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纪大灾难

 **eBOOK**
网络资源 非精英

灾难，本世纪的焦点（代序）

在世纪末谈论灾难，有人也许首先会想起《圣经·启示录》里的话，“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哉，祸哉，祸哉！”；还有人会想起诺查丹玛斯那本著名的预言书《诸世纪》以及他所预言的世界末日。当然，同先知们的话相比，人们更关心现实中的灾难。

其实，只要翻开历史就会发现，所谓“末日”的征兆并不少见：战争、地震、洪水、瘟疫等等，一直伴随着人类。而在本世纪除了这些灾难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外，又增加了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能源危机、人口爆炸、粮食短缺、恐怖主义、毒品、核污染等新的天灾人祸，其中许多又可以归结为人祸。人的力量的确可以而且已经改变了人的生存环境，但同带来的益处相比，有些灾难性的后果却更加影响深远。

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类可以说是从灾难中发展起来的，所谓“生于忧患”。鼠疫曾在欧洲横行三个世纪，在人们改善了卫生条件以后，它就迅速消失了。相信“人定胜天”者认为，人类总是能度过难关的，只须埋头大步向前。这类人大致是不相信增长也有极限的，他们习惯于在灾难发生后再考虑其“善后”和“改进”。“人定胜天”假设了一种人与自然的敌对关系，结果天（臭氧层）真的也被戳了一个大洞。这还不算，地下核试验震得大地塌陷，核泄露把放射性物质吹向全世界，更不用说足够摧毁地球几十上百次的核库存了。“天”真的不是人的对手了吗？

或者，这种极端的提问正在使我们接近灾难的实质。人们关心灾难，或许是因为灾难往往触及到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敏感之处，灾难其实也是无所不包的。

研究灾难的人会发现，灾难不可能被完全消灭，却可能被人为地扩大。这注定了人在“天”的面前必须持一种谦恭的态度。顺应自然，才有可能利用自然。

这并不是说，在灾难面前人只能束手待毙，而是说，如同人与人一样，人与“天”也需要对话。独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灾难是自然的一种语言，人类应该倾听。

二十世纪仅有数载。我们从一百年来的灾难中挑选出十三个具有典型性的汇集成本书。我们同所有具有善良本性的人一样希望，灾难不仅毁灭着人，也总是促进着人类进步；研究灾难，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战胜灾难。

编者
1996年6月

冰海沉船

1912年：英国“泰坦尼克”号沉没惨案
概况：在本世纪接踵而至的大灾难中，第一个震惊了全

世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灾难就是“泰坦尼克”号沉没惨案。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世界上最大的客轮、号称“永不沉没”的远洋巨轮“泰坦尼克”号意外地撞上一座冰山，于次日凌晨沉入洋底。船上仅有六百九十五人得以生还，另外一千五百一十三人葬身大海。惨案和很多可歌可泣的场面使世人久久无法平静。“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充满神秘和巧合，至今人们仍不断提出惊世骇俗的说法。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全世界各大报纸头版以大字标题沉痛宣告：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晚二十三点四十分，世界上最大的客轮、号称“永不沉没”的英国银星公司超级远洋客轮“泰坦尼克”号在其驶往美国纽约的处女航途中撞上一座冰山。

次日清晨二点二十分沉入洋底，出事地点在纽芬兰的大浅滩以南九十五公里。六百九十五人——其中多为妇女和儿童——多是爬上了救生艇得以生还外，另外一千五百一十三名乘客与船员葬身大海。

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华盛顿的美国上院裁定：在“泰坦尼克”号超级远洋客轮灾难性的沉没事故中，操作人员玩忽职守。

一九一三年四月十五日，为纪念“泰坦尼克”号超级远洋客轮遇难一周年，美国纽约举行了灯塔落成仪式。

巨轮的沉没有许多神秘之处，至今人们仍不断提出奇异的解释。沉没中出现很多可歌可泣的场面，震惊了全世界。“泰坦尼克”号沉没惨案是本世纪第一个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和思考的不幸大灾难。

“不沉之船”：不幸的处女航

“泰坦尼克”号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船。豪华富丽、极尽奢靡的客轮。“泰坦尼克”号犹如刚刚出阁的少女，漂亮、沉稳、丰满、楚楚动人。恐怖正在大海中等待这位雍容华贵的海上女王。实业家欧纳是唯一一个因为预感而没有登船的人。头等船的乘客尽是显贵富豪。

“泰坦尼克”号巨型客轮是英国银星轮船公司的骄傲。虽然它被誉为“海上最大的船”，但并非独一无二，它的姊妹船“奥林匹克”号客轮和它大小一模一样。

银星轮船公司在英国有一家强劲的竞争对手英国古娜海运公司。古娜海运公司在一九一七年建造了一艘“摩尼达尼亚”号巨型客轮，创下了横渡大西洋的纪录。

银星轮船公司一直想推出更大型的巨轮，打破竞争对手“摩尼达尼亚”号创下的纪录。

一九一一年五月，银星轮船公司以当时货币七百五十万美金的巨资，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开始兴造，一九一二年三月建成。

“泰坦尼克”号吨位四万六千三百二十八吨，排水量六万六千吨，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超过四万吨吨位的客轮。船长二百五十九米，最大宽度为二十八米；船舱重量超过一百吨，一共有三只桨，中间最小的桨二十二吨重，两侧的桨则有四十吨重，叶长七米。这个钢铁庞然大物的航行速度可达每小时

三十海里（约五十五点六公里）。

“泰坦尼克”号是当时最先进、最科学的设计产物。它建有双层船底，船的内部有利用水密室建造的十六个密封舱室。这种水密室装置可以利用电气或人力，将浸水受害的程度减至最低，即使其中的四个密封舱室破裂而灌满了水，也无关紧要。

银星公司告诉新闻界，“泰坦尼克”号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船。

“泰坦尼克”号还是一艘豪华的船。客轮上下共十一层，拥有七百六十二个舱室、七公里长的走廊和游步甲板。船上有超水准的豪华餐厅、酒吧、吸烟室、游戏厅、游泳池等等，设备均极尽奢靡华丽。客舱内装饰着高级灯饰、铺着厚厚的地毯，甚至连天花板也炫人眼目。如同一个豪华都市的缩影，一座壮丽而巍峨的海上璇宫。

银星轮船公司决定“泰坦尼克”号处女航由 J·E·史密斯担任船长。史密斯胡须银白、慈眉善目，在银星轮船公司工作了三十八年，是该公司最有经验的船长。

他近来的工作很简单，专门指挥银星轮船公司所有的新船进行处女航。公司由于他丰富的经验而将此重任交给他。指挥“泰坦尼克”号首航横渡大西洋是他为银星轮船公司作的最后一次服务，史密斯船长心情很激动，他打算此行归来便告别航海生涯。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星期三，英国的南安普敦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港湾风和日丽、波平浪静。眼前的“泰坦尼克”号犹如刚刚出阁的白衣少女，漂亮、沉稳、丰满、楚楚动人，五彩缤纷的纸带飞扬在空中，从她身上连接到陆地。

午后一点，随着一声嘹亮的汽笛长鸣，照像机的镁光灯不停地闪着，送行和观看的人群响起如雷的欢呼声。新的海上女王“泰坦尼克”号起锚，慢慢地离开码头，驶向蔚蓝色的大海。然而，欢乐、惜别的气氛中，谁能想到，恐怖正在大海中等待着这位雍容华贵的女王。

英国著名的实业家约翰·欧纳是唯一一个因预感而没有登船的人。他因为一笔商业贸易必须赶赴美国，好不容易弄到一张“泰坦尼克”的头等舱船票。动身前十天，欧纳连续两个晚上都做了同样一个可怕的梦。梦中他看见“泰坦尼克”号沉没于大海之中，许多大人和孩子被无情地抛向海面。欧纳被这个梦困扰着，感到十分不安，终于取消了旅行。

“泰坦尼克”号预定单程时间七天。经英吉利海峡后，“泰坦尼克”号于第二天驶达爱尔兰的昆士敦港作短暂停泊。由于船员在离港前最后一分钟的变化，以及旅客数字报告中的差异，“泰坦尼克”号上的人数统计至今仍不够确切。据估计，船上共有二千二百零八人：船员八百九十二人，乘客一千三百一十六人，其中——头等舱的乘客为显贵人士，有银星轮船公司总经理 J·布鲁斯·伊斯梅，威廉·爱德华·塔夫脱总统的贴身顾问阿奇博尔德·W·巴特少校，原国会议员、梅西公司总经理伊萨多·斯特劳德，美国百万富翁本杰明·古根海姆，“泰坦尼克”号的总设计师托马斯·安德鲁，约翰·阿斯特上校和他年轻的新娘等。二等舱乘客为八百名中等阶层的游客和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三等舱的乘客聚集在“泰坦尼克”号的公共起坐厅里、走廊里和楼梯上，估计为四百六十二名男子、一百六十五名妇女和七十九名儿童。其中大多数是不懂英语的德国及瑞典年轻工人和移民，他们较为贫穷，准备到美国这个“新世界”去谋生计。

海上风平浪静，“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中顺利地航行，史密斯船长执行了银星轮船公司每艘新船都要慢速前进的规定，使“泰坦尼克”号以每小时二十二海里（约四十点七公里）的保守速度前进。在当时照这种速度，仍可能创下横渡大西洋的最快纪录，船长和船员们都十分兴奋，而乘客们也正享受着舒适愉快的海上之旅。

“轻微的一颤”：撞上冰山

“泰坦尼克”号毫无反应，这个庞然大物溜过“加利福尼亚人”号身旁，向危险的冰山驶去。水手们为那一夜明亮的星光而感到惊奇。“冰山！就在前面！”，“主啊，圣母啊！”

就像一把锋利的罐头刀切开罐头一样。声音就像有人在撕一条长布。正是这“轻微的一颤”，毁灭了海上巨轮。

那年冬天是几年来最暖和的冬天，人们记得，一九一二年从北极崩裂后随拉布拉多水流飘入大西洋的冰山特别多。白色的冰山飘浮着，就像被逐出家园、四处游荡、心怀忿忿的流浪汉。

银星轮船公司根据所有关于冰山的情报，特意为“泰坦尼克”号标出一条偏南的能够安全航行的航线，不幸，这正是一条“死亡之旅”的路线，白色的“流浪者”已经向偏南的方向漂去。

几份观测到冰山新动向的报告都没有经无线电传来，由于收到的报告说最近的冰山尚在二百五十英里（约四百零二点六公里）之远，史密斯船长毫不犹豫地按即定航线以每小时二十二海里的速度向冰山驶去。此时是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泰坦尼克”号航行的第五天。

上午九时。“卡罗莱娜”号轮船发来电报：“泰坦尼克”号船长——西行轮船报告：在北纬四十二度，西经四十九至五十一度处发现有冰山、小冰山和冰原冰。

致意——巴尔。

译电送到船桥，交给了船长史密斯，史密斯回电：“谢谢！”

正午，“波罗的海”号轮船发来电报，称“泰坦尼克”的航线上有冰山。电报员杰克·菲利普斯将译报交到船桥。史密斯船长看后将译报递给银星轮船公司总经理伊斯梅。伊斯梅正陪两位妇女散步，看后将译报塞进口袋，告诉两位妇女关于有冰山的事情，继续散步。

傍晚，报务员哈罗德·布赖德收听到离“泰坦尼克”最近的荷兰轮船公司客轮“加利福尼亚人”号呼叫告知冰山的消息，布赖德正忙于盘帐，未记下电文。

晚上二十一时四十分，在“泰坦尼克”号正前方航行的“美萨巴”号发来电报，告知已经发现冰山，并强调：“发现沉重的浮冰块和无数硕大的冰山，还有冰原冰。

天气晴朗。”

无线电报室一号发报员约翰·乔治·菲利普不知道自己船的航行位置，无法判断距冰山多远，这样的警告当天又有很多，他决定暂不上交。他继续忙着拍发旅客电报，旅客中有许多电报要由他发往纽约，以便船抵达时有人来接。

晚上二十三时三十分，大副墨多克站在船头铁栏杆旁。船头高出海面

六十九英尺。另一名了望哨弗里德韦克·佛利特在桅楼守望台直视前方。

离后来的沉没地点约八英里（约十公里）处的“加利福尼亚人”号，因害怕冰山停泊在那里。二十三时三十分前，电报员西里尔·F·埃文斯试图叫通“泰坦尼克”号，告知遇阻冰山的消息，然而“泰坦尼克”号毫无动静，二十三时三十分，即规定的下班时间，埃文斯关上了报话机，回舱睡觉。三副看到了“泰坦尼克”号径直驶来，他向船长作了报告，船长命令用摩尔斯灯光信号联络，但信号发了好几遍，“泰坦尼克”号毫无反应，这个庞然大物溜过“加利福尼亚人”号的身旁，向危险的冰山驶去。

此刻，海平线如一把刀锋般的发亮。群星沉落，从海平线射出一道半明半暗的银色的光。大副墨多克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可能出现冰山，他甚至命令一位名叫海明斯的灯光管理员熄灭舱口的灯光以免影响视野。

“遗憾的是，我们经过冰区时没有起风”，如果当时有海风，会在冰山处掀起汹涌的波涛，就会被了望哨及时发现。然而当夜，没有一丝风，水手们为那一夜明亮的星光而感到惊奇。

几分钟后，突然，了望哨佛利特看见有什么东西出现在正前方，一个“巨大的黑色物体”，比夜更暗。那物体开始时只有两张桌子大小，但每一秒钟都在急剧扩大，飞快地扑来，已经凸出水面四十至五十英尺。佛利特迅速冲向警钟，连续敲响三次——死亡妖怪就在前方！同时，佛利特抓起了直通指挥船桥的电话，大喊：“冰山！就在前方！”

“主啊，圣母啊！”墨多克小声祷告，迅速扑向传令钟。他使劲拉响传令钟，发出“停驶”信号，然后转过身来，朝舵手罗伯特·希金斯大吼：“右满舵！”

在轮机舱的希金斯使尽全身力气旋转舵轮，并瞅了一下了望台的大钟，时间是二十三时四十分。他看见冰山约在前方零点二五英里的地方。“泰坦尼克”号向左舷缓慢滑动，但前进速度仍是每小时二十二海里。

水手们称之为“乌鸦窝”的桅楼里，佛利特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睁睁地看着那“黑色物体”越来越大，赫然逼来。好像过了无限长的时间，“泰坦尼克”号终于转头向右，开始绕过冰山。

冰山急速地向右舷漂来。希金斯已经将全身压在舵轮上，他感到舵轮已经打不动了，对墨多克大喊：“满舵右！”，墨多克高声嚷道：“右满舵！”

墨多克感到前桅有点朝前摆动，船身两侧也开始有点振动。

但没有任何人知道一座冰山的山嘴此时像一把利刃一样突出水下。“泰坦尼克”号向它压来，相撞发生了。冰山山嘴就像一把锋利的罐头刀切开罐头一样，把“泰坦尼克”号船身割裂。

仅仅过了十秒钟，冰山就漂过去了，但冰山已在吃水线下切进了船体，撕开一道三百英尺长的口子，割裂了三个底舱和两个锅炉房。

冰山在“泰坦尼克”号龙骨之上三米、船身的前三分之一处，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最先看见裂洞的是在吃水线以下的前锅炉房的锅炉工，他们先听到机舱车钟里传出的“全速后退”的刺耳喊声、报警器的噪叫声和红灯的频频闪烁，过了约三十秒钟，传来了“吱吱嘎嘎”的声响，紧接着海水就从裂开的壳板涌进了锅炉房。

锅炉工弗雷德里克·巴雷特当时正在六号锅炉房给锅炉添煤。

该锅炉房在船的最底部。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翻着泡沫的海水一下子从船体的侧壁、离地板大约二英尺的地方涌进来。六号锅炉房右舷一侧

的整个壁板被掀开，五号锅炉房的储煤舱壁也受到了较为轻微的损坏。水密舱响起警钟，水密门开始降下。巴雷特赶在水密门“眶唧”一声关死之前跳出来，进入五号锅炉房。

此刻，乘客们没有被惊动。当冰山从旁边漂流过去时，头等舱里的乘客看到这种景象还颇觉有趣。二等舱的乘客却比较注意，冰山贴船身擦过，大块冰渣掉进开着的舷窗口。而三等舱的乘客完全感觉到了碰撞的影响，被猛地抛了一下，他们觉得很恐怖。

“泰坦尼克”号的设计者安德鲁在自己的舱室听到了微弱的撞击声，他马上来到了望台。冰山远去了，许多人都觉得“泰坦尼克”只是轻微地颤了颤，一些船员还庆幸躲过一场大难。

一名叫乔治·罗的幸存下来的舵工后来心有余悸地说：我觉得船发生了一次奇怪的颤抖，我知道出事了。我感到就像掉进了冰窖那么寒冷，连呼吸都要冻住了。

接着我看见了冰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它。

事后有人说，当时只听到一种摩擦声，听起来就好像有人在“撕一条长布”。

正是这“轻微的一颤”，毁灭了海上巨轮。

无援的死：“泰坦尼克”号的呼救与沉没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船的内部设计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大难临头，“泰坦尼克”号却还没有打算发任何求救信号。只有九十分钟船龄了。这是一封震惊世界的电报。“快来，危险！救救我们的灵魂！”“见死不救”的“加利福尼亚人”号。巨轮继续头朝下斜着下沉，四个大烟囱指向缀满繁星的夜空。一个小时后，“卡帕西亚”号出现了。

摩擦声过后，船长史密斯从舵房旁的舱室赶到船桥上，急促向大副墨多克询问。

“冰山，船长。我向右打满舵，并开了倒车，但船离冰山太近，我没有别的办法。”

“关闭水密门！”史密斯命令道。

“已经关闭了，船长。”墨多克答道。

“中速前进！”史密斯接着发布命令。然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巨轮的继续前行将海水从巨大的裂口人为地压进了船身。

史密斯船长发现船壳破裂以后，并没有丝毫惊慌。他认为，依船的设计即使船前四个水密舱全部进水，船也能保持不沉。但史密斯还未意识到冰山一下子撞破了五个水密舱。船的内部设计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第五号舱的舱壁并没有像其它舱壁一样延伸到船的顶端。如果前四个水密舱灌满水后，船头下沉，海水漫过第五号舱舱壁流入第六个水密舱，接着流入第七个、第八个舱，船也会沉没，而事实正是如此。

二十三时四十五分，船首底部已是水声大作、波涛汹涌，然而，乘客的舱室却是一片寂静。有些乘客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披着睡衣打开舱门到处张望，纷纷询问出了什么事。船上的服务员回答到：“什么危险也没有，太太。用不着担心，先生，请你们放心休息吧！”

可是接着，邮件舱里的各种各样的邮件不停地滚来荡去，水已经漫过了邮件舱职员的膝盖。“泰坦尼克”号船体已轻度倾向右舷。

二十三点五十分，海水开始灌向三等舱。船的摇晃加剧，船内的器皿撒得满地都是，玻璃的破碎声夹杂着乘客们悲惨的叫声。大难临头，“泰坦尼克”号却还没有打算发任何求救信号。

史密斯船长和设计师安德鲁从船员专用楼梯通道下到船的底部检查受损情况。

他们发现，虽然所有的水密门受到碰撞影响后都已自动关闭，但情况危急，已无法补救。海水已经高出船的龙骨水平面十四英尺，船首舱、一号货舱、二号货舱、六号锅炉房、五号锅炉房、邮件舱等至少六个隔水舱均已进水。总长约九百英尺的船体已出现一道长达三百英尺的裂口，有五个隔水舱已毫无希望地灌满了水。

这一切意味着，“泰坦尼克”号已经在劫难逃，将向大西洋一万三千英尺深的海底下沉。安德鲁估计“泰坦尼克”号只有九十分钟的船龄了，除了他、史密斯船长、高级船员及修理工们，全体船员对“泰坦尼克”号遭受破坏的程度均一无所知。

史密斯船长下令“全体甲板集合”。船员全体出动，奔赴各个舱面，其中三百二十五人下到底部进水处堵漏，其他人员奔赴各自岗位坚守。

乘客们开始走向甲板集合。除了陷于一片混乱的三等舱乘客外，一等舱、二等舱的乘客们一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说话轻声细语的服务员彬彬有礼地请他们离开船舱，“请带上救生衣。”

成百上千的人们穿着毛衣、浴衣、皮衣和睡衣就来到甲板上，这里没有惊慌失措的气氛，宽阔的甲板让人觉得踏实。

“泰坦尼克”号开足马力全速前进，然后突然停船，令人不安。蒸汽机吼叫着，从四个巨大的烟囱共排气四次，声音如高炉爆炸一般。乘客们自上船以来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开始惊恐起来，“难道冰山……这可能吗？”，难道“不沉之船”真会沉没？

服务员们超乎寻常的泰然自若。“只是临时停船而已”当惊慌的人们询问为何熄火停船时，他们答道，“几小时后我们会启航，是一次小修理，请放心。”

史密斯船长沿着救生艇甲板左舷跑进无线电报房，命令一号电报员菲利普发出遇难呼救信号CQD，向附近海面上所有的船只求救。

此刻是次日零点十四分，是在与冰山相撞后的第三十四分钟。这个命令早就该下达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宝贵的三十四分钟。

菲利普跳到发报机前，疯了似地按动电报机键：“泰坦尼克”号被冰山撞沉，请求立即救援，位置：北纬四十一度四十六分，西经五十度十四分。

这是一封震惊世界的电报。

此时离“泰坦尼克”号仅十公里的“加利福尼亚人”号电报员埃文斯已下班回去睡觉，于二十三点三十分关掉了无线电。

第一个发出回电的是距离第二近的“法兰克福”号。回电称“你们等着”。此后，便再无任何音讯。事后，美国调查团团长对此疑惑不解：“会不会是‘法兰克福’号的电报员不懂英语？”

“CQD（当时国际规定的求救信号）谁都懂”，“泰坦尼克”号二号电报员布德雷回答说，“他不过是不懂得他的职责罢了！”

当晚，大西洋过往船只很多。但是许多船只没有赶来营救，不是因为收到“泰坦尼克”号的呼救信号，就是因为距离太远。银星轮船公司的姊妹船“奥林匹克”号正在五百英里远处，即使全速赶来，也来不及了。

“奥林匹克”号要求“泰坦尼克”号报告具体位置。菲利普作了回答，同时电告：“‘泰坦尼克’号致电‘奥林匹克’号：我们正把妇女弄上救生艇。”

“上救生艇。”“奥林匹克”号船长叹了口气，“我的上帝，它正在下沉。”“奥林匹克”号致电“泰坦尼克”号：“我们正点燃每一只锅炉，全速向你们靠拢。”

第一个到达海难现场——“泰坦尼克”号沉没一小时后——的却是一只锈迹斑斑的旧船：丘纳德公司的“卡帕西亚”号，它的船体在这次以多年未有的高速度航行的救援中颤抖：午夜零点二十分，“卡帕西亚”号电报员H.T.科塔姆正准备躺下睡觉，他突然想接通“泰坦尼克”号，他打开无线电报话机，轻轻打出“泰坦尼克”号的电报编码——“MGY”，从茫茫黑夜中传来的竟是一串可怕的字母：“CQD、CQD、SOS、SOS！（快来，危险！救救我们的灵魂！）速来，我们撞上了冰山。方位北纬四十一度四十六分，西经五十充十四分。CQD、SOS！”

午夜零时三十五分，“泰坦尼克”号收到“卡帕西亚”号拍回的电文：“已改变航向，正全速行驶。”然而船长史密斯知道，要等四个小时以后五十八海里远的“卡帕西亚”号才可能赶到。

进入冰原地带，“卡帕西亚”号船长罗斯德隆也拒绝减速，“卡帕西亚”号左避右闪，绕过一座又一座冰山，全速向“泰坦尼克”号冲来，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越野赛跑运动员在作最后冲刺一样。罗斯德隆船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卡帕西亚”号是一条时速为十四海里的船，然而那天夜里，她以十七海里的时速行驶了近三个半小时。

“CQD”是传统的海上遇难呼救信号，而一个国际会议刚作出决定，建议使用“SOS”信号。半夜，菲利普又改换信号，拍出历史上第一个SOS信号。

无援的船长史密斯命令发射火箭，红色和白色的遇险信号火箭不断升上天空，希望过往船只发现。“加利福尼亚人”号的船长和值班长看见了这一信号，但他们以为那是这艘豪华客轮上举办的晚会灯光，不认为是呼救信号。其实，船长这时可以叫醒无线电员，让他搜索无线电信号以作出准确判断，然而，船长洛德优先考虑的是睡觉。

据“泰坦尼克”号幸存者之一阿德博多德上校回忆，当时人们甚至看到了这条“见死不救”的“加利福尼亚人”号：在左舷靠近船尾的A甲板上，早已聚集了很多男人和女人，斯特劳斯上校和太太等其他人也在其中。为了安慰专门由我负责照顾的女士们，我指给他们看约五英里开外的一束明亮的白色灯光，我相信那是一条来搭救我们的船。然而灯光不是越来越亮，而是越来越暗，以至完全消失了。

凌晨二时十五分，菲利普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泰坦尼克”号致电各船：发动机房进水，锅炉被淹没……CQD、CQD、SOS、SOS……突然，一声巨响，锅炉爆炸，飞离底座。“泰坦尼克”号猛烈颤抖起来，船尾翘起，几乎与海面成直角，所有可移动的东西都挣脱出来，二十九个大锅炉、四万六千件瓷器、二万七千瓶啤酒和矿泉水、五个大钢琴、二万六千个银碟和银托盘、四十四吨肉禽、四十吨马铃薯、三十箱高尔夫球棍和网球拍、五吨白糖、三万五千吨鸡蛋，以及若干吨煤和若干粗大的锚链，尽数轰隆隆地倾泄入水中。

一英里之外的七号救生艇上的乘客劳伦斯·比斯利说，
我们惊恐地注视着她缓缓地抬起船尾上翘，显然是绕着船中偏后的某个重心旋转，并且垂直竖立起来，然后她就那样呆立那儿，一动不动了。

巨轮继续头朝下斜着下沉，四个高达一百七十五英尺的大烟囱指向缀满繁星的夜空，船上的乐队开始奏圣歌。逃生的人们不时听到锅炉和发动机从底座上撕裂和其他钢铁扭曲的声音。倾刻间，支撑第一只烟囱的支架垮了。巨大的烟囱如一只火箭一样腾空弹起，翻转砸向水中挣扎的人们。

在海水和轮船自身巨大吨位的压迫下，被人们一直称誉的水密舱室彻底地崩溃了，一声长长的、隆隆的爆炸巨响传向远处的海面。巨轮全部的灯火顿时熄灭，突然又灼目地闪了一闪，然后永远地熄灭了。

一切都陷入了险恶的黑暗之中，嘈杂声停息了。一分钟后船的下滑加快了速度。

凌晨二点二十分，海水淹没船尾的旗杆，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吞没声，“泰坦尼克”号彻底沉没。

一个小时后，“卡帕西亚”号出现了。它发射着火箭，向幸存者表示它即将赶到。

而海面上漩涡早已消失，一切显得平静，“泰坦尼克”号已经静静地安卧于海底墓地。沉没后仅仅十一分钟，“泰坦尼克”号就撞到了大西洋的洋底——它永远的安息处。

“上帝离你更近”：1513名死者与695名生者

救生艇少得可怜。遵循古老的航海传统，孤助无援的船长决定与船一起沉没。“就是沉到海底也要像一位绅士！”。贪生怕死的银星轮船公司总裁。一位已坐上救生艇的女士起身离座，毅然回到了“泰坦尼克”号。在救生中人们没有抛弃嫌贫爱富的思想。电报员保持着不停地拍发“SOS”的姿势，直至最后一刻。

人们突然像糖果一样撒进大海。渐渐地，冰冷的海冰使他们僵硬，不再动弹。最后，乐队在船上奏起一只古老的圣歌——《上帝离你更近》。

史密斯船长在得知沉没无法避免时，首先做的不是下令发出国际遇难求救信号，而是来到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舱室，为的是在通知其他乘客之前通知他。

史密斯还亲自一一通知了一等舱的显贵们，彬彬有礼地关照他们：“请套上救生背心。”

服务员们也得到命令开始挨舱叫醒所有乘客，传达船长的指令：“所有人都穿暖和些，套上救生背心，然后全部上甲板集中，妇女和儿童会得到照应的。”

一等舱的乘客首先汇聚到甲板上，他们集中于船的中央甲板。二等舱的乘客集中于稍靠船尾的甲板。三等舱的乘客被安置在船尾和靠近船首的甲板上。

慌乱中人们几乎抓到什么就穿什么，宽阔的甲板使他们稍稍镇静下来，站在各自的甲板上等候下一道命令。

史密斯船长下令，解开所有救生艇的苦布。

英国商务部早在一八九四年制定的航运法则条文中明确规定了一万吨以上的客轮应备有的救生艇数目。而“泰坦尼克”号吨位达四万六千三百二十八吨，能载二千三百人，救生艇却少得可怜，仅仅二十只，最多能载一千一百七十八人。

刚开始时，很多接近半疯狂状态的乘客，争先恐后地想登上救生艇。当所有的人都明白救生艇不够后，男人们决定依海上规则，先把妇女和儿童送上救生艇，男人中的大多数则留在船上。

等待其他船的救援。

面对死亡，人们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遵循古老的航海传统，孤助无援的船长史密斯决定与船一起沉没，他把船旗卷起来，塞进口袋，坚定不移地站在了望台上。

设计师安德鲁也决定与自己的作品——“泰坦尼克”号一同沉入洋底。

作出同一选择的还有富豪伊萨多·斯特劳斯、百万富翁本杰明·古根海姆、记者威廉·斯特德等。

其中，古根海姆的豪言至今为人们提及。他和男秘书回舱重新换上了晚礼服，宣称：“就是沉到海底也要像一位绅士！”他让人们给他在美国的妻子带个口信：“告诉她，我的举止非常光明磊落，直到最后。决不会有哪个妇女因为本杰明·古根海姆是个懦夫而被留在这条船上。”

而银星轮船公司总经理布鲁斯·伊斯梅此时却贪生怕死。“泰坦尼克”号的一位司炉工哈里·西尼尔回忆道——我是躺在自己的舱室中感受到猛烈撞击的。有人高叫：“船被撞了！”我跑上甲板，看见有一大块冰横在船头，知道船撞上了冰山。

可我们都以为船肯定不会沉，所以又都回到各自的船舱。这时又有一个司炉工跑下来喊：“乘客都上救生艇了，你们怎么还呆在这里？”我连忙奔到甲板上，船长对我们说：“所有的人都到主甲板集中，谁乱跑我就枪毙了他！”这时我看见第一艘救生艇正放入海中，乘客是十一个男人和二一个女人，其中三个是大富翁，银星轮船公司的总经理伊斯梅就在其中。

新婚燕尔的里德帕丝同丈夫一起去美国作蜜月旅行，她不愿离开丈夫独自逃生，死死抱住丈夫不放。丈夫在万般无奈中一拳将她打昏。等里德帕丝醒来时，她已在一条海上救生艇中了。此后，她终生未再嫁，以此铭记亡夫的一片深情。

一位史密斯夫人在瑞士洛桑的幸存者聚会上回忆了令人感动的一幕——当时我的两个孩子被抱上了救生艇，而由于超载我不能上去了。出于母爱的本能，我喊了一声：“让我上去吧，孩子不能没有母亲！”听到我的呼喊，一位已坐上救生艇的女士起身离座，回到了“泰坦尼克”号，把我推上了救生艇。没多久，“泰坦尼克”号沉下去了。那位女士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

而对生死离别，一位新郎对他的新娘强作欢笑：“没问题，我的小姑娘，你上艇吧。我再在这儿呆一会儿。”达夫·戈登女士几次拒绝登上救生艇，和丈夫并肩站在甲板上，众人多次请求，戈登夫人最后深情地看了丈夫一眼，登上救生艇。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朝他的妻子俏皮地笑了笑：“等一会儿再见。”

一对非常恩爱的白发夫妇亲吻着，默默地相互凝视，再吻一下，等“老太太”上了救生艇，老先生却悄悄地躲进甲板上的人群里去了。

有一位幸存的妇女说起这样一件事：“上救生艇时，从人群后面冲过来

一位银发飘拂的老太太，只见她排开众人，首先跳上小艇。后来小艇漂流时，一阵风吹来，“老太太”头上的银发突然掉下来，原来是一个健壮的男人。”

一名叫纳瓦特利尔的法国人，没告诉妻子就将两个小儿子带上了“泰坦尼克”号。两个孩子被送上了救生艇，纳瓦特利尔先后帮助几名妇女登上救生艇，自己却拒绝上艇，行为十分高尚。

两个儿子得救后却无人知道他们是谁家的孩子，世界各地的报纸纷纷登载这两个孩子的照片，直到他们的母亲从照片上认出了他们。孩子却永远失去了父亲。

有两个富翁，面对自己的满箱珠宝，其中一个看也没看一眼，只取了三个橙子放进口袋；而另一个死死抱住箱子，直到从倾斜的巨轮上滚入冰海。

一位年轻的学者洛伦茨·贝斯利，于凌晨一时三十分和另外三名男性乘客经允许上了一条救生艇。他后来报告：尽管当时救生艇还可以容纳下十个人，但“泰坦尼克”号的五副洛伊竟“砰”地开了一枪，驱走了小艇旁的几个意大利贫穷移民，洛伊还一边骂这些移民是“一帮野兽”。

有些人抱着侥幸心理，宁愿呆在灯火通明的客轮上，而不愿在黑暗的救生艇上受苦冒险。救生工作进展缓慢，不少指挥人员呼唤着妇女和儿童，但反应迟缓。康斯坦斯·威拉德女士几次拒绝别人的救助，一位被激怒的指挥员最后说：“别浪费时间了，她不愿上就随她去。”

在救生中，人们仍没有抛弃嫌贫爱富的思想。人们没有平等地对待一等舱和二、三等舱的乘客。没有人检查一下二等舱、三等舱的乘客是否都被叫醒，都到了甲板上。

三等舱的许多男人、妇女和儿童还在迷宫般的通道、走廊里乱转，找不到楼梯和出口，等他们摆脱翻涌的海水登上第七层船甲板时，救生艇已经全部开走。妇女们放声哭泣、祈祷，孩子们则一声声“妈妈、妈妈”地尖叫不止。

穷人中的妇女和儿童，并没有按规定得到应有的救生艇名额。一等舱的妇女有百分之九十七脱险，三等舱却只有百分之四十六的妇女脱险；一、二等舱的三十名儿童全部得救，而三等舱七十九名儿童中竟有五十三人因没有被送上救生艇而葬身海底。

显贵者坐的救生艇根本就不满额。一只救生艇本可以载六十人左右。他们乘坐的几条救生艇最先放下去，每条只坐了十几或二十几个人。而后来的救生艇由于混乱，有的挤着七十人，有的却只有五十来人。二十条救生艇中竟有二条没放下去，有的还在溜放过程中被弄翻在海水中。救生组织得太让人痛心，本来可以救出一千一百七十八人，却仅有不到七百人坐上去。

坚守岗位的船员十分悲壮：船员全体在甲板集合后，依船长命令，三百二十五人下到底部堵漏、坚守岗位，这些司炉工、供煤工、轮机手和机械师始终没有离开深不可测的船底，尽管他们比谁都清楚厄运已步步逼近。随后，他们被水密门封在下面，已与外界隔绝，但他们仍然在岗位上坚持到最后的一息，三十名机械师全部殉职。其余绝大多数工人也一同罹难。

五十多名高级职员除指挥救生的年轻二副莱托勒幸存外，均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其中，在凌晨二点时，一号电报员约翰·菲利普接到船长的命令：“弃船，各自逃生”，但他仍坐在发报机房，保持着不停地拍发“SOS”的姿势，直至最后一刻。

到后来，连说声“再见”时间都没有了，人们明白“泰坦尼克”号正失去任何指望，许多船员和乘客开始跳海。司炉工西尼尔后来回忆道：我看到一位意大利妇女抱着两个婴儿站在船舷边惊恐地瑟瑟发抖，于是我跑过去接过一个婴儿，并帮助这个女人抱着另外一个孩子跳到海里。我也跳了下去，当我浮上水面时，发现怀中的婴儿已经死去。那位妇女正以一种优美的姿势划着水，我朝她游过去。

就在这时，“泰坦尼克”号的一台锅炉突然剧烈爆炸，无数碎块落入海中，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等海面平静下来，我再也没能找到那位意大利母亲和她那个孩子。

我松开了抱着死婴的那只手。

此时大西洋海水的温度是零下四度，由于海中含盐，尚未结冰。寒冷如无数刀子扎向跳、落水的人们。“泰坦尼克”号巨轮急剧的旋转掀起了汹涌的波涛，形成巨大的漩涡。两只刚刚放下的救生艇被漩涡卷向海底。漩涡中尽是破碎的门窗、散架的家俱、板子、箱子、绳索和折叠躺椅，许多跳海、落水者在其中苦苦挣扎。

从救生艇上看去，在倾斜的“泰坦尼克”号上，人们如蜂群般紧紧地趴在甲板室、通风装置以及绞车上。随着船尾翘得更高、船首扎得更低时，挣扎的人们突然像糖果一样撒进大海。

“她还是沉没了，这是她最后的时刻。”十三号救生艇上有人叹了一口气，对了望哨雷金纳·李说道。

D·H·比肖普夫人记得，当时有几只救生艇想往回驶去，救起那些侥幸游出淹没处的人，但很可能被水中的人弄翻救生艇，只得作罢。

惨淡的星夜下，是一幅恐怖的画面。四下的海面上覆盖着各种残骸和几百上千的男女，儿童，这些人还在挣扎着。渐渐地，冰冷的海水使他们僵硬，不再动弹。

一层薄薄的灰色水雾笼罩着几英尺高的海面上空，就像死者灵柩上的一件灰衣。

幸存者阿奇博尔德在回忆中写道：

从那里升上天空的是人们恐怖的喊叫声——从一千多张喉咙中发出的垂死的痛苦呼喊，幸存者的恸哭和呻吟，被折磨疯了的人的尖叫以及溺死前发出的骇人的大口大口的喘气声。我们之中不会有一人能够忘却，直到我们去见上帝的那一天。

“那些呼喊的声音”，另一位幸存者，乘客劳伦斯·比斯利说，“起初声音很大、很多，慢慢地，它们一个个地消散了。然而那天夜晚很晴朗，寒冷无风，海面平静。那些声音沿着平静的水面，一直传到好几英里以远的地方。”

“泰坦尼克”号上有一只乐队，七位音乐家在华莱士·哈德利指挥下，当人们登上救生艇时一直在甲板上演奏爵士乐。“泰坦尼克”号开始沉没时，他们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祈祷灵魂的昂扬激越的旋律，“伦敦德里的空气”的怀乡之歌和赞美诗“秋天”，直到水漫双膝。最后，幸存者听到他们奏起一只古老的圣歌，那就是《上帝离你更近》。

“神秘”的沉没：众说纷纭

的“‘泰坦尼克’之谜”

人们简直不敢相信，小说描写的故事竟真的发生了。有不少人预知沉没将会发生。木乃伊的诅咒。

“泰坦尼克”号并未沉没，是轮船老板们策划的一个大骗局——波兰电影《十诫之一：不可信仰其他的神》。

“泰坦尼克”号没有深照灯和望远镜。船上有二十亿美元的财富。人们有幸看到了七十三年前这艘豪华巨轮孤沉深渊后令人伤感的身影。父亲向她挥手，并与滞留甲板上的人群齐声高唱赞美诗。

“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全世界为之震惊，各种猜测纷纷出笼，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提出惊人的“说法”。

一八九八年四月，在英国的南安普敦港，一艘豪华客轮即将开始她的处女航。

这艘全长二百四十米，排水量七万五千吨的豪华巨轮，不但号称全世界最大的客轮，而且也自称是一艘“不沉之船”。然而，这艘不沉之船在经由大西洋驶向纽约的处女航中，不幸撞上冰山而沉没，船上全部人员约有三千人，船上只有二十四只救生艇，所以大半船员和乘客都随船沉入海底。

这是英国的一位一等航海士摩根·罗伯逊于一八九八年发表的小说中的一段。

这本名为《空虚行为》的小说，刚出版时并不惹人注意。但十四年后“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公布后，小说引起巨大的骚动，人们简直不敢相信，它描写的事实竟真的发生了。而且，小说的描写与现实中发生的灾难竟然有很多惊人的相似。

《空虚行为》中描述的海难发生在一八九八年四月，也就是说，在十四年后的同一个月，“泰坦尼克”号真的沉入了大西洋。

两艘船都是处女航，都是由南安普敦港出发，航行的目标都是纽约，都是横越大西洋的途中撞上了冰山，都造成了大量的死亡。

同时，小说中的巨轮也想创造横越大西洋的航行的纪录，正好与现实中的“泰坦尼克”号不谋而合。“泰坦尼克”号以每小时二十二海里的高速撞上了冰山。而小说中的船速则是每小时二十五海里。

除此之外，船的规模是一致的，都有“三只桨”，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豪华客轮”和“不沉之船”，而且都是被冰山将吃水线以下的船壳撞裂，由于救生艇太少而使大批乘客丧生。

小说中巨轮的名字叫做“坦达尼”号，酷似真实的“泰坦尼克”号。

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罗伯逊的小说在出版了十四年之后，一夜成名，瞬间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书，被称为“一个世纪以来最令人惊奇的预言小说。”但是，小说的作者摩根·罗伯逊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后不久，在美国的新泽西州的阿多迪市举枪自杀，没有人知道他自杀的原因。

有人还指出，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有不少人预知其沉没将会发生。除前文提到的因预感而临时退掉船票的实业家约翰·欧纳外，住在加拿大维尼培克市的教会牧师查尔斯·摩根，也做了巨轮沉没于大海的噩梦。

海难发生那天的下午，摩根牧师正为傍晚礼拜辞的内容而冥思苦想，疲倦之余便打起盹来。他在梦中看见了一个骇人的景象：有一艘巨轮航行于黑暗的海面上，突然天空转暗，浓雾弥漫。这艘巨轮在迷雾中撞上冰山。甲

板上充满了求救呼喊、嚎陶大哭的人，人们争先恐后地登上救生艇。最后，这艘巨轮倾斜着沉入海底。这时候，甲板上传出赞美歌。

赞美歌响起之际，牧师惊醒了过来。当天晚上牧师礼拜结束后，把他的梦告诉了在场的人，于是所有的教徒齐声唱起这首赞美歌。而数小时后，“泰坦尼克”号就沉没了。

新闻记者威廉·斯特德据说预知该难，却仍然上了船。灾难发生数年前，曾经有两位预测大师警告过他，说他会有水难。其中一人甚至说：“你会乘船去美国，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有一千人在大海上呼救，而你在那群人中间。”

斯特德是伦敦的新闻记者，他曾对以“巨轮沉没”为主题的虚构故事做过评论，说那完全是由于救生艇不足的缘故。他自己也写一个关于客轮撞上冰山的故事。更值得惊奇的是，他曾经梦见自己站在即将沉没的客轮的甲板上，没有穿救生衣，眼睁睁地望着救生艇离他而去，而且他清楚地记得梦中沉船的名字叫“泰坦尼克”号。

然而他并未顾忌这些不祥之兆，毫不犹豫地上了船。沉船时他主动放弃上救生艇的机会，与“泰坦尼克”号同归于荆“泰坦尼克”号遇难后，有一则报道称，船长的保险箱里有一尊神秘的“黑菩萨”雕像，雕像身上镶嵌稀世宝石，价值连城。

据传，这尊雕像是从北京的一个寺庙里盗来的，它带有符咒，引起这场灾难。

流传更广的是“木乃伊的诅咒”。

一九二一年左右，一群考古学者在埃及古墓中发掘出一具石棺，石棺上刻有这样的咒语：“凡是碰到这具石棺的人，都会遭难。”不过，热心研究的考古学家并不在意咒语的内容，依然打开了石棺。石棺中躺着一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木乃伊。

当时，这具石棺被运到英国，展示在大英博物馆中，供民众参观。可是不久后，当时考古队员之一回到英国后突然莫名其妙地猝死；后来，参与发掘石棺的考古学家也接二连三不明不白地去世。于是，博物馆决定将石棺移至民众看不见的地方，以避免闻风而来的大批好奇的参观者。十年之后，一位富有的美国实业家欣闻这一消息，要求博物馆将石棺和木乃伊卖给他。最后，这位实业家如愿以偿，终于购买了石棺和木乃伊。当他想把它们运回美国的时候，刚好碰上了“泰坦尼克”号处女航，因此他便将石棺和木乃伊交给“泰坦尼克”号运送。但是当时没有人注意到，石棺上咒语的最后一句正是说凡碰到这具石棺的人都会遭难，“将被海水吞没”。

这些说法显然没有太多的依据。由于“泰坦尼克”号沉没惨案是本世纪较早降临的大灾难，震惊了全世界。人们久久不能平静，浮想联翩，想把惨案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并用“想象”来减轻心理上的负担。这些说法倒是反映了当时的世人心态，说明他们对待灾难的态度还比较幼稚、主观，对本世纪接踵而至、原因更为复杂、危害更剧烈的灾难还毫无“预知”。

也有人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来试图解开“‘泰坦尼克’之谜”。

其中，英国历史学者罗宾·加德纳的观点最为惊世骇俗。

这位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于一九九五年出版了一本书，提出下述“说法”：“泰坦尼克”号并没有沉没，因为发生的一切都是轮船老板们策划的

一个骗局。

加德纳说，“泰坦尼克”号的船主们将已受到损坏的姊妹船“奥林匹克”号冒名为“泰坦尼克”号，让它在北大西洋高速与冰山相撞。目的是使其沉没，因而可得到“泰坦尼克”号的巨额保险金。原计划将船上的所有人员都救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点。

加德纳声称自己对这起“神秘”的灾难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调查，才写出了这本名叫《“泰坦尼克”号之谜》的专著。

加德纳通过进行的调查而得出的结论认为：英国银星轮船公司及其老板、美国人皮尔庞特·摩根决定在这艘船首航时使其沉没，以便获得保险金一百万英镑。这一阴谋在事件发生前一年就开始策划。当时“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制造的两艘相同的船中的第一艘“奥林匹克”号在南安普敦港附近与另一艘船相撞，受到严重损坏。

银星轮船公司没能修复“奥林匹克”号，决定用它来替代“泰坦尼克”号。原计划是当发现一座冰山时将船上的门全都打开，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将船上所有的人员撤到预先安排在附近行驶的“银星”号上。

这位历史学家在专著中说，计划是很简单的，要求采取的措施也很简单，如换掉所有标有原来船名的物品。

这种“说法”能够说明为什么摩根将他原来摆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大量艺术收藏品全部都撤换掉，以及为什么船离开南安普敦港后摩根及其友人都不在船上。

这也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当时船长 J·E·史密斯下令高速行驶。

据加德纳说，问题是“奥林匹克”号提前与冰山相撞，结果成了一场大灾难。

加德纳的“说法”较为大胆，但仍属于将海难归因于某个单一原因的类型，也没有触及这场灾难的实质。

照“泰坦尼克”号高级船员里唯一幸存的莱托勒的“说法”：“一切都和我们过不去，一切！”，灾难的原因就是一切都与人过不去吗？

有一部波兰电影，名叫《十诫之一：不可信仰其他的神》：一个精通电脑科学家，其爱子很想到未结厚的湖面上溜冰，科学家在电脑中进行了复杂的计算，得出了安全的结论，儿子遂被允许上湖溜冰，结果薄冰突然碎裂，吞噬了孩子。

正是由于人们过分相信自己，对灾难“畏惧”不够，掉以轻心，准备不充分，从而导致了“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并悲惨地沉没。

首先，“不沉之船”自视结构空前，绝不会沉没，从而没有按航运法则准备充足的救生艇。当时英国所有的军舰早已安置了探照灯，可是，豪华之至的“泰坦尼克”号上竟然只有航行灯而没有探照灯，并且了望哨连一副望远镜也没有配备，将巨轮上两千多人的生死都交给了望哨的裸眼视力来决定，假如“泰坦尼克”号有探照灯和望远镜，远距离就能发现冰山并且避过它。而且撞击的事实证明，“泰坦尼克”号的设计存在一些漏洞，根本不是一条“不沉之船”。

其次，据事后英国调查团的核查分析，“泰坦尼克”号船长本来可以采取两个措施来防止与冰山相撞，一是将航线改为“南”或“西南”，即加大航程；二是随着天色转暗、能见度下降而降低航速。为什么他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呢，英国调查团认为：这是因为至少二十五年来，在能见度良好情况下，

有船首了望哨随机报告，远洋轮一般都保持着原航向，而且也不降低航速，根据以往的经验，类似的作法还一次也没有导致重大事故……所以，船长史密斯就犯下了一个错误，一个令人痛心的错误。

还有人认为，史密斯船长为使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航行受世人瞩目，引起轰动，想露一手，他决心创造航行速度的新纪录。

所以史密斯不顾警告，一意孤行，直至撞上冰山。

再次，海上无线电联络没有二十四小时都须有人值班的明文规定，各条船自行规定无线电报室的上下班时间。当“泰坦尼克”号电报员从零时十四分起发出紧急呼救信号时，距离最近的“加利福尼亚人”号电报员已关闭无线电报机上床休息，直接使一千多人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

由于以上原因，当遭遇到海上无风的天气、冰山突兀的特大山嘴、“加利福尼亚人”号粗心大意的值班人员以及救援船只的距离遥远这些意外情况时，对灾难缺乏应有准备的“泰坦尼克”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惨痛的悲剧。

痛定思痛，人们认识到，必须重视灾难，必须作好理智、细密的充分准备。一九一三年在伦敦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通过了国际海上生命安全条约。条约规定：每次航海，都必须进行救生艇救生训练；每条船二十四小时都须有报务员值班；必须为船上的每一个人提供救生艇座位。

一九八一年，一个国际性的辛迪加公司曾想设法打捞起沉入海底一万二千英尺海底深处的“泰坦尼克”号。他们的计划预计将花费四亿五千万美元，采用一项先进打捞技术：先用两英寸粗的尼龙绳把二百个浮筒缚在沉船上，然后用电将浮筒内的水电解成氢气，使六万六千吨重的“泰坦尼克”号从海底浮出水面。这个辛迪加公司希望从沉船中获取更多的财富，据估计，“泰坦尼克”号的保险舱中存放着二十亿美元左右的装饰品和贵重品。该公司的计划后因各种原因搁浅。

至少有三次以上搜寻“泰坦尼克”号残骸的行动，都未如愿以偿。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由法国的“苏鲁瓦”号和美国的“诺尔”号两艘探险船在联合搜寻中，终于找到了她。这只联合探险队由法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组成，“伍兹·霍尔”海洋研究院的罗伯特·D·巴拉德担任联合探险队的队长。他们使用一个装备有电视摄像机的“水下机器人”发现了残骸。这只探险队为了防止掠夺沉船的事件发生，没有把“泰坦尼克”沉没的确切地点公布于世。从“水下机器人”拍摄到的满身覆盖着绿色洋底沉淀的沉船彩色照片上，同世纪的人总算有幸看到了七十三年前这艘豪华巨轮孤沉深渊后令人伤感的丰姿。

“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约定，每隔十年在瑞士洛桑举行一次聚会，以纪念“泰坦尼克”的沉没。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每十年一次的集会参加者越来越少了。一九八二年的幸存者集会只有十一人到会，为了能再多聚几次，聚会中决定今后的会期由十年一次改为五年一次。

一九八七年的聚会如期举行，可是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就剩下四个人了。一九一二年仅有三岁的小婴儿格兰特是在他母亲的怀抱中逃上救生艇的，他还记得那时海面上尽是上下浮动的人头，叫喊声不绝于耳，但顷刻间便寂然无声了。一九一二年仅有九岁的小姑娘麦克莱恩，在船将沉没时被送上救生艇，凌晨微光中，她依稀看到父亲向她挥手，并与滞留于甲板上的人群齐声高唱赞美诗，悲壮的场景令麦克莱恩终生难忘。

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发生了多少恐怖的大灾难，改写了世界历史的进

程，也深深震撼了人类的内心世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次灾难：海上女王“泰坦尼克”号，孤独地撞上冰山，最后孤立无援地、悲惨地沉没。

殃及 1500 万人的灾难

1934—1939 年：前苏联政治大清洗

概况：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斯大林借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基洛夫被杀为由，开始对前反对派成员及其追随者进行迫害。先后杀害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等一大批党政军要员，清洗、枪毙了几十万干部，殃及一千五百万无辜群众，成为人类史上空前的政治灾难。它使人们认识到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的重要性。

成千上万的人受到死亡威胁，然后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成批成批地死去——不是死在战场上，也不是死于人所不能控制的自然灾害，而是按照一个可怕的计划死在刑讯室和监牢里。这场完全人为的政治灾难发生在前苏联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中。就其规模来讲，它确实堪与一场大战，一次肆虐的自然灾害相比：考虑到它的阴险性和隐伏在迫害后面狭隘可鄙的个人目的，它的危害性就更加令人震惊。这场灾难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但首次将这一可怕的灾难的详情揭露出来，却要等到许多受害者已死去近十五年以后，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人类的理性和良知在这一事件中备受拷问。

一九五三年，恰好在斯大林刚刚死后，流亡美国的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将军列夫·费尔德宾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为笔名用英文出版了他根据亲身经历写出的《斯大林肃反秘史》，该书又立即被译成了德文、西班牙文以及其他一些文字。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凌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后召开了一个秘密大会，首次以大量的事例揭露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政治大清洗中所犯下的“严重错误”。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纽约时报》率先报道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写的一篇关于“秘密大会”的报道，紧接着英国《卫报》也报道了这一新闻，但材料都不够准确。六月四日，《纽约时报》终于搞到全部材料，并用醒目标题全文刊登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而在前苏联国内，这一“秘密报告”迟至一九八九年才正式发表。

大量毋庸置疑的事实表明，这一“肃反”运动实乃一次空前政治大劫难。正如戈尔巴乔夫在一九八七年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政治大清洗中，“对一系列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化工作者的政治控制和借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罗织的。”

前奏：党内斗争与基洛夫疑案

也许正是在这段危机四伏的日子里，斯大林已经下定决心……在将来一定要把这些等着他垮台的潜在对手统统干掉。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

这是一幢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俄里长的古典大厦，里面的长廊长得没有尽头，就像隐藏着什么秘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期间，这里曾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所在地。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这一天在这里发生的事因为它在随后进行的铺天盖地的大清洗中被借以发挥的作用也注定会被载入史册。

这天晚上，四十八岁的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谢尔盖·米罗维奇·基洛夫在大楼中被一枪打死。凶手被当场抓获。他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出身于工人家庭，党员。

这次犯罪的详细情况当时当然没有公布，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悬案。在事发后的几天内，政府发布的声明断言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是白卫恐怖分子，这些白俄是从波兰、立陶宛、芬兰潜入苏联进行恐怖活动的。各家报纸，也纷纷附合，并称枪毙了一百零四名白卫分子。但十六天之后，苏联的报纸上发表的新说法，又把罪责推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头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及许多从前的反对派都被逮捕。十二月二十二日，“鉴于罪证不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案由法庭转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组成的特别会议”审理。

十二月二十八日，官方公布的起诉书断言尼古拉耶夫和其他十三人是罪犯，被秘密法庭判处死刑并已执行。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秘密法庭又以对基洛夫被刺一案负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为罪名判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五年徒刑，把他们关进了集中营。

有警觉的人这时应该感到这一切都是有预谋有计划地在进行着，对基洛夫被杀一案的调查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斯大林在后来的运动中反复利用这一案件则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但这是为了什么呢？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洛夫在历次斗争中一直支持斯大林及其路线，提高他的威望，同他的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作无情的斗争。虽然基洛夫与布哈林私交甚笃，但他更忠诚于斯大林。列宁临终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他是一个粗暴的人。而基洛夫认为，应当把个人品质和政治品质分开，认为斯大林的方法虽不可取，但他的路线是正确的。

但支配着斯大林的是一种极其狭隘而残酷的思想，他迷狂于一种绝对的权力和威望。基洛夫同斯大林相比，具有许多优点和长处，比如基洛夫是当时以斯大林为核心的政治局常委中唯一具有优秀的演讲才能的人。在许多人心目中，他是继承总书记职位的最合适的人。他在群众和党员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人们甚至称他是列宁唯一的忠实继承者。在苏共（布）第十七次党代会上，他的讲话几乎获得了与斯大林相同长时间的鼓掌，而且在斯大林不容许任何人过问的干部问题上（要求斯大林召回他派到列宁格勒的亲信扎波罗热茨）同斯大林发生过正面冲突。基洛夫表现得太具独立性了，斯大林完全被激怒。他认为这种问题只能用一种办法来解决，就是消灭基洛夫，而杀害基洛夫的罪名则要由原反对派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来承担。这样一来，就可以一箭双雕地消灭他的对手。

其实早在基洛夫被杀害之前很久，斯大林就使用各种政治诡计和强力

手段，使自己摆脱党员和群众的任何监督。一九二九年称得上是一个大转变之年。布哈林右倾反对派被打倒以后，斯大林思想被奉为正统的思想，他开始猛烈抨击新经济政策，强迫推行农业集体化和过急的工业化，以及过分集中的国民经济的计划化。与“全盘集体化”的急剧步伐同时发作起来的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当右倾反对派的领袖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投降以后，斯大林的所有敌手几乎都被打倒，政治局的成员没有谁会梦想向斯大林的权威挑战。中央委员会承认斯大林是党的唯一领袖。

斯大林的名字和肖像成了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个人崇拜还将继续大规模地发展。他可以不再受党的领导机关的约束，把这种机关变成他实行个人专断的工具。一九三一年六、七月举行的第十六次党代会上，斯大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二千一百多名代表一致宣扬“党的路线的胜利”，以前的所有反对派领袖都表示了忏悔。但在大会之后，以谢尔盖·西尔佐夫和维萨里昂·洛米纳泽为首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对斯大林的独断专行首先进行了反抗。西尔佐夫在一九二九年五月曾作为接替注定要下台的李可夫的人选而在俄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后补委员。但具有很大个人勇气和理想主义精神的青年西尔佐夫并没有真正接受斯大林的栽培。在他看来斯大林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不是真理的探索者，跟他争论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想，不仅无益而且看害。他希望通过党的主要环节：书记——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党委书记有组织地提出要求，按照崭新的准则来组织党的管理，分散斯大林手中的权利。因为斯大林既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书记处的总书记，又是事实上的立法机关政治局的主席，还是十分重要的组织局事实上的首脑，如此多的权力集于一身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尚无先例。以西尔佐夫和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洛米纳泽为首，这个所谓的“左派”“右派”联盟得到了许多地方上的书记和党员的支持，还受到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很大一部分年轻委员的同情和支持。

参加这个集团的还有过去的反对派人士。如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腾斯。他们在莫斯科秘密就“灾难性的局势”进行讨论，并在官方机构中游说，要求改变政策。

他们打算在不迟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召开的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组织计划，分散斯大林独掌的权力。但在决定性的关头西尔佐夫的友人、乌拉尔州委书记苏利莫夫出卖了他们。这个所谓“联盟”（实际上是一些看法相同的人）的成员全被开除出党，一大批地方上的书记被免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真理报》宣布撤销西尔佐夫和洛米纳泽的职务，紧接着李可夫也被撤职，最后他们全在几年后的大清洗中死于非命。

此案刚审理完毕，又一个新的反对派集团马列主义者联盟又出现了。组成这个联盟的主要是以前参加过右倾反对派的中层干部加尔金、阿斯特罗夫、斯列普科夫等人，以米哈伊尔·留京为首。另外布哈林的一些学生以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个别拥护者与之亦有联系。这个基本上是秘密性质的联盟提出的任务是改变党领导的政策，使之更民主化，更多地考虑工农的利益，停止党内迫害活动等等。他们起草了一份长达二百页的反斯大林宣言，称斯大林为“俄国革命的恶魔，在复仇心和权力欲的驱使下把革命引到了深渊的边缘。”这个集团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一网打尽，斯大林要求立即处决米哈伊尔·留京，这是他第一次要求判处一位党员死刑。

但这个要求受到政治局里多数人的反对：十个成员中，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科西奥尔、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可能是反对斯大林的，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可能有动摇，支持斯大林的可能只有奥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留京等人当时只受到党纪处分，但在大清洗中还是全被消灭了。

这个阶段，强行推行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已显现出来了：在农村表现为大饥荒，几百万人被饿死；在城市则是工业发展的比例失调，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变成了一股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势力。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一向崇拜斯大林的斯大林夫人娜佳在极度的疑虑和委屈苦闷中自杀身亡，给斯大林极大刺激，他从此变得更加多疑和易怒。

一九三三年一月，又一个企图更换党的领导的集团斯米尔诺夫集团被国家保卫局捕获。其成员农业人民委员伊万·斯米尔诺夫，国内战争的著名英雄尼古拉·埃斯蒙特、托尔马切夫等被开除出党，随后死于大清洗。他们重新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当然随风而逝。斯大林击败了一个个党内反对派，大权独揽。但此时斯大林仍没有度过他的危险期，各种反对力量甚至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为了镇压农民，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地区他甚至动用了武装力量和军用飞机。下层人民对这种斯大林制度已痛恨之极，国家政治保卫局也由于对未来充满恐惧和疑虑重重而士气低落。在知识分子集中的一些地方，阐述托洛茨基理论的传单随处可见，属于被禁之列的列宁《遗嘱》的手抄本也传播开来，工厂的厂房墙壁上贴满反对斯大林的愤怒标语。也许正是在这段斯大林的政权摇摇欲坠、危机四伏的日子，斯大林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他能经受住这场危机并保住自己的个人权力的话，在将来他就一定要把所有在这些日子里幸灾乐祸地等待着他垮台的潜在对手统统干掉。留京的死刑未能在政治局通过使斯大林感觉到，尽管他身处最高地位，在十六次党代会上受到一致欢呼，在全国得到一片颂扬，但在政治局还有对手。他决定等待时机清算这一切。

一九三四年，斯大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这一年国家刚刚摆脱了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造成几百万人被饿死，几十万农民被枪毙和流放）。现在，斯大林开始把矛头直指他的每一个潜在对手，又主要是一些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

涉嫌基洛夫一案的扎波罗热茨和内务局长梅德韦季在两三年中先后被枪决。对此赫鲁晓夫在苏共（布）二十大上说：“可以设想，枪决他们是为了对谋杀基洛夫案件的组织者灭口。”这句话是否正确，可以从另一策划该案的斯大林亲信亚戈达的身上看出。基洛夫一案后，亚戈达曾有过一段平步青云的日子。但他在一九三八年招供曾对阴谋准备谋杀基洛夫一事有所了解，并授意扎波罗热茨不要阻碍这一行动。他立即被枪决。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所有知情者甚至连列宁格勒州和市党政机关的几百名负责人员也死于非命。基洛夫显然并不是斯大林的唯一目标，但基洛夫一案拉开了整个大清洗的序幕。诚然，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就进行了几次清党，但仍然有为数不多的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斯大林制度的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决定要来狠的。

震惊世界的三次莫斯科大审判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被杀
皮达可夫等人被杀

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被杀

“是什么使您如此诚恳地承认自己有罪？”

基洛夫死后，斯大林立刻掀起了一股大逮捕高潮，并在没有征求政治局其他成员意见的情况下，下令毫不迟疑地对一大批人执行死刑，尽管绝大部分人与基洛夫一案毫无关系。几天之内被处决的列宁格勒有三十九人，莫斯科有二十九人，基辅有二十八人，明斯克有九人。同时，在列宁格勒还掀起了迁出大批原贵族和他们家属的运动，而这些人绝大多数并没有从事任何地下活动和反苏活动。

这股“基洛夫急流”把三十年代大清洗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为苏联政治生涯中的转折点。

一九三五年五月，斯大林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其成员都是老党员），并着手篡改历史，虚构传记。一个月后，斯大林又取缔了“政治苦役犯和流放移民协会”，他们在刊物《苦役和流放》中提到的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所有传奇英雄，凡是活到斯大林暴政时期的，全部都遭到镇压——因为斯大林本人从未当过沙皇的政治苦役犯。为了便于镇压反抗，斯大林还恢复了被革命所摧毁的哥萨克军队的一切特权甚至包括军服。政府还颁布了一项世界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法律：十二岁以上的儿童对于所犯的各种罪行，应负与成年人相同的责任（包括死刑）。

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公审，对象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十四人。显然，对前二人进行第二次审判是因为第一次审判对他们判处的几年判刑不能让斯大林满意。而哥尔茨曼·奥利别尔德、赖因霍尔德、皮克尔等五个人则完全是被安排来揭发、攻击其他被告和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的假被告。不幸哥尔茨曼编造的故事在一些细节上显然出了漏洞，即使托洛茨基不马上声明那些谎言毫无根据，国外媒介也很快就把它戳穿了：哥尔茨曼说他曾在一九三二年在哥本哈根的“布里斯托里”饭店同托洛茨基见过面接受任务，而丹麦的政府报纸则声称该饭店在一九一七年就关闭了。

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作由叶若夫和斯大林亲自去做。此二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早期领导人，曾长期直接在列宁领导下工作，是列宁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在十月革命期间在武装起义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了重大分歧，但后来一直支持列宁，列宁逝世后也和斯大林一起共事，但他们和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一九二五年他们作为“列宁格勒反对派”为斯大林所挫败，而基洛夫在一九三三年又为他们恢复了党籍和工作。

对于这样的老党员，必须用特别的手段才能使他们就范，在公审中认罪。斯大林击中要害，以许诺不杀害他们及他们的子女换取他们出庭作证，向公众承认他们与国外的托洛茨基相勾结，是杀害基洛夫的幕后凶手并曾企图谋杀斯大林本人和所有苏维埃领导人。经过反复较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屈服了。在法庭上，经过多次排演的被告们在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的提示下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罪状全盘承认了。尤其是一班假被告（他们被许诺以党的信任和重用）表演得尤其卖力。无论哪个被告人的陈诉与预先确定的台词稍有出入，他们就会从椅子上站起来做一番纠正，恶狠狠地咬住对方不放。客观上说，他们由于过分卖力，把被告人角色演得离了谱。

但结果是真假被告一律被枪毙。

从一九三六年夏天开始的接连不断的清洗给全苏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令人厌恶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被撤职了，而替代他的人是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叶若夫。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叶若夫在一九三七年初掀起了一场被称为“叶若夫旋风”的更大规模的清洗。这时判断这个或那个党组织是否坚定和忠于党，是看他告发和揭露的敌人的数目多少。一时间，告密成了瘟疫，内务人民委员部各个机构门外竟排起长队，耐心地等待着进去揭发人民的敌人，甚至一家人之间互相揭发。有些人还以此为职业。

“叶若夫旋风”迅速导致了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苏联所有报纸刊登了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签署的起诉书，指控格奥尔基·列奥多维奇·皮达可夫、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格里高里·雅柯夫列维奇·索柯里尼柯夫、亚历山大·加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等十七名托洛茨基分子组织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背叛祖国，从事间谍活动，进行军事破坏工作，实施阴谋暗害勾当，准备恐怖暗杀行为，妄图借助外国势力，夺取政权，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这十七名被告中大部分是过去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几乎所有被告在二十年代中期都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大多数被告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底被捕的，为了凭空捏造出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预审期一再延长，直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才开庭。

皮达可夫是这一所谓集团的主犯，是列宁临终前高度赞赏的六个人之一。他同妻子早已分手，受审时儿子才十岁。内务人民委员部首先制服了他的妻子，使她为了保全孩子而揭发丈夫。随后又以从受审人名单中去掉他妻子和秘书为条件（由斯大林的同乡和好友奥尔忠尼启则劝告）说服了皮达可夫认罪。但在编造同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接头时又一次出漏洞，弄得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但他在法庭上风度翩翩。

另一主犯拉狄克是一个脆弱而易变的人，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反对继而又歌颂过斯大林。他被捕后先是愤怒发疯，继而在得到斯大林亲口许诺后又抢过审判员的笔帮助叶若夫编造阴谋神话。在法庭上他表演得像一位戏剧演员，好像一切就发生在昨天。最后他居然还因“在审讯期间折磨了审问官”而向预审员致以歉意。

他那绘声绘色的供述给这场审判增添了不少色彩，也暂时救了他的命。他当时被从轻发落判处十年监禁。

第三号人物索柯里尼柯夫被捕前是苏联驻英国大使。作为反对派活动家，他首先对全党提出警告，要求阻止党内发展对斯大林的迷信，后被清洗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但后来他承认了错误，被分派了外交工作。他被捕后初审时受过严刑拷打，在得到斯大林亲口许诺保全生命的情况下在伪造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承认反苏平行中心与纳粹德国勾结，准备肢解、颠覆苏联，企图建立法西斯独裁。他在法庭上以“是”、“正是”为口头禅完成了任务。

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被邀出席审判会。但每当检察官要交给法院“某一国外侦探机构”的什么材料时，公开审讯立刻中止，转为秘密审讯。大批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始终没有亲眼看到任何能证明被告有罪的书面证据和物证，实际上唯一的证据只是被告的供词。

但令人奇怪的是，是什么因素使被告如此诚恳地供认自己的罪行呢？更加令人奇怪的是，就像专门为了堵住外国记者的嘴似的，所有被告都声明自己没有受到任何严刑拷打或逼供。

这里面确实有交易。但同斯大林做交易是不会成功的。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苏联最高军事审判庭宣判皮达可夫等十三名被告死刑，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阿尔诺里特各判十年监禁，斯托罗依洛夫八年监禁。当然后四人最后全都没能逃脱被处死的命运，这是必然的。

这不仅使人想起那个似乎操纵着整个审判的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用沉着而带着戏弄的口气不断向每一个“杀人犯、破坏者、叛徒和间谍”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使您如此诚恳地承认自己有罪？”

第三次莫斯科大审判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开始。出庭的主要被告人有：尼古拉·布哈林——他曾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列宁时期的政治委员和党内最大的理论家之一；阿列克谢·李可夫——他也曾是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和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副手，列宁去世后他领导了苏联政府；尼古拉·克列斯廷——他曾是党中央书记和列宁在组织问题上的副手；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他是党内最受尊敬的老党员之一，曾被列宁任命为苏维埃乌克兰的领导人。

此外还有许多人。但其中不可思议的是那个处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及其他许多人的亚戈达也成了被告，他同前面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站在一起，形成了有惊人讽刺性的轰动效果。

虽然在那些对轰动一时的事件感兴趣而不是对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感兴趣的人看来，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案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原内务部人民委员亚戈达，而不是布哈林、李柯夫这些闻名世界的革命活动家，但这次审判的中心人物的确是布哈林。

宣判是无情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进行各种恐怖、破坏和间谍活动，暗杀了基洛夫、高尔基、古比雪夫等人，还策划谋杀斯大林，企图向德国、日本开放苏联的边界，复辟资本主义，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参予对列宁的谋害等罪名，判处包括布哈林在内的十八名罪犯死刑，予以枪决；另外三名被判处长期监禁。这个所谓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反苏联盟”就这样被消灭了。

可以看出，三次审判都首先是反托洛茨基的。斯大林的确特别痛恨托洛茨基，他嫉妒托洛茨基拥有的巨大威望。只是由于从一九二九年起托洛茨基就被驱逐到国外，使得斯大林鞭长莫及，他也就更加痛恨托洛茨基。他无法处死俄国两次革命（一九一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的这位卓越领导人，便迫使三次莫斯科审判案的所有参加者即被告人、公诉人和辩护人都来痛骂托洛茨基，把托洛茨基说成是罪魁祸首和道德上的堕落者，以此来暂时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

至于布哈林，在二十年代初曾积极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他也曾得到斯大林的全力支持。但自斯大林等人在一九二八年前后提出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阶级关系变动、阶级斗争尖锐化等一系列新理论并采取一系列的新政策后，在党内有两种不同意见争论。其中一派自然以斯大林为首；另一派则以布哈林为首，包括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兰诺夫等人。此后布哈林等人即被称为“反党集团”和“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和“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但他们在同斯大林“和解”后还是都被

安排了工作。肃反开始后，受审中的加米涅夫等突然供出与原反对派人士的“罪恶关系”，形势于是急转直下。一九三七年二月，布哈林即被逮捕。经过长时期的逼供，出于对娇妻爱子的担心，布哈林终于在伪供词上签了字。但在一份早已交给妻子的信中，他认为“历史迟早会清除我头上的污秽”。

清洗军队

“我好像做了一场梦。”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红军中存在一个分支密布的间谍网。”

——斯大林

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后不久，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苏联塔斯社公布了一则消息：苏联国防部副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名苏军高级将领，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已被逮捕并交付军事法庭。随后在两天内，这八人全部被以叛国等罪名枪决。

这八人中除了被誉为“红色拿破仑”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外，其他七位全是在红军中享有盛名的将军：雅基尔将军（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乌列维奇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科尔克将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费尔德曼将军（总参谋部人事处长）、艾德曼将军（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主席）、普特纳将军（前驻伦敦、东京和柏林武官），以及已经自杀身亡的红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他们被控要发动“反斯大林政变”，因而全都成为人民的敌人。

在战争即将爆发的一九三七年，突然处决这么多红军将领，世人莫不惊愕。只有神经不正常或害了迫害狂的人，才会干出这种荒唐事来。但这才只是一个开始。

而斯大林借以清除这个所谓的“平行军事中心”或“反苏军事中心”的罪证谁也想不到竟然是斯大林用高价从纳粹希特勒手中买来的。不过，苏联的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是：德国制造的伪证不过是用来作为消灭图哈切夫斯基等高级将领的一个借口而已。清除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乃是从一九三四年底基洛夫被刺后掀起的大规模镇压浪潮深入发展的结果。是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初对“反对派”成员的一连串审讯所获得的伪造供词中，发现了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所谓“军事小组”的。

斯大林所需要的，不过是清除不利于他的军人。斯大林同图哈切夫斯基的冲突，始于国内战争时期，也表现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对军事改革的分歧上。图哈切夫斯基在法庭上最后说了一句话：“我好像做了一场梦。”这的确是一场噩梦，但被卷进去的，远不止图哈切夫斯基一人。

处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人之后两个月，一九三七年八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在红军中“根除敌人”，并称“红军中存在一个分支密布的间谍网”。它掀起一股狂澜，使军队中人人自危，诬告成风。这以后，被控参加“反苏平行军事中心”的案犯数量急剧增加。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上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至苏联的各军区、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一大批高级和中级的军事干部、政治干部被逮捕了，数万人的肉体遭到消灭。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布柳赫尔元帅、叶戈罗夫元帅和罗科索夫斯基、麦列茨科夫、

戈尔巴托夫等将军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军官。

毫无疑问，这些被指控犯有背叛祖国和反党活动罪而遭镇压的数万军官，没有一个人是人民和党的敌人，没有一个人企图推翻政府，更没有一个人像斯大林断言的那样为德国间谍机关服务。与其说是希特勒的伪造文件害了他们，不如说是一切皆出自于斯大林的个人需要。

叶若夫等人在审讯皮达可夫等十七人的所谓“反苏平行中心”案过程中，用编造假口供、株连等惯用手法又编造出了这个“反苏平行军事中心”，并将与这些元帅、将军有一丝联系的人全部划入了“反苏后备力量”的名单。

布柳赫尔，叶戈罗夫这两个第一批被授予元帅称号的人，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军事法庭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时，还被邀请担任“法官”，一年又三个月后，他们也同样被杀。他们在法庭上都不承认自己犯了罪。

这次对红军的大清洗，同样席卷了红军军事学院。负责培训政治委员的列宁格勒 N.G.托尔马切夫军政学院和白俄罗斯的一批高级政工人员，以及海陆军中的许多政工干部，因为在十年前曾反对过军队中的一长制，在一九三七一—一九三八年全都遭到无情镇压。其中著名的有：红军政治部副主任布林和奥地谢扬，各军区军事委员如阿麦林、阿隆塔什姆、哈汉尼扬，各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如比特、戈沃鲁欣、泽姆斯科夫、伊萨延科、塔鲁津斯基等。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军事学院院长马尔基安·雅科夫列维奇·格尔曼诺维奇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

用“平行的军事中心”、“军内反对派集团”等形形色色名义清洗红军的結果，是上至国防人民部，下至军、师、团的大批红军干部被无辜杀害。红军骨干被毁，几乎成了一支群龙无首的部队——或者说斯大林成了唯一的领导。

由于档案被毁，很难全录受害者名单。但不完全的统计数据也是耸人听闻的。

苏联《在国外》杂志披露：一九三七一—一九三八年对红军大清洗的直接结果是“近三万五千名红军指挥员被处死，近百分之八十的高级军官，五名元帅中的三名，十五名集团军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方面军司令中的五十七名，一百九十五名师长中的一百一十名，四百零六名旅长的二百二十名，以及所有军区司令都死于内务部军队的子弹。另据亚·伊·托尔多斯基的计算，战前被捕的红军干部有：五个元帅中的三个，四名一级指挥员中的三名，十二名二级集团军军长中的十二名，六十七名军团长中的六十名，一百九十九名师长中的一百三十六名，三百九十七名旅长中的二百二十名，二名一级海军最高指挥员中的二名，二名二级海军指挥员中的二名，六名海军一级指挥员中的六名，十五名海军指挥员中的九名，二名一级军政治委员中的二名，十五名二级军政治委员中的十五名，二十八名集团军政治委员中的二十五名、九十七名师政治委员中的七十九名，三十六名旅政治委员中的三十五名。

如果根据《伟大的卫国战争简史》（莫斯科一九五六年版第三十九—四十页）的说法，情况更为严重。战前，几乎所有集团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团长、多数集团军、师和旅的军事指挥员和三分之一的团指挥员都被捕了。此外还有难以数计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因“丧失警惕性”被降了职，或被开除后转为预备役或被开除党籍。他们被迫离开原来的位置，遭受凌辱，不可能再为红军作贡献。无论在哪一次战争中，无论哪一个军队都

没有像苏联军队在战前那样遭受那么大的损失。

由于大批军官被捕、失踪，很难找到相当的人进行补充，红军的干部素质和士气大为降低了。在国际局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如此自相残杀，无情的报应——几乎消灭苏联的血与火的灾难——很快就在战争中降临到苏联人民头上。在苏德战争初期，红军连吃败仗，大部分飞机还未来得及起飞就给摧毁了。德国装甲部队三天内就推进了二百五十公里。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让·艾伦斯坦在《斯大林现象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一历史上罕见的错误再有力不过地证明了个人绝对权力的可怕。对一九四一年六月苏联的无戒备以及战争初期的一系列失败，斯大林现象在历史面前的严重责任是推卸不了的！”

死亡，形形色色的死亡

……这项命令使内务人民委员部那些最残忍的工作人员都不寒而栗。

……当问题涉及到报复时……只能意味着把反对者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大清洗中，无数人被以各种各样的罪名镇压了。他们中有的人是自杀，更多的人是被杀；有的人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错误，更多的人则是完全无辜的。

早在一九三二年，当几十万个受饥饿折磨无家可归的儿童挤满许多火车站和大城市时，斯大林就下了一道极其残酷的密令：凡在抢劫粮仓时或者在扒窃列车时被抓住的人以及害花柳病的人一律枪毙。死刑应该秘密地执行。由于进行这种大批的枪毙和采取其他“行政措施”，到一九三四年夏季时，无人照管的儿童问题已经以纯粹斯大林的方式解决了。

在几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斯大林、叶若夫、亚戈达、贝利亚等人先后动用了几百名原反对派囚徒，对他们进行整治，逼迫他们屈服后诬告他人、出假供词，最后再把他们通通枪毙。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斯大林把亚戈达找去，下达了一项命令。这项命令甚至使那些最残忍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为之不寒而栗。这项命令是在老布尔什维克们被枪毙才过去六天就发出的。斯大林曾经向老布尔什维克们许诺保住他们的生命。

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们，即从前曾经参加过反对派、现在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的犯人们，也许下了同样的诺言。然而现在，斯大林竟命令亚戈达和叶若夫要从这些犯人中挑选出五千个过去曾经积极地参加过反对派的人，秘密地统统加以枪毙。

对共产党员大批地处以死刑，而且是在连形式上的审判也没有的情况下处以死刑，这在苏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接着，一九三七年夏天当内务人民委员已由叶若夫来担任时，斯大林命令他准备出第二份名单来，名单上要列出五千个其他参加反对派的人，这些人也没有经过形式上的审判就被集体枪毙了。这种对原反对派成员的屠杀，不知究竟重复了多少次。

从一九三五年五月起，许多斯大林的忠实盟友也开始纷纷被捕，而这些被捕者们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这个期间在莫斯科，在全国其他城市，国家许多最著名的活动家失踪的事，没有一天不发生。他们是人民

委员、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党的州委书记和最重要的军事长官等。有两个被认为是斯大林的亲信的政府成员，在莫斯科从家里去上班的路上同自己的汽车和司机一起失踪了。甚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们也未能逃脱被秘密逮捕的厄运！

到一九三七年奥尔忠尼启则是克里姆林宫中剩下的能与斯大林用本族语即格鲁吉亚语进行交谈的最后一个人。但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报纸上刊登的政府公告说他已于二月十八日十七时三十分由于心脏麻痹在他的家中突然逝世。各家报纸还登载了详尽的医疗鉴定报告。

奥尔忠尼启则是深孚众望的联共（布）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和重工业人员委员。人们称他为“谢尔哥”。这本是一个昵称，后来竟成为党内使用的代号，足以说明他所受到的一致尊敬和爱戴。他是斯大林的同乡、老友并一直支持斯大林同反对派的斗争，但他也有直言不讳的习惯，是唯一敢向斯大林提出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的人，并为一些被捕的人说情。他很早就对斯大林说贝利亚是个无原则的恶棍，但正是贝利亚在斯大林心中播下了怀疑奥尔忠尼启则的种子。但直到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才正式宣布奥尔忠尼启则是自杀身亡的。

其实一九三七年一月对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案的公开审判就是冲着 he 来的，他主管的工业部门的破坏和怠工是这次公审的一大主题，报纸和电台中不断地要人们警惕破坏者的话也直接牵涉到他。他的副手、重工业副人民委员皮达可夫被指控犯有阴谋和破坏罪而被处决，他主持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许多高级官员也被捕入狱，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叶若夫的指示还搜查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这之后不久，他对密友米高扬说，他不能再活下去了，他不能容忍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也不再有力与之斗争。二月十七日上午，斯大林来到奥尔忠尼启则的寓所，他们发生了激烈争吵，长达三十年的友谊一朝破灭。

奥尔忠尼启则：“……而你不怕报应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你夜晚拿着灯或电筒往睡觉的床下照时，你会胆战心惊，要知道你现在什么也没有，没有朋友，没有心爱的女人，只有奴才！你唯一的癖好就是权力和残暴。你说说，当妻子和小孩哭泣时，你是哪种享受呢？当男人哭泣时，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你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幸福吗？”

斯大林：“流氓！我枪毙了你的哥哥帕普利亚，我也要告诉你，无论哪一个奥尔忠尼启则都不会留下！一个也不留！我向你保证做到这一点。”

第二天下午五点三十分，奥尔忠尼启则卧室里传来一声枪响。他妻子季娜伊达跑进房间，发现丈夫躺在血泊中已停止了呼吸……在二十年代参加过“工人反对派”和二十二人签名的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等人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大清洗中，被指控准备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在既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任何证词的情况下被处以死刑。他们的子女也被逮捕流放。

被斯大林轻蔑地称为“自由派”的几名政治委员及候补委员曾私下试图使斯大林的政策变得温和些，所以又被称为“温和派”，他们曾试图挽救布哈林和李可夫，因为他们看见斯大林违背诺言杀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宣布对布哈林和其他人进行调查后，苏联工会运动创始人托姆斯基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自杀了。在八月底到九月初举行的一系列高级会议上，温和派曾取得短暂胜利。政治

局委员斯尼斯拉夫·维肯季维奇·科西奥尔、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楚巴尔、政治局候补委员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帝舍夫、罗伯特·英德里科维奇·埃赫、扬·叶尔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格里高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等六人的投票决定结束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诉讼。但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又推翻了上述决定，斯大林已对温和派怀恨在心。

他指使叶若夫编造出一个以上述六人为核心的平行的布哈林中心，并审判他们。叶若夫未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无论他在审问时多么残酷，多么厉害，但是在布哈林审讯案之后，人们不仅在秘密法庭上拒不承认自己那些莫须有的罪行，而且在囚室里直接写信给斯大林和政治局，揭发叶若夫的胡作非为。叶若夫搞得太臭了，而且不能胜任工作，知道得又太多，只有走向坟墓了。

制造一个集团性冤案的预谋固然没有实现，政治局中的温和派还是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他们中经过法庭审讯的只有极少数，其他的人要么经过秘密审讯，要么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死于非命。他们的子女也都遭到了监禁和流放。他们被逮捕的消息，没有一家报刊透露过，甚至他们的朋友亲戚也长期不知道他们的命运，直到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才在他的秘密报告中透露了他们的悲惨命运。

大规模的镇压同样祸及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样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清洗对象。驻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就遭受到残酷的对待。著名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拉·贝恩被处死。列宁的老战友中，瑞士人普拉敦被捕后死于集中营；波兰人加涅茨基被枪决；流亡在莫斯科的波兰共产党人全部被处死！常驻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领导机关遭到毁灭性的清洗，等等。不但不少国家的共产党人直接成为殉难者，这个大清洗还作为一种错误的理论和方法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斯大林派的人曾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庆祝他们对党内反对派的最后胜利，但是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竟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被打成“党和人民的敌人”，一千九百六十六名拥有表决权 and 咨询权的代表中，也有一千一百零八名被定罪为反革命而遭到逮捕或处决。一个人作为朋友被邀请去见斯大林，但是当他同斯大林坐下来后，他就不知道将会把他打发到哪里去，究竟是回家还是进监狱。

斯大林消灭的革命者比所有俄国沙皇加在一起消灭的革命者还多。他所消灭的不仅有真正的和潜在的对手，而且还有这些对手的拥护者。为了力求除掉他不喜欢见的证人，他还会把最忠实的执行了他的罪恶指示的帮凶们统统送去见阎王。他把自己早在高加索时就结识的老朋友们都加以杀害，就是因为他们对他的过去有所了解。

斯大林和叶努基泽、奥尔忠尼启则在漫长的过去中曾是一个亲密无间的格鲁吉亚三人帮。但由于叶努基泽经常在斯大林镇压异己时替斯大林的政敌求情，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叶努基泽被开除出党，并被指控扮演“善良的大叔”的角色，庇护了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使克里姆林宫机关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混进了反苏反子。当奥尔忠尼启则活着时，斯大林还不敢对叶努基泽这位老朋友给予彻底的打击。一九三七年二月，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以后，斯大林决定把他同叶努基泽的冲突发展到“逻辑的结局”。当问

题涉及到报复时，从斯大林的观点来看，所谓“逻辑的结局”只能意味着把反对者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各家报纸同时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报道：叶努基泽、卡拉汉及其他五人由于进行了间谍和恐怖活动被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判处死刑并已执行。这样，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也被他清洗掉了。

众所周知，对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女士（即娜佳）的死因有各种传说。在娜佳死后斯大林开始不断地咒骂她的家人。娜佳的弟弟阿利卢耶夫在一九三九年被处死，她的其他亲人大多也在大清洗中受到牵连，甚至含冤死去。

在大清洗中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朝夕难保的。在摧毁了党内的反对派之后，斯大林对自己的追随者也发生了怀疑，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清洗者的清洗

这些自杀者是“被良心折磨死的”。

“把这些孤儿赶出莫斯科去！”

凶手是他的老朋友和老同事。

首先是清洗者自杀。从三十年代初起，自杀事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中，尤其是在秘密政工管理局中那些曾经镇压过反对派的干部中，自杀事件就更为严重。其中以内务人民委员部乌克兰分局秘密政工处处长科泽尔斯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高尔基市分局局长波格列宾斯基的自杀最突出。他们二人都在遗书中对自己参加的迫害和清洗进行了自责。所以当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们被执行死刑的当天，内务部秘密政工管理局一个曾经参加过审讯的审讯员自杀时，就出现了一种传闻，说这些自杀者都是“被良心折磨死的”。

其实在莫斯科审判案的准备过程中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头头们要是能分析一下斯大林下达的各种指示的话，他们或许就会发现斯大林迟早也会消灭他们本人。因为他们是斯大林罪行的不合心意的见证人，是进行伪造来迫害列宁近卫军的直接参与者。

一九三六年十月，斯大林派亲信叶若夫带领近三十个“自己人”取代亚戈达和他手下所有知道莫斯科审判案内情的人。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之后，他们消灭了所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中那些了解秘密的工作人员，紧接着，对那些可能了解秘密的人也进行了消灭。

一九三六年三月，除四个人以外，叶若夫把所有亚戈达的副手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各主要管理局的局长和副手全部骗出莫斯科关进了监狱。

当一个行动小组在黎明时分出现在以凶残审讯加米涅夫而闻名的切尔托克的住宅时，他高喊一声：“你们抓不住我！”说着飞快跑到阳台上从十二层楼上跳了下去。另一个外事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弗利克斯·古尔斯基也从九层楼上跳了下去。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筑群位于莫斯科的中心，所以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纷纷从最高的楼层跳下去自杀时，许多行人都能看见。

而被捕之后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根本不会进行任何审查（连样子都不作）就被整批整批地指控为信仰托洛茨基主义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枪决了。这些工作人员如果是波兰人就被宣布为波兰间谍；如果是拉脱维亚

人则被宣布为拉脱维亚间谍；如果是俄罗斯人则被宣布为德国、英国或法国的间谍。

被枪毙的肃反工作人员的子女往往立刻沦为街头流浪儿，因为他们家的朋友、亲属由于怕受到连累而不敢收留他们。当时许多大城市里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现象：十至二十五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就有许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们在自杀前还常常给斯大林寄信诉说惨情，但这些信被加注的批语都是：要把这些青少年赶出莫斯科去，以免让外国记者和外宾看到这么多被抛弃街头的孤儿。

在消灭驻国外的肃反干部时遇到的困难要比在国内消灭他们困难。因此经常采取的办法是先把他们诱入国内。

同时斯大林和叶若夫也害怕打草惊蛇。因此很长的时间中几乎没有去触动驻外人员，使国外的工作人员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血腥的清洗与他们无关。

从一九三七年起，国外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被分批召回。首先是家属留在国内的那一部分人，因为他们听话。回国后他们也没有立刻被捕，而是先去南方享受、疗养，以便他们有时间给国外的同事寄去平安的信息。接着他们似乎又要被派往国外，但在莫斯科失踪。

内务人民委员部驻法国情报站站长尼古拉·斯米尔诺夫（真名是格林斯基）就是这样消失的。他消失前对仍在法国的妻子发出了平安信，结果他妻子斯米尔诺娃返回后即很快消失。

一九三七年夏季，约有四十名在国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接到了莫斯科的召回令，其中只有五人拒绝回国。许多人回国是因为害怕同斯大林决裂会株连家属。他们都知道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斯大林颁布了一项特别法。这项法律规定：如一军人叛逃国外，其亲属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遥远地区，即使他们并不知其叛逃意图。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国外完成任务后拒绝返回苏联，其亲人要被剥夺十年自由。而如果该人出卖国家机密，其亲人将被处以极刑——死刑。他们回国后都遭清洗。

而拒绝回国的人当中，驻法情报站站长伊格纳季·赖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瑞士被杀死。另一个驻荷兰情报站站长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虽然在法国政府的帮助下在巴黎幸存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一年他仍被杀死在美国华盛顿。而在一九三八年初，原政治保卫局驻土耳其情报站站长阿加别科夫在被逮捕了十年之后在比利时被杀。

其实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工作的人员都知道，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中，甚至是高级官员中，都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工资的情报员。叶若夫的暗杀行动小组依靠他们的帮助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叛徒”的住址而将其杀害。这对所有人都具有威慑力。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他所有管理局很快就被毁灭完毕时，对外事管理局工作人员的逮捕却进行得非常谨慎，可以说是严格地分批进行的。当这个管理局的局长斯卢茨基还在原位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斯大林决定不以普遍逮捕来削弱这个局。相反，他要保护那些了解外国和掌握外语的业务极为熟练的干部。

到一九三八年初，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在国外工作的大多数着手都回到了苏联，斯大林已经没有必要保存一直没有撤换的斯卢茨基作为诱饵了。二月十七日，斯卢茨基被用氰化钾毒死在办公室里。凶手是当时叶若夫的副手

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是斯卢茨基的老朋友和老同事。

这个弗里诺夫斯基最终当然也被清除掉了。但为了组织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斯大林暂时留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几个人，他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列昂尼德·扎科夫斯基、劳改管理总局局长马特维·贝尔曼和边防部队管理局局长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斯大林甚至授予他们国家最高级奖章。一九三八年三月，经过三人竭尽全力准备起来的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结束了。现在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了，而且他们三人知道的东西也太多了。于是他们三人全都被调到内务人民委员会担任不同职务，紧接着就永远消失了。

严格说来，这种三十年代的政治清洗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甚至直到斯大林去世。

一九五一年九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确认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米哈伊尔·罗吉奥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彼普科夫（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及其同伙犯有叛国罪而判处死刑。该案被称为列宁格勒案件。

这一案件的主要受害人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都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年轻领导人，一度深得斯大林赏识，被斯大林认为是部长会议主席和总书记的理想接班人。但在斯大林疑心和贝利亚的嫉妒中很快就被清洗了。

这一案件中受迫害有二百多人，二千多名干部被撤职。

一九五二年七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又以叛国罪及间谍活动罪等莫须有罪名，判处“犹太人反法西斯协会”的领导人死刑或长期徒刑，其成员被大批逮捕。

在此之前被枪毙或暗杀的犹太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还有索·阿·洛佐夫斯基、索·米·米赫尔斯等等。这场反犹运动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才出现转折。

临死前，斯大林仍在计划着对政治局进行新的清洗。在他看来，敌人老是包围着他，因此应该试图从每一个人当中去找出一个暗藏的叛徒或破坏者。他把这个叫作“警惕”，并常说，一个报告只要有百分之十是真的，就应该认为是真的。

他最后的清洗是针对医生的，并利用告密信，捏造了一个医生谋杀的案件。但是年轻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人向垂死的斯大林宣战了，他们拒不执行斯大林的旨意，而后者在极度愤怒中突发脑溢血不久死去……据估计，在斯大林执政的三十年间，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人遭受了迫害，蒙受着不白之冤。仅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之间，就有一百多万人被镇压，被逮捕的不下四五百万人。

他们的罪名都如出一辙，不是“叛徒”、“间谍”、“走狗”，就是“卖国贼”或“杀人凶手”，有时则干脆笼统地说成是“人民的敌人”。面对数百上千万无辜受害的人，仅仅把这次大清洗理解为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确实是说不通的。从后果来看，“肃反”运动堪称苏联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

它的原因和独特的背景与残酷性至今仍值得人们去思索、总结。

首先，它是在一种极端有害的理论即“随着社会主义越来越大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指导下开展起来的。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即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提出这一理论。其实践后果必然是人为地制造斗争，导致大规模迫害。

其次，它的实施必然以法制的彻底被破坏为前提。而法制被毁往往又与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是互生的。当斯大林成为全苏至高无上的唯一领袖以后，他的个人权威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也凌驾于法律之上。他的个人好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一大批小人则借大清洗之机用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等手段讨取信任而平步青云，灾难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大规模的镇压呢？许多学者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有计划的政治安排。

在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间，斯大林镇压了资产阶级的旧专家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影响，把镇压的矛头指向原反对派。

而三十年代大清洗的主要特征，就是从原反对派着手的。因为在当时能够对他的权力和影响构成威胁的，只有那些虽然被击败但仍在党内占有职位而且还享有一定权力的原反对派成员。于是一九三四年底以基洛夫被刺为契机，以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为理论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头们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制造种种冤、假、错案，从肉体上消灭了原反对派的领导人及所有成员，甚至包括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然而，这种专横的镇压措施，并没有到消灭完原反对派成员为止。后来，与这些反对派有过交往的人，甚至许多与原反对派毫无牵连的人都被看作是“人民的敌人”，用以镇压他们的证据常常是用卑鄙残酷的手段逼压出来的假口供。

再后来，就是对这种清洗有异议的人，对不力的内务部人员也开始镇压。最后，仅仅为了灭口，又消灭了参加肃反的几乎所有工作人员。

也许这场运动能让人们明白狭隘、敌意和仇恨的人性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在一系列天理难容、使人惊骇的非常事件中，人们也许会想起“良心”这个朴素的字眼。

在原苏联国内，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一段时间中，虽然开始了对斯大林时期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但却是有限的、很不彻底的。六十年代中间，这一工作实际上停顿下来。只是到了一九八七年以后，苏共中央才决定重新做好平反工作。而这时，距离大部分受害者的受害时间已经是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

或者正如前苏联《星火》周刊总编辑、著名作家维·科罗季所说：“面对万千冤魂的泣诉，用任何政治字眼来解释这种社会现象，都将显得十分虚伪苍白。”是的，没有人会为了平反而死去，活着的人也不应该让他们随时间推移而永逝。他们应该成为永远的悲哀的发问者。

死亡赋格曲

1939—1945年：纳粹大屠犹

概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

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种族灭绝灾难。纳粹用“死亡坑”、“死亡营”等大批量、集中的手段屠杀了五百八十二万犹太人，使欧洲犹太人骤然减少了二分之一，世界犹太人减少了三分之一。最残酷的奥斯威辛死亡营用毒气室杀害了一百万人。今天，世界范围的种族歧视和新纳粹、新法西斯又开始死灰复燃，甚嚣尘上。人类绝不能忘记纳粹大屠犹的事实，绝不能让大屠杀悲剧重演。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在希特勒主持的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两部反犹太法，《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德意志帝国公民法》中规定：只有日耳曼民族或与日耳曼同宗血缘的人才是帝国公民，犹太人以及吉普赛人现在已不再是帝国公民。《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规定犹太人的贱民地位，使之成为“不可接触者”；禁止犹太人与日耳曼民族等所有非犹太人通婚或性交。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戈培尔指挥德国各地的冲锋队烧毁了一百九十一座犹太会堂，彻底摧毁七千五百家犹太商店。犹太社区满地都是碎玻璃，是夜被称为“水晶之夜”。事件中发生了六百八十起受害者自杀事件，三万多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德国犹太人被要求随身携带特别身份证。

从三十年代开始，德国犹太人纷纷要求移居他国。一九三三年初至一九三五年八月西方国家接纳了七万五千名德国犹太移民，其中三万人去了巴勒斯坦。形势日趋严峻后，犹太人纷纷外逃，使欧洲骤然出现了犹太难民潮。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紧急召开的探讨解决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埃维昂会议”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然而德国犹太人还是在各国犹太组织的高额资金安置下，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名符其实地大逃难。有一半的德国犹太人，约有三十万，一半的奥地利犹太人，十一万人脱离了死神。处于危险之中的波兰逃出十一万人。但这些数目和后来整个德占区犹太人口的数量相比，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下令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入侵波兰之后的二十一个月中三万多名犹太人被杀害、冻死或饿死。

战争的进程使希特勒不再满足于驱逐、隔离犹太人，而是想实行“彻底”的种族灭绝。被称为“最后解决”的大屠杀开始了。

死亡坑：对苏联—波兰地区犹太人的大屠杀

二百九十万苏联犹太人落入纳粹之手。犹太会堂先塞进八百多人，然后点火焚烧，再不断赶人走入烈火熊熊的会堂。乌克兰帮凶先将妇女强奸，包括一名十三岁的少女，然后再将她们击毙。犹太人沉默地走向屠场引颈就戮，刽子手有条不紊地“落刀”。满头银发的祖母抱着一周岁的小孙子唱起一支犹太古歌。苏联国家特别委员会找到了记有大约二千个“死亡坑”的记录。苏联地区死难犹太人总计九十万。

一九三九年九月之前的苏联本土上居住着二百二十万犹太人，加上后来控制的波兰地区的一百八十万犹太人，共计四百多万人。战争爆发后有一百一十万人撤到后方，二百九十万犹太人落入魔手。

专门执行屠犹任务的是德国“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由党卫军最高头目

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副手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指示于一九三九年组建。特别行动队共有三千多人，分为 A、B、C、D 四个支队，成员主要由挑选出的德国党卫队员和警察构成。

A 支队由党卫队旅队长费朗兹·施塔勒克尔指挥，负责跟随德国北方集团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屠杀犹太人，最终目标是列宁格勒；B 支队由保安总局刑警处长阿图尔·奈比率领，负责尾随中央集团军在乌克兰与波罗的海之间地区的屠杀行动，最终目标是莫斯科。C 支队由党卫队旅队长奥托·拉施指挥，负责在南方集团军活动范围内的北、西、东三个方向的屠杀，总部设在基辅。D 支队由保安总局国内处处长奥托·奥伦道夫率领，负责南方集团军的南面，比萨拉比亚地区的屠杀。同时，屠杀时侵苏的德国国防军部队视情况，可出动参加。

特别行动队身穿特殊军服，手臂上佩有保安处的菱形标志，来源为：党卫队员百分之三十四，盖世太保百分之九，保安处人员百分之三点五，刑警百分之四点一，治安警察百分之十三点四，外国辅助警察百分之六点八等。各支队兵力相当于一个营，A 支队近千人，人数最多，最少的 D 支队五百多人。每支队下分特遣队和特别队，皆为连级，随军级陆军部队行动。再往下为小队，排级规模。各分队长和小队长由党卫队、盖世太保或表现“出众”的当地帮凶担任。各支队长由海德里希的中央保安总局选出的处级干部担任。各支队的屠杀行动由当地的保安警察司令兼保安处处长统领，这些司令直接听命海德里希的指挥。

大屠杀前，海德里希将特别行卫队的一百二十名大小头目集中，训练屠杀技能。

希姆莱作了秘密指示，对于犹太人等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两亿东方“劣等民族”，“要于战场上一个一个地予以全部消灭”。海德里希还集中三千多全部队员，作了屠杀前的总动员。

在本世纪苏联犹太人历史上，先后发生过沙皇、乌克兰白军大头目彼得留拉策划的大屠犹，仅仅过去二三十年，一场更空前的大屠杀又已降临。

首先，陆军将占领地的人民集中围起来，交给特别行动队甄别“处理”。或者，陆军杀到一地，立即颁令所有的犹太人佩带上六角形的“大卫星”标志，以便特别行动队快速辨捕屠杀。

首当其中的是立陶宛考纳斯市附近的边境村庄维堡里斯。人们被一批批地赶到德军甄别小组前，几百名被当地立陶宛帮凶拖来的犹太人直接放到一边。未带证件者或苏维埃干部立即被推到树林后面枪毙。“甄别”完后犹太人被赶到树林背后。

二公里长的反坦克沟成为天然“死亡坑”，屠杀者逼着几十名犹太村民跳入沟中，由一名机枪手顺着沟沿边走边扫射。这天一共扫射了六批犹太人。最后沟边剩下四个几岁的犹太幼儿，四个屠杀者放下枪，抓起小孩的腿在大石头上砸碎了他们的脑袋。

拉脱维亚的德温斯克有一万六千名犹太人，德军先欺骗说十六~六十岁的男人报到参加废墟清理，缺乏对德国种族灭绝意图了解的犹太人毫不迟疑地去了。夜间他们被分批枪决，凌晨时分尸体推入城外的万人坑中。

六月二十七日凌晨，德军攻入处于波兰东部边境的比亚利斯克市，该市犹太区含西部逃来的犹太人共五万多人。八点钟屠犹开始，犹太人挨家挨户赶出来，稍有挣扎者立即被处决。大部分被赶往犹太人大会堂。会堂先

塞进八百多人，然后点火焚烧，再不断赶人走入烈火熊熊的会堂。会堂附近的房屋开始燃烧，德军不住地往没燃的房子扔手榴弹，很快这个由木制房屋组成的犹太区成为一片火海，全城弥漫着尸臭。一天之中，德军烧杀了二千多名犹太人。

在诺沃格罗代克镇，德军先要求犹太人派五十名志愿者到新设立的“犹太委员会”工作，想活命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报名。一支行刑队在镇外一个砖瓦厂里等候第一批从德军司令部用卡车送来的“志愿者”。接着又是第二批……这种方式采用到犹太人明白是屠杀的骗局为止。

屠杀每天都在各地“有序地”进行，地点往往是苏军退却前挖的反坦克壕。

七月初在乌克兰利沃夫市郊外。一群衣服被扒光的犹太妇女挤在一起发抖，被一伙乌克兰籍的特别行动队员围在中间。这些乌克兰帮凶并不准备遵守“不准与犹太女人性交”的禁令，先将妇女强奸，包括一名十三岁的少女，然后再将她们击毙。

“上帝的选民”们逐渐弄清楚了自犹太先祖雅各以来四千年古老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悲剧命运之后，沉默地走向屠场引颈就戮，刽子手有条不紊地“落刀”。屠场上只听到枪声和沉闷的步伐。

正如早逝的犹太写作者卡夫卡在一篇小说中预言般的写过的，一架性能优良、只需按一个电钮就将人切成碎片的杀人机器，屠杀过程改进成最简单、迅捷的流水线方式。次日要枪毙的人先挖好“死亡坑”，一批批的犹太人自己趴到沟里，特别行动队照准他们的后脑勺射击。

十月五日乌克兰杜布诺镇，目击者德国工程师赫尔曼·格瑞比特看到：卡车送来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孩子无言地脱掉衣服，按外衣、内衣、鞋和帽子分别堆放，其中鞋堆足有上千双。然后一家人一家人互相拥抱告别。一个八口之家，有祖母，五十多岁的夫妇和一二十岁的五个孩子，满头银发的祖母抱着一周岁的小孙子唱起一支犹太古歌。低声细语的告别后，二十多个赤裸的犹太人被枪托点出走进大坑，其中一位黑头发的漂亮姑娘指着自己对格瑞比特说：“请记住，我才二十三岁。”

坑中已装满三分之二，足有一千多人。走进去的人摸摸未断气同胞的脑袋，说一两句鼓励的话，然后扫射开始。屠杀持续一天一夜，目击者格瑞比特称，他没有看到一个刽子手有过丝毫犹豫的表现。

巴贝亚尔沟是苏联地区最大的一个屠场，它是乌克兰首府基辅市郊的一条雨水冲刷出的深沟。在德军占领基辅的两年时间里，巴贝亚尔沟里枪杀了十余万当地人民，其中三万多是犹太人。

九月二十七日起德国人命令基辅市犹太人到指定地点集中以便进行重新安置。

结果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赶来报到。屠杀由特别行动队 C 支队执行。两行荷枪实弹的乌克兰警察将人们夹送至主沟前，特别行动队命令所有的人脱光衣服，一百人一百人地走入沟中。乌克兰警察用枪托和刺刀逼着人们往前走，若是幼儿就提起小腿往沟里扔。沟中挤满人后，机枪齐鸣，沟中立即积起一尺深的鲜血……屠杀持续了两天，就将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一名犹太人全部杀死。

“死亡坑”，就是指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包括上述屠杀在内的一系列行动，在波兰建立采用技术方式专事屠杀的死亡营之前，党卫队特别行

动队在德国国防军的配合下，将约一百万人杀死在反坦克沟、防御壕和其他坑中。

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苏联控诉代表出示了苏联国家特别委员会法医专家的报告，报告认为特别行动队枪杀和掩埋死难者的方式是逐年“完善”的。报告详实描述了“死亡坑”的典型外观：这些挖出尸体的坟穴不是公墓。尸体不是一个挨一个地有次序摆放，而是男女尸混杂，深厚不匀，横七竖八，姿态各异：有的侧卧，有的扒地，有的跪着，有的两臂和腿绞在一起。在尸体挖出之前，要辨认每一具尸体的轮廓是不可能的。

苏联控诉代表还指出，从一九四三年至战争结束，纳粹分子还使用了更加残酷的集体杀害方法。

希特勒分子强迫蒙难者将木棒堆积起来，然后让他们躺到上面，接着将其击毙。

下一批蒙难者又弄来木材架到死者尸体上，他们被迫再躺在新铺的木头层上，而后又被击毙。然后点燃木材当即烧掉尸体。

在沃里尼恩的罗夫诺市的前盖世太保大楼里，苏联国家特别委员会找到了记有大约二千个“死亡坑”的记录，仅在罗夫诺地区就有大批枪杀地点二百处。

除了无数个杀死一百到一万人的“死亡坑”外，苏联国家特别委员会还列举了每处谋杀几万、十万人以上的大“死亡坑”，死难看还包括从欧洲其他地区押运来的人。除巴贝亚尔“死亡坑”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还指出：距立陶宛的维尔纳八公里处的波纳依“死亡坑”，死难者不少于十万人，并且是在木柴堆上焚尸；考纳斯九号工事，有七万多人被谋杀；里加附近的比克尼克森林，一块由五十五个深坑组成的处决场，总面积二千八百八十五平方米，埋有四万五千多名死难者；里加以东五至七公里处的伦布里森林，三万八千人被枪毙并埋在那里。

值得一提的是，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募招的帮凶是当地警察和反犹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领头的还往往是些教员、医师或教士之流。他们的残暴比德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上曾经屠犹的基什涅夫镇，七月十七日德军和罗马尼亚仆从军一进城，五六十岁、曾经参加过几十年前大屠犹的老暴徒们立即率领几孙出动，红着眼睛，拖着铁棍四处搜捕犹太人。到该月底，他们“配合”特别行动队杀了一万多名犹太人。

一九三六年一个名叫夏洛姆·斯切兹巴德的犹太复仇者在巴黎刺杀了流亡的乌克兰的屠犹头目、白军将军彼得留拉。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彼得留拉在乌克兰利沃夫地区的反犹支持者自发实施了“彼得留拉行动”。极端分子抓了几千名犹太人，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朝死里打，残暴地杀死了二千余人。

据统计，到一九四二年底，特别行动队 A 支队和 C 支队的实际兵力已远远超过三千人，其中德国人就达一万五千人。而德占各地的自愿效力分子有十五万以上。这些人有相当部份是出于反苏仇苏的政治原因，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

世称“里加屠夫”的赫伯特·库克斯，拉脱维亚首府里加市人，加入特别行动队后很快升为头目。有一次几百名犹太人正在犹太会堂作礼拜，库克斯下令钉死门窗，亲自点火，将几百人全部烧死，一边还吹起一支轻松的

小夜曲。他组织的搜捕一次将里加市几万名犹太人一网打尽，杀死在市郊森林中。他亲自指挥杀害的犹太人在五万以上。

苏联—波兰地区的犹太人对屠杀进行了一些自发的微弱的游击抵抗。占领区德军的规定是，一名德国士兵被抵抗分子打死，至少杀死一百名人质，但对犹太抵抗分子，这个比例为一比几千，在明斯克附近一个德国警察被犹太人游击队击毙后，特别行动队处死了四千五百名犹太人以示报复。

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一九四二年一月的几个月内，特别行动队共杀害了近五十万苏联——波兰地区犹太人，其中A支队消灭了二十四万九千人，B支队消灭了四万五千人，C、D支队各消灭九万二千人。从一九四一年入侵苏联到一九四四年被苏军赶出，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共实施二百四十九次屠杀行动，消灭六十一万八千犹太人。

如果加上死于转运途中和运往死亡营后遇害的犹太人，死难者的总数约九十万。

死亡列车：全欧大洗犹

“死亡列车”将分散于欧洲各处的犹太人集中到大屠场去。屠杀者称这段路为“天堂之路”。一千二百名犹太自卫组织成员拼死抵抗，其中有一半是妇女。

德军节节败退之际，艾希曼仍然发疯般执行着屠犹令。

斯洛伐克战前有十三万七千犹太人，共有十一万人死难。丹麦上上下下立即行动，将犹太人隐藏起来。犹太人无数次呼吁西方盟国采取解救行动，但英美政府都予以拒绝。匈牙利犹太人跟希姆莱谈判，以每人一千美元的代价，救出一千六百八十四人。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海德里希在柏林近郊的江西湖畔召开了部署屠杀全欧犹太人的高级干部会议，制定出了在已占领和准备占领的三十三个欧洲国家和地区中全面铺开的屠犹行动。大屠犹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海德里希于捷克被刺身亡后，由恩斯特·卡腾布鲁纳接任保安总局局长继续统一指挥。为了“纪念”大刽子手海德里希，党卫队把随后的灭犹行动称为“莱因哈特行动”。

首先要做的是将分散于欧洲各处的犹太人集中到大屠场去：重新安置区、劳役营、集中营以及灭绝营。这项任务由保安总局犹太事务处处长阿道夫·艾希曼负责，第三帝国的军事、外交、经济和运输部门必须全力配合他的工作。运送的交通工具为火车，每趟二至三千人，是名符其实的“死亡列车”。

艾希曼每到一地，立刻在德驻占领国使馆中设立“特派员办公室”。首先采用所谓“重新安排”、“到东方安排就业”等欺骗通告，让犹太人自动集中。然后指挥德国占领军、盖世太保和当地仆从军，警察合力搜捕犹太人。然后调动几十列“死亡列车”将犹太人运往屠场或劳动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多次命令铁路部门要全力配合，优先安排运送犹太人的“死亡列车”。

一九四二年四月底起，艾希曼勒令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犹太人都佩带上黄色大卫星标志，试图一个不留地将犹太人全部运走。六月十一日他召集驻三国的行动代表开会，制定了协同行动方案。

比利时战前有九万犹太人，死亡列车将其中的四万人送进灭绝营。荷

兰有十四万犹太人，其中包括从德国和奥地利逃来的三万犹太人，死亡列车共发出六十七趟，将十万五千人送到死神面前。

法国当时有三十五万犹太人，其中十九万五千在维希政权统治区，其余的在德占区。考虑到与维希政权的关系，德国驻法大使和驻法德军司令都不同意大搜捕。

尽管如此，艾希曼还是想尽办法从七月到九月期间向奥斯威辛死亡营和索比堡死亡营发送了二十二趟死亡列车，使七万五千人坠入地狱。

一九四二年七月，希姆莱下令“重新安置”华沙犹太人隔部的四十万人。从七月二十二日到九月十二日，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赫尔曼·霍夫里把二十六万五千华沙犹太人送进了灭绝营。在抓捕过程中，被枪杀和自杀的犹太人就有一万多人，而逃走者仅八千人。第一批搜捕中有一批孤儿，教育家詹努斯·科尔扎克不忍逃生，咱愿陪着孩子们赴死，那天他穿着节日盛装，领着这些孤儿上了火车，又领着他们走进毒气室。

距离最近的所谓“新安置地”就是华沙以北约一百五十公里的特雷布林卡灭绝营。人们在五分钟内走下死亡列车，按男人、女人和孩子分为三群，脱光衣服后排队走向毒气室。屠杀者称这段路为“天堂之路”，他们计算过，男人走完它需八~十分钟，女人的时间长些，要十五分钟，因为她们得在死前留下自己的头发。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对华沙隔部剩余几万人的一大搜捕又开始了，一千二百名犹太自卫组织成员用手枪和手榴弹，出没于房前屋后进行拼死抵抗，其中有一半是妇女。

五月十六日抵抗基本被消灭，华沙犹太会堂被炸毁，整个隔部一片火海，五万六千零六十五名犹太人被当场枪毙或送走，华沙犹太区已不复存在。

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德军开进匈牙利，逼着霍尔蒂政权一起作垂死挣扎。三月十日，艾希曼召集助手制定了向奥斯威辛等灭绝营运送八十万匈牙利犹太人的方案。他亲自到布达拉佩斯，纠集当地法西斯分子组成捕犹特遣队，在极短时间里把四十二万犹太人投入六个死亡隔离区准备运送。

希姆莱想留条后路，指示艾希曼与当地犹太组织谈判，收取一笔赎金放过匈牙利犹太人。艾希曼一边提出骇人要价：短期内交出一万辆卡车、二百万箱肥皂、二百吨咖啡和二百吨茶叶，一边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向奥斯威辛灭绝营抢运死亡隔离区的匈牙利犹太人。两三个月后，四十多万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到死神面前。

十一月苏军逼近布达拉佩斯，已经没有车皮的艾希曼竟逼着最后抓起来的二万五千名犹太人徒步走向奥地利，“死亡行军”沿途还要替德军挖战壕，路上就有几千人死去。

德军节节败退之际，艾希曼仍然发疯般执行着屠犹令。每每苏军逼近一个城市，他就派人赶紧组织一次“死亡行军”。这样又将二十万看到生机的犹太人送入死神之口。他还常常视察各灭绝营，催促他们提高杀人效率，以便发出更多的死亡列车，真是十足的疯子。

欧洲其他国家的屠犹情况如下：

希腊是犹太人遇难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七万七千希腊犹太人只剩下一万余人，死难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其中大部分是被送到奥斯威辛和贝尔根—贝尔森灭绝营后处死的。

南斯拉夫原有七万五千犹太人，主要遇害于战争前期。德国、意大利、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瓜分了南斯拉夫领土。只保留了一块“克罗地亚自由国”，德国推行了亲克抑塞的政策，将塞族人和犹太人送往奥斯威辛，仅剩下二十四名幸存者。

罗马尼亚将犹太人一批批地送往波兰的灭绝营，战前罗马尼亚犹太人有七十五万，战后只剩下不到四十万人。

斯洛伐克战前有十三万七千犹太人，共有十一万人死难。一九四二年三月至十月的首轮屠杀中，有五万七千名犹太人死于奥斯威辛灭绝营，斯洛伐克当局积极配合屠犹，甚至许诺德国兵每抓获一个犹太人可得资金五百马克。一九四四年十月，艾希曼最得力的助手阿洛伊斯·布伦纳将剩下的犹太人全部送进奥斯威辛灭绝营。

法国维希政权还想将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犹太人送往欧洲，北非战局的进程使这些犹太人幸免于难。

保加利亚是德国的仆从国，虽然颁布了反犹法但并不准备执行。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德国向保加利亚施压向灭绝营送人，但保加利亚一直顶着不执行，使五万多犹太人几乎未受损失。

一九四三年八月德军开进“保护国”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解除了丹麦军队的武装，将国王软禁，逼迫丹麦政府辞职。并准备在一夜之间将丹麦总共七千多的犹太人一网打尽。德国保安总局驻丹麦头目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将消息透露给德驻丹麦海军武官乔尔戈·杜克维茨，杜克维茨再将这一消息通知给同情犹太人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丹麦上上下下立即行动，展开全民性救援，将犹太人隐藏起来，一批批乘小船送往瑞典，使德军大搜捕时只抓到近五百名老弱病残的犹太人。五百人被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后，丹麦政府还不断向德国方面询问他们的下落，丹麦的红十字会派出代表团去集中营探视。一九四五年四月纳粹毁灭该集中营时，丹麦红十字会人员抢在屠杀者之前将剩下的丹麦犹太人救了出来。

与此相比，国际上对犹太人的救援工作开展得迟，而且极不得力。

最早披露屠犹情况的是苏联，但根本没有引起西方重视。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在《真理报》上发布公告：德寇屠杀的苏联公民至少有一百万犹太人。

一九四二年五月华沙犹太地下组织向伦敦的流亡政府报告屠犹情况。六月十日犹太人崩得组织将搜集的这方面情况通报了西方盟国。七月九日英国政府专门举行了公布屠犹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八月世界犹太人大会(WJC)驻日内瓦代表戈哈德·里格纳向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发出电报，报告希特勒将用毒气灭绝欧洲犹太人，并请英美将情报转交各自国家的犹太组织，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竟扣下了情报。

全世界犹太人无数次呼吁西方盟国采取解救行动，但英美政府均予以拒绝。两国政府的理由是：第一，当务之急是反法西斯战争，尽快打赢、结束战争才是解救犹太人的最有效办法；第二，犹太人不是一个构成主权国家的民族，分散于各国，不便集中救援。并且整个欧洲的人民都在受难，犹太人不能要求特殊对待。

一九四四年四月初，阿弗雷德·魏茨勒等四名囚犯先后从奥斯威辛灭绝营逃到斯洛伐克，向全世界详细介绍了屠犹惨相，尤其是该营正加紧消灭匈牙利犹太人的情况。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驻日内瓦代表查德·利奇海因等人强烈请求西方盟国轰炸匈牙利政府部门以阻止其遣送犹太人。七月二日，英

美轰炸机轰炸了布达佩斯，炸死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五百多人。德国人将截获的利奇海因请求轰炸的电文转交给匈牙利霍尔蒂政府，几天后霍尔蒂政府下令停止向奥斯威辛遣送犹太人。

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要求美国轰炸奥斯威辛灭绝营的铁路枢纽，以阻止死亡列车。美国方面直到一九四四年十月，没有采取行动。

犹太人先后展开了一些自救行动。美国犹太人联合捐助委员会从全世界各犹太社团募集了七百三十八万美元。其中付给德国人一万五千元停止了斯洛伐克剩余犹太人的遣送。

匈牙利犹太领袖利用希姆莱想与美国私下谈判的心理，以每人一千美元的代价，用火车从匈牙利载出一千六百八十四名犹太人。这大约是唯一一次的从冥河渡回的“小船”，被世人称为“卡斯特纳快车”。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一支苏军出现在奥斯威辛灭绝营，只看到七千六百名奄奄一息的幸存者和堆积成山的尸体。这个世界史上最大的杀人工厂，开始一点点地暴露在世人眼前。

死亡营：奥斯威辛—比肯瑙灭绝营

卢布林的布雷布林卡死亡营，共杀害犹太人七十五万。

奥斯威辛死亡营是最大的死亡营。死亡营建有四座巨型毒气室，同时操作一次可杀一万二千人。人们争先恐后地脱掉衣服，涌进“浴室”。人间最惨不忍睹的景象出现在面前。窒息的痛苦和本能的相互撕扯使他们缠成一个拉扯不开的大肉坨。人发织成的袜子大受德国海军欢迎。一家德国人的日用品化工厂用人油制造肥皂。被残害者都是千里挑一的绝色美人，即使死后的卧姿化使人怦然心动。她按到大批要用美女乳房和大腿根的嫩皮作灯罩的“定货”。暴动失败了，没有一个人逃出死亡营。

死亡营是纳粹德国建立的，地点固定，批量处死的大型屠犹“工厂”。除奥斯威辛外，其他死亡营的情况如下：波兰海乌诺姆死亡营，兴建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第一任指挥官是党卫队突击队长赫伯格·朗格，首先是为了杀害波兹南和罗兹省的犹太居民。屠杀成员为一百五千至一百八十名党卫队骷髅队员和波兹南的十至十五名盖世太保干部。

卢布林的贝乌热茨死亡营，兴建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成员为三十名党卫队员和二百名哨兵，长官先后为“无痛苦致死术”专家维尔特，党卫队突击队长戈特利布·赫林。死亡营南边长二百六十五米，其他边长二百七十五米。首先接收卢布林地区的犹太人，然后是整个波兰、奥地利、德国、荷兰、比利时、苏联、挪威、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它有六个毒气室，每个容纳七百五十人，每天可毒杀一万五千人。从一九四二年三月中旬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底，共杀害六十万犹太人。

卢布林的索比堡死亡营，兴建于一九四二年三月，成员为三十名德国和一百名乌克兰的党卫队员组成，长官是党卫队突击队队长斯坦格尔，总面积为十一公顷，是一个六百米×四百米的矩形。它有五个毒气室，分成 A、B、C 三个车间，活人从 A 车间进去，死尸从 C 车间出来，如同一个肉类加工厂的屠宰流水线。

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共杀害卢布林地区、荷兰，

法国、比利时、白俄罗斯等地押运来的二十五万余名犹太人。

卢布林的布雷布林卡死亡营，距华沙一百五十公里，长官先后为党卫队头目绍尔、突击队队长托马拉和弗兰茨·斯坦格尔。

它有十三座毒气室，每间毒气室容纳二百人，日“处理”能力为二万五千人。

主要“处理”华沙、波兰其他隔离区、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南斯拉夫、希腊、葡萄牙、捷克及俄罗斯的犹太人。一九四三年春天以后，尸体被扒出来烧掉，在砖砌的台基上，用铁轨摆成炉条（焚炉尺寸为 50×50×50 米），在上面一次可烧掉二千~三千具尸体。共有七十五万犹太人被杀害。

卢布林的马伊达内克死亡营，该营主要“处理”斯洛伐克、比利时、希腊、荷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的犹太人。共杀害了二十万犹太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日，该营使用包括集体枪杀在内的各种方法一天疯狂杀死一万七千人。

这些死亡营最初采用的是机动汽车毒气室，是借助特别活动的管子将马达废气管通入密封锁死的车箱里进行大批屠杀的专用设备，一般每次可毒死六十多人，时间为十五分钟。

奥斯威辛死亡营是最大的灭绝营。死亡营长官鲁道夫·霍斯在自传中称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天接到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建立最大的谋杀中心的命令的。在这之前，奥斯威辛集中营是由希姆莱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亲自下令设立的，地点在波兰上西里西亚东部的奥斯威西姆镇附近，波兰语的原地名在德语中读作“奥斯威辛”(Auschwitz)，它原为波军的一座旧兵营。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希姆莱视察该集中营后，命令鲁道夫·霍斯将其扩建为一个同时具有关押、劳役和灭绝三种功能的超级集中营。扩建后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总面积达十五点五平方公里。原来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改称 I 号营，到该营解放时有注册编号记录的囚犯逾四十万五千人，其中女性囚犯约十三万二千人；在比肯瑙村的比肯瑙分营即死亡营，称为奥斯威辛 II 号营，所以，世人也称奥斯威辛死亡营为奥斯威辛—比肯瑙死亡营，它还先后扩大为 B1 营、B2 营等等；奴隶工厂区称为 III 号营。

奥斯威辛—比肯瑙死亡营建有四座巨型毒气室，同时操作一次可杀一万二千人，配备的焚尸炉每天可烧八千具尸体。四号火葬场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号火葬场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五号火葬场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三号火葬场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开始焚烧被毒气害死的尸体。

二号火葬场和三号火葬场各有五台焚尸炉，每台焚尸炉附设有三间小室和一间毒气室。这些毒气室可容纳二千~三千人。四号火葬场和五号火葬场各有一台焚尸炉，每个炉子附设有八间小室和四间毒气室，它们的容积各有不同，总容量为三千人。

奥斯威辛的毒气室使用“齐克隆 B”毒剂杀人，速度最快，“功效”最大。希姆莱曾视察不同的死亡营后认为，所有使用的屠杀技术都太慢，霍斯的手下卡尔·弗里奇想到了“齐克隆 B”，它是一种蓝色晶体状的氢氰酸杀虫剂，见空气就挥发为剧毒气体，操作方便，生效时间短，生产成本低。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进行了第一次“齐克隆 B”的杀人试验，试验地点是青壮年营二号房舍的地下室，试验对象为六百名男性苏联战俘和二百五十名从集中营医院筛选出来的男性犯人，试验的结果令霍斯等人非常满意，上报要

求大力推广。在各灭绝营都使用“齐克隆 B”杀人后，这种杀虫剂的每月用量达三吨左右，由汉堡的特奇—施塔本诺夫公司和德骚的达格奇公司充分供应。

当艾希曼的“死亡列车”到达奥斯威辛站台时，先由专业医生将人们分成可以劳动或进毒气室两类，这些完全丧失了职业道德的医生必要时还掰开年长者的嘴巴看看他们的牙齿，以断定他们能不能干活。所有人的行李被要求留在站台上。

不能干活的犹太人被送到比肯瑙。刽子们知道，屠杀的效率取决于受害人走上刑场的秩序，所以骗局最好保持到最后一秒钟。广播里温和地劝告犹太人先应洗个澡，“浴室”门前的地面上铺着青草皮，栽着令人高兴的时令鲜花，没进屋就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走近“浴室”时还可听到动听的音乐，一支小乐队在“浴室”前厅为“欢迎”新来者而演奏一些轻松的乐曲，乐队队员一律穿着白衫和海军蓝的裙子，俨然文雅、漂亮的一群年轻姑娘。

看守们告诉犹太人在“淋浴前每人能分到一个衣橱，看守们还“友善地”提醒人们记住自己衣橱的号码，免得出来时找不到自己的东西。随后犹太人被带到“浴室”的过厅里，那里不仅有衣橱，还能领到毛巾。墙上用各种语言写着欢迎人们来奥斯威辛营工作的标语，甚至写着洗浴时间的规定等等。人们争先恐后地脱掉衣服涌进“浴室”。

但是“浴室”内变得越来越拥挤，以至前胸贴着后背，人们感到有点蹊巧，还没明白过来，沉重的大铁门已经关闭，还听得见看守们在门外加上了锁和密封条。

地面上的看守开始走向草坪中的邪白蘑菇”，这些隐蔽在草丛中的白蘑菇雕塑是毒气室的通气孔，只见看守们向气孔中投放“齐克隆 B”。

人们正仰头望着喷头。突然，所有的灯全熄了，人们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叫。跟着，离喷头最近的人摇晃着倒下了，人们知道不妙，争相涌向大门口。受尽惊吓的犹太人意识到厄运降临，人群中发出阵阵喊挤的惨叫。紧接着，所有的喉咙好像都被一只手卡住了……十五分钟后灯亮了，屠杀者通过窥视孔察看里面的动静，若有人还在挣扎，就熄灯再等十余分钟。打开灯，只见纹丝不动的一堆白肉。看守们打开抽气机抽走毒气，然后就是干杂役、可以多活几个星期的“特别队员”打开大门处理尸体。

门打开了，人间最惨不忍睹的景象出现在面前：刚才进去的人像突然被什么抽去了全部生气，尸体木头般一个紧贴着一个站立着，所有的尸体面目极其狰狞可怕，混身青紫、伤痕累累。窒息的痛苦和本能的相互撕扯使他们缠成一个拉扯不开的大肉蛇。

尸堆成金字塔形，这是由于人群都想挤上唯一的通风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而形成的。

杂役们戴着防毒面具，先用水龙头冲去尸体上的血迹和地上的粪便，然后用绳子套住尸体将其分开。实在分不开的就用斧头砍断尸体的手指。然后用钳子拔下尸体上的金牙，搜出珠宝，剪下头发，把处理完的尸体十具一排摆在地上等看守过目。

最后杂役们再用提升机将尸体弄到焚尸炉里火化，火化后没有烧化的骨殖质则用磨碎机弄细后抛撒掉。

为了跟上毒气室的杀人速度，焚尸炉采用最新发明的三层式的巨型焚

尸炉。到后来这种焚尸炉也不够用，而且炉子经常烧坏，于是一个毒气室往往配上了好几个焚尸炉。德国的焚烧设备商人争相以最上等的材料和最新的技术向各灭绝营提供最先进的焚尸炉。

杂役们将站台和衣橱里的东西全部装车拉走，拉进一个巨大的“车间”。车间里有两三条几十米长的“流水线”，由几溜长桌组成，旁边坐着上百名“熟练的”犯人，像是在分拣邮件。第一个犯人用撬杠开箱子，箱子打开后，顺着长桌推给第二个犯人，他负责拣衣服，将衣服按种类、尺寸和新旧整齐地码放在身后的货架上。

第三人专门拣鞋子，然后是专拣眼镜、专拣领带、用放大镜和天平专门鉴定珠宝首饰成色等等。乌克兰看守在车间里来回巡视，他们有权当场枪决试图私藏东西的人。

整个车间没有人说话，人们低着头两手飞快地挑拣着。

从犹太死难者那里得到的各种物品被列为国家战略物资。一九四三年奥斯威辛营里建起炼金车间，将金首饰、金牙熔化成金锭，一天的最高产量达到二十二磅。

救护车将金锭运往柏林，救护车上涂着红十字标志，可以避免盟军飞机的轰炸。

成箱的金表、项链、戒指和胸针等，被送到当铺当掉，转换成党卫队的经费。

最后，这类赃物已多到当铺拒绝接收的程度，希姆莱便以“马克斯·黑利格”的名字将它们存入德国中央银行里，塞满三个大保险库。

余下的衣物被储存在奥斯威辛营一个专门的巨型仓库，代号叫“加拿大区”。

其中的手表和钢笔等，用来奖励党卫队的骨干分子和伤员。衣服则用来赈济灾民。

甚至尸体本身也不会被放过。第三帝国海军专门购买用人发织成的水手袜子，据称这种袜子能够长时间地保持脚的温暖与干燥，受到普遍欢迎。德国的化工康采恩法本公司的分工厂用人发作制造氨基酸的原料，还用人发做成滤酸垫。面对人发的大量需求，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党卫队总部下令，每上交一公斤人发将奖励营长官半马克。

但泽市（今波兰的格坦斯克）一家德国人的日用品化工厂用人油制造肥皂，生产过程是，十二磅人体脂肪，加入十夸脱水，再加入一磅苛性钠，煮上几个小时，冷却成形即可。

骨灰也有用处，一般卖给农民去肥田。

纳粹大小头目个人只对价值昂贵的钻石“感兴趣”，成色最好的大粒钻石常常被他们收入腰包。灭绝营看守也能捞到大量油水，他们往往接受高额贿赂，仅一勺有几块土豆的稠汤就为他们换到犯人的价值五美元的金耳坠。

纳粹根本就不把犹太人当人看，完全赋予看守们生杀大权，使得每个灭绝营都出现一些疯狂杀虐的虐待狂。

奥斯威辛营的犯人杂役马克斯·卡纳斯奉命到一个犯人棚舍的后院去收尸。他走进那个院子，血水齐脚踝深，大约七十具尸体躺在地上。被残害者都是千里挑一的绝色美人，即使死后的卧姿也使人怦然心动。她们雪白的肌体被利刃割得残痕累累，乳房全部被割掉，靠近大腿根处的皮肉也被割下。

是奥斯威辛的女看守伊尔玛·格列泽干的这件令人发指的罪行。

她不想看见灭绝营中有比自己漂亮的犹太姑娘，一见到美丽的囚犯就想方设法地要杀死她们。

另外，她接到了大批要用美女乳房和大腿根的嫩皮作灯罩的“定货”，据称这种灯罩的光线可以柔和到极限。格列泽是这方面的专家，她甚至发明了一种药水，注射到处死前的青年男女身上，可使他（她）们死后皮肤仍保持生前的柔软度和色泽。格列泽自己收集了各式各样的人皮灯罩，她特别嗜取刺有姓名、花朵或其他图案的纹身人皮，这种有纹身的人皮灯罩就更为“稀奇”。

一九四三年八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奥斯威辛、索比堡、特雷布林卡先后发生了犹太囚犯的惨烈的大暴动。其中，特雷布林卡灭绝营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发生由犹太杂役策化的暴动、逃亡，千余人惨死，几十人逃走得生。索比堡灭绝营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发生犹太杂役的暴动、逃亡，几百人丧生，几十人冲入森林幸存。

奥斯威辛灭绝营的大暴动发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四十多万匈牙利犹太人刚刚被消灭完后。

当时营内流传着一旦苏军逼近德国人就要杀死所有囚犯的说法。烧尸的二号炉、三号炉和四号炉杂役特别队都制定了暴动计划。

十月七日一早，四号焚尸炉的特别队长接到通知，叫他下午带人去烧三百具尸体。高度紧张的暴动者认为这是骗杀他们的阴谋，竟生硬地拒绝了命令。党卫队员恼怒地命令他们集合，无法再保持镇静的人们大吼一声扑上去，掏出暗藏的铁锤和斧头杀死一些军士。但全副武装的德军很快赶来，隔着铁丝网一一射杀暴动者。人们退入棚舍，走投无路的人们点燃草垫子引燃了整个棚舍，大火蔓延到焚尸炉，先烧燃焚尸炉的木顶子，随即整个炉子烧了起来。

二号炉的特别队看到焚尸炉起火，以为是整个暴动的信号，他们扑向正好赶来的看守，将领头的一个德国看守塞进了熊熊燃烧的炉膛。人们抄起各种家伙结果了三名党卫军看守，剪断电网向营外奔去。然而德国人很快乘着卡车带着警犬追了上来，逃亡者相继被就地处决。一部分逃亡者躲进一个谷仓，德国人点燃了谷仓，在外面等着射杀那些从大火中冲出来的人。冲出电网的暴动者被枪杀了二百五十名，只有十二人逃脱。看守们还在营内枪杀了二百名暴动者。第二天十二名逃脱者全部被抓住，德国人枪毙了他们并把尸体拉回营区示众。

三号炉和杂役们看见党卫队部队包围了自己的营房，赶紧将准备暴动用的炸药倒进厕所。党卫队没有搜到什么，看守们接着把他们赶到二号炉去烧尸。他们烧了六百具刚刚被杀害的暴动者的尸体。

暴动前从制造弹药的“联合工厂”冒死拿出炸药的三位犹太姑娘埃拉·戈恩特、图兹卡和金娜（后两位姑娘只留下了姓），以及炸药的转交者，奥斯威辛地下组织成员犹太姑娘罗莎·罗葆塔四人被党卫队查获，罗莎和三个姑娘被带到奥斯威辛营的政治处，德国人要她们供出奥斯威辛营地下组织（奥斯威辛营有十二个国家的囚犯，奥斯威辛营的地下组织领导核心由这些国家的政治犯组成）。她们始终没有开口，罗莎还带话给自己人说死也不会招供。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四个姑娘一齐被吊死在营地中央的广场上，所有囚犯被勒令观看，人们看到她们临死前毫无惧色。

由于苏军胜利推进，希姆莱下令从一九四四年夏季起将奥斯威辛营的

工厂设备和囚犯分批向内地其他集中营转移，希姆莱还想让奴隶工厂继续生产。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起，奥斯威辛营的设备和犯人开始向上西里西亚的格罗斯—马森集中营转移。

当时的奥斯威辛营还有十二个国家的十一万名囚犯，其中包括一名从达豪集中营转移来的中国人。

十月十八日，希姆莱下死命令立即撤离奥斯威辛营。十二月二十五日后，由于所有车皮被前线溃退部队占用，德国人强迫囚犯徒步转移。

由于寒冷、饥饿、疲惫和看守们不时的枪杀，这场行军演成一场可怕的虐杀。

每一百米左右就有一具遇害者的尸体，组成一个延续几百公里的路标，指向吉凶未卜的目的地。

到达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后，营房已难以再挤下新来的人。

拥挤的营房开始流行斑疹伤寒和猩红热，疫情越来越猛烈，每天尸体一车车地拉出去。从转移行动开始到基本结束时，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有二十五万人死于疫并饥饿等，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苏军到达奥斯威辛营之前，西里西亚的纳粹头目恩斯特·舒莫斯一直忙着往柏林抢运“加拿大区”的死者衣物和销毁罪证。鉴于卢布林地区的马伊达内克灭绝营的记录未及时销毁而被苏军得到，堆成小山的奥斯威辛营的杀人记录、文件被全部烧毁。舒莫斯根据希姆莱的密令开始处决可能成为人证的人员，除了多年干杂役的特别队员外，还包括长期在办公室做文秘工作的文职人员。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纳粹拆毁了二、三、四号焚尸炉，二十六日炸毁了五号炉。

一九四五年二月六日，当一个波兰红十字会的代表来到奥斯威辛灭绝营时，只看见几千名仅有眼珠会转动的幸存者。

从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第一次用毒气（“齐克隆 B”）试验杀人，到一九四五年一月为止，由于杀人记录几乎全部被销毁，据各方面资料推算，奥斯威辛死亡营总共杀害了二百~四百万人，其中至少有一百五十万是犹太人。（另外，供参考，据美国历史学家劳尔·希尔贝格较为保守的推测，奥斯威辛死亡营因疾病被处决，被毒气室大批谋杀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一百万，其中三十万人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花名册上作为囚犯登记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死亡试验：集中营绝育试验和其他“医学”试验

利用 X 射线在妇女的卵巢和男人的睾丸上集中照射，使其丧失生育能力。每个星期都从“十号楼实验室”拉出数具已经解剖了的女尸。试验对象疯摆着头、翻着白眼，两手乱抓自己胸部，最后痉挛而死。

看守们按时毒死一些犹太人，切下头颅给教授送去。

必要时还要做双胞胎母亲的活体解剖。酒精瓶里泡着几百双各种颜色的眼睛。“死亡天使”门格尔与一名绝色犹太少女姘居。“美国太空医学之父”竟是残忍的白衣死神。

阻止犹太民族的人口增长是希特勒种族灭绝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间，德国政府、人类学家和医生们经过艰难的调查和追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犹太妇女与法国雇佣军队中的黑人士兵发生性关系后出生的四百名混血妇女秘密地强制做了绝育手术。强制性绝育和强制性堕胎成了制服德国本土和占领区的“劣等民族”的工具。使用强制和残暴手段的绝育手术使受害者中大约百分之五十的妇女在绝育手术后死亡，约百分之九十的男性死亡，到一九三九年战争开始前至少有五千名妇女和六百名男人死于绝育手术。战争开始后，集中营内从事强迫劳动的犹太妇女被强迫中止妊娠；对被吞并的波兰的犹太妇女实施强制性绝育。

纳粹党卫队旅长加·克劳贝格一九四一年在柯尼希斯贝格妇产科医院和专家们试验出一种称为“克劳贝格方法”的绝育方法，这种方法是将一种刺激液注射入子宫腔，引起子宫腔发炎和输卵管堵塞而导致不孕症。克劳贝格将此方法报告了希姆莱。希姆莱指定奥斯威辛集中营作为克劳贝格绝育研究的试验中心。

一九四二年秋，奥斯威辛—比肯瑙死亡营建起三十多间专门用 X 射线做绝育试验的实验室。纳粹党卫队突击队旗队长霍斯特·舒曼博士用 X 射线在犹太男女囚犯身上进行“舒曼绝育方法”试验，利用 X 射线在妇女的卵巢或男人的睾丸上集中照射，而导致其丧失卵子或精子的再生能力。为取得最佳效果，在 X 射线照射过程中，X 射线的照射时间和照射强度不断变化，使试验的受害者几乎都死于丧失体力、虚脱和烧伤。假如被试验者在试验之后其劳动能力减退，则通过注射酚醛树脂或用毒气将他们杀死。只有极少数的被试验者活了下来。

一九四二年晚秋，奥斯威辛青壮年营的十号楼改建成了“实验楼”。从此，十号楼与外界的联系全部被切断。那里面配备了各种医用器具，设有一间小放射室和几间手术室，摆着几张妇产用床和其他仪器，俨然一个妇产科诊所。第一层有几间化验室和配有床的病房。第二层是一间打通了墙壁的大厅，里面有为试验对象摆放的几张三层床。舒曼博士在这里做 X 射线绝育试验，为了确定 X 射线的照射效果，经过 X 射线照射过的器官将在这里手术切除后拿去化验。受害者中有十五名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是艾希曼的死亡列车从希腊萨洛尼基押运来的。

一九四三年四月，克劳贝格教授和党卫队救护军官宾宁以及医生约翰·格贝尔在“十号楼实验室”又开始了一种恢复绝育妇女生育能力的新试验。试验期间，当希姆莱曾询问：“用一千名做了绝育手术的犹太妇女进行试验，估计需要多长时间可以看到效果？”克劳贝格报告如下：从我进行的试验情况看，如像目前这样的进展，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她们不能生孩子——这一时刻到来的时间不会很久了。

我可以这样说，把一位技术相当熟练的医生安排到适合他的工作位置上，再配上十名助手，每天最快只能做几百例手术。

根据奥斯威辛集中营在给上级报告中提到的该集中营曾参加绝育试验的囚犯人员的统计材料显示，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女性囚犯被分为“供绝育试验用囚犯”和“绝育囚犯护理员”。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一百一十二名从比利时马里内斯囚营来的妇女，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一百二十八名从萨洛尼基犹太人隔离区来的犹太妇女，一九四三年六月至一月期间，四百三十三名来自法国德朗西囚营、荷兰韦斯特布克囚营的妇女，被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后，作为“绝育试

验用囚犯”被送进了“十号楼实验室”。

自一九四三年四月至十月底，共有七百一十二名犹太妇女作为“绝育试验用囚犯”，有一百零二名妇女作为“绝育囚犯护理员”被送进“十号楼实验室”。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奥斯威辛一比肯瑙死亡营重大文件备忘录的最后一份记录称：“现在只有三百八十七名供绝育试验用囚犯和六十七名绝育囚犯护理员。其中三百二十五名女试验者和三十五名女护理员已经死亡。”

波兰历史学家弗兰西斯柴科·皮珀尔称，据当时的女囚犯称，供绝育试验用囚犯中的一些人死去或被折磨死后，他们的尸体也被解剖了；一名叫阿尔特·雅库乌斯基的当焚尸杂役的囚犯在法庭的证词中称：“每个星期都从‘十号实验室’拉出数具已解剖的女尸送往焚尸炉。”纳粹党卫队突击队小队长佩利·布阿德在回忆录中称：“纳粹党卫队的医生们没有一个意识到，他们在‘十号楼实验室’进行的试验是一种野兽般的犯罪。他们试验的对象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和没有生存权力的犹太人。”

强制绝育和绝育试验也在其他集中营进行。一九四四年中期，舒曼博士来到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在儿童身上进行绝育试验。一九四四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初，克劳贝格和他的工作人员也转移到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继续在女囚犯身上进行他的试验。在许多集中营进行的强制绝育和绝育试验一直持续到纳粹政权垮台。

集中营里还进行了人类学测量、压力试验、高空缺氧试验、药物试验和生存能力试验。曾是农学士、养过几年鸡、对品种改良很有兴趣的希姆莱亲自创办了“德国遗传研究基金会”，集中营进行“医学试验”的医生都是基金会成员，不少人是教授、博士。他们很坦然地作各种残酷的活人试验，活像一群白衣死神。

这种纳粹式的医学试验使大批犯人惨死。

一九四一年五月，空军军医西格蒙·拉希尔博士写信给希姆莱，要求用“职业罪犯”进行高空缺氧试验，以找到救护从高空被击落的飞行员的方法。希姆莱同意了这一要求。拉希尔将犹太“罪犯”固定在一个压力舱里，然后减低气压，让他们长时间处于模仿一万四千米高空的低压状态。接着他命令犯人取下氧气面罩。惨剧立即发生，试验对象疯摆着头、翻着白眼，两手乱抓自己胸部，最后痉挛而死。有八十多名犹太人死于这种试验。

拉希尔还进行冷冻试验。两名苏联军官脱光衣服后被投入零下二十五度的冰水中。三个钟头过去了，二个苏联人还可以说话相互鼓励。五个钟头过去了，其中一位苏联军官请求看守开枪打死自己，拉希尔拒绝了，观察他们一直到冻死。

绰号“蓝胡子”的沃尔弗勒姆·西弗斯，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名教授奥古斯特·希尔特博士作人类学试验的重要助手，他的任务是将犯人毒死供希尔特解剖。有时他会叫看守们现时毒死一些犹太人，切下死者的头颅给希尔特送去。希尔特就用这些头颅进行他的人类学研究，在课堂上传授如何识别犹太人的“研究成果”。

“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斯的理论是：“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有人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了良种犬，我也能在里面培养出优良人种来。”门格尔是这群白衣死神中最臭名昭著的恶魔，获得过法兰克福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二个博士学位，智力超人，三十岁时担任奥斯威辛死亡营的主任医师。业余爱

好是骑着自行车在灭绝营里闲逛和寻找。他曾亲自冲到毒气室“抢救”出几个犹太侏儒，给他们打各种针剂，看能不能快速长高，他拔下侏儒的牙齿与正常人牙齿进行比较，他还叫他们脱光衣服，在请来的党卫队军官面前当展品。门格尔对女侏儒兴趣最浓，当众叫她们做裸体表演。

门格尔的试验是研究孕育双胞胎的奥秘，以让每个雅利安母亲都生双胞胎。他每天杀死一些双胞胎，必要时还要作双胞胎母亲的活体解剖，观察她们的子宫构造，然后将他（她）们的器官包好送到柏林作进一步研究。他对一千五百多名犹太双胞胎进行了试验，活下来的不到二百人。

他的另一项“著名”试验是用颜色将人眼珠染成雅利安的蓝色。维拉·克里格和她的孪生妹妹奥尔加曾当过门格尔的试验品，当时她们仅五岁。双胞胎的父亲一到奥斯威辛一比肯瑙死亡营就被送进了毒气室，母亲却被留下来，因为门格尔想弄清楚为什么她女儿的眼睛是褐色的而她本人却是蓝色的。两个孩子曾被放在一只用草盖着的篮子里达十天之久，其间门格尔多次向她们的眼珠注射彩色水，想把她们的眼睛变成蓝色。试验室里有一间样品陈列室，那里的酒精瓶里泡着几百双各种颜色的眼睛。

门格尔在灭绝营发现了一名叫维尔玛的绝色犹太少女，不顾纳粹严厉的戒律与之姘居。这位犹太富豪之家的少女也爱上了他，并在战后逃亡生涯中给予他巨大的帮助。一九六一年一名叫努拉·埃尔多克的年轻犹太妇女在巴拉圭与门格尔不期而遇并认出了他，但门格尔也一眼看到她手臂上蓝色的奥斯威辛营犯人号码。以色列特工组织摩萨德派埃尔多克重返巴拉圭去确认这个恶魔，竟被一名叫阿尔贝特的纳粹党骗进深山杀害，并用集中营练出的手艺肢解了她的尸体。被激怒的摩萨德随即发动规模更大的追杀，均被门格尔逃脱。他甚至还策划伏击了以色列突击队并杀死一名队员。门格尔的晚年每年各种收入达几百万美元，居住在巴那河畔的一幢白色小别墅里，由巴拉圭的军队、警察和四名贴身保镖保卫他的安全，他甚至在每年纳粹党夺权纪念日一月三十日、希特勒的生日四月二十日和巴拉圭国庆节（也是以色列国庆节）五月十四日几天示威性地设宴招待老伙伴。全世界的公愤一直持续到巴拉圭警方宣布一个几年前淹死的老头就是他为止。

逃脱惩罚的白衣死神还有后来被誉为“美国太空医学之父”的胡贝图斯·施特鲁格霍尔德。当时他是德国空军医学研究所所长，首次披露事情真相的世界犹太人大会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文件称，二战期间施特鲁格霍尔德一直假手西格蒙·拉希尔在灭绝营作包括活体实验在内的残酷试验，拉希尔将现场记录、有研究价值的器官和内脏给施特鲁格霍尔德送去供其研究。战后美国政府聘请他参加核武器研制计划，给予高薪华宅。后来请他主持太空医学研究，从灭绝营的试验中获得的科研资料使之在这一领域中保持领先地位。施特鲁格霍尔德一九八六年死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生前竟获得巨大荣誉。

死亡档案：大屠杀绝不能重演

总计死难犹太人数：五百八十二万零九百六十人。

纽伦堡后续审判判处包括大屠杀元凶在内的二十四人死刑。艾希曼和“里加屠夫”被犹太人追杀。欧洲犹太人骤然减少了二分之一，世界犹太人减少了三分之一。不排除希特勒有精神

病理的可能。“金发野兽”海德里希演奏小提琴时，会数小时泪流满面。西方大国鲜有针锋相对的斗争举动。分层次地捕杀“有节奏”地残酷推进，是一部恐怖之至的死亡赋格曲。光头党活动猖獗。世界最大的种族灭绝大屠杀纪念馆正式开放。

纳粹大屠犹的死难者数目，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和世界犹太人大会估算，为五百七十万人。下面是各国、地区被屠杀犹太人的估算数目：苏联—波兰地区（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四百五十六万五千人匈牙利四千万零二千人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七万七千人德国十二万五千人荷兰十万零六千人法国八万三千人奥地利六万五千人希腊六万五千人南斯拉夫六万人罗马尼亚四万人比利时二万四千人意大利七千五百人挪威七百六人卢森堡七百人总计五百八十二万零九百六十人犹太人的财产损失，最保守的估计约为一百二十亿美元。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国际军事法庭于纽伦堡，根据违反人道罪（指对平民的屠杀、灭绝和奴役等）等四条罪行起诉和定罪，对戈林等十二名纳粹德国首要战犯宣判死刑。此前，大屠杀元凶海德里希于一九四二年被刺死，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三个元凶自杀身亡。在被起诉的组织和团体中，屠犹组织党卫军、国家秘密警察被法庭宣布为犯罪组织。

美国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对在纳粹德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机构与组织中身居要职的一百七十七名被告进行了十二项后续审判，其中与大屠杀有关的有：医生审判（针对在战俘和集中营囚犯身上做医学试验）；法官审判（针对利用法律迫害犹太人和纳粹党反对派的高级司法官员）；波尔审判（针对党卫军集中营管理机构的领导人 H.von·波尔）；弗里克审判（针对大量使用外国强制性劳工的 F·弗里克总裁和他的康米恩）；法本公司审判（针对法本公司在占领区的活动）；种族和移民局审判（针对党卫军的种族计划）；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审判（针对奥伦多尔及其他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后续审判判处包括大屠杀元凶在内的二十四人死刑（其后十二人被执行）。

可以确定其具体犯罪地点的战犯由受害国家根据国内法审判，一些大屠杀纳粹元凶和当地帮凶被严惩。

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和其他犹太人复仇组织在战后五十年来一直追踪、捕杀着逍遥法外的屠犹元凶。其中，大元凶艾希曼于一九六二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贫民区被摩萨德抓获，他被运回以色列受审，以色列特别法庭根据其反人类和反犹太人等十五条罪行判处他死刑，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他被送上了绞形架，尸体被焚化后扔入地中海。“里加屠夫”赫伯特·库克斯也被犹太复仇者在南美洲击毙。

屠杀真相公之于世后，提高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呼声并引起世界范围的响应、同情和支持。根据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规定，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归阿拉伯人，一个归犹太人。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面积为二万四千平方公里，犹太教为国教的以色列国正式存立，苦难的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寻找到被赋予宗教意义的希望之乡。以色列现有人口四百七十万，其中百分之八十为犹太人。

纳粹大屠犹使欧洲犹太人骤然减少了二分之一，世界犹太人的人口也因此减少了三分之一。关于纳粹把犹太人单独挑出来予以无情灭绝而灭绝又一直能进行，数目如此惊人的原因始终众说纷纭，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希特勒个人的原因和纳粹集团出于政治、军事及经济的考虑。希特勒从

小就从生理上、思想上极其厌恶犹太人，不排除其中有精神病理的可能，他的煽动富有极强的感染力，自己老婆就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戈培尔坐到希特勒身边仅几分钟就“转变”成一个狂热的反犹斗士。在发展阶段高举反犹大旗使纳粹集团在政治上大获其益，爬上颠峰，发动战争期间反犹是最好的战争借口和欺骗鼓动的口号，战争进行期间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和强迫他们劳动可以维持战争机器的疯狂运转。

第二，欧洲人和犹太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领域里的复杂冲突。欧洲有长远的反犹传统，反犹一直是罗马教廷的宗教职责，世俗统治者往往把对犹太人宗教迫害和经济掠夺结合起来。

对德国民族性的形成影响很大的马钉路德一方面大骂教皇，一方面在确信犹太人不会改变信仰后，一改早先推崇、赞扬犹太人的态度，开始诅咒和痛骂犹太人。

以西方形而上学为基石的欧洲文明在本世纪已经进入衰落阶段，而犹太人每到一处，总是建立起自己的社区，犹太商人的善于经营，使当地经济发展迅猛，令感叹资本主义经济使古老的文化传统日渐破碎的某些欧洲人士反感。文化向来独立于世的犹太人一直有着冷峻、怀疑和善于讽刺的性格，涌现过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本杰明等思想观念造反大师，犹太社区的社会主义活动也非常活跃。而有着深厚的人文思想传统、性格高傲的德国人，死死抱住狭隘的、带着浓厚浪漫主义悲剧色彩的颓废理想主义不放，俨然欧洲最后的贵族，在思想上已经落后。这也许可以解释，被称为“金发野兽”的海德里希丧失人性地下令屠杀千千万万犹太人，而他演奏小提琴时，有时会动情地数小时泪流满面。

第三，西方大国对纳粹的退让、姑息，以及人性中的欲望和软弱。西方大国在靖绥主义方针指导下，以不干涉德国内政为由一再姑息纳粹的滔天罪行，鲜有针锋相对的斗争举动。大屠杀前夕极力封堵出逃的犹太难民，屠杀期间救援不力，使纳粹德国更加猖獗地挥动屠刀。另外，大屠杀的各级参与者，有的出于聚敛财物和向上爬的贪婪欲望，为虎作伥，丧尽天良；有的是由于盲从和人性的软弱，助纣为虐，陷于荒谬绝伦的境地。灭绝营系统的毒剂分发人库尔特·格施坦因，自己的亲戚死于毒杀精神病人的“无痛苦致死行动”，在大屠杀中他一边听话地杀人，一边暗中作了详细记录，在法庭上他声称之所以坚持干下去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详尽的纳粹罪证，他的供词和详尽的记录确实成了法庭的铁证，最后他自杀于狱中。

第四，纳粹屠杀组织的“周全”，疯狂的运转和残忍。艾希曼、霍斯、库克斯等元凶完全是些疯子，死亡营的很多看守都是心理变态的残忍的人魔。大屠杀安排得非常“细密”、快速和“有秩序”，奥斯威辛死亡营附近的居民甚至不知道旁边竟有这样一个人间地狱。分层次地捕杀，“有节奏”地残酷推进，是一部恐怖之至的死亡赋格曲。

今天，以光头党为代表的新纳粹组织在德国发展很快，选举中每次都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四的支持率，它们还制造针对政府、黑人和犹太人的街头暴力行动，仅在一九九二年就制造了二千一百八十四起暴力事件，造成十七人死亡，对纳粹大屠犹的历史事实他们竟宣称：“毒气室在集中营里是用来消灭虱子的，而没用它来杀人。”在奥地利，由老纳粹分子组成的奥地利自由党已成为拥有百分之十八支持率的维也纳第二大党。在比利时，极右的弗拉芒集团控制着百分之十二的选民。瑞士的三个极右政党在议会中占据

了十六个议席。挪威和丹麦出现了具有纳粹色彩的进步党。在瑞典出现了新民主党。在俄罗斯，有十多个新纳粹党叫嚣要清除国内的犹太人和高加索人等少数民族。捷克的光头党不断袭击茨冈人和越南人，一家报纸登出了一百六十八名政府领导人的名单，指出他们是“犹太人和混血的犹太人”。

在罗马尼亚，一家发行量最大的周刊每期都有反犹内容。在匈牙利和波兰，犹太会堂和犹太人墓地经常受到亵渎，匈牙利的一位著名反犹剧作家于一九六三年六月成立了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控制着议会中的十二个议席。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右翼政党也非常活跃。一九九五年二月，日本一个名叫西冈昌纪的医生在刊物《马可·波罗》上发表题为《毒气室不存在》的文章，断然否定奥斯威辛灭绝营杀过犹太人，此论一出引起世界舆论的严厉抨击，致使《马可·波罗》不得不宣布停刊。近年来日本极右势力一直气焰很盛，他们不断宣扬“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根本不存在七三一细菌部队”、“新加坡大检证只杀了干把人”等谬言，妄想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罪行辩解翻案。

纳粹大屠犹过去五十年后的今天，法西斯主义又开始抬头，引起人们的忧虑和警惕。人类绝不能忘记纳粹大屠犹的悲剧和法西斯主义对世界造成的巨大创伤，人类一定要对这一点保持清醒。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美国华盛顿的世界最大的种族灭绝大屠杀纪念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克林顿总统参加了纪念华沙隔都暴动五十周年活动并于二十二日主持了纪念馆的开幕式。一九七七年，一位名叫埃利·威赛的美国犹太公民给当时的总统吉米·卡特写信，建议修建一所大屠杀纪念馆。一九八一年美国国会通过有关法案，由私人捐款一点六八亿美元，历经十五年建成。美国设计师用高科技手段使参观者对大屠杀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从而达到纪念馆的目的：“我们希望说明它是怎样发生的，并呼吁确保那场悲剧不会再重演。”

一九九四年，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将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的同名小说拍成叙述大屠杀场面、长达三个小时的黑白巨片《辛德勒名单》，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的一个展厅，回荡着悲戚的童声：“我叫娜塔娅·维拉，九岁，乌克兰基辅市人。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德国人和乌克兰警察把我们全家赶进了巴比亚尔沟。”，“我叫伊里特·宾戈诺维奇，十一岁。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德国兵将我和姐姐从华沙隔都送进了特雷布林卡死亡营。”……人类绝不能忘记这些死亡档案。

绝不能让大屠杀悲剧重演。

人间地狱：结局还是开始？

1945年：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概况：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为迫使日本迅速投降，在日本广岛投掷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当场炸死七万余人，

负伤失踪者五万余人。八月九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造成九万五千人伤亡。原子弹迅速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拉开了人类核灾难的序幕。它还直接导致了战后美、苏的核军备竞赛，在核威慑力下形成长达几十年的世界格局。

原子弹是原子兵器的一种，是利用分裂性物质的核分裂连锁反应，在瞬间释放出极大的能量，具有极大破坏作用的兵器。原子弹的主要成分是铀（或钚），这种具有很强辐射作用的稀有元素，能通过光辐射、震动的力量和热量的释放将敌方的所有人员、牲畜、物资归于毁灭。它不仅使受害的一方遭受难以承受的巨创，而且使胜利的一方亦毫无获得。

一九四五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尾期。

随着五月八日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事也告结束。

七月二十六日，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的名义发表的“波茨坦宣言”意在敦促日本迅速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

八月六日，日本广岛遭到一颗威力空前的炸弹的袭击，立即造成七万余人死亡，十余万人受伤。

八月九日，又一颗同样的炸弹落到了日本长崎，又立即造成十余万人伤亡。

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破天荒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面无条件投降。

日本的迅速投降，出乎当时许多人的预料。而对促成这一效果的两颗炸弹的性质，在此之前知之者也甚少。

广岛的爆炸一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宣布：这是一颗原子弹！

日本军方派往广岛的核科学专家也很快得出结论：这是一颗铀弹！

对于长期同日本艰苦作战的军队和人民来说，这不啻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喜讯，而对蘑菇云下的日本来说，这又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灾难。

但这根最终操在杜鲁门手中的超级大棒，却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从天而降”的，甚至最初研制它的目的也不是用来对付日本的。对它的策划一直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

美、德争先：“曼哈顿” 计划与“阿尔索斯”行动

“……那是一种新型的威力极大的炸弹。仅仅一颗这样的炸弹放在船上在一个港口引爆，就足以摧毁整个港口连同周围地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一九三〇年代，爱因斯坦在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质能转换公式 $E=mc^2$

论界的单纯命题了。一九三八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和斯特劳斯曼成功地进行了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的实验，终于出现了物理界期待已久的裂变效应。

欧美各国的政界和科学界于是越来越密切地关注来自各国第一流物理实验室的报告。

这时应该说从原子核裂变中获得巨大能量的实验已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哪一国能够首先把它转为实用，造出第一颗原子弹，那伴随而来的将不仅仅是科技应用的巨大成功，对处于战争前夕虎视眈眈的双方在实力对比上也将产生决定性影响。

本来德国在此领域具有绝对强劲的竞争优势：它手中拥有丰富的铀矿，攫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沥青铀矿，霸占了比利时一千二百多吨精选铀矿石，还有本国的萨克森铀矿；其发达的化学工业、先进的机械制造工业、雄厚的财力，也令欧美诸国只能瞠乎其后；特别是大批素质较高的研究人才和起步较早的原子物理学研究，更使它具有了问鼎核科学这一新兴的尖端学科的实力。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哈恩和斯特劳斯曼揭示出铀裂变现象后，次年德国即由享誉世界的理论物理学家海森堡牵头，开始了铀计划的组织实施，并就建立第一座原子核反应堆做了充分论证。此时的德国在该领域大有独领风骚的势头。

但自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后，对犹太人等非日耳曼民族实施种族歧视和迫害，使身居中欧的大批科学家流亡到美国，其中仅物理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就有爱因斯坦、玻尔、费米、西拉德等等。美国不费吹灰之力就聚敛了科学巨轮所不可或缺的第一动力——人才！再以其雄厚的国力为背景，似乎也堪同德国在该领域一争高低先后。

也正是这些流亡到美国的科学家首先强烈地意识到绝不能让纳粹德国首先拥有核武器并积极采取了防范措施。因为他们知道，德国人不仅在实验中首次实现了核裂变，而且也是德国人首先预见了原子武器的可怖的威力。鲁道夫·派尔斯和奥托·弗里施战前就在论文中预言：仅仅一公斤纯铀就可以制造出一颗威力无比的炸弹。他们还叙述了一种分离铀二三五的可能方法和原子武器的原理，并对这种武器的效能作了估计。

匈牙利裔的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在这一事态中对美国起了重要作用。他曾在德国的大学中从事过核物理研究，深知如果能有一个以上的中子被释放出来，连锁反应就有可能发生。为了阻止德国人研制出原子弹，西拉德和意大利裔核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美国政界和军界奔走游说的同时，还采取了其他的办法。

首先他们利用一九三九年夏天海森堡到美国讲学的机会，由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乔治·B·佩格拉姆出面力聘海森堡担任该系教授，敦请其留在美国，但未能成功。此后，西拉德和费米等人决定：为了防止任何有关核裂变的情报泄露给德国从而加速德国同行的研制过程，必须呼吁德国以外的从事原子物理研究的学者自动实行“自我出版检查制度”，对德国人封锁一切有关这方面研究进展的信息。

紧接着，由佩格拉姆教授和费米出面，他们力图使美国海军作战部长S·C·胡柏海军上将相信，德国正在研制一种威力无边的炸弹，但对此一窍不通的胡柏显然认为这只是一个天方夜谭。

最后，他们想到了一个被白宫另眼相看的巨人，希望通过他去直接影响白宫的最高首脑罗斯福总统。这位巨人并不是什么达官显要，而是饮誉全球的物理学界泰斗，来自德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简而言之，爱因斯坦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爱因斯坦在这封签名信中说：核裂变能产生极大的能量。如果应用研究的最新成果，摧毁性的新型炸弹就有可能制造出来。“仅仅一颗这种炸弹放在船

上在一个港口引爆，就足以摧毁整个港口连同周围的地区……”据悉：德国正千方百计地加紧研制这种炸弹，因此美国应尽快着手此项研制工作。

这封信由罗斯福总统的密友兼科学顾问、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一日直接呈递给了总统本人。

经过一天的考虑：轮椅上的罗斯福在第二次接见萨克斯时仍举棋不定。尽管他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然而，动员整个美国科学——工业界与德国来一场制造原子弹的竞赛，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人手、经费、保密等一系列如何解决？这种谁也没见过的炸弹万一造不出来怎么办？假如制造过程中不慎爆炸又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萦绕在这位患过脊髓灰质炎的总统脑中。最后，焦急万分的萨克斯引用了当年拿破仑因没有采用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制造蒸气船的主意而终于未能横渡英吉利海峡征服英国的例子，来劝说罗斯福。

此时德国已在策划入侵比利时和荷兰。面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希特勒疯狂扩军备战的现实，罗斯福感觉到了眼下这封信的分量。在这场胜败未卜的竞赛中，只有美国堪与德国匹敌。而德国一旦得逞，美国势必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因此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投入这场竞赛。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罗斯福果断地拍了板，对爱因斯坦的信作了肯定的决定。他对军事助手沃特逊将军下达了命令。一个专门负责“铀裂变炸弹”研究的代号为“S—11”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了。其主要成员有陆军部长史汀生，科学研究发展局长布什博士，还有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博士。

美国的核战车终于启动了，而日本此时正在中国南部掀起战火。但日本人万万想不到，他们正追赶着两颗摧毁性的炸弹。五年后使他们迅速崩溃的种子已经在大洋彼岸悄悄播下。

美国政府一开始只提供经费以进行核实验，因此头两年 S—11 委员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分离浓缩铀和如何产生裂变连锁反应的实验性课题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实验室的劳伦斯教授发明了电磁分离法；哥伦比亚大学的尤里博士研究成功了气体扩散法；后来美国著名的卡内基学院的阿贝尔桑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热扩散法。为了扩大材料源，芝加哥大学的康普顿和西博格还设立了一个“冶金”实验室同时研究用钚来产生裂变的可能性。

S—11 委员会制定的十六个初步计划，分散在海军、各大学和各实验室里互不相关地各自进行。尽管初步的研究进展神速，但布什和科南特还是认识到，要在战争期间将原子弹付诸实用，研、制工作必须统一起来。

随着欧洲战局因德国于一九四一年风卷残云般横扫欧洲而日益严峻，特别是风闻德国柏林威廉皇家研究院承担一庞大的铀研究计划，美国日益加快了核研究步伐。

一九四一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使原子弹研制进入工业阶段的迫切性进一步加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在十二月七日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的偷袭，等于是激怒了一颗即将爆炸的巨弹，为日后遭到的惨痛报复找了一个再好不过的理由。

根据布什博士的建议，由陆军工程兵负责承建原子弹研制工程设施。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一日，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建筑部副主任格罗夫斯将军以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马歇尔将军的全权代表名义主持了 S—11 委员会的科学家、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会议，制定了命名为“曼哈顿”的新计划。研制工作的所

有指挥权由设立在纽约以东曼哈顿地区的专门机构接管。统一后的“曼哈顿”计划直属总统，任何人不得干预，这种辖属关系甚至严格到对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的询问都无可奉告。为便于管理，分散各处的力量被集中起来，格罗夫斯为此在新墨西哥州的荒原上选择了一个间谍和不相关的人不可能涉足的偏僻地区，就是洛斯阿拉莫斯。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工兵上校格罗夫斯被总统任命为原子弹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并在当天被晋升为准将。格罗夫斯上任后不久，即委任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奥本海默教授为原子弹研制的技术负责人。为了严守机密，对参予“曼哈顿”计划的人员进行了严格的审查，现场出入受到严格限制。此事就连美国国会也不知其真相。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天下午在芝加哥足球场地底下的一间大厅里，当着全体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的面，费米进行了裂变链式反应的实验。过去仅仅只能使原子产生裂变，但从这一天起，人们却可以随意地控制裂变：可使它产生，也可使它中止。这时，科学家们的头脑中已经在设想怎样让这样的链式反应在一颗原子弹中再现。这是实验证明的理论原则，目前的问题只是立即将之投入工业级的生产。

但正如格罗夫斯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的那样，“曼哈顿”计划像是在充满了不定因素的半空中走钢丝。任何人都无法估算制造这样一种谁也没见过的炸弹到底需要多少经费，也不知道一颗炸弹又要多少裂变材料。单单铀的浓度选择范围就可以从百分之零点七一直排到百分之一百。大部分的工作只能靠估算来安排。

对此从美国政府对研制原子核的拨款一再追加上也可见一斑。

直到最后“曼哈顿”计划完成后，才最终得出全部共耗资二十亿美金的数字。

遵照美国政府为“曼哈顿”计划确立的两个原则：一、造出原子弹供给军队；二、在德国人之前造出原子弹，“曼哈顿”计划必须从速进行。为此采用了多管齐下的方针。例如分离铀的三种成功方法一齐上马，三种类型的工厂集中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先后动工。后来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又另外建立了一座分离钚的工厂。最后确定，到一九四五年夏天必须准备好五十公斤核裂变材料。

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中，格罗夫斯坐镇华盛顿的“曼哈顿”计划总部，而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实验室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每天与他进行数次通话。工作在紧张而神速地进行，到了一九四四年圣诞节晚上，格罗夫斯向华盛顿的罗斯福宣称，可望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制造出一颗原子弹。

这段时间里美国唯一担心的是德国首先造出原子弹，为了摸清德国底细，掌握德国研制尖端武器的进展情况，一九四三年秋，美英组成了一个代号为“阿尔索斯”（希腊文“小丛林”之意）的特别情报组。准备或空投或随盟军在法国登陆。情报组成员佩带一种白色“a”字母的小徽章，上面一道红色闪电穿过（即原子弹的标志）。

在美英盟军自法国登陆前，“阿尔索斯”情报组已经收集到大量情报，这些情报源源汇总到美国华盛顿。经过对来自各方面情报信息的核对和分析，美英方面异常惊奇地发现：德国的原子武器研制计划（即U计划）并没有取得像美英科学家所料想的那样有突破性进展。而随着欧洲战局对德国日益不利的发展趋势，嗜杀成性的希特勒也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亮出手

中的杀手锏——核王牌，甚至连一声虚张声势的核叫嚣也没有。

但美国人仍不放心。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阿尔索斯情报组人员随巴顿将军的部队进入斯特拉斯堡后，便急切地寻找有关德国核能研究的蛛丝马迹，并展开大搜捕，将德国的核物理领袖人物哈恩、劳厄、魏茨泽克及海森堡一一捕获。从他们口中证实：德国确实没有展开如美国那样的原子弹研制工程，甚至还没有铀二三五和钚二三九工厂。而其原因则在于急功近利的希特勒看不见这种耗资巨大的研制在战争中可能产生的决定性作用。

至此，美国人彻底消除了顾虑。“阿尔索斯”行动的成功令人鼓舞，“曼哈顿”计划顺风满帆地驶向了它的目的地。

神秘的死神：“第五 九混成队”与“不可替换物”

“这个爆炸装置能够毁灭整个世界……它能使美国处于一种在战争结束时发号施令的地位。”

——史汀生

一九四五年七月，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星星点点的列岛中有一个叫作提尼安的岛屿，名字虽然不为许多人知道，但是，它却是当时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

这个空军基地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日本。有时候，近一千架的 B-29 大型轰炸机以仅仅十五秒的间隔，从六十条跑道上起飞，去轰炸数千海里之外的日本城市。这些战略轰炸机往往施行一种称作“地毯式”的轰炸方法，对日本的目标进行夜以继日的轮番轰炸。东京的防空警报也不时地尖利呼叫，一时间，两万七千英尺的高空中，黑压压的美国飞机扔下七吨重的一枚枚梯恩梯炸弹，或者抛下五百磅重的一颗颗燃烧弹。驾驶员透过飞机的舷窗可以看到爆炸和爆炸后的废墟，可以看到浓烟和浓烟下的火海。京城皇宫被炸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裕仁天皇也不得不一次次屈尊躲藏进地下防空掩体。

当然，从提尼安机场飞起的轰机群并不一定都能安然地如数归来，它们也经常遭到日本的炮击或飞机的拦截，因此，空战伤亡相当惨重，而往返途中的坠毁及机场起降的失事更是司空见惯。

不过，这个军事机场却有一个特殊的空军中队，俨如宠儿一般，看着同伴的飞机不分日夜地远距离奔袭，穿梭般来往，自己却从不出击。这个中队有十五个飞机组，每组七个人。更为特殊的是，这是一个有科学家参加的空军轰炸中队，番号为“第五 九混成队”。

第五 九混成队，由一位叫格罗夫斯的将军在美国华盛顿遥控。然而，格罗夫斯的这班人马却总是受到提尼安机场其他部队的嘲笑，因为这个混成队就像宝贝儿子那般稚气可掬，整天不知干些什么，偶尔所见，不过是投几颗练习弹罢了。所以，当他们的飞机从北机场起飞的时候，便有一片嘘声、怪叫跟着升空，伴随而来的还有一首顺口溜：

秘密小队飞上天空，
欲去何地无人知情。
除非你想得罪上司，
最好不要四处打听。
可有一点毋庸置疑，

“五九”将赢得战争。

很快，刚起飞的机组扔了一颗练习弹又飞回机场降落了。更多时间里，第五九混成队总是藏身在机嘲第八大道”和“第一二五大街”的一座座半圆形活动房屋里，在铁丝网和轻重机枪的严密保护下等待着执行特殊使命。

“五九”在等待什么呢？

一九四五年七月，美国华盛顿“曼哈顿计划”办公室。格罗夫斯将军正在向他的一位得力干将罗伯特·R·弗曼发出指令：“你要把一个东西带到提尼安。”弗曼随后被告知，将军指的那个“东西”是叫做“不可替换物”，代号为“Bronx”货物。

这个被称作“不可替换物”的东西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之中的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基地。试验基地附近的阿尔布克机场上，“货物”刚被由武装人员押送的车辆送到，就立刻装上飞机。三架大型DC—三运输机组成编队，带着贵重非凡的“货物”和随侍左右的技术人员、保卫人员，腾空而起，小心翼翼地飞往美国西南部上空，随后在旧金山的哈密尔顿机场降落。

这个“不可替换物”当然就是原子弹。

而早在一九四四年秋季，原子弹尚未问世时，在美国空军总司令阿诺德的指示下，就有许多B-29超级重型轰炸机被做了重要改装：去掉机关炮。其目的就是使它能装载一颗原子弹。与此同时，又集中了一千五百名即将参加投掷第一颗原子弹各项工作的官兵。这些人员混编在一起，就是所谓“第五九混成队”。

此外，从十二名飞行员中遴选了一名优秀驾驶员保罗·蒂贝茨上校及其他飞行人员。他们都在内华达州的边境地区受训，以熟悉B-29和练习从一万米高空向沙漠中直径为二百米的目标投掷。一九四五年四月底，“第五九混成队”全体人员来到提尼安岛。

“货物”既然已经到了美国的西海岸，怎样被“带到提尼安”，也就只有两条途径，一是空中，一是海上。

由飞机空运是比较理想的，因为这可以解决时间紧迫的问题。但是煞费苦心研制这个“货物”的科学家们都忧虑不已，他们对飞机能否安然无恙地完成这一运送使命感到没有多大把握。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飞机在机场起飞时候就失事，那么旧金山这座繁华美丽的城市眨眼的功夫就会被抹平，从地球上消失。

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

从哈密尔顿机场西行十四英里便是马雷岛海军船厂。这里停泊着一艘名叫“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重型巡洋舰。这艘巡洋舰因为在冲绳岛附近遭到日本“神风”突击队的袭击而受到重创，刚刚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修理。然而格罗夫斯将军偏偏看中了它，决定启用这艘已经服役了十六年的重型巡洋舰来执行贵重“货物”的西运的特殊使命。

海军少将威廉·珀耐尔在旧金山办公室紧急召见巡洋舰舰长查尔斯·巴特勒·麦克维上校，珀耐尔将军命令舰长道：“你要运送一批特殊‘货物’，起锚以后必须全速驶向提尼安，在那里，‘货物’将转交他人。如果途中舰只遭到袭击沉没，哪怕只剩下一只救生筏，你也要将这‘货物’装上救生筏，记住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货物’！此外，你和你的水兵们不必知道这‘货物’到底是什么。”

舰长麦克维上校迷惑不解地离开了这间办公室。

这个“不可替换物”到底是什么，舰长是无从知道的。其实，就连杜鲁门也仅仅是在四个月之前，即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由副总统接任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之职时才对“曼哈顿工程”初知了一二。

四月十二日晚上七点九分，杜鲁门的宣誓就职仪式仅用了一分钟多一点的时间。接下来的是第一次内阁会议。由于杜鲁门与前总统罗斯福的顾问幕僚还不怎么熟悉，所以会议草草结束，充其量是个敷衍形式。会议之后，除了战争部长之外，其他人都一个个退出了。史汀生提出要向杜鲁门讲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他简要地勾勒了一下“曼哈顿工程”的大致轮廓，声称该“巨型工程”将为美国研制出“一种拥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的爆炸装置”。战争部长的含糊其辞的叙述使这位新总统初闻乍听时“莫名其妙”。很快，他从个别知情人所补充的一些细节里知道，这个爆炸装置能够“毁灭整个世界”，具有可以用来进行讹诈的潜在外交作用。只要愿意，尽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投掷到任何地方，这就是说，它能使美国“处于一种在战争结束时发号施令的地位”。

“不可替换物”的这些秘密，现在不可能轮到麦克维这样一位上校舰长知道。

“曼哈顿工程”的军械主任、海军上校狄克·帕森斯只留给舰长一句：“你每天在航行中所保护的东西，将大大地缩短战期。”

“货物”是一个桶形的包装物，桶高不足二英尺，自径却有十八英尺。桶上虽有金属把手，可没有人提得起来。“货物”重达三百磅，其中二百磅是铅绝缘体。

七月十五日，格罗夫斯的干将罗伯特·R·弗曼赶到了停泊在旧金山猎人角海军基地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与他一起而来的还有一位爱尔兰人，是个上尉，洛斯阿拉莫斯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名叫詹姆斯·F·诺兰，格罗夫斯称他为“放射学家”。贵重无比的铅桶在他们登舰以后被吊杆吊上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弗曼和诺兰，从左舷舱口看着那铅桶被金属丝牢牢地固定在舰长室上方的甲板上。除了警惕的守卫人员之外，谁也不敢接近铅桶。

临起锚了，麦克维舰长还是疑虑重重，他叫来了诺兰上尉。

遵行上司的指示，诺兰只说：“我是一个军医，这件敏感的‘货物’对船和船员没有任何危险。”

舰长仍然不信：“我认为我们还不至于在这场战争中用细菌武器。”

诺兰上尉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尽快地离他而去。

七月十六日上午八点三十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启航。舰上没有人知道，三小时以前的五点三十分，第一颗原子弹已在新墨西哥洲的沙漠里试爆成功。

蓝色的太平洋上，巡洋舰以其最快的速度，劈波斩浪，昂首前进。第四天早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抵达夏威夷，进入珍珠港。经过六个小时的燃油及各种军需的补充之后，军舰再次启航，又向西航行了三千三百海里。七月二十六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到达提尼安岛，在离海岸半海里处抛锚停泊。

提尼安岛各级负责军官蜂涌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甲板上。“货物”被小心翼翼地吊越后甲板栏杆，放到舰旁预先准备好的驳船上。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完成了“货物”长途西运的重任，然而三天以后，这艘军舰及其军舰上的水兵也走向了末日。一艘来自广岛吴港码头的日本帝国伊——五十八号潜艇，在菲律宾海，与奉命将北上赴日本海域参战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不期而遇。七月三十日十时五分，鱼雷从海水深处射出，击中了水上巨舰的舰首右舷。重二千六百吨、有一百零五名舰员的日本伊——五十八号潜艇击沉了重九千九百五十吨、有一千一百九十六名舰员的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型巡洋舰。两声爆炸后只有十五分钟，这个庞然大物从海面上彻底消失了，三分之一的水手在昏睡中随巨舰葬身海底，弃舰跳海的八百余人，在茫茫大海中漂泊煎熬了四五天，强烈的日晒、严重的缺水、长久的饥饿疲乏，加之鲨鱼的不间断袭扰，使他们如浸染瘟疫般一批批地死去，海面上满目尸骸，惨不忍睹。八月三日，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架反潜艇侦察机无意中在例行侦察时发现了海面上漂浮的长达数英里的油迹。飞机下降了飞行高度，同时向基地报告了所见。美国海军舰艇“赫尔姆”号也参加了后来的对死难者尸体的搜索处理，舰长 A·F·霍林斯沃恩中校在他的《搜索报告》中对当时的惨象作了这样的记录：所有尸体状况非常糟糕，估计死后已有四五天了。有些尸体穿着救生衣或救生圈，大多数尸体什么也没有。多数尸体一丝不挂，有的只穿件短裤或粗布工装。找到的二十八具尸体中，只有三具穿着衬衣。

尸体已经肿胀腐烂，脸部辨认已不可能，大约一半尸体被鲨鱼咬过，有的吃得只剩下差不多一副骷髅。军舰所到之处始终有一~四条鲨鱼在周围游动。有一次，两条鲨鱼在离舰不到五十码的地方共同不停地撕咬一具尸体，我们只得开枪将它们赶跑。大多数场合难以得到死者的指纹，因为他们手上的皮肤已经脱落，或者双手被鲨鱼咬烂了。在这种情况下，医务官便从死者手上切下一块皮肤。进行脱水处理，设法使其能够辨认。死者的所有个人财物取下来用以辨别身份……尸体经过检查后绑上三四发一百二十七毫米的炮弹沉入海里。到天黑工作结束时，海面上还有很多尸体未经处理。

有一艘叫“弗伦奇”号的军舰，两天内搜索到并检验了二十九具死尸，作出的报告也很单调，总是“尸体严重腐烂”，“无法取得指纹”，“被鲨鱼严重咬烂”。

一千一百九十六名水手，获救幸存的只有三百一十六人，而另外的八百八十人也就一命呜呼了。

死者长已矣！可悲却也滑稽的是，这些海底冤魂竟再也不能弄明白他们不远万里，横涉重洋所运载和保护的那货物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不可替代物”在世界人们面前的炫目亮相之日比起他们自己的海上末日迟了就那么三四个朝夕！

蘑菇云升起：“第十三号特殊轰炸使命”

火药还算什么呢？太渺小了。电还算什么呢？太没意义了。这颗原子弹是基督在盛怒中再临——温斯顿·丘吉尔

八月五日下午三点三十分，提尼安基地“第五九混成队”装有空调的炸弹贮藏室。一枚重达五吨，代号“小男孩儿”的炸弹从链式吊车上平稳地移落到一辆拖车上。这位“小男孩儿”的心脏正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号

巡洋舰日夜兼程，横渡重洋，以生命作代价运载而来的“不可替换物”。炸弹外壳上写着一些粉笔字，这是希望日本人以及裕仁倒霉，预祝蒂贝茨及其同伴成功的口号。

保罗·蒂贝茨是“第五九混成队”中“安诺拉·盖伊”号飞机的上校驾驶员，“安诺拉·盖伊”是他母亲的名字，而这架“最棒的飞机”、空中超级堡垒的正式名称为八十二号飞机。

蒂贝茨和他的“安诺拉·盖伊”号将执行一个空前的绝密命令：“第十三号特殊轰炸使命”。

将出动七架 B-29。一架预先飞往硫磺岛，随时代替“安诺拉·盖伊”号。两架为蒂贝茨护航至目标附近。一架负责摄像，另一架进行空中实验，届时投下三个分别带着仪器的降落伞录下爆炸后的数据，其余三架随航并前往各个目标测回气象情况。

气象报道提示：午夜后可以起飞。

拖车把“小男孩儿”慢慢地拖到灼热而耀眼的烈日下，八名警卫随行拖车两旁，俨然特工人员守卫总统一般。在庄严的仪式下，一支由吉普与其他车辆组成的车队护送着这枚炸弹从特克区前往半英里之外的机常目击者形容说，这就像是一支送葬的队列。

午夜时分，蒂贝茨还在回想三十个小时前核武器专家、该炸弹设计者之一狄克·帕森斯对他以及另外七名机组成员在广岛等供选择目标的侦察照片前所宣布的那番话。

“你们将要投掷的炸弹，是战争史上的新玩意儿，”帕森斯避开了会泄露机密的字眼，但显然他已汗流浹背，“它是迄今生产出的最具破坏力的武器。我们认为它会把半径三英里内的一切几乎全都毁灭。”话音刚落，听众中传来了一阵透不过气似的喘息。

他对“曼哈顿工程”做了一丁点简介，还放映了沙漠基地有关试验的影片。放映的画面效果不佳，狄克·帕森斯平静地根据他的记忆补充描绘了沙漠试爆。大家眩晕起来，就连知道此事的蒂贝茨也“惊呆了”。

然后，蒂贝茨正向他的机组讲话。然而直到此刻，他仍然称他们将要掷的是一颗“很有威力的炸弹”，始终闭口不提“核武器”之类的字眼。他告诫他的手下人，到时务必戴好护目镜，并宣布新的无线电呼号为“酒涡”。

凌晨一点三十分，三架气象侦察机首先从北机场不同的跑道上同时起飞。

二十三分钟后，“安诺拉·盖伊”号和两架护航机的机组人员乘卡车刚抵达起飞地点，便被弧光灯、泛光灯、发电机、摄像机、摄影师、电影导演以及到处乱窜的摄影记者们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是格罗夫斯将军计划中富于意义的环节之一，他要把起飞的历史场面记录下来。

二点三十分，最后一张合影拍完，蒂贝茨机组十二个人一个接一个地爬上舷梯，钻进前舱门。然而就在这一刻，格罗夫斯的助手法雷尔将军发现狄克·帕森斯忘带了一件东西：“你的枪呢？”

狄克于是从旁边一个人那儿借了一支手枪，插在腰带上，转身爬上飞机。除了每人必须带枪外，蒂贝茨飞行服的口袋里还预备着一只小金属盒，里面装有十二粒氰化物胶囊。上司命令他们若遇不测，可以从“用手枪”或“用毒药”两种方式中选用一种方式自杀。

凌晨二点二十七分，北提尼安指挥塔向“安诺拉·盖伊”号发出滑行

和起飞命令：“酒涡八十二，北提尼安指挥塔命令沿 A 跑道向东起飞。”

凌晨二点四十五分，（东京时间八月六日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华盛顿时间八月五日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蒂贝茨扭转头向副驾驶员罗伯特·刘易斯上尉道：“出发！”

“安诺拉·盖伊”号超重一百五十吨，其中包括七千加仑的汽油。飞机在洒了汽油的跑道上异常费劲地向前滑行。眼下滑行距离已经超过了跑道长度的三分之二，可速度依然很慢。机组人员面面相觑。

“飞机太重了！”罗伯特上尉叫道，“拉起来——快！”

蒂贝茨上校不声不响。他在让飞机继续滑行。向前，再向前，……眼看跑道将尽，大地快要消失了，……就在眼前出现空旷海洋的一刹那，蒂贝茨将飞机拉了起来。

法雷尔将军在指挥塔上惊出了冷汗，心砰砰直跳：“啊，我从未见过飞机需要这么长跑道，我真以为蒂贝茨飞不起来了。”

东京时间四点五十五分，两架护航机加入了“安诺拉·盖伊”号的行列，蒂贝茨成为 V 形编队之刀尖。然而到底要对三个目标城市（广岛、小仓、长崎）中的哪一个投弹，谁也不知道，大家都感到了一种紧张的气氛。

六点三十分，海军上尉杰普森在弹舱将炸弹起爆装置的最后一个电路接通了。

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毕。杰普森通知了帕森斯，帕森斯通知了蒂贝茨。现在，蒂贝茨通过话筒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投掷世界上的第一颗原子弹了！”

好几个人激动得难以喘过气来，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原子弹”这个令人可怕的字眼儿。

其实早在五月八日德国宣布投降前后，“为了彻底击溃日本，是否要使用原子弹？”这个问题就已提到日程上来了。

当时美军正在草拟进攻日本的作战计划。由于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对“曼哈顿”计划一无所知，因此准备按传统的作战方式，分两个阶段登陆日本。

第一阶段将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占领南部，第二阶段在一九四六年三月攻占东京。但美军攻克不足八平方英里的硫磺岛，就损失了二点八万多名海军陆战队官兵，攻克冲绳岛的代价是七万余人。面对日本本土二百万军队的基本力量，还有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七十余万关东军，要占领日本本土美国部队的伤亡就有可能超过一百万。基于这种考虑，美军联合参谋计划用三十六个师、一百五十三万人执行进攻日本本土的任务，而这还仅是一个保守的计划。

因此这样一种观点就产生了，即将原子弹成功地造出来并付诸使用，将大大缩短对日战期，并大大减少美军伤亡人数。罗斯福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去世前，并未对此有所决定，他的继任者杜鲁门则显然为这根大棒感到激动。

关于是否对日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很多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都始终拒绝考虑。而提出最明确的保留意见的第一位物理学家正是一九三九年要求爱因斯坦向罗斯福上书的那个西拉德。他所期望的是美国先于德国拥有原子弹。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希特勒不仅没有原子弹而且已经垮台。剩下的日本不可能拥有原子弹，因此他认为美国绝不能单方面使用这种杀伤性极

大的武器。当他正想把自己的想法转告罗斯福时，却传来了罗斯福死去的消息。奥本海默也曾说：“即使不依靠原子弹，对日战争显然也即将结束……而我们要考虑的是，原子弹在未来的文明中将能代表什么？”有些科学家深感责任重大，甚至打算辞职。

当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原上为进行原子弹试验所做的准备即将结束时，美国新总统杜鲁门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任命了一个以陆军部长史汀生为首的，包括军政界首脑和科学家的临时委员会，研究对日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六月一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有人提议进行一次示威演习，然后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如遭拒绝，再扔原子弹不迟。但有人认为无法保证日本不把美国战俘运往选定的演习地点，以阻止这次行动，也无法保证投弹飞机不受日本“神风队”的袭击。经激烈争论，委员会最终作出决定：

- 1、应尽快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 2、应对位于居民点及其建筑物附近的军事和工业目标投掷原子弹。
- 3、使用原子弹时，毋须就其性能预先警告日方。

这项决定得到了杜鲁门的批准。

绝大部分科学家不同意委员会的武断裁决。参加“曼哈顿”计划的七名物理学家联合起草一份报告，反对使用原子弹。他们主张在沙漠上或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试验这种新武器，请各国代表前来观看，其中包括日本代表。这样将可创造出一种对国际缓和极为有利的气氛……对此美国政府内有人反驳说，假如原子弹不爆炸呢？假使日本政府不派代表团呢？因此这份报告递上去后便石沉大海。

其实，对杜鲁门和美国政府来说，原子弹不仅是一种军事武器，还可抑制苏联。

当时的国际局势是：在欧洲，围绕着对德管制及波兰问题，美苏之间的意见冲突十分尖锐。按照雅尔塔协议，苏联将在八月八日后对日宣战。这样一来，如果由苏联击败日本，必将导致苏联在亚洲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在欧洲发生的事将会在亚洲重演。这对美国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威胁。为了确保美国在亚洲的优势，美国政府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抢在苏军参战的八月八日之前尽快使用原子弹。

箭已在弦上，这一决定是不会因科学家的反对而改变的。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五时三十分，试验性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爆炸。据目击者说，当时一道闪电在方圆四百公里的范围内划破长空，其亮度抵得上好几个太阳。

一团巨大的火球直升八千米高空，大地微微颤抖，美国整个西南部都听到了爆炸声，很多人惊奇地以为太阳提早升起了。史汀生立即飞往彼茨坦，亲自将试验成功的消息报告给了正在开会的杜鲁门总统。

除了这颗试验性原子弹，美国还拥有两颗：一颗是用铀作裂变材料的，被命名为“瘦子”，后又称作“小男孩”（就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运载的那颗）；另一颗用钚作裂变材料，被命名为“胖子”。试验成功后，临时委员会确定八月六日为投弹日期，四个城市被列入投弹选择目标：广岛、小仓、新泻、长崎。

八月六日七点二十五分，先行的伊瑟利少校的气象侦察机发来消息，他的飞机在广岛上空巡航时，没有日本飞机拦截，高炮火力也很微弱。伊瑟利报告说：“所有高度上云覆盖率低于十分之三。建议：优先考虑。”

“下面是广岛，”蒂贝茨对着话筒通知大家。在薄云的空白处，他和帕森斯看到了一个城市的轮廓清晰地出现在飞机的下面。

“你同意将它作为目标吗？”蒂贝茨问。

“同意，”帕森斯答。

“各就各位，准备投弹，”蒂贝茨对着话筒宣布道，“戴上护目镜。”

八点十三分三十秒，投弹手费雷比开始控制飞机，他研究过目标照片上的每一个细节。现在，广岛市中心的那座T型相生桥向他的瞄准器的十字线飞快地靠近。

“对准了，”他说。

八点十五分十七秒，炸弹舱门自动打开。投弹手叫道：“炸弹投出去了！”飞机在于重量一下子减了一万磅，顿时晃晃悠悠地向高空升去。蒂贝茨赶紧让飞机作了六十度的俯冲和一百五十度的右拐弯。原子弹正在下坠，先是自由下落，随后弹头指向目标。

八点十五分四十三秒，一道耀眼的闪光将整个飞机照亮，机尾射手卡伦看见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冲霄，急骤扩散，犹如“遥远星球上的光环突然裂开，迎面朝我们飞来。”巨大的冲击波夹杂着爆炸声，使飞机猛地向上一窜。

广岛距飞机渐渐地远了。卡伦对着录音机开始录音：“烟柱腾空而起。烟柱中心通红……到处起火……数不胜数……帕森斯上校说过的那种蘑菇云出现了……”

人间地狱：核爆中的日本人和美国人

前面是大火熊熊的河水，后面是挟带着燃烧火焰的火风

……她感到整个广岛，整个日本，她的世界，正在毁灭。

广岛八月的夜晚异常炎热，人们经常被警报从睡梦中惊醒，这已习以为常了：美军飞机每日每夜向日本投下成吨成吨的炸弹，然而广岛始终幸免，未遭破坏。有一些广岛人甚至把美国的B-29轰炸飞机亲切地称为“B君”。

因此八月六日这天早晨，广岛人和往常一样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不为八点钟响起的那阵警报所动。

当原子弹落下时，不少人都看见了从高空的B-29轰炸机上掉出来个纸屑般大小的白点。又过了一会儿，人们觉得那似乎是个降落伞，没有人会想到它是威力无比的毁灭性炸弹。一个叫田中的日本人，这时候甚至还朝“小男孩”伸出双臂，嘴里喊着：“你好，天使！”

在“小男孩”蓝色的铅皮上，还确实有一个“天使”，那是美军人员不知出于何目的贴上去的一张驰名全球的女电影明星丽塔·海沃丝的玉照。

但在千分之一秒的刹那，“天使”在一道闪光中爆发成了强光和有毁灭性能量的火球。

从此以后，有关这一无法描述的现象的故事，就不断地在全世界被叙说。人们的想像力似乎永远难以捕捉到那个世界末日般的一刹那……原子弹下坠以后，没有落到T形相生桥上，它偏离了预先设计的弹着点八百英尺，在广岛市中心岛川医院上空的一千八百五十英尺的空间爆炸。飞机上的帕森斯上校看到了他预见到的景象：首先是一片极其明亮而耀眼的闪光，接着一股黑色云团，夹着滚滚尘土与残渣碎片升腾于距地面一千英尺的高处。在黑

色云团之上、距地面二万英尺的天空是一团蘑菇状的白色浓烟。

岛川医院成了原子弹爆炸的投弹点，医院庭院的地面与爆炸空间正好是一个直角，成为广岛死亡世界的焦点轴心。在距爆炸中心一千五百英尺的范围里，百分之八十八的人当场死亡或于当天死去。另外百分之十二中的大多数在几个星期内或几个月以后也相继丧命。

四百英尺长的 T 形相生桥桥身虽然未被炸断，但两侧的石栏杆都一根根掉进桥下河里，混凝土的桥面则如海洋波浪般打皱翘起。木川小学面对着 T 形相生桥，与岛川医院相隔六百五十英尺。学校定于八点三十分召开一次教师会议。然而就在崛部克子刚在办公室桌前坐下的当儿，一片朦胧的蓝光将办公室整个儿罩祝她并没有听见什么，可门窗飞了，玻璃碎片四散横飞，划破了她的头皮、前额、左臂，当时她并没有任何感觉。她立即扑倒在办公桌底下，双手掩住眼睛，大姆指塞进耳朵。

当她抬起头时，外界沉寂而灰暗，如同可怕的黑夜。由于学校四周厚厚的钢混砖墙，崛部克子得以幸存。然而，闪光的一瞬，时间不足零点五秒，三千摄氏度的热辐射将距离爆心二英里之内的人们烧伤。

广岛市的三十五万人口当中，十三万人不久尽数死亡，崛部克子的十位同事都在来校的路上罹难。

崛部克子冲出学校，立即被裹进一片浓厚、翻滚的黑色尘埃之中。她发现七个小孩或坐或躺在地面上呻吟，那是他们刚刚玩“捉迷藏”游戏的地方。孩子们身上到处流血，遍体黑色的伤，校服成了碎片，大块大块的皮肤从身上耷拉下来。孩子们带着剧痛，一路哭喊，咒骂，在克子的帮助下，蹒跚地越过瓦砾，向着宽广的木安川河艰难移动。路只有几十米，却似乎永无尽头。克子终于爬上了高达七英尺的河堤，汇入了一股推推搡搡奔向河水求生的人流之中。孩子们与她走失了。她从此再没有见到他们。

其实，克子眼前这条河，似乎也被点燃了，人们还在往这个“火炉”中跳，当然已经说不清这些人是跳下去的还是被推下去的。受难的人们，衣不遮体，摩肩接踵地拥挤在一起，满脸焦黑、浑身流血，无所措手足。很多很多人，将双臂平着伸直，胳膊时朝外，这是难民们的发现：抬高胳膊可以避免伤口的摩擦，减轻灼伤的疼痛。那些燃烧的建筑残骸以及从附近储木场漂流而下的浮木堵塞住河面，使人们无法游水穿过，而水面上漂浮而过的大多数人看上去都像已经咽了气的尸体。克子周围，大部分人由于烧伤，脸庞和身体都古怪地膨胀起来，许多人命在垂危之中，一些人已经断了气。克子的身体开始剧痛，并不停地呕出一种奇特的黄色粘液，脸上、衣裤上溅满了血污。前面是大火熊熊的河水，背后是挟带着燃烧火焰的火风，她困在中间，寸步难行，她感到整个广岛，整个日本，她的世界，正在毁灭。

鹤见桥那儿同样汇合了一条逃难的人流，有一位父亲怀抱着一个婴儿，他旋开一个水龙头给孩子喂点儿水，但他不知道孩子早已经没了气息。这座桥通向近郊的伊士山，山上没有起火。桥边的人不再往河里跳了，河水虽然能够减轻灼痛，但很快就会变成孱弱者的坟墓，河面上到处是漂浮的死尸。人们向伊士山艰难地移动。

二十五岁的森下文子，是一家炮弹工厂的检验员，尽管她现在表面上没有什么创痛，但她想象不到她能在死亡线上徘徊的时间只剩下了几个月，也想象不到在山路上艰难爬行的她的同胞们在数周后即将死去，都将成为滞留原子辐射的牺牲品。

十五岁的寺前妙子是一位电话接线员，她的电话大楼离爆炸点只有六百米。蓝光闪过的那一刻，她刚戴上耳机和话筒，装有电话器材的盒子一下砸到她的身上。

她爬到楼道梯口，其他接线员的尸体遍布于楼道阶梯上，堵住了去路。她只好爬上窗台，跳到街上，惊恐地越过几根燃烧的电线杆，朝一座小桥跑去。她的左眼失去了视力，右侧脸颊和右臂鲜血在流淌，但她却感觉不到什么疼痛。大街上挤满了逃避大火的人群，她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俯身叫唤着一个小女孩：“麻子！麻子！”

“你不能死！”小女孩没有回应。“麻子，你还活着吗？”小男孩把妹妹紧紧地偎抱在怀中。下午，寺前妙子步履艰难地上到了伊士山的山腰，她的脸肿起来了，左眼肿得只剩下一道窄窄的缝，她看到了一个临时急救站门前的一长排受伤的人，听着剧痛中人的一声声尖叫：“水，水！给我点儿水”，“杀了我，请杀了我吧！”队列中，妙子不知等了多久，她的眼睛终于肿得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觉得有人在用针帮她缝合伤口，却并不给她打麻醉，妙子疼得直哆嗦。绷带整个地包住了她的脸，只露了两个鼻孔和一张嘴。

从山上望去，市区一片火海。广岛瘫痪了，市长在府邸殉难。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已死亡，总人数为二百八十名。没有人能看到消防队员的踪影，整座城市在解体。

浜井新三是市政府分配部门的负责人，他从炸毁的废墟中钻出的那会儿就意识到饥荒的危险，他正在东奔西走，想竭力为幸存者解决粮食的奇缺。在市政厅前，他被一名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拦住小姑娘的脸、手、腿都严重灼伤，她乞求浜井的帮助。

浜井找来一把椅子，让她安静地坐下，并答应她马上回来，然后送她去医院。小姑娘在椅子上坐下了，脸上绽开了笑容。几分钟后浜井新三回来时，小姑娘依旧僵直地坐在椅子上，浜井想把小姑娘抱起来，可是，她已经死去。

三十四岁的冲本常男是一位会计师，早上八点十五分他刚在广场火车站登上一列火车，原子弹爆炸了，几个旅客被抛向空中，落下以后压在他的身上，爬起来时，背上尽是血，血是别人的，他因为被别人压着而没有受伤。冲本常男想回家看看妻子是否还活着。市区到处是燃烧的大火，街道两边遍布着已经焦化的尸体，越接近市区，火焰的高温越令人不能忍耐。他无法径直回家，只能绕道迂回。在路过广播电台时，他看到一辆有轨电车，车中挤满了人，个个都站立着，可都是些死人。夜幕降临了，广岛犹如炼狱，犹如火的世界。冲本望着弥漫于全球的熊熊烈火。

感到妻子生存的希望太渺茫了，城东以及爆炸中心地区是废墟残骸的赤色火焰，城西一带却是蓝色的火光，那里，幸存的人们正在用汽油成群地焚化尸体。第二天上午十点，冲本终于找见了“家址”，然而他所见的只是灰烬和一片废墟上他妻子烧焦的头颅。冲本没有流泪，他把妻子的头装进一个防空兜帽里，带到郊区他父母的家，在那里，他把妻子的头火化了。

原子弹的破坏力、杀伤力是罕见的、空前的。八月六日八点十五分的那一刻，原子弹爆炸时间不足半秒，高达亿度的强高温使爆炸中心成千上万的人，在一瞬间犹如离子分离那样立即烟消云散了，以至幸存的亲属始终以为他们的亲人是“失踪了”。

强烈的爆炸使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刹那之间被炸成齑粉，以至寻找残骸

都不可能，死难者的亲属无奈中只好就地捧起一把灰土权当祭奠的亡灵。

比太阳光要强不知多少倍的爆炸闪光使成千上万的人失明眼瞎，许多幸存者的眼窝处只留下了两个黑洞。

爆炸产生的高温不仅使数在万计的人当场被烧死，还使数以万计的人被严重烧伤，烧得面目全非。蜂谷道彦是广岛电信医院的院长，他被炸晕在医院花园中，一位医生为他缝合了四十多处伤口。爆炸后“医院”的所有空间——楼梯、地板、回廊、厕所以及院外的花园都被病人占据了，病人的症状几乎相同：化脓腐烂的烧伤、呕吐和一种令人怀疑的腹泻。有些病人一个晚上便血五十多次。蜂谷院长的一位朋友前来探病时，向院长说起了在广岛一路上他所见到惨景：“那些逃亡的士兵比漂浮在河面上的死人更悲惨，……他们简直没有脸！眼睛、鼻子、嘴都被烧了，耳朵似乎也熔化了，根本分不清正反面。”

这是人类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可怖场面，广岛已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但在这场空前惨烈的毁灭性灾难中，受害的还并不全是日本人，其中也有美国人！

由于天意的安排，侥幸躲开了原子弹轰炸的相生桥，变成了对美国人施加报复的场所。当十八岁的矶子玉越过这座桥去寻找她十六岁的妹妹时，一个令人惊愕的场景使她在桥东头定住了脚步。一名高大的穿着美国军服的人被绑在一根石柱上，周围围着十来个日本老百姓，一边叫喊，一边往他身上掷石块。矶玉被吓得惊恐万状，忙不迭地跑开，也不知那个人是死是活。

大桥边这位美国兵的命运是格罗夫斯将军及其美国军事当局造成的。投放原子弹时，广岛有二十三名美国战俘。

E·索耶，是广岛美国战俘营中的一个战俘，也是劫后余生者之一。“那一天”，他在一篇题为《原子弹落下那一天》的回忆录中说，“我们从一群正在挖掘砖瓦堆寻找幸存者的日本兵身旁匆匆走过，然后又经过一堵烧黑了的墙壁，墙上有个灰色的人身轮廓，看来像幽灵似的。”他判断说：“这人在闪光出现时刚好靠墙站着。”E·索耶回忆他“那一天”寻找他的同伴的情景说：“我们觉得恶心。我们向仓库走去，找到了那几个战俘的尸体。

两个倒在地上，第三个仍坐着，茫然地睁着眼睛，眼珠则慢慢融成蜡状液汁，流下肿胀发红的脸，我们望着他，惊骇得说不出话来。”

弗洛伦斯·加妮特是三千二百名第二代日籍美国人之一。原子弹投放前，她在广岛与祖父母居住在一起，爆炸使他们相互离散。加妮特的父亲在洛杉矶经商，希望女儿在日本接受教育，但加妮特却不愿意呆在日本。她思家心切，时常梦见汉堡包和热狗；此外，她常因与男孩子说话而遭到斥责。本分的女孩子在这里是不允许与男孩接触的。她设法说服老师，同意她在防御训练时不必挥舞竹制的长矛。但如今却是美国人——她自己的同胞——对她进行了轰炸。

加妮特不停地呕吐腹泻，身体虚弱不堪，黑雨中的砂砾弄得她满身污浊。她最后终于找到了祖父母的尸骨。她把他们放到一堆木头和报纸上面。这时来了一名士兵，主动要帮她完成火化。

（一九八三年，加妮特成为洛杉矶一家医院的护士。她支持一些人搞运动，呼吁国会为一千名已成为美国公民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医疗费用拨款。这一运动势头虽旺，但显然没什么结果。）爆炸后的两个星期内，在广岛感

到最恐怖的或许并非当地人，甚至不是日本人，而是十名美国 B-29 飞机机组的战俘。

这架飞机于八月八日被迫降在日本邻近的海域，机组人员在救生筏里度过了一周，后来被日本渔船捕获。八月十七日，战俘被送到广岛，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他们眼睛上蒙着布，手脚被牢牢捆在一起，躺在城东练兵场的草地上。他们周围围满了人群，威胁地对他们喊叫着。战俘中谁要哼一声，脑袋上就会狠狠挨上一脚。

为他们当翻译的军事警官福井伸一上尉曾在美国呆过，所以保护了他们。他在渔民们已准备在砧板上切下他们的头的时候碰巧遇到了他们。他将俘虏押上一辆卡车，并向人群大声喊道：“我是负责他们的人！”人们只好让卡车开走。但福井伸一毕竟是位爱国者，在卡车上他不停地大讲投放原子弹是多么不人道。

当车开到广岛火车站时，福井让司机停下，并将战俘的遮眼布除去。“看看你们干了些什么！”他高声说。“一颗炸弹！就一颗炸弹！”美国人呆若木鸡地坐在卡车里，穿越过市区。“那真是一次骇人的旅行，”机组报话员马丁塞普夫后来回忆说。“看不到一幢立着的房屋，没有任何物体移动，连只狗也没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焦头发的奇异气味，但鸦雀无声，唯有福井愤怒的叫喊：一颗炸弹！就一颗炸弹！”

到了城郊时，卡车再度停下，另外两名美国战俘也被送上车。他们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罗威尔地区的海军飞行员诺曼·布里斯特和肯塔基州考宾地区的空军中士拉尔夫·尼尔。他俩的身体状况极为糟糕，不断地呕吐并经受着巨大的疼痛。B-29 雷达军官斯坦利·莱纹后来回忆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从他俩的嘴里和耳朵里流出来的绿粘粘的可怕液体。”

这两名形如残骸的人说，八月六日，他们与另外二十一名美国飞行员被关押在广岛。他们只记得看到了爆炸，大火，然后日本人便陷入一片歇斯底里的混乱之中。

当时他们两人跳进了一个污水池，因而保住了性命。他俩还从没听人提到过原子弹，卡车上其他的人也不知道，而他俩的症状正是致命的核辐射中毒的反应。

当天晚上，这群战俘被监禁在一个日本军营的囚室里。两名命在旦夕的俘虏疼痛难忍，尖声嘶喊。日本人把一只急救箱送给 B-29 机组人员，他们迅即为这两上人注射了吗啡，但吗啡也不管用。整个夜晚，两个垂死的人在痛苦中挣扎。

“他们祈求我们用枪把他们打死，快点结束这一切，”莱纹回忆说，“但天亮前，他们就死了。”

虽然美国人在广岛的死伤情况很快就为格罗夫斯和战争部所知，但美国政府从未告诉过他们的家属他们的死是美国的原子弹造成的。

广岛毁灭了，但——

为了不致从上面的悲惨描述给读者一个错误的印象，即对广岛以及对长崎的原子轰炸是毫无意义的对无辜平民的屠杀，并继而在每年八月六日看到广岛的祭亡式表演时无谓地洒出一掬同情之泪，我们在这里特别引入另外两段记述，供读者参考。值得一提的是，这本由“中国人”剪剪贴贴拼凑出来的破书《世纪大灾难》却绝口不提南京大屠杀。与 1937 年的“今世

地狱”南京相比，投向广岛的“一颗炸弹”在刹那间超度了那么多皇军，堪称仁慈——亦凡公益图书馆校对者识：

……

裕仁也和希特勒一样，在宫殿的底下有一个防空地堡。那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就是在这里，在情绪激昂和互相攻讦的气氛中，举行了许多最

关紧要的会议。最初，政府对广岛已被彻底摧毁的情报知道很少。8月6日

一整天，东京没办法和这个城市恢复正常联系，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

天一清早，陆军副参谋长河边中将接到一个报告，里面只有一句话，使他

看后莫名其妙：“一个炸弹顷刻之间把整个广岛市摧毁了。”接着报来具

体情况，他听起来有点象胡言乱语。原来广岛市并不是没有军事意义的，

这和后来很多说法正好相反。日本陆军第二集团军原来驻扎在那里。8月6

日早上9时1刻整个部队在巨大的阅兵场上做体操。这时“瘦子”几乎就在

头顶上爆炸，于是全军一扫而光。这就是河边中将收到的许多电报中的一

份。情况突然，就有如五角大楼收到了报告，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练滚翻

动作时，在不到一秒钟就全被消灭了一样。

……

美国人对日本人这样驯服地认输感到奇怪。其实当时千钧一发，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日本的将军们愿意堂皇自杀，但在少壮派军官中，这样

那样的策划和反策划一直进行到8月28日。那天，美国军舰“密苏里”号

驶进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武装的海军官兵和第四海军陆战队师同一天也

在横须贺登陆。准备顽抗到底的叛乱者已经发誓要将登陆的部队杀尽，神

风轰炸机群则已驶进厚木机场的跑道待命。座仓中的飞行员也以祖先的荣

誉发誓，要俯冲炸沉“密苏里”号。当舰只下沉时，已准备好的战斗机飞

行员就扫射东京湾，直到“密苏里”号上的全部人员包括海军上将尼米兹

和麦克阿瑟将军全部死掉为止。这个计划要是成功，美国人必然认为这是

日本人最恶毒的阴谋诡计，对他们会怎样报复，想象起来也很可怕。

但是，

这样的事竟然几乎当真发生。在投降前最后的狂乱时刻里，裕仁把他的皇

族成员派到各个要塞据点，要求保证履行天皇的诺言。他的弟弟高松亲王，

及时赶到厚木机场，劝阻那杀气腾腾的人，要他们不要起飞。整个局面，

一触即发。后来有人问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轰炸广岛、长崎是否必

要，他说：从所有情况来看，“胜利有如摇摇欲坠的一座拱门，而原子弹

则是拱门的基石。”

结局或开始：灾难并未结束

迄今为止，我们的军事机构的主要目的都是打赢战争。

而核武器出现以后，它的主要目的必须是避免战争。

——伯纳德·布罗迪

广岛的蘑菇云一升起，杜鲁门就在华盛顿向全世界发表了声明：“十六小时前，一架美国轰炸机在日本的重要军事基地广岛投掷了一颗炸弹。这颗炸弹的威力相当于二万吨 TNT。日本卑鄙地偷袭了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现已遭到数倍的报复……为了将日本人民从毁灭中挽救出来，我们于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向日本发出了最后的通牒，但是遭到日本政府的断然拒绝。如果日本政府继续顽固不化，拒绝投降，那么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毁灭性的原子激流，将从天而降如雨般落在日本人头上。”

广岛的惨剧并未使日本军方立即同意接受波茨坦的最后通牒，即无条件投降。

他们竭力掩盖广岛的事实真相，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调停上。但八月八日，日本人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得到的是苏联即将对日宣战的答复。掌握日本密码的美国对东京——莫斯科来往的电报内容了如指掌，但为了加速事件的进展，美国迫不及待地又于八月九日向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八月八日晚，在提尼安基地硕果仅存的取名“胖子”的原子弹被装上了 B-29 轰炸机。九日，查尔斯·W·斯威尼少校驾驶着名为“博克之车”的轰炸机在美国代表随行下飞往日本。此行的最初目标是日本小仓市。但飞机到达小仓上空时，发现小仓上空乌云密布，“博克之车”在小仓上空来回飞了三次，企图寻找能目视轰炸的云缝，但未能成功。后来，由于担心汽油不足，转向第二目标长崎。长崎上空也布满了乌云，但投弹手发现了一处宽大的云缝，于是就将“胖子”从八千八百米的高空扔了下去。

“胖子”在距地约五百米处爆炸，长崎立即变成了第二个人间地狱。一个港口城市变成了一个打渔村落，没有留下一草一木。

八月九日晚，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集十二个军政界高级首脑召开御前会议，由裕仁天皇主持，就如何回答波茨坦公告进行讨论。

八月十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再次发表声明，要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

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再次召集御前会议，尽管东条英机等主战派仍

坚持己见，天皇迫于国际压力，决定无条件投降。八月十五日中午，全世界都从广播中听到了日本天皇亲自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

九月二日，日本投降仪式正式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场夺去上千万人性命的大战结束在广岛和长崎的毁灭之后。从这个角度说，两颗原子弹的爆炸确乎是结束了一场灾难。

杜鲁门在事后的一份声明中所表露的似乎正是这样一种当时存在于西方国家的普遍情感：“对于原子弹的使用，我比任何人都感到不安，但日本人对珍珠港的袭击和杀害战俘的肆无忌惮的做法，更令我感到不安。他们所得到的唯一语言似乎就是我们对他们进行的那种轰炸。当你面对野兽时，你就得使出对付野兽的办法……”也是出于同一逻辑，“安诺拉·盖伊”号飞机的机长蒂贝茨在广岛遭轰炸四十年之后仍然对当初的所做所为表示“至今不悔”。

一九八五年，这位已是古稀老翁的蒂贝茨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公然说他四十年前参与向广岛投掷原子弹是“拯救了地球”。他从未“因想到自己投过原子弹而睡不着觉”。他深信原子弹减少了无谓的牺牲，只有原子弹才是结束战争的有效武器。

但原子弹在震撼了日本当局的同时，也震撼了整个人类世界。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家中回答一位前来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说：“世界对核武器还毫无准备。”在罗马，教皇对日本的平民百姓所蒙受的灾难表示抗议。在芝加哥，利奥·西拉德（又是他！）要求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纪念教堂的神父为“广岛和长崎的死难者进行一次专门的祈祷”。在华盛顿，杜鲁门总统接到全美基督教教堂联邦协会秘书长打来的电报，反对进一步使用核武器。

核武器所带来的灾难确有可能是更巨大，更无法挽回的。

原子弹即时的破坏力、杀伤力关键在于原子核裂变的瞬间所产生的强烈辐射。

原子弹中虽然也装填了普通炸药，但主要作用是为了引爆。

据不完全统计，原子弹爆炸后，广岛当时疏散后人口的二十四万五千人中，当场死难者达七万八千一百五十人，负伤失踪者为五万一千四百零八人。全市建筑总数为七万六千三百二十七幢，其中全毁者四万八千幢，半毁者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八幢；长崎疏散后人口为二十三万人，伤亡九万五千人，失踪五千人。

（这颗原子弹的破坏程度比广岛小，主要原因是长崎城市周围都是山，局限了炸弹的威力。）原子弹的核心是具有有害放射性能的物质，八月六日的爆炸裂变，使广岛数以万计的人瞬间致命罹难，然而更可怕的是原子弹辐射波的滞留影响，或称“滞留效果”所具有的“不可知的效果”。成千上万的人虽然没有在原子弹爆炸时丧生流血，但很快就大量脱发、皮肤出现紫癜，白血球数急剧下降至五百—六百（三千是临界线，五千—六千为正常），许许多多的人外表健康地却又是在悄无声响地死去……原子弹爆炸后半小时，一种神奇的“黑雨”——放射性微粒，夹杂着灰烬和蒸气，在广岛市中心下了起来。“黑雨”下了整整一天，涉及到了原先未受影响的地区，增添了新的灾难，这种放射雨含有近二百种不同的同位素，全部具有放射性，沾染上放射雨的人在以后二十年中缓慢地走向死亡。原子弹爆炸后，“每天数以千计的人们死于奇特而不可名状的症状”的传说，使广岛成为一个棘手的独特

所在。

而劫后余生的人几乎都得了“辐射病”。这种病使患者呕吐、丧失食欲、高烧、腹泻，接着头发脱落、白血球迅速消失、伤口难以愈合，各种癌症相继发生。受辐射的人很难与健康的人结婚，他们之间婚后出生的婴儿，全部智力迟钝。这样，侥幸大难不死的人，也有无尽的痛苦与他们终生为伴。

原子弹到底戕害了多少个生灵？十三万？十七万？……统计数字不稳定，但毫无疑问地始终呈上升趋势。日本至今还存在着地球上独此一家的特别医疗中心——广岛原子弹医院（一九五六年成立），床位多达二百张，一直在收治大量的“原子弹”复合症，诸如智力迟钝的痴呆、染色体“畸变”的不育症、癌症、白血并复合骨髓瘤，以及其他罕见的血液病等等慢性病变的患者。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日广岛市有关部门发表的原子弹受害者调查报告日公布：广岛直接遭受原子弹侵害和受到原子弹放射影响的被害人达四十九万！

死亡，永无尽期的死亡……

但这还不是结局，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灾难的原子弹（以及所有的核武器）才刚刚登台。当它被作为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威慑力量在战后苏美两大国迅速发展起来时，它就像一个被从瓶子里放出来的千年魔鬼，把巨大的阴影投射到整个人类世界上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和前苏联以及英国的士兵都亲身体验过原子弹爆炸的可怕后果。有人拿他们作了实验，而且是在平时时期。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甚至也没有预先警告他们。

一九四六年，美国在太平洋南部的比基尼岛爆炸了两颗原子弹，其中每一颗的威力为两万吨当量。当时，十八岁的水手约翰·史密特曼刚成为美国军人中的一员，他当时距离爆炸地点不远。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数小时，史密特曼所在的驱逐舰进入了靶舰停留的比基尼岛海湾。史密特曼和其他一些水兵奉命登上其中的一艘靶舰去灭火。水手们完成任务后，为了凉快一下，跳到海湾里游泳，据史密特曼讲，他们“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稍后，史密特曼水手没有得到任何保证安全的指令，他穿着短裤站在驱逐舰的船头，这时，试验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的火球在天空出现。

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九八三年秋天，约翰·史密特曼失去了双腿，一只手残废，他正住在费耶特维尔市（田纳西州）的一家医院里，他患了淋巴腺癌，处在死亡的边缘。据辐射专家认为，患病的原因是在比基尼岛上核爆炸期间受到辐射。

一九五四年九月，前苏联对自己的军队投掷了一颗原子弹，以测试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和士兵在使用核武器情况下的作战能力。

一九五八年，英国也在澳大利亚的一个荒原上对自己的士兵作了类似实验……在此之后，各种各样的核试验、核泄露、核污染、核事故层出不穷，并且酿成全球性灾难，许多全球性问题都与它有关。

广岛的蘑菇云是核武器威力在世人面前的第一次公开亮相，然而它的破坏性与越来越先进的核武器相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今人类所研制、生产的各类核弹头，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地球毁灭数百次。

幸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在减少，尤其是核战争的威胁在减少。

但核武器仍然存在，核威胁也仍然存在。

在这种威胁的阴影中，每一个善良、热爱生命的人都希望。

灾难永远不要再发生。

而人类其实是唇齿相依的。最新的调查结果表明，一旦再发生核灾难，任何一个大陆都不会确保安然无恙。即使在没有投掷原子弹的地方，生态平衡也将受到极大的破坏。到那时在尼罗河滩上发现的法老时期刻在石板上的话就会成为现实，而且会更骇人听闻：“我站在我的宝座上痛哭这巨大的灾难。在我执政的七年期间，尼罗河水干涸了。粮食歉收，食物所剩无几，人们变为盗贼，邻人相扰。人们希望逃走，但却迈不动步。孩子在啼哭，青年人好似老者，拖着变曲的双腿。他们的心碎了，谷囤中风在游荡。一切都完了。”

北纬 40 度大难

1976 年：中国唐山大地震

概况：地震灾难时时威胁着人类，全世界七级以上地震每年都有十多次。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中国唐山市突然发生里氏七点八级强烈地震，仅仅几秒钟后，唐山夷成废墟，六十五万六千一百多间民用建筑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二十四万二千七百六十九人死亡，十六万四千八百五十一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达三十亿元以上。地震罹难场面惨烈到极点，为世界罕见。人类不能忘记，地震的警钟还会在某一天敲响。人类永远不会忘记：唐山大地震。

公元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北京时间三时四十二分五十三点十一秒，东经一百一十八点二度、北纬三十九点六度，在距地面十六公里深处的地球外壳，比日本广岛原子弹强烈四百倍的猛烈爆炸发生了。

中国首都北京摇晃不已，天安门城楼高大的梁柱痉挛般地“嘎嘎”作响。从渤海湾到内蒙古、宁夏，从黑龙江以南到扬子江以北，这一华夏大地的人们都感到了异乎寻常的摇撼，一片惊惧。天津市房倒屋塌、摇晃和震响惊醒了正在该市访问的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

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天文台急速响起扣人心弦的警钟声，世界各大通讯社当日向全球公告了灾难消息——美国夏威夷地震台宣布：中国发生八点一级地震，震中在北京附近。

美国地质调查所宣布：北京东南约一百英里，北纬三十九点六，东经一百一十八点一度，发生八点二级地震。

香港的英国皇家天文台宣布：中国发生八级左右地震，震中在北纬三十九点六，东经一百一十八点一度，距唐山极近。

中国台湾“中央气象局”称：大陆北部发生八级地震，震中在北平东部一百三十五公里附近。

凌晨四点三十分。中国国家地震局收到南京、兰州、昆明等十个台的报震急电，其中六个台给出震级，但数据彼此悬殊甚大，有的定在八级以上，

有的定在七级以下。至于震中只有粗略的“北京附近”的估计。

早晨六时。中国电信局报告，在与全国各地联络中，唯独唐山地区电话通信中断，呼叫若干次，均无回音。

中国新华通讯社于七月二十八日向全世界播发了以下消息：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讯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七月二十八日三时四十二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七点五级……中国在几天后再次公布了经过核定的地震震级：里氏七点八级。

唐山，一座上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已经在一场没有预报的特大地震中夷成废墟。中国地震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的震撼》一书，公布了以下数字：死亡二十四万二千七百六十九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八百五十一人轻伤五十四万四千人。本世纪世界最惨痛的地震灾难发生了……

蓝色的闪光之后： 地震前兆和破碎的拂晓

北纬四十度，是一条“不祥的恐怖线”。京、津、唐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磁场。油轮上出现了传说中“诺亚方舟”的景象。唐山上空出现强烈的几次蓝色闪光，地上狂风呼啸，惊雷轰响，大地发了疯似地摇撼，几秒钟后，唐山破碎了。钢筋混凝土的梁柱被撕裂、挤酥、扭断。地裂宽三十米，长十六公里，一路穿过民房、围墙、路基，如同一道通向地狱的漆黑裂口，使农研所、小学、党校、十中、二十九中永远消失了踪影。极震十一度区内再没有任何人类建筑的立物。十多米的高楼竖直叠落，只形成了几米高的废墟。只有极少数人保留下那“破碎的几秒钟”的记忆。

北纬四十度线，横穿地球上的美国、日本、地中海及中国等重要地区，然而它下面的地壳是一条神秘诡谲的躁动带，被人们称为“不祥的恐怖线”。就在这条恐怖线上，发生过多处人类记忆犹新的大地震：美国旧金山大地震；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日本十胜近海地震；意大利波察坦以南地区地震；中国海城地震……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这个恶魔又一次突然选择了北纬三十九点六度——唐山作为它的牺牲品。痛定思痛，人们后来才惊醒：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大自然深知灾难将临，作出了使人恐惧的预警！

水，首先向人类发出了警报。

七月下旬起，北戴河一向露出海面的礁石被海水吞没，海滩上过去能晒三张渔网的地方只能晒到一张渔网，海水还淹进了海滨浴场淋浴用的房子。而距唐山比较近的蔡家堡等海域，从前碧蓝蓝的海水变得浑浑黄黄。一位潜泳于秦皇岛海水的人在水下看见了一条明亮的光带，就像一条不安的火龙。

唐山滦县一口井平时用扁担就可以提起水，忽然有人用扁担无法提起水来，当他取来井绳时，井水又突然猛涨，超过了平时的水位。唐山丰润县一口五十多米深的机井，从七月中旬起水泥盖板的小孔就上往外冒气，到了七月二十五日，喷气十分猛烈，几十米外能闻其响，气孔上面小石头都能悬起。

电磁也出现怪异现象，警醒人类！

距唐山二百多公里的佛爷顶山空军雷达站，二十六、二十七日连续接收到来自京、津、唐上空的奇异的扇形指状回波，这说明在京、津、唐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磁常北京、唐山半夜不少人家已经关电的日光灯依然奇怪地亮着，北京通县有人甚至发现一只拆下的日光灯还在闪闪发亮。七月二十七日，唐山一个军队驻营里，一堆钢筋竟然迸发出闪亮的火花。

唐山的一个矿区还飘来了一股散发着硫磺味的淡黄色的“臭雾”，使人迷惘不已。

与人类朝夕相处的动物更是奇行迭出，仿佛要唤醒人们，灾难即在眼前！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唐山附近农村一百余只黄鼠狼，大的背着小的蜂涌钻出一个墙洞，有十多只跑到一棵核桃树下乱转不已，被村民打死几只后其余亦不离去，怪叫不止。随后这群黄鼠狼向村外转移。另一村庄棉花地里若干群老鼠仓皇乱窜，小老鼠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

七月二十四日，唐山市陈玉成家中两只鱼缸中的金鱼不断跳出水面，当主人把跃出来的金鱼放回缸中时，它们竟然尖叫不止。二十五日唐山一养鱼场草鱼成群跃起，有些草鱼竟头朝下尾朝上、倒立着陀螺般飞速打旋。

天津大沽口海面的“长湖”号油轮出现传说中史前大洪水时“诺亚方舟”般的景象：大群深绿色蜻蜓扑向船窗、桅杆和船舷，密密麻麻，赶之不去。接着，大群的五彩蝴蝶、蝗虫、蝉、蝼蛄、麻雀都飞来了。船员们还记得，最后飞来的是一只色彩迷人的虎皮鹦鹉。这是发生在七月二十五日的怪事。七月二十七日白天，唐山一村庄蝙蝠在大白天满院子飞，有人很轻松地捉了十多只。同日，农民家中屋檐下的燕子衔着乳燕飞走不再回来，有只燕子还在最近几天连续将小燕扔出巢外，主人把小燕放回巢，又被它摔出来。二十七日，村民看见密集的大群蜻蜓集成约三十平方米的飞行方阵向北飞去。

七月二十七日深夜，比人类早觉醒一步的自然界发出了最后的灾难呼告！

滦县深夜几个出夜工的年青人惊叫着跳出洗澡池子，池子是从附近一口热水井里汲出的水，水突然烫得无法忍受。昌黎县看瓜的农民看到二百多米高的上空忽然明亮，地面照得发白，西瓜叶、蔓照得清晰可见，如同天亮一般。丰润县一个中学生被窗外的强烈光亮惊醒，他一看表，才凌晨三点多，这时天色又马上变得漆黑。

深夜十二点回家的唐山人王财看见自己的四只鸭子竟还站在院子外，一见主人它们齐声叫唤，脖子伸长、翅膀张开，扑上来用嘴死死夹住主人的裤腿。抚宁县养貂场的四百多只貂一起惨叫，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丰润县一养鸡场千余只鸡来回乱窜，嘎嘎怪叫。丰润县一马棚里喧响一夜，三点多钟，六十辆马车的一百多匹马全部挣断缰绳，嘶鸣着跃出马厩，在漆黑的夜里狂奔。这一夜，唐山地区许多人饲养的狗、猫都争相狂叫，恐怖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三时四十二分五十三点十一秒，唐山上空出现强烈的几次蓝色闪光，地上狂风呼啸，惊雷轰响，大地发了疯似地摇撼，几秒钟后，唐山破碎了，一片死寂，灰色的尘雾浓浓地笼罩着唐山。

整个唐山，没有一点声息。

就是这短短的几秒钟，唐山市区和农村六十八万二千二百多间民用建筑中，有六十五万六千一百多间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

除夜班人员和极少数早起者，绝大多数唐山人均在睡眠的情况下遭此浩劫。

地震震动情况如下——

极震区（烈度十一度）：唐山市区内，等震线约略呈北东走向的椭圆形状。东起开平区的越河，西至土产仓库、矿冶学院，往北到达煤研所、二十一中，往南到女织寨公社，短轴在五公里上下，长轴约十点五公里，整个极震区面积达四十七平方公里。

十度区：东起古冶、大庄蛇公社，北到付家屯公社和五犂庄公社，面积约为三百二十平方公里。

九度区：东起滦县霍庄，西至宁河岳龙庄，南抵丰南县小集、西葛庄，北到丰润县李庄子一线，面积约为一千四百三十平方公里。

八度区：东起卢龙县石门，西至宝坻县林亭口，北起丰润县北部的火石营，南到渤海边，面积约五千四百七十平方公里。同时天津市的破坏已达八度。

七度区：东起抚宁县枣园，西到黄骅县歧口，往北则到三河、蓟县、遵化以北，往南则至渤海之中，面积约二万六千平方公里。（七度区虽远离唐山，但竟使蓟县辽代白塔塔身震裂、塔尖坠地；遵化县清东陵包括葬有慈禧的陵墓的石人石兽掀倒；往北万里长城的烽火台倒塌。）六度区：大约以承德、怀柔、房山、沧州一线为界，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广大地区。

极震十一度区内，所有建筑一律被摧毁倒塌，荡然无存。质量较低的砖瓦被挤成粉砾，钢筋混凝土的梁柱被撕裂、挤酥、扭断。房屋砖墙倒塌、预制板的塌压，造成严重伤亡。

唐山市路南区建筑密度达百分之七十，也在极震十一度区内，地震发生时，地裂缝穿过该区，其主要裂缝带沿东北方向延伸，宽三十米，长十六公里，一路穿过民房、围墙、路基和河渠，如同一道通向地狱的漆黑裂口，使农研所、东新街小学、地委党校、唐山十中、二十九中永远消失了踪影。极震十一度区内再没有任何人类建筑的立物。广大农村的砖石、土墙、房屋全部毁坏，难有幸免。

地震的破坏性，设置了一个个惊天动地的惨烈景观——唐山人民医院大楼十多米高的高楼竖直叠落，一落到底，所有的一切叠摞在一起，只形成了几米高的废墟。

矿冶学院图书馆藏书楼底层整体向西滑行平移，使上面三层落地，如同陷入地下一截。

唐山十中门前水泥马路被拦腰震断，一截向左，一截向右，彼此错开一米多。

火车站铁轨扭成蛇形，有些路段俯瞰像扁平的铁葫芦。行驶的十五节车厢的北齐四十次特快列车七节脱轨，一节颠覆，钢混枕木被碾碎四百三十根。载有十吨柴油的牵引机车在剧烈的晃动摇撼中燃起冲天大火。

雄伟宽阔的湾河公路大桥，几截桥面震落河水，剩下的斜搭桥墩成滑梯状，如同一长串零乱无序的玩具积木。

开滦医院的七层大楼，变成三角形斜塔，阳台全部震塌，三楼阳台直直地砸叠在二楼阳台上，欲坠不坠。市委宿舍楼的一面墙被震倒，暴露出楼

内各家各户的家用设备。外宾招待所餐厅只剩下一个空框架。

浓浓的灰雾将散之际，两只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狼四处奔窜，跃过断墙残壁、瓦砾堆和尸体，最后冲上凤凰山顶，发出令人毛骨惊然的悲嚎。

只有极少数人保留下那“破碎的几秒钟”的记忆——一个值班的护士在那几秒钟看见西北方的天空特别亮，好像失了火，又听不见人喊，到处如同死了一般。这时空气中传来“呜——呜”的巨响，像百八十台汽车在同时发动。房子猛烈摇晃起来。这位护士奋力冲出屋，死死抱住一棵大树。只觉得大地晃悠，人和大树都往一个万丈深渊落下去……两位早起锻炼者突然听见“呜——呜”的如刮大风的声响，又见东北天边火红一片。大地紧跟着颠簸起来，两人死死抓住公园的铁栏杆，眼看着对面大楼眨眼工夫就倒下来。当他们跑回自己的家——哪里还有家，整个四周已是一片平地！

一位当时在火车站候车室的幸存者永远忘不了地震的那声巨响。三点多钟，看见天色昏红好像在打电闪，她跑进候车厅。巨响瞬间她还以为是两列高速行驶的火车头对撞了。大厅摇晃起来，不断有东西落下来砸在人脑袋上的声音，被砸中的大人孩子一声接着一声惨叫。接着“轰隆隆”一声，整个候车厅落了架，几百人全被砸在里面，她听见很近的两声惨叫：“哎呀——”、“妈呀——”……睡梦中的人们，现在你们是废墟下的人们，你们在哪里？！

剧痛的城：地震中的死者与生者

最令人胆寒的是那些悬挂在危楼上的尸体。一个女兵胸口血肉模糊，粗大的钢混梁柱戳穿了她的胸膛。

死者的头颅被挤扁，成了一块平板。压住下半身的楼板无法掀开，人们只能眼看着她一点点走向死亡。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盲目地把机场看作是逃生之门。手术棚外的土坑里，堆满了残臂断腿，白森森、血淋淋。喝尿食土坚持了十三天的幸存者。几乎已经失去知觉的陈俊华仍然本能地手举着这块三角铁一下一下地敲着。消失的围墙和铁栏使精神病人显得分外危险。有三名日本人和一名法国人遇难。第一天扒出来的人，救活率为百分之八十左右，第二天救活率减少到百分之三四十，再往后，扒出来的除了死尸还是死尸，尸山越堆越高。

一位诗人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

那茶杯上的一道裂缝，通向死者的乌有之乡……唐山大地震的伤口，却是一座八十五平方公里的剧痛的城！

唐山是个人口稠密的一百万人大城市，昨晚还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一夜过来就变成一座末日之城。满天空弥漫着朦朦的大雾，这是唐山地动山尧城市毁灭时扬起、散落、升腾的沙灰、煤屑、黄土以及烟尘所混合而成的“惨雾”。雾气中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呼喊。时间凝滞了，空气凝固了。偶尔地，有几声孩子细弱的哭声，像是从遥远的地心深处传来，深幽、尖细、悠长、哀伤得像幻觉中一根飘飘欲断的白色的细线。

此刻进入唐山，最令人胆寒的是那些悬挂在危楼上的尸体。

有的头被砸裂耷拉着，双手被楼板压住，有的倒悬空中，双脚被坍塌的预制板死死扣住，他们是跳楼时被死神抓住的人。一位年轻的母亲，扯着

孩子，从三楼的窗口探出大半截身子，但沉重的楼板无情地把她压死在窗台上。她还保留着死去瞬间护住孩子的姿势，随着余震的震摇，她的头发还在微微拂动。

地震发生在凌晨，人们在酣睡，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无数遇难者没有准备、没有反应、更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永远坠入了死的深谷。在解放军二五五医院，一个女兵胸口血肉模糊，粗大的钢混梁柱戳穿了她的胸腔。有的遇难者上半身完好，下半身却血肉筋骨糊成一团。有人目击过这样的遇难者：舌头外伸，眼球外突，死者的头颅被挤扁，成了一块平板。

跟历史上多次大震之后一样，唐山也下起了大雨，废墟中开始一片片地渗出血红的水，雨下着，汇成一条条血的小河，这是那些蒙难者残损的尸体流出的血。

而眼见着的、活生生的死更令人欲哭无泪。陆军二五五医院的护士丰承渤，地震发生时正在值班，不幸下半身被死死钳在一块楼板下，她的战友们用锹和镐都无法掀动那块楼板，而整个灾区还没有开进一台吊车。由于没有条件输血，又无法截肢。人们只能眼看着她一点点走向死亡，战友们轮流陪着她，有人送来半个西瓜，用勺子一口一口地让她吃点。她提出的最后要求，是让朋友给自己梳好头发。这位才二十岁的姑娘就这样安静地死去了，像是睡在了废墟之中。

惨白的太阳照着废墟，侥幸活着的人们仁立在废墟旁发呆。

有人手里捏着一只死鹅，不知撒手。更多的人赤身裸体，甚至忘了找件衣服遮身。人们的意识已被噩梦击碎，有人还以为是原子弹爆炸了，因为唐山历史还不曾有过破坏性的地震。一个叫陆实的幸存者，回忆了当时从废墟中爬出来的人们：因为大都是光着身子从废墟里爬出来的，所以用什么遮体的都有。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分男女）都穿着宽袍大袖、长及脚面的外国睡衣，我知道这是从服装厂弄出来的出口服装；几个小伙子穿灰制服，头戴新四军帽，有两个居然戴着日本战斗帽，还有一个光着膀子穿着日本马裤，这一定是京剧团的戏装，因为这都是《沙家浜》里的东西。有个拄棍子的白胡子老头，光着干瘦的身子，下边却围了一条姑娘穿的花布裙。一个十多岁的小孩搀着一个中年人走过来，那人腿受伤，一拐一拐的。他右手搭在小孩肩膀上，左手却紧握着一把鱼皮鞘的宝剑，鲜艳的桔红色灯笼穗飘然地在他腿边荡来荡去。大概是祖传的吧……正是这种被击碎的心态，使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盲目地把机场看作是逃生之门，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在那条九公里长的虚妄的“生命线”上，人流如潮地开始大逃亡，赤身裸体的，拄着树棍的，相搀扶的，光着脚的，都在往这股混乱嘈杂、恐慌不安的人流中挤。一位中年妇女，怀抱中的孩子早已断气，仍然死不放手地走着。一个受伤的男子，在地上一寸一寸地爬着。

沿途死尸路毙、血泪斑斑。

然而机场的药品越来越紧张，又没有大型的医院，只有一个四十人的医疗卫生队，如何救助这么多濒临死亡的伤员？到“七·二八”下午，人们又开始沿着来路涌回市区，沿途尽是死尸，尸体填满水渠、沟坑。悲惨、惊悚的幸存者们都觉得走投无路，许多人痛哭失声。

下午二点，三架飞机载来辽宁省医疗队。下午四点，五架飞机分别载来大同、阳泉、抚顺、淄博、淮南各矿矿山救护队，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个医疗队，一万多名医护人员，在唐山的废墟上铺开。当天晚上，刚刚赶到

的解放军总医院在唐山机场搭起最早的两个抢救手术台。

当时简易手术棚外的土坑里，堆满了截肢截下的残臂断腿，白森森、血淋淋一堆。没有冲洗的自来水，仅有一双手术手套，条件极其简陋。抢救者们踩在遍地的血泊中抢救伤员，在汽灯下做开颅、剖腹和截肢手术。由于没有血浆，许多伤员在手术台上死去。运送伤员的汽车上伤员一路惨叫，车下流不完的血洒满路面，汽车常常一路走，一路停，不时抬下具具死尸，又马上拉上伤员。

七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将唐山伤员向全国十一个省（市）紧急转送。一场全世界罕见的全国范围伤员大转移开始了。在这场大转移中，截至八月二十五日，共发出火车一九九列次，飞机四百七十架次，一共将十万零六百二十三名伤员运往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和上海。

在唐山地震的罹难者中，一些人不是被砸死的，而是由于精神崩溃和莫大的恐惧“杀死”了自己，他们完整的尸体上指甲抓挠的血痕往往说明了这种情况。而另一类人在绝境中怀着求生的希望坚持到获救的一刻——卢桂兰，地震时四十六岁，正在医院陪伴丈夫。她躲在病床下躲过了第一难。此后她渴了喝自己的尿，饿了就抓一把泥土咽下肚，一直坚持十三天后获救。当时她大腿骨折，血压很低，全身已呈现酸中毒症状，但她的确活了下来。

唐山市第一医院护士王子兰，震后被困于地下，她一直靠着一瓶葡萄糖盐水，每天喝下去一点维持生命。她清楚地听见周围地下的伤员和被困者一个个死去，而后尸体开始腐烂，发出阵阵恶臭。她不断给自己的手表上发条，坚信自己将像手表一样坚持，八天七夜后终于获救。

新婚夫妇陈俊华与郝永云被埋在废墟下整整二天三夜，丈夫陈俊华在黑暗中摸到一把菜刀，这把菜刀给这对蒙难的蜜月夫妻带来一线生机。陈俊华先后在黑暗中凿开了七个窟窿，但都遇上坚硬的水泥而无法突围。菜刀已经砍成一块三角形的硬铁，他们将“硬铁”在暖气片上不停地敲击报警，希望声音传出沉重的地下。敲击声越来越弱、越来越慢，几乎已经失去知觉的陈俊华仍然本能地手举着这块三角铁一下一下地敲着。三十日下午六点多钟，人们终于听到这不屈不挠的微弱的敲击声，获救的命运之门终于向他们敞开了。

唐山著名的开滦煤矿地震时井下有上万名工人。煤矿的地面建筑全部夷为平地，各矿井均断电、断风。矿工妻子们从废墟中钻出来，拼命赶到矿区在矿井上哭着、喊着、叫着。其实这时井下的情况比地面好得多。由于地震的强度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弱。

矿井四周又有坚硬的岩石层约束，结成一个不易受地震破坏的整体。各矿的井下工人有的沿着狭窄、倾斜的紧急通道撤回地面，有的攀着百米长的金属梯爬出矿井，有的沿地面救护者们放下的保险梯脱离险境。结果，开滦煤矿井下万余名人员除十七人因坚守岗位或路线迷失误入采空区死亡外，其余人员全部在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以前平安撤到地面。其中赵各庄矿陈树海等五位矿工，在矿井里苦苦摸索了整整十五天，终于全部得救。

唐山市监狱幸存的关押犯人在受伤的军人监视下加入了抢救队伍。在这之前，二百多名犯人和看守人员、警卫战士，几乎全被压在断壁残垣之间。重刑犯由于戴械具行动不便，大都已被砸死，不再有一点声息。

唐山市精神病院也夷为平地。幸存下来的精神病人在头几天显得异常

沉默、镇定，没有哭声也没有喊叫。余震摇晃时，四周一片惊呼，他们也无动于衷，似乎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而许多健全人却精神崩溃以至失常，目光呆滞、语无伦次的患者一个接一个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废墟上。这些精神失常的人由于过大的刺激，嘴里不停地念着惨死亲人的姓名，全身颤抖。有的不断往耳中塞泥，有的总想一头撞死。景象十分可怜。

震后第四天，原先精神病院的住院者们开始恢复病情。由于地震刺激造成的反作用力消失，患者们原先的症状开始出现，他们唱的唱、跳的跳，又打又闹，狂躁不已，消失的围墙和铁栏使他们显得分外危险。救灾部队和唐山市精神病院药剂师李忠志、医生张志勇等人历尽千辛万苦，将这些幸存的病人转辗送到了外地。

在唐山的特大地震中，有三名日本人和一名法国人遇难，其中日本专家武腾博贞、田所良一当场死亡，身负重伤的须永其幸在送到机场后死去。当时的唐山宾馆共住着十九位丹麦人、二十三位法国人和九位日本人，其中日本人住的四号楼倒塌，丹麦人、法国人住的新楼岌岌可危。中国翻译张广端不断用英语告诉外宾们千万不能跳楼，用窗帘、被单结成救生索从窗口往下滑。

中国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大楼，爬上断裂的楼梯，踩着摇摇欲坠的楼板，撞开挤压变形的门窗，将一个个已经无法自救的外国人背出来。获救的法国人和丹麦人在法国的访问团六十岁的蒙热团长带领下，不顾中国救援人员的劝阻紧跟着其他人奔向四号楼的废墟去抢救日本人，不同肤色的人们自动组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行动小组。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唐山地震抗震调查总结资料选编》记载了以下事实：

地震时，在震区共有列车二十八列，由于路基线的突然变形和巨大的地震力，使七列列车同时脱轨，其中客车两列、货车五列。

济哈直快一一七次，在北塘 茶淀间下行至二百~六百米处，客车七辆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三百七十根。

京齐四十次特快，在唐坊 胥各庄间上行至二百四千八~五百五十米处，内燃机车起火，一辆行李车颠覆，七辆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四

百三十根。

— 三 次货物列车在唐坊 胥各庄间上行至二百四十八~一百米处脱轨，压坏钢筋混凝土枕四百三十根。

四一次油罐列车在卢台 田庄间下行至二百二十一~一百米处脱轨，三辆颠覆。

— 二 次货车在卢台站四首，两辆货车脱轨。

— 一七次货车在唐坊 胥各庄间脱轨。

地震就这样轻而易举、疯狂地撕裂了人类交通的大动脉。

当十万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主力的救灾大军急速赶到时，士兵们饱受毕生从未经历的强烈刺激。眼前即是他们不敢想象、不愿承认的残酷事实：一座人类城市横遭灭顶之灾，已经彻底地破碎。远处和近处，危楼上和废墟上，以及辨不清方向的废墟深处，呼救、惨叫、呻吟和幸存者的抱尸长恸，使士兵们沉默进而哭泣起来。

在八月七日前，士兵们凭着一双手去推碎石、掀楼板、拽钢筋，以至许多士兵指甲全部剥落，双手血肉模糊。他们不仅仅承担着劳累、危险，而且还承担着巨大的心灵重负。有的地方明明看得清清楚楚，在废墟以下一两丈深的地方还有人活着，然而没有工具，不能救援。有的士兵用小锯条锯钢筋，硬是把结实的钢筋水泥板一小块一小块地分解开。每发现还在地底下挣扎着的人，士兵们就想尽方法给他们送下水和食物。他们用早已嘶哑的声音一遍遍喊话，让那些幸存者一定要等待、坚持。

然而许多困境中的生命随着时间的飞逝迅速地陨落了。强震后废墟重墙叠屋，砖砾上压着沉重的预制板，预制板上又压着更重的梁柱。死神攫住奄奄一息的生命不放，刁难和阻挠着抢夺生命的救援人员。

时间一天天过去，从废墟中救出的活人越来越少了。据救灾部队某部现场统计，第一天扒出来的人，救活率为百分之八十左右，第二天救活率减少到百分之三四十，再往后救活率就更低了。此时，扒出来的除了死尸还是死尸，尸山越堆越高。

地震消耗了空前的人力、物力。截至八月十日，包括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空军、海军、铁道兵和工程兵共出动十万人参加救灾，冒着不断的余震危险，日夜苦苦挖救，共救出废墟下的灾民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五人。另据河北省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的资料记载：唐山特大地震发生后，军队和地方参加救灾的汽车就达二万多辆。

自七月二十八日到作八月十二日的半个月间唐山机场起落各类飞机二千八百八十五架次，最多的一天达三百五十四架次，平均二分钟起降一次，密度最大的时刻，间隔仅二十六秒。

灰色的尘雾逐渐消散，但灾难还远未离开喘息稍定的幸存者们的和疲劳不堪的救援人员。

生存还是毁灭：震后灾难逼临唐山

调动飞机喷药消灭苍蝇、蚊子。废墟中有二十四万二千具残损、溢出血水、腐烂发臭的死尸。士兵们冒着恶臭有害的气味和尸液的有毒污染，赤手露臂进行挖掘、掩埋。许多士兵由于尸液的污染导致中毒，暴露的手臂和脸，以至全身生疮、淌水。废墟、道路旁，塑料袋或棉被包殓好的尸体堆得密密匝匝，令人不忍看下去。干涸的洼地、沟渠成为天然的墓穴。一九七六年入冬，卫生部指示进行“尸体再清理”，重新清理、掩埋了上万具死尸。

特大地震后往往紧跟着接连不断的余震，余震往往给稍稍放松的幸存者和救援人员造成新的伤亡。唐山七点八级地震后四十八小时之内，三级以上余震九百多次，其中五级以上强余震十六次，不断给人们带来恐慌和惊吓。废墟上的人们纷纷搭起临时防震棚，前面用四根竹竿，后面用四根竹竿，顶上横着二根竹竿搭一块塑料布，棚子四面透风，风雨飘零，然而它能给心悸不止的劫后余生者带来安全感。棚子里往往住着好几个残缺家庭的二十多口人，睡木板铺的地铺，吃一个锅里的粥，不分男女老少，挤在这个小小的庇护所里。救灾部队就以这些“临时家庭”为单位分发粮食、衣物和药品。

地震引来的另一恶魔是瘟疫。

大的死亡灾难后往往伴随大的瘟疫横行，纵观世界灾难史，反复重演这样的悲剧，证明着这个可怕的规律。

一五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国陕西华县发生八级地震，震亡人数十多万，而因地震引发的瘟疫却吞噬了七十多万人的生命。一九二五年中国云南大地震，震后“闭口风”症肆虐，患者一旦染病，身黑一半，手足收缩，一两个钟头就死去。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国河北滦县的六点三级地震后瘟疫流行，许多灾民遭受灭顶之灾。

唐山地震之时正临夏季，气温高、雨水多，难以胜数的死尸迅速腐烂、发臭。

由于城市废污排放系统基本上被破坏，使得废墟上遍地是垃圾、粪便和污水。某救护所最高时一天就有一千四百多伤员死亡。从废墟中扒出来的尸体更是堆积如山。

这些死尸、断肢大部分还来不及转移、掩埋，以至城市废墟上到处绿蝇如蜂，昼夜蚊声若雷。

令人胆寒的瘟神游荡在劫后唐山的上空，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已经摆在人们面前！唐山废墟上各种传染病感染人数日渐上升，已经快到暴发的程度，必须立即挡住瘟神，刻不容缓。

八月三日，“河北省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成立防疫领导小组。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灾区防疫紧急通知。从上海、广东、黑龙江、甘肃等地调动二十一个防疫队共一千三百人火速赶赴灾区。调动疫苗一百多万份，军用防化消洒车三十一台，喷雾器五万一千多具，杀虫药一百七十六吨，消毒药二百四十吨，从各地往灾区急运。

八月五日，国务院抗震救灾办公室发出通知，调动飞机喷药消灭苍蝇、蚊子。

“安一二”飞机飞临唐山上空，常规喷洒作业九十五架次，喷药面达二万五千亩；超低容量喷洒作业四十六架次，喷药面四十万亩。总共喷药量达四十五吨，喷药面积累计四十二万四千亩，飞机出动一百四十一架次。八十五平方公里的整个唐山市区被药物覆盖。

同时，在地面上圆桶形压缩喷雾器、群英式背负喷雾器、防化喷洒车和东方红一十八型机动弥雾机投入地面喷药战。入夜，一堆堆火在废墟上燃着，“六六六”的烟雾飘向四处。

经过空中和地上的初步喷药战，唐山市区蚊子的密度下降百分之九十多，苍蝇的密度下降百分之五十。

空前的埋尸大战拉开了黑色幕布。

废墟中有二十四点二万具残损、溢出血水、腐烂发臭的死尸。假如将这个数字的尸体全部不留空隙地葬在一起，需挖一个占地一百三十亩的大坑。假如要将这个数字的尸体全部一次运载，需用解放牌卡车二万四千二百多辆。假如死尸与死尸间踵相连将出现一条长达四百公里的死亡之线。

震后第二天，七月二十九日大规模的尸体掩埋开始。军区救灾前线指挥部曾经发布命令：必须在七月三十一日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慰问之前，把所有的地表的尸体掩埋完。

掩埋初期所有的埋尸部队均无防护措施。死尸发出的气体是硫化氢、氨、甲烷混合而成的强刺激性有毒气体。士兵们唯一能采用的措施即向尸体

上洒酒精、鼻孔中塞进酒精棉球、戴上简易的自制纱布口罩。士兵们冒着恶臭有害的气味和尸液的有毒污染，赤手露臂进行挖掘、掩埋。

掩尸头二天，没有水洗手。士兵们用手抓馒头吃，均感恶心，一些士兵不能进食。许多士兵由于尸液的污染导致中毒、暴露的手臂和脸，以至全身生疮、淌水。

有的部队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生疮感染。据目击者称，有士兵在紧张的挖掘中一头栽倒死去。

八月一日后，挖埋尸体用的防护用品和装殓尸体用的特别制塑料袋等运到。北京军区有如下指令：“挖掘尸体要注意，因为是夏天，部队要轮流作业，要有防毒面具、防毒手套，要组织好。”

以下是北京军区某师的具体规定：

一防尸臭刺激。工作人员应配戴防毒口罩。普通口罩或口罩代用品（毛巾、手绢）上应喷洒酒精，涂抹牙膏；或者在鼻孔中放入蘸上酒

精、

香水的棉球，也可放入大蒜、香菜叶。

二防尸液污染。工作人员必须穿工作服，戴橡皮手套，穿高筒防护靴。

若没有防护靴时，应用塑料布包扎前臂、小腿，以防尸液接触皮肤。

接触

尸体的工作人员应轮流作业，下班时应用来苏尔水消毒手，晒衣服。

三是应按规定要求对尸体处理做好喷、包、捆、运、埋。其中——喷

药：扒尸与喷药紧密结合。用消毒车、机动喷雾器或用脸盆喷洒来苏

尔溶

液、漂白粉、漂白精粉或酒精等。

包裹：先用衣物包头，后用棉被包整个躯体，或装入塑料装尸袋扎口。

捆紧：用棉被包尸体后，甚少捆三道（头、腰、腿），以防尸臭散逸。

运走：应指定专车专人运送，包裹好后立即运走，避免在市内存放，

影响环境。

深埋：尸体深埋地下一点五米到二米，上面加石灰和厚土砸实。

唐山应该记住这些年青的士兵：两个瘦小，还很孩子气的士兵，军帽歪到一边，衣袖高挽，尸体流出来的液体一滴滴淌在他们的衣裤上，已经打湿了一片；有一处预制板下有具尸体，已经好几天了，从旁边走过都熏人得很，两个士兵不顾灾民的劝阻，冒着中毒的危险钻进去扒。过了很久很久，递出来一条胳膊，又递出一条腿……起初防毒面具甚至普通口罩并非人人一个，很多士兵用的是口罩代用品。他们从药品仓库的废墟里找来战备绷带，用这些，绷带在脸上缠绕几圈，遮住口鼻。废墟上处处可见扒尸、抬尸的士兵满脸缠绕的白色绷带随风飘动，一个个好像在为唐山的不幸而披麻戴孝。

废墟、道路旁，塑料袋或棉被包殓好的尸体堆得密密匝匝，令人不忍看下去。

通往郊外的公路上，运尸车一辆接着一辆，都装满了尸体。田野里、干涸的洼地、沟渠成为天然的墓穴，士兵部队不断用推土机犁出一道道深沟，以便迅速集中掩埋成百上千具的尸体。在那些大坑里，一具具尸体头踵紧挨，无论男女老少，百姓领导。

一九七六年进入冬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指示唐山灾区进行“尸体再清理”，将全部掩埋深度不足的尸体尽数挖出。

火化或深埋。

根据“河北省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卫生组的具体要求，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清尸防疫办公室。由数万名民兵组成专业队、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进入唐山，连夜清理和重新掩埋了上万具死尸。

指挥部门对“尸体再清理”作出明确的规定：凡此次清理出的死尸，能辨出性别的必须男女分别集体掩埋。如果有遇难者亲属要求移葬的，可给出指定时间、地点，同意埋葬。无论集体埋葬还是自己埋葬，都必须按坑深一点五米，盖土一米以上的标准下葬。

十一月二十一日，“尸体再清理”正式开始。为了不惊动饱受失去亲人的巨痛、很难再受刺激的广大灾区人民，“尸体再清理”专业队选择黑夜降临时开始操作。

第一步清理并全部移出距水源、自来水管及主要居民点一百米内的尸体。

第二步清理离市区较近、集体掩埋于交通路线附近的尸体。

规定全部用石灰消毒，然后盖土一米，再用拖拉机反复碾压二次。

最后清理被压于高层建筑物下面、仍未清理出来的死尸，将其全部挖出并按规定予以掩埋。

“尸体再清理”工程紧张艰苦、规模浩大。清尸队、防疫队、医疗队，各队紧密配合，同时作业，连续运作。清尸一处，防护、消毒一处。工程基本上结束了第一次救灾大掩埋的隐患。

唐山灾后的第一个春天，也是全世界人士最担心暴发瘟疫，密切关注着唐山的时节。然而，这个春天不仅没有流行疫病，而且传染病的发病率低于常年。

救护人员历经艰难和折磨，终于挡住了紧跟地震恶魁的瘟神。

无法悲伤：地震没有预报

一九七五年二月，国家地震局成功的预报了海城地震，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到临震预报的决断时却失败了。地震工。作者中出现两种观点的分歧。尽管如此，几位持华北地块今年将强震的观点的地震工作者坚持己见，并发现了八大异常。距唐山地震十六天，中国“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赶到会场，向代表们呼吁注意唐山、滦县一带。国家地震局局长应付政治运动就已经身心疲惫。强震发生整整一个小时之后，国家地震局仍找不到震中。“京津唐地区的地震预报的发布，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问题”。

当中国国家地震局人员出现在地震废墟上时，遭受了雨点般的石块袭击，愤怒的唾沫和辱骂扑面而来。人们认为国家地震局一直在重点监视京津唐的地震活动，如此强度的地震事前竟毫无预报，惨烈的灾难他们要负直接的责任。

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由于国家地震局和各地地震工作者发布的预报，使得辽宁省南部的一百多万人全部撤离工作和住宅地点，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发生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城镇房屋遭毁五百八十万平方米，农村房屋遭

毁八十六点七万间，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地震地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

在世界历史上成功地预报七级以上大震尚属首次，中国地震工作者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海城地震发生前，中国国家地震局根据小震活动、地壳形变、地磁、海平面等四项异常，同时根据西太平洋地震带和深源地震对中国华北地区的影响，以及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气候异常等重大情况，确定中国渤海北部为地震危险区。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向京、津、冀、晋、内蒙、辽、鲁七省转发国家地震局的文件，并传出通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由国家地震局派往各地和各级部门的地震工作人员布成一张预测监视的大网，终于成功地发出了地震预报，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

同时，地震工作者已经将唐山套在他们的监视网中。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到临震预报决断时却失败了。

地球表面是由许多裂片构成的，华北地块就是其中之一。它西起贺兰山——六盘山构造带，东至海中，南起秦岭——大别山构造带，北至阴山——燕山构造带。

这些构造带附近经常有规模巨大的褶皱断裂系统，复杂的变质岩余和从地幔层侵入的超基性火成岩系。所以它既是构造活动带，又是各种地球物理场的异常带，同时也是地震活动带。在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相对运动的包围中，华北地块必然常常处于不平静的状态。

海城地震后，地震工作者之中出现两种观点的分歧，一种观念认为华北地块自海城地震后趋于平静，而中国西南云南、四川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四年，已连续发生三次七级以上强震。防震重点应在西南。另一种观念认为，在海城地震前观察的现象预示着十分强烈的地震，但海城地震后其中一些异常现象并未消失，强震可能性依然存在，应该继续严密监视。

唐山地震前半年时间左右国家地震局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一九七六年地震趋势的报告》，报告中称：“当前我国正处在地震活动的高潮阶段，估计近一、二年内大陆地区有可能发生七级以上的强震。目前有较多异常显示，可能发生较强地震，需要重点加强监视地区为：（1）滇西北及川藏交界一带；（2）四川、青海、甘肃交界的四川松藩——茂汶一带和青海花石峡——都兰、乌兰一带。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背景的地区为：（1）京津唐渤张地区；（2）皖北、苏北、鲁东、豫东一带。

……京津唐渤张地区今年内仍然存在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可能，但目前尚未出现明显的短期和临震异常……从目前地震活动和前兆异常的空间分布来看，唐山与朝阳之间和京津之间两个地区尤应加强工作……”然而，随后发生的多次地震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四月六日，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发生六点三级地震。四月二十二日，河北大城发生四点四级地震。震后，某些华北海城异常现象消失。五月二十九日，云南龙陵发生七点四级地震。几天后，四川大邑又出现异常情况。

尽管如此，几位持华北地今年将强震的观点的地震工作者坚持己见，并相继发现了八大异常：华祥文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和短期气象异常、李宣瑚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水化学氡含量异常、陈光忠和刘惠琳提出京郊大灰厂形变异常以及有人提出该地区磁场总

强度异常、地下水位异常和地电异常。他们分别向北京市地震队领导、北京市科技局领导、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和国家地震局领导作了汇报。

距唐山地震十六天，中国地震“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汪成民赶到会场，向代表们呼吁注意唐山、滦县一带，并散发三百多份调查表，希望一有临震突变异常立刻报告。汪成民回京后在国家地震局局长办公室门口以大字报的形式呼吁紧急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北京市地震队在与国家地震局会商此事前于七月二十四日召开的准备会上，华译文、张阅厚、耿庆国、李宣瑚四人认定即将在七月底或八月初京津唐张地区将发生大地震。当晚还收到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报来的意见：七月二十七日前，北京附近二百公里范围以内，将发生五级以上地震。

而这时的中国，政治领域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在这半年里胡耀邦失去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位置，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被迫靠边，而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应付政治运动就已经身心疲惫。

最后一次技术人员就监视、预报京津唐张地震要求领导召开的会议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距唐山地震十七小时。会上介绍震情的汪成民宣读了汇报稿，要求大家紧急动员起来。而采取什么措施，似乎还是希望领导定夺。地震局领导最后拍板，要求他们拿出详细资料，用一周时间圈出危险区，并决定第二天派车去核实水氡异常现象。然后会议结束。

从此时算起十五个小时之后，唐山特大地震发生了。由于惊恐慌乱和落后的通讯反馈，强震发生整整一个小时之后，国家地震局仍不知道震中在哪里。而唐山的一切，早已无法挽回——地震预报彻底失败！

中国地震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中国九大地震）一书中认为唐山地震未能做出临震预报的原因如下：一九七六年初召开的年度地震会商会上，曾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五一六月间河北省地震局曾派出唐山地震工作小组赴唐山调查，而且有几位同志就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但为什么未能像海城地震那样作临震预报呢？这是因为，总的说，我们对地震规律认识能力还很差。在工作上，我们认为可能还有以下几点重要原因：第一，对基本形势估计的错误。一九七五年海城七点三级地震后，在海城周围几百公里的范围内，近年内还会有七级以上强震发生吗？虽少数人据地震活动和气象异常，认为有大震背景，但多数人抱有怀疑。所以，虽然看到唐山—辽西一带存在异常，也只作为有五至六级地震的背景区加以注意。第二，四月六日在唐山市以西五百三十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发生六点三级地震，震后京津地区原有一部份异常现象消失，同时，天津西南大城四月二十二日还会发生四点四级地震，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些异常和这两次地震发生有关。第三，地震前十天至几天，震中区及其周围没有获得大量的突发性异常的报告，也无前震，因此，未预计到地震会来得那么快，那么大。第四，京津唐地区的地震预报的发布，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问题。

在唐山地震中有二十余位地震工作者和唐山人一同罹难。然而，面对惨景，地震工作者心中更多的是内疚和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地震啊，地震，当这个恶魔再次将要出现时，人类能否发出拯救的信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灾难思想观”：地震与人类启示录

直接经济损失达三十亿元以上。几乎每五个幸存的唐山人中就有一个重伤员。应该有一种“灾难思想观”。城市高楼林立、高人口密度的发展模式值得深刻反思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出发必然导致对大自然的轻视，灾难发生时就可能忽略自然界的警告。

救护部队情急之中赤手空拳就开进了灾区，直到八月一日以后才陆续调来吊车、电锯等。中国先后拒绝了美国、联合国、英国、日本的救灾援助。美国旧金山大地震。日本关东大地震。全世界每年发生可记录的地震五百万次。

唐山是中国著名的工业城市，该市的生产产值在地震前约占整个中国的百分之一，其煤矿业、电力、工业、陶瓷业、冶金业，纺织业等都在中国占有较大的份额。

然而，只短短几秒钟，中国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便被无情地摧毁了。

唐山经济在这次地震中的可计算的直接损失达三十亿元以上，用于救灾和重建的投资更是无法计算。

唐山大地震给人类生命和精神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几乎每五个幸存的唐山人中就有一个重伤员。据统计，在运往中国辽宁省的一万八千五百九十一名伤员中，各类骨折伤占伤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截瘫占百分之九点一，软组织损伤占百分之十二点九，挤压综合症占百分之二点一，其他伤势占百分之十七点九。这些幸存者从身体上就受到长远的损害。地震撕碎了无数家庭，有三千多个孩子的家庭被彻底摧毁，成为孤儿。

对人类而言，地震与其他灾难不同，它只能被预报，不能被制止。反思唐山地震，人类应该有一种“灾难思想观”：地震必然发生，不能被制止，地震必然打破人类的常规思想规范，人类只能预测地震，转移人员和物资，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灾难发生时直面灾难，超越日常政治、文化和生活的意识逻辑，主动、客观地投入减灾、救灾。

考察唐山灾难的细节，应该给人类许多启示：第一，从地震灾难的角落反思人类建筑。

唐山灾难中，工厂厂房大都倒塌，多层厂房破坏尤为严重。

民用多层砖混结构房屋全部倒塌。一些新建筑用砖质量低次，灾难中几乎全部碎成拳头大的砖砾，砖墙倾倒。预制板的屋盖、楼板散落造成严重伤亡。而地震中一座八层的内框架外墙承重结构的房屋，海城地震后因防震又续加十二根构造柱，结果在强震中大楼完整未损。同时，一些形体简单、开门较窄高度低、屋盖轻的房屋，也幸免于难。

这说明人类建筑房屋要考虑地震袭击的可能，建筑结构应该合理、坚固，质量一定要过关。同时人类城市高楼林立、高人口密度的发展模式值得深刻反省，在地底活动带应该适度控制大工业、大城市的过度膨胀。

第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普及地震预防、救护知识的启示。

人类不应该忘记自己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依存关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出发必然导致对大自然的轻视，灾难发生时就可能忽略自然界的警告。水、电磁尝动物界等大自然的物事都在唐山大地震前出现异常，如果人

们重视大自然的信息，同时广泛宣传、普及预报知识，地震灾难就有可能提前预报，获得避灾的宝贵机会。

在地震活动带地区普及救护知识，让人们灾难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它对减少损失、减轻灾害有着关键作用。唐山地震中北京、上海的救护力量迅速送水、供电，辽宁省邮电系统维修队修复东北三省经唐山通往天津、北京的电话线，铁道兵部队抢修京山线铁路使之于八月七日恢复通车，这些举措给垂死的唐山搭起一条生命线。相反，心理准备的不充分将导致慌乱和失误。救护部队情急之中赤手空拳就开进了灾区，直到八月一日以后才陆续调来吊车、电锯、凿岩机、电焊切割机。只有平时有所准备，才能在灾难发生时正确快速地行动。

第三，在对抗灾难时人应该超越日常政治、生活的意识逻辑。

唐山地震的银行废墟上，一些士兵为了符合平常银行的规定，为了区区五分钱在废墟里从下午找到晚上；一些受灾单位将抗灾任务“提升”到空洞的高度，提出若干“假、大、空”的口号；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中国先后拒绝了美国、联合国、英国、日本的救灾援助。这些举措也许符合当时人们的日常意识逻辑，但在面对特大地震这样的灾难时是应该值得反省的。

唐山地震后的水灾危险就是一群具有英雄气概的士兵解除的。距唐山十五公里的陡河水库在强震后大坝下陷一公尺，主坝横纵均出现多处裂纹，又加上暴雨连连，如果不排洪后果不堪设想。由于停电，北京军区炮兵某团士兵四人一组，每十分钟一班，赤裸身子，发疯般使劲用手摇绞车去启动四十吨重的洪闸。

他们冒着跌下大坝的巨大危险死命摇了七八小时之久，终于提起闸门，让洪水顺利排流。他们这种英勇的优秀品质抗拒了一次毁灭性的地震次生灾难。

地震是非理性的，它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痛苦，仅仅翻开本世纪的历史，它的肆虐使人类何其沉痛：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凌晨，美国旧金山遭到里氏八点三级的强震袭击，持续时间七十五秒。该城大部分地区房倒屋塌。地震后不久发生了火灾，大火烧了整整九天。大约八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一切被烧了个精光，近三万幢房屋被烧成灰烬。地震灾难使七百多人丧生，经济损失达五亿美元。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甘肃发生里氏八点六级大地震。巨大的石块从陡坡上滚下来，几百处发生地裂，地面上所有的一切被吞噬。许多人被埋在窑洞里。

地震使十八万人丧生。幸存者中有二万人冻死于震后冬季，由于他们害怕“山还要走路”，不愿建造厚实的房屋。据专家论证，此次地震是本世纪破坏性最大的地震之一。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很难找到灾难的详细记录。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日本关东的横滨、东京一带发生地震。地震刚开始并不强烈，但一秒一秒地不断加剧。关东大地像海水一样起伏不定，平原、山丘都像发疟疾般颤栗。一座山林以每小时九十多公里的速度滑下山谷冲过一个村庄，落入大海，由于它裹挟着很多尸体以至染红了方圆好几公里的海水。逃到一个火车站的好几百人由于混乱被开过来的火车碾死。东京、横滨震后燃起大火。有好几千人跳进海里，由于油库爆炸，石油流进海塘在水面燃烧，使其中几千人烧死。四千多人藏身的一个仓库被大火环状包围，

只有十多人浑身烧伤跑了出来。关东大地震使十四万三千人丧生，二十多万人受伤，五十多万人无家可归。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智利中部康塞普西翁市和周围广大地区发生地震。

地震使安第斯山脉约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地表出现一道道裂痕，其中有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带下沉了三百米。地震使六座沉睡的火山重新喷发，还形成了三座新火山。

熔岩涌出地面流进兰科湖，使湖水溢出，向山下倾泻，引起了山崩。地震持续了一周，一群印地安人杀死一个放牧孩童，取出其心脏祭神，企图祈求神灵收回地震。

灾难使六千多人丧生，十万户人家被毁，全国五分之一的工业遭破坏，经济损失达四亿美元。

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伊朗发生地震。在六十秒钟内，大约二千四百平方公里的地带变成了悲惨世界。地震的轰隆声停息后，幸存者呼喊自己的亲人，但大多已得不到回答。共有一万多人死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是伊朗人习惯修建泥砖厚墙房，在地震中悉数倒塌。据专家估计，如果震中在距伊朗首都德里兰一百四十多公里的地方，那么死亡人数将达一百万。

地震专家告诉我们，全世界每年发生可记录的地震五百万次，其中有感地震五万次，造成破坏的近千次，而七级以上，足以造成惨重破坏的特大地震，每年将平均发生十多次！

也许，人类终究会弄清，天文因素、太阳黑子活动与地震的关联，地核的不规则运动、地轴和磁轴的偏转与地震的关联，地幔热流与地震的关联……人类终将能够准确地预报地震，扼住灾难的咽喉！

人类不能忘记——地震的警钟还会在某一天敲响！

人类不能忘记——唐山大地震。

魂断琼斯敦

1978年：美国“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惨案

概况：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全世界掀起强大的宗教热，也带来了尖锐剧烈的宗教冲突，酿成一幕幕重大惨剧。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南美洲圭亚那与世隔绝的丛林公社琼斯敦，美国“人民圣殿”教成员九百一十四人，在教主吉姆·琼斯的带领下集体服毒自杀，震惊了全世界。“人民圣殿”教是美国旧金山地区影响颇大的新兴宗教，教主琼斯以其个人魅力吸引了无数信徒。当今世界，迷狂的宗教泛滥成灾，邪教的阴云何时才能从人类的头上散去？

一九六七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地区出现一个叫“人民圣殿”的教团，教主是詹姆斯·沃伦·琼斯，他宣称“人民圣殿”教的理想是“消

灭种族主义、政治压迫、贫富悬殊和生态不平衡的问题”。“人民圣殿”教因信仰治疗的奇迹、救助穷苦堕落分子和兴办社会福利而在美国名声大振，一时人们纷纷入教，传播越来越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一九七七年，琼斯带领上千名虔诚教徒，从旧金山来到南美洲圭亚那合作共和国与世隔绝的林深处，建立定居地，取名“琼斯敦”。琼斯在这里俨然以神自居。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在这个热带丛林的世外桃源中，“人民圣殿”教成员九百一十四人，大多数是黑人，包括很多妇女、儿童，在教主琼斯的带领下集体服毒自杀了。

“琼斯敦惨案”震惊了全世界。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迷狂的邪教屡屡酿成重大的惨案，邪教的阴云何时才能从人类的头上散去？

迷狂的邪教：“人民圣殿”教内幕

风景美丽的“红杉谷”出现了一座教堂。教主琼斯是个令人入迷的人。他遇上一位年轻秀气的护士。基督教是一种容许奴役的宗教。他只有一个不良嗜好：定期跟漂亮的女教徒睡觉。“圣殿”供给信徒全部生活费用。“我最后一次化身为俄国的列宁”。“有一天我将是美国的统治者”。

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红杉谷”，是个风景优美的小小农业村镇，在旧金山北边，开汽车两个小时就到。镇外几英里的乡村地带，丘陵起伏，小丘上覆盖着一片片红杉林，多数坡地上覆盖着葡萄园。一九六五年，来了一位精力充沛的年轻牧师詹姆士·沃伦·琼斯，在其中一个山丘的顶上给他自己盖了一座教堂。这是一座模样笨重的大房子，红墙、铁皮顶，大门上头立着一个大十字架，还写着“人民圣殿基督教堂”的字样，风格粗朴，地点偏僻，看上去倒更像是个粮食仓库。

每个星期日的情形：几千名黑人和白人教徒将教堂挤得水泄不通，这常常是人们争相跑上宽阔的讲经台发言，大谈“人民圣殿”教的理想和教主创造的奇迹。教主琼斯也出现在台上，他脸色苍白，头发乌黑发亮，穿一身深身西服，配了一件浅色衬衫，笑容满面的脸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他首先猛烈地抨击旧金山的纳粹党。

讲话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后，一个秃顶的矮子便开始尖声喊叫起来：“现在该轮到你们尽义务了！请大家把钱包打开！”

为圣殿捐款会对你们有好处的。”大厅里便响起“刷刷”的点钞票声。人们争先恐后地捐献支票和现金，成千上万的美元随着动人的赞美诗旋律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教主琼斯是个令人入迷的人。要是他高兴，他可以把魔鬼本人迷祝要是他情绪不好，他能栩栩如生地描述出地狱的火焰与硫黄，将教徒们吓得不敢动弹。他还有信仰治疗的巨大奇迹，有些信徒宣称他们亲眼看见过教主施行神迹，甚至把一个等死的可怜家伙身上的致命癌症驱走了。

琼斯来到红杉谷的经历起始于印地安纳州的林恩，琼斯一九三一年在这里出生。

这位后来成为几千人的大家庭之“父”的人，几乎是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生长大的。其父詹姆士·瑟曼·琼斯，受的教育不多，干农活或在工

厂做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打仗中了毒气，一直未恢复健康，在琼斯还很小时就去世了。其父还曾是当地三 K 党的骨干，被琼斯后来称为“卑鄙的种族主义乡巴佬”。

琼斯的母亲林内塔·琼斯是个身强力壮、无私、值得爱戴的母亲，怜爱小孩子、青年人、流浪乞丐和动物。她认为信仰应该在于帮助贫苦人和弱者，而不在于听道。

但是她每个星期天都上教堂。她一直订阅《全国地理杂志》，热爱关于遥远的地方的文字，还喜欢幻想。她相信灵魂转世，经常给琼斯讲她在“前世”中航行的回忆——在猎取人头的野蛮人中间溯亚马逊河而上的航行。她醉心于超自然的神迹、符咒、预兆、灵魂和梦。而她常常梦见她的儿子，这些梦都预示着伟大。她告诉琼斯，他命中注定要成为帮助贫苦人和弱者而献出一生的人，是一个要在这世界上留下痕迹的人。

一九四九年，琼斯进了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几个月后琼斯与一位年轻秀气的护士学员玛希琳相遇并相爱。玛希琳出身于教士家庭，笃信上帝和善良的德行。

他们当年结婚，琼斯在玛希琳的鼓励下，进入印地安纳波利的巴特勒大学学习当牧师。

一九五三年，二十二岁的琼斯在印第安纳波利顿的一个穷苦的地方建立“国民公共教堂”，主要靠琼斯自己在家养猴子卖维持。其跟随者是些贫穷、弱孝困苦无助的人，“又肥又丑的，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的老太婆。他大老远走过去又抱又吻，就像他真的爱她们似的。”

琼斯传教的特点是黑人和白人混杂听道，事业发达的同时，也遭到当地种族主义者的反对，教堂几次搬家、改名。一九六一年，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盖起一座“人民圣殿纯福音教堂”。

由于他治疗灵魂又治疗肉体的天赋，名声迅速传遍了州内外，一九六一年被任命为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城市人权委员会”主席。

一九六一年末，他携妻子和儿子斯蒂芬，到巴西的一个贫民窟传教约二年。一九六三年回到美国，正值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涨，琼斯怀着深刻而真实激情听了马汀路德·金等人的讲话。

然而，另一个不同的声音却改变了琼斯。

这是马尔科姆的声音，他以前是个吸毒成瘾的街头流浪者，在监狱中从基督教转到伊斯兰教，取了一个穆斯林名字“马尔科姆·爱克斯”。这位著名活动家不仅强烈抨击种族主义，而且特别尖刻地指责基督教和美国的教堂。他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容许奴役的宗教，它所许诺的“爱”只不过是白人的一种残酷而巧妙的欺骗，其作用是防止黑人要求正义。他批驳民权运动，认为它是低声下气地指望一个由奴隶主组成的国家会有基督的仁慈，实在无益。

一九六四年初，琼斯被任命为主要由白人组成的稳健的新教教派的“基督门徒教堂”牧师时，他已经不再相信基督教的正义和上帝。“信仰危机”几乎使他想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一个“宗教讲坛后面的秘密煽动者”。

一九六五年是“对美国失望”的丰收年，越南战争等使琼斯越来越相信美国已经是个晚期病例，这个危险的大国将拉上全世界，最后向核爆炸的地狱作可怕的一跳。琼斯从一份杂志上看到过，因气候地理条件的因素，加利福尼亚州沿海岸的山谷地带是最安全的，能够经得住核战争的地区

之一。一九六五年底，琼斯带着大约三十名最忠诚的追随者到了红杉谷。

在以后的几年里，琼斯拼命传教，星期日也不休息，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他从不挪用他的教堂资金给自己买奢侈品，他只有一个不良嗜好——定期地对“人民圣殿”教的年轻、有吸引力的女会众提出性要求。而许多年轻的女会众认为分享“圣殿之父”的床铺是一种光荣，是她们能力这位伟大人物做的一件小事。到一九七一年底，在“圣殿”里很难找到一个年轻而有吸引力的女人没有在他的床上尽过自己的职责。

一九七二年初，琼斯与其主要助手蒂姆·斯托恩的妻子格鲁丝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约翰。斯托恩还写了一份宣誓书：斯托恩本人要求“这位世界上最仁慈、最高贵、最勇敢的人物”使他的妻子生一个孩子。他“坚定地相信上文所说的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献身追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会在把上帝的国度带到地上来时起作用，就像他非凡的生父一样”。而同时，琼斯的妻子玛希琳仍然是她丈夫的助手，主管着“圣殿”的婴儿之家和一个诊疗中心，“圣殿”的群众尊其为“圣殿之母”。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人民圣殿”教成长极快，从一个小小的乡镇教堂变成强有力的全州性组织，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用几十万美元买下地皮，建成两个分部，各有几千名信徒。教主琼斯的声望也随之大增，一九七五年，他被“美国宗教生活基金会”列入“美国百名优秀牧师”名单，又被旧金山市任命为市住房管理机构主席，一九七六年，被《洛杉矶先驱调查报》提名为“本年度人道主义者”。这期间，旧金山成了“人民圣殿”教的大本营。

“人民圣殿”教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贫苦的信徒，他们可分为三种类型：无依无靠者、青年人和文化程度低而又无工作的年青人。

另一种是数量可观的一小批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会众。他们之中许多人都在“圣殿”的“计划委员会”中，这是个有一百多人的大组，在名义上是拟定“圣殿”的政策方针的机构。计划委员会的成员不参加读经，不参加信仰治疗，也不瞻仰神迹，对他们来说，“圣殿”是严肃的事业，是持久不变的艰苦工作、责任和牺牲。

计划委员会成员要牺牲他们的时间、金钱和全部精力。

甚至还要牺牲他们的私生活，一般不与“圣殿”之外的亲属或朋友接触。在内部，成员的生活都要公开，就像是住在玻璃房子里。

计划委员会常常召开讨论、批评、洗脑的会议，持续到深夜。许多成员在大学的校园里就经历过多次气氛热烈的会议，所以积极性很高。有次开到大清早散会时，一百多个感悟了的“革命者”便满怀对正义事业的激情，拖着脚步去上班。

“圣殿”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数量庞大的信徒捐款和社会募捐。在“圣殿”外边有工作的信徒按规定将收入的相当部分上缴，有时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富有的信徒，则要求他们把财产转给“圣殿”。领取福利补贴、养老金或抚恤金的穷苦信徒，则按期将领到的支票转给“圣殿”。每一次集会就是一次募捐，并且许多穷苦信徒拿着募款箱，走街串巷拉募捐。

“圣殿”供给信徒全部需要，除了衣、食、住，还有医疗和娱乐。而且还为大学生付学费，为婴幼儿和老人提供日夜全托。

“圣殿”还向非信徒提供免费伙食、免费医疗、小儿免费日托等一大串各种服务。

琼斯宣称，圣殿可以代替家庭。他认为美国的家庭破裂是件好事：老式的、作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是像恐龙一样的古老社会古董，是垂死社会中的过时的残留物。

它使有着共同境况的穷苦百姓相互隔离，使他们受压迫。将来的潮流是穷人们在一种全新的家庭里联合起来，以一种全人类都是兄弟的乌托邦式的观念为基础，组成一个延伸得很广泛的联合组织的网。在这个新的、扩大的家庭里，人人都是兄弟姐妹，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一个强有力的、关怀备至的“父”。“圣殿”就是这样一种家庭，琼斯就是家庭的“父”。

琼斯的教义问答的内容常常是简单的三句话：“我不相信我瞧不见的什么鬼上帝。天上没有天堂。地狱嘛，也只有我们住着的这一个。”他在谈到《圣经》里说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才说他就是上帝。他提醒人们：“上帝为你作过什么了？”他要人们依靠他们自己，也互相依靠，也依靠他。

有一次琼斯厌恶地将《圣经》扔到地上，然后一再提醒会众，那位“钦定”标准英译本《圣经》的英国詹姆士一世不是别人，正是他把黑奴贩卖到新大陆。“你们还想坐在这里念这些废话吗？”琼斯问，“你们还想坐在这里念这种奴隶的《圣经》吗？”

为了加强份量，他指着附近的圣玛丽大教堂，“他们怎么能自称是基督教徒？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晚上还俄着肚子上床的时候，他们把穷人的钱花了五百万元来买这一大堆水泥和玻璃。他们怎么敢自称是基督教徒？”

琼斯在一次大的仪式之后向会众宣布：

“我早已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来到世上是为了一种特殊的用处，追随我的你们是我的选民。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我化身之前就跟随我了。我在几千年前化身为佛，后来我短期化身为巴布，即为建立巴哈（Bahai）信仰的人。我曾经在世上生为耶稣基督，我最后一次化身为俄国的弗拉基米尔·列宁。”

有一次，一个八十多岁的小个子老太婆站起来讲她还是个姑娘的时候，在南方租种白人的土地，有天晚上白人地主冲进她的家，到处乱摔东西。这个妇女刚生了小孩，几个月大的婴儿睡在摇篮中。这个白人抓起摇篮就扔。孩子后来死了，这个白人却什么事也没有。

老太婆讲完后，琼斯首先哭起来，马上所有的几百个人都哭起来，个个哭得像在地狱里一般。最后，琼斯说：“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重演，我们不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下去了，这简直像是在地狱里生活！”

教主自己特别引为骄傲的是从青少年收容所监狱里挽救过几个人，还挽救了一些吸毒者。他还喜欢吹嘘“圣殿”改造这些人的成功率很高，尤其是青少年不良分子。二十九岁的迪姆有着一双几分稚气的蓝眼睛，但他的眼里却包含着对越南战争的恐惧，他说：从越南回来后，我一直给自己注射海洛因。后来一位朋友把我带到“圣殿”听教主布道。教主说：“人人都应享受幸福的权利。”我非常感动。听完后，我跑回家，把针头、针管统统扔进垃圾堆，然后来到琼斯身边，像其他人一样为他效劳。我们现在什么也不需要。“圣殿”给我们提供膳食、衣服，并在城里给我们租房子祝我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帮助老人，帮助贫民窟里的穷人。我们也常去探望疗养院里的病人。“人民圣殿”教有个收养弱智儿童的基地，在门多西多农场，我们负责耕种那里的土地。

琼斯喜欢声称他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出生的，具有“超人”一样的神力，什么事也妄想瞒过他的眼底。会众对他心存畏惧，有人说：“教主有像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你几年前同他谈过的话，他能一字一句地背出来。他能拿出一个文件从头到尾看一遍，再一字不差地背给你听。”

不管琼斯具有什么样的神力，他还是小心翼翼地不单是依靠这种超自然的“神力”。他对“圣殿”的每一个信徒都保存有丰富的档案，里面是家族历史、医疗记录和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资料。里面还有“圣殿”的每个信徒都要定期写出来的“自我忏悔书”，也有一些是告密者提供的材料。假如某个信徒的档案里没有个人秘密材料，琼斯就让告密者去找这个信徒进行“友好”的谈话。

自从几个“人民圣殿”教的教徒移居法国传教后，引起法国社会的关注。一九七七年四月，法国《新观夜报》记者吉泽尔专程乘飞机抵达旧金山，采访那里的“人民圣殿”。他参观了教堂背后的城中之城。在一个三层建筑里，设有精神病诊所、司法机构和社会福利办公室。此外，还有一座幼儿园，一间水疗室以及一个每天向旧金山数千名穷人提供汉堡包的食堂。一切似乎无懈可击，然而记者却发现一个很不起眼的通道，里面是一间大而先进的录音室，可以与任何最高级的录音室媲美。记者看见录音室里有十多人忙碌着，便向里面走去，但有个人很快把门关上，记者发现他的眼光混浊而充满恐惧。

琼斯让每个会众铭记他的“伟大理想”：有一天我将是美国的统治者。我将消灭种族主义、政治压迫、生态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问题。我将使全国变得像我们的社团一样，我把这叫做“教徒的社会主义”。

正是在琼斯精力旺盛、富有煽动力和感染性的鼓动下，“人民圣殿”教日益壮大，成为一个拥有众多会众、内部团结紧密、工作效率非常之高的邪教组织，在旧金山市显示出很大的力量，据称，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间，有好几位旧金山官员是全靠“圣殿”才得以当选，他们是：旧金山市市长乔治·莫斯科恩（他任命琼斯为市住房管理机构的主席）、旧金山警察局局长，以及地区检察团约瑟夫·弗雷塔斯（他聘请斯托恩为其助理）。

“敌人来了”：危机逼近“乌托邦”

有人叛离“圣殿”。“圣殿”的敌人是座巨大的冰山。那地方是多么美，它叫“琼斯敦”。琼斯学着中国的办法。琼斯也笑起来，“自杀”闹剧结束。琼斯敦已成了丛林中的斯大林格勒。“圣殿”将迁往苏联。

两名情妇的叛离。美国国会议员瑞安等五人被琼斯的枪手打死。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位于南美洲大陆东北部，有八十万人口，主要为印度族和黑人，绝大多数信奉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热带雨林密布圭亚那。

一九六三年琼斯从巴西归国途中去过一次圭亚那，一九六六年这个国家脱离英国独立，并且选举出一个黑人社会主义政府时，琼斯就在地图上把这个地方画上要再去的记号。一九七三年起，他开始同圭亚那谈判，希望租用一大块未经开发的丛林。

十分不发达的圭亚那立即接受了建议。同时，圭亚那政府还考虑到租给“圣殿”的这块土地位于圭亚那和委内瑞拉有争议的边境，让相当大数量的美国公民在那里居留，可以促使主权的确认并防止委方的武力吞并。

一九七六年三月，双方签定了长期租约，面积共为三点八四三英亩。一九七七年初，大量的建筑材料等物资开始运抵这个居留地。

这段时间，“圣殿”虽然兴旺繁荣，但幕后问题也在增加。

最令琼斯头痛的是默托夫妇、斯托恩和格雷丝夫妇的先后“叛变”。

默托夫妇是“圣殿”计划委员会成员，从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他们觉得“圣殿”变了，教主琼斯变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变了。

计划委员会的会议内容越来越奇怪，特别是讨论教主的性生活。有人吹捧说和教主过一夜可以保证提高革命热情。教主则大骂资产阶级式的性生活态度，要每个委员会成员坦白他们对性生活的幻想和恐惧。有一次他还声称要脱离大家过几个月独身生活，作为一种性绝食罢工，以表明革命纪律和放弃感官快乐的决心。

另一次，琼斯在通宵达旦的会议中不让任何人离开房间直到讨论的问题有个结果。他叫人拿来个铁皮桶放在房间让人小便，坚持说性公开和男女在一起小便是“圣殿”坦白无私的表现。

默托夫妇慢慢觉得，在“圣殿”的生活中，“纪律”取代了“爱”，成为第一戒律。一九七五年，曾被琼斯的崇高理想和热情感召而入教的默托夫妇宣布脱离“圣殿”。他们的新家里立即来了个“圣殿”代表团进行游说。随后又来了一个代表团要求搜查，说是“圣殿”丢了文件。几般斗争后，默托夫妇签署了一份宣誓书，控告琼斯有长长的一串堕落不法行为，还改了他们的名字，决定一辈子跟“圣殿”斗争。

一九七六年又有几个教徒“叛变”。教主对脱离“圣殿”的人十分敏感，大骂他们背叛了事业，“为了一口袋信用购货卡和一辆花哨的汽车就出卖了兄弟姐妹。”每一个脱离了“圣殿”的人，尤其是计划委员会成员，都被列入敌对者名单，住宅被监视，查明他们是否与政府机关的人或敌对记者有接触。他们的私生活（甚至垃圾堆）都被仔细检查，为的是找材料写信恐吓他们。

一九七六年六月，琼斯带领几百名教徒乘坐领头汽车挂有“吉姆·琼斯牧师的人民圣殿”的车队，周游全国一个月，沿途在大城市租用教堂传教，吸收新教徒。

准备于七月四日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纪念日返回旧金山举行“圣殿”的盛会。

就在车队到达纽约时，发生了格雷丝脱离“圣殿”的“灾难”。自从给琼斯生了一个儿子后，格雷丝学了点大学课程，开始想过比较一般的生活，她悄悄离开车队，不告而别。琼斯非常爱私生的儿子，不能想象约翰的妈妈竟是叛徒。他担心她可能把自己的私生活及“圣殿”财务情况告之报界，更担心格雷丝上诉法院收回约翰的抚养权。格雷丝的丈夫斯托恩建议，假如格雷丝上诉，可以将约翰转移到美国法院管辖之外的地区，圭亚那的丛林营地自然是首选之地。

心腹斯托恩本人也在“圣殿”迁往圭亚那时“叛变”，他不愿到圭亚那的丛林中生活。

琼斯开始鼓动教徒向圭亚那迁移，他说：“圣殿”的敌人是座巨大的冰

山，这几个变节者，只不过是冰山的看得见的光……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是一群穷苦人，特别是黑人，自己团结起来了，政府的权力结构就会感到威胁……唯一的出路是离开美国这个种族主义的地狱。

后来在集体自杀中死里逃生的奥德尔·罗兹，参加过越南战争，曾是惯偷和瘾君子，一九七六年在琼斯组织的大周游传教活动加入“圣殿”。他还记得琼斯当时对众人的承诺：他开始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是多么美。而且最重要的是人在那里是多么自由。比如说“圣殿”在这里不能喝酒抽烟，唯一的原因是你在这里买东西都要拿穷苦人的汗水去换。而到了那里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在那个地方不是拿人的肤色来评判人，也不是拿说话的习惯或是他父母的地位来评判人。在那地方你想做个什么样的人就可以做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你可以成为你一直想做的那种人。

只要你是在做工作帮助你的兄弟姐妹，在那地方评判人只有这一条。

教徒们把这个丛林营地称为“琼斯敦”。十年之前琼斯从印地安纳州搬出来就是为了逃避这个世界的末日。现在，琼斯又一次看见的魔鬼出现在耶稣的诞生地伯利恒，这个罪孽深重的美国巨人又一次快要毁灭他自己了，迫害“圣殿”就是最明显的证据。迁往琼斯敦，琼斯就可以挽救他的追随者们免遭大屠杀，而且可能有一天出来继承整个地球。

一九七七年三月初，三百八十名“圣殿”成员向圭亚那驻华盛顿大使馆申请移民签证。几个星期后，第一支“圣殿”大军出发奔向丛林中的新家——琼斯敦，其中包括教主的私生子小约翰。

不到几个月，琼斯敦迅速扩大成将近七百人的一个喧闹忙乱的众社，而且每星期还有三四十个教徒到达。琼斯敦由紧急建成的三十来栋结构简单的房子组成，除了少数几栋之外都是在最近三个月内盖起的，分成男人的房子、女人的房子和孩子们的房子。这些房子都用只经过粗糙加工的木料盖成，窗子是用的活动木板，未装大门。房子之间铺着木板人行道。双层床、桌椅都是自造的，居住空间狭窄。由于没有锯木厂，所有建筑木料都是买进来的，碎煤从纽斯卡尔运来。

人们被命令从事三项最紧要的工作：砍伐丛林，种地、盖新房。田地有几百英亩，种着香蕉、木薯、菠萝、甜瓜和柑橘树，还有小块的试验田，种着豆类、卷心菜、土豆、胡萝卜和别的蔬菜等美国故乡的农作物。琼斯学着从书本上看到的中国情况以及他亲自了解的古巴的做法，定下一条严格的制度：每一个琼斯敦的成员都必须轮流到地里劳动，从事整地、耕地、插种、浇水和收获。

琼斯敦禁止临时性的性关系。一对男女想要建立性关系，先得向“亲属关系委员会”提出申请，考验三个月后，如有地方可住，这种关系才允许发生。

琼斯“布道”时，如有人抽烟或没有注意听讲，会遭到当众辱骂，然后一顿毒打相加。在向孩子们灌输信仰时使用的方式是在他们臂上和腿上通电。村社里的每个人都必须称呼琼斯为“圣父”，而且要面带微笑。

然而，危机并没有放过这个远避人世、狂热的“乌托邦”。

八月一日，琼斯担心已久的揭露圣殿的文章在美国《新西方》杂志登出，内容有：虐待、人身摧残、勒索、讹诈与贪污，以及琼斯与格雷丝等人的不正当关系。

几天后，琼斯通过设在丛林的短波电台口述了反驳文章，并宣布辞掉

旧金山市住房管理机构的职务。

由于斯托恩与妻子格雷丝联合上诉，八月二十六日美国法院判决琼斯将约翰交给斯托恩夫妇。虽然美国法院的判决在圭亚那不起作用，但琼斯一口咬定“中央情报局只要一高兴就杀人，他们想拿有毒的雪茄烟暗杀卡斯特罗，什么事也逃不脱中央情报局的黑手……把“圣殿”赶出旧金山的阴谋集团又追到琼斯敦了”，琼斯如临大敌，弄了六天的警戒，还跟圭亚那的内政部长、副总理等人联络，在圭亚那法院四下活动。

一批“叛徒”却组织起来，斯托恩夫妇联合米尔夫妇以及有亲属在琼斯敦的二十多人，成立“有关亲属委员会”，四处活动。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一日，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宣言，宣言长达三千字，描绘了一幅高压、抑郁和精神错乱的图画，控诉琼斯：穷凶极恶残酷无情地漠视人权，用肉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威压手段进行思想训练运动，以没收护照和在公社周围设置岗哨的办法防止社员离开琼斯敦，以及剥夺社员的私生活权利，剥夺言论、集会自由。

消息传来，琼斯放声大哭，召集全体教徒到中央大帐篷集合，宣布末日来临：“无论怎样我们也斗不赢，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想过和平生活，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

他们到这里来了。他们讲假话。他们不搞垮我们不会罢休。我们活着受这些罪还不如死了好。……我们怕死吗？难道死比活在地狱里还可怕吗？”

接着琼斯命令一个护士当众喝下一杯“毒药”，然后命令一个小姑娘如法炮制，小姑娘想先跟人们告别，她几乎把琼斯敦的人叫遍了，速度极快的呼唤声把人群逗笑了，琼斯也笑起来，“死了”的护士也爬起来笑了，“自杀”闹剧结束。

在琼斯看来，琼斯敦已经成了一个垂死挣扎中的公社。圭亚那同盟者抛弃了它，敌人包围着它。琼斯开始把琼斯敦看成是丛林中的斯大林格勒——一千万敌人围困的危城。他怀疑敌人就要来了，希望身边有更多的人。他指示旧金山加快送人到琼斯敦，尤其是有身份的人。有个家庭儿子出走了，琼斯派人通知父母说儿子在琼斯敦，等父母到了琼斯敦，他又派人通知儿子：“父亲在琼斯敦病危，急盼你来。”

琼斯宣布了新的预防性安全措施——不允许事先未通知的任何来访者进入琼斯敦。三天两头搞警报演习。召开一种被称为“白夜”的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反复谈论危机，甚至开一整天。

相互告密得到鼓励，不守规矩者被严罚。

当他察觉到圭亚那政府不再怎么支持“圣殿”时，便断言这些圭亚那社会主义者由于对事业缺乏足够的献身精神，已经被敌人收买。他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鼓吹苏联是更强有力更忠实于理想的保护者，他指示在圭亚那首府乔治敦的人员跟苏联使馆接触，试图跟苏联方面讨论有无可能将琼斯敦一古脑搬到“俄罗斯母亲”去。

包围着琼斯敦的是一种浓厚而凄凉的绝望感，一种一切都无所谓的感觉。琼斯对琼斯敦的前途越来越悲观，迷狂的教徒很容易受到他的感染。琼斯敦变得拥挤、伙食差，充斥经常性的感情发泄，砍伐、耕种、建筑等工作变得徒有其名。

虽然琼斯定期向教徒报告他与苏联协商的情况，最后还宣布了第一支

先遣队出发的时期——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但他心里面明白，事情的进展和可能性要比他嘴上说的小得多。人们越来越很少看到他，连同他住一个屋子的妻子玛希琳、情妇、两个儿子约翰和基摩也都一样。他多是独自在电台的小屋子里，嘴角绷得紧紧的。

他派人在深夜把一个漂亮的黑人姑娘从床上叫醒，告诉她“琼斯在等着你哩”。有一天琼斯说非革命性的性生活会引起癌症，琼斯敦的医生支持了这个说法，琼斯大为高兴，为了奖励他，琼斯介绍了几个年轻的女子，定期地依次在夜间满足他。

而琼斯自己拥有多名情妇。他对下面的人实行性禁忌，使女信徒获得一种优势。

而女信徒一般更为支持他，下面就能被他控制得更紧。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少，与“父”的关系就越来越重要。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五日，琼斯敦高级内层圈子的多比·布莱凯走进美国大使馆，要求使馆保护她返回美国。布莱凯的哥哥莱顿结过两次婚，两次都把妻子带进“圣殿”，琼斯先后把二个女人都据为己有，和她们同居。使馆要求布莱凯写一份确认她想离开“圣殿”的书面材料，布莱凯在书面材料中写道：“我已决定脱离‘人民圣殿’教，因为我担心如果圭亚那法院作出把约翰·斯托恩还给他母亲的判决，吉姆·琼斯可能实行他的威胁，强迫这个组织在圭亚那的全体人员自杀。”

六月初布莱凯将一份宣了誓的材料交给“有关亲属委员会”，内容包括她对琼斯敦生活的看法，对琼斯的精神是否健全提出了疑问，还有对琼斯敦的前途的预计，这预计准确得令人打寒噤。

六月十五日，《旧金山记事报》登载了布莱凯的材料的部分内容。琼斯把这个叛徒的事告诉社员，并说她这样做是因为她恨他，她恨他是因为他不肯同她睡觉。

人们相信了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布莱凯一直是琼斯的情妇之一。

“圣殿”的敌人斯托恩和“有关亲属委员会”加快了行动，从三个方面发起进攻：向法院控告；将琼斯敦内幕公布于世；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国会对“人民圣殿”教作全面调查。

委员会得到了利奥·瑞安为首的二十多位议员的支持。十月二十四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批准瑞安去圭亚那调查。十一月一日，瑞安通知琼斯，准备十一月十四日到二十日来访一周。

琼斯立即提出三个条件：一、访问时应有琼斯的律师到场；二、应有同情“圣殿”的国会议员参加；三、不带记者或“有关亲属委员会”人士同行。据说，当时瑞安的助手除第二条外，答应了两项条件。

就在同时，琼斯断定：九月份派回美国打官司、他最信任的助手之一——特丽·布福德也判变了。据说，布福德也是琼斯的情妇之一，她知道琼斯跟“有关亲属委员会”打官司的答辩策略；琼斯与圭亚那政界的接触、贿赂；琼斯在外国银行帐目上存以备用的款项。假如她加入敌人阵营，琼斯就要面对已经掌握了他的秘密的可怕人敌人。布福德的失踪对琼斯无疑是一次电击。其实她仅仅是断定瑞安的访问将把琼斯推向极端，故而跑到琼斯在美国律师那里躲了起来。

“判变”这个错误的判断终于压垮了琼斯的心理健康。瑞安就要来了，琼斯觉得围绕着他的阴谋快要收紧了，收成一个绞索。一个玉石俱焚的计划

渐渐完备。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瑞安一行到达琼斯敦。他没有依照琼斯提出的条件，恰恰相反，同行的不仅有多名记者，还有六名“有亲属委员会”的成员。

晚餐八点开始，饭后乐队奏起了欢快的乐曲。瑞安和记者们找到琼斯及其助手谈话。琼斯自始至终保持着冷静。瑞安根据“有关亲属委员会”开列的名单，会见了其中二十人，没有一个像是洗过脑受被恐吓过的，也无人表示想离开琼斯敦。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然而，当晚有人向记者递了条子，要求瑞安将他们带走。第二天，当记者强行闯入一间住着一些胆怯不敢见人的老太婆的宿舍时，引起纠纷。摄像机对准了琼斯，琼斯在记者们咬住不放的尖锐提问下，只几分钟就垮了：“我觉得遗憾的只有一件事——为什么没有人开枪打死我。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公社。我们没有招谁惹谁。

可是他们不毁了我们不罢休。”记者们高兴极了，他们上这儿来就是为了看到一个患偏执妄想症的琼斯。他们提问提得更快，更尖锐。

正是这时，有人报告有九个人趁访问的混乱逃出营地不知去向，还有帕克斯一家和博格一家要求跟瑞安回美国，博格一家甚至一家人分裂了，剩下的人不愿意离开。琼斯摇摇头：“让他们走……他们走的时候统统都说慌话……每个人都有走的自由……我要去道别，拥抱他们，告诉他们我爱他们。”

几分钟后，瑞安一行和十多个要走的人上了车，艾尔·西蒙拖着两个孩子也跑过来要上车，他的妻子追上了他，把孩子往相反的方向拖。国会议员、律师等都无法决定孩子应该归谁，最后西蒙只好留下来等瑞安下一步解决。

就在瑞安等人将离未离之际，冲过来一个年轻的圣殿信徒想用刀子对瑞安行凶，被人们拉开了。绰号“琼斯的机器人”、布莱凯的哥哥拉里·莱顿也假装叛变，跟着上了车。瑞安离开前仍告诉琼斯他对营地的良好印象不会全部改变。

随后，瑞安一行和叛离者匆匆离开。记者们早已吓得够呛，他们觉得在丛林中记者证不过是一张纸片而已，恨不得马上回到文明世界。瑞安一行到达凯图马港飞机常一架载着叛离者的飞机刚发动，剩下的人们开始陆续登上另一架飞机时，开来一辆拖拉机，上面是琼斯派来的六名枪手。飞机上的莱顿首先在第一架飞机上对一个叛离者开枪，接着其他枪手冲向另一架飞机和下面的未登机者开枪，几秒钟之内死了五人，伤了十二人。枪手们扬长而去。

袭击者主要想杀死的是国会议员利奥·瑞安，记者唐·哈里斯，全国广播公司的摄像员鲍勃·布朗，《旧金山调查报》的摄影记者格雷·鲁演逊，这四个人受伤倒地后头上又重复挨了好几枪。

圭亚那方面的机场警卫人员认为这是美国人之间的战斗，没有干涉。

杀掉利奥·瑞安，琼斯的“敌人来了”的断言就会实现。现在他可以真正兑现毁掉琼斯敦、不让敌人得到胜利的宣言了。

“我们献出生命”：教主琼斯的死亡演说

这段录音长达四十五分钟，是历史上罕见的最生动、最可怕、也是最奇特的自杀记录。“我们坐飞机去苏联吧”。“你愿意看见约翰死吗？”。“仇恨太大了，他们追了我们六千英里”。“我们不让他们来夺去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献出生命”。

袭击瑞安的枪手一派出，琼斯便召集了保安人员和卫生人员，布置了此后几个小时的任务，保安人员围绕中央大帐篷排成两层同心圆，内层以弓箭和刀为武器，外层以枪为武器；卫生人员去准备氧化钾和“伐利安”（一种镇静安眠药），调和好装在容量为零点五加仑的大瓶子里，再用容量为五加仑的大桶调好人造水果汁，准备和毒药混合使用。

然后他指示三个最重要的助手——卡特兄弟和迈克·普鲁克斯，叫他们将一只装有五十万美金的箱子送到乔治敦的苏联大使馆。

有线广播里传来琼斯命令全体信徒集合的声音，除了少数几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外，所有的人都要马上到中央大帐篷来。几分钟后大帐篷里坐满了人。帐篷的边沿是掀开的。上百名挤不进帐篷的人就坐在帐篷沿下面。大部分信徒还穿着开舞会时穿的衣服。

约在下午五点钟与飞机场的流血袭击几乎同时，琼斯开始讲话。他讲的话被录在录音机里。这段录音长达四十五分钟，是历史上罕见的最生动、最可怕、也是最奇怪的自杀记录。琼斯的声音还很平稳，但显得疲倦。他似乎既是在对信众宣讲，也是对人类的子孙后代宣讲：为了你们能过好生活，我努过力。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我们自己人里头出了一小撮人，讲假话，已经搞得我们的生活过不下去了。……所以我想，可怜可怜孩子吧，可怜可怜老人吧，我们像古代希腊人一样喝了这一杯吧，安安静静地跨过这一步。……我们可以打仗，可是要是只有孩子们活下来，他们就会被人家残杀。我们可以打仗，但是我们不得不去打的那些人，（他指圭亚那社会主义国防军的黑人士兵）我们又不愿意跟他们打。……但是，我们在旧金山的人不会瞧着这事不动手的，他们不会让我们白白送命的！

一阵欢呼声之后，一个叫克里斯廷·米勒，五十多岁，身材矮胖的黑人老太婆站起来问：“现在到苏联去还不晚吧？”琼斯很快地回答：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到那里去了，他们已经拿着枪去了，所以来不及了。我不想叫他们杀人……可是那些人要我们把乌贾拉（乌贾拉是想用刀子对瑞安行凶的唐·斯利在琼斯敦的外号）交给他们。你们想我会把乌贾拉交给他们吗？死也不会交的。

此时，唐·斯利本人提出来把自己交出去，他说：“我知道，人家一看到我就会杀死我。”琼斯对他说：“不，你别去，你别去，我不能这么活着，我活着是为了大家，我死也是为大家。”

琼斯每一次提到死，信徒们就爆发出一阵喝彩。

克里斯廷·米勒建议，“我们坐飞机去苏联吧。……走的人太少了，为了走的这些人不值得牺牲一千二百人的性命。”

琼斯又一次强调情况的严重性：莱顿等几个人已经去杀瑞安和那些叛徒们了，他设法阻止过他们，瑞安一死，敌人就有借口了，他们等的就是这种借口，他们就要进攻了。

然后琼斯愤慨地摇摇头：

去苏联？我们有了这些不好的名声，你以为苏联人还会要我们吗？以

前我们也许有点价值，可是现在什么价值也没有了。……希望也是会断绝的。因为人人都是要死的。我还没有见过不死的人。我要换个办法，我想怎么死就怎么死。苦恼太多了，我厌倦了，厌倦了！

“我也没认为你怕死。”

“可是，我一看这些娃娃就觉得他们应该活着，你明白吗？”

“我同意。但是他们还有应该得到的东西哩，他们应该得到和平。”

“我们大家到这里来为的就是和平。”

“可是你得到了和平没有？”

克里斯廷·米勒还没回答，全体信徒就齐声喊出了琼斯想听到的“没有！”，声音响遍全常琼斯继续说：我努力想让你们得到和平。为了这，我实际上是献出了生命。我实际上是为这个天天都在死。可是你们还是什么和平也没有得到。和很久以前我见到你的那時候比较起来，你像是过得好一些了。但这还不是我想让你们得到的那种和平。只有傻子才明明输了反而说是赢了。……不，我们赢了。我们倒下的时候就赢了。蒂姆·斯托恩再也没有仇恨对象了，他也会毁掉自己。我不是以牧师的身份说这话，我今天是先知的身份说的。

一千个人朝着克里斯廷·米勒大嚷，叫她听先知的話。克里斯托还想坚持自己的态度：“我想我有权决定我的命运，别的人也个个都有权决定他们的命运。”

“我并没有取消你的权利，”琼斯刚刚说了一句，一个助手叫嚷起来：“克里斯廷，因为他在这里你才能站在这里！我不懂你说的是些什么，什么个人的性命。

因为他，你才能活到今天，站在这里！”

又是一阵欢呼。克里斯廷有点紧张，她还期望琼斯想起自己全能的神力：“你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吗？”随后是琼斯疲倦的声音：我救过他们。我描绘了我的愿望，也运用了我的能力。可是现在这个世界不行。圣徒保罗讲过有的人生不逢时。

我就是生不逢时——我们大家都生不逢时。

我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证明就是离开这个该死的世界！

人们再也忍耐不住了，叫着、骂着，有人挣扎着要把克里斯廷拖离扩音器。一个老太婆疯子般要去把克里斯廷的眼珠挖出来，有人抱住了她的腰，她就在空中乱抓乱嚷：“你太怕死了……你到苏联去也干不出什么他妈的好事，这靠得祝”克里斯廷直发抖，孤注一掷地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愿意看着约翰死吗？”

琼斯叫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反问克里斯廷，要她回答，他琼斯会不会为了救约翰就牺牲乌贾拉：对于我，他就和我的随便哪个儿子一样。我们随便哪个人做的事都和我分不开。要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我会跟你站在一起。要是他们想来找你，他们首先得找我。……我喜欢你，我本人很喜欢你。你应该做个诚实的人。可是你没走。要是你想走，就跟他们一起走了。因为今天谁想走都可以走。我知道你不会走。

你的生命和约翰一样可贵。

一个年轻女人突然哭了起来：“父，我们都愿意，只要你说是我们现在得去死，我们都愿意。孩子们和兄弟们也都愿意。”

克里斯廷也终于自愿和兄弟姐妹一起行动了，再没人有异议。这时，

袭击人员从飞机场回来了。琼斯叹了一口气，对信徒们和卫生人员说：这事完了。仇恨太大了……他们追我们追了六千英里……请吧，把药给我们。这很简单。这不会引起痉挛。请吧，别太晚了。国防军很快就要来了。我告诉你们——快点、快点……别怕死。要是那些人来了，会折磨我们的孩子，折磨我们的一些人，折磨我们的老人……请吧，请吧，不能快点把药弄好吗？你得快点，玛希琳，我们还有四十分钟。

根据录音带里的声音，琼斯敦的集体自杀正式开始。在恐怖的哭叫声中，琼斯不断催促人们快死。他目睹了自己的信徒、情妇、妻子和儿子死亡，并留下最后的话语：哦，上帝，母亲们、母亲们呀，请你们、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吧。带着你们的孩子一起献出生命，但是不要这样……自由了……终于自由了……你说这种事以前没有过？历史上所有的部落都干过，所有的面临着种族灭绝的部落都这样干，他们一个婴儿也不弄到这个世界上来。凡是有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就把他杀了，忍耐一点……不管听见了多少叫声，不管有多少痛苦的啼哭声，这样去死总比再活十天要好一百万倍。成年人，成年人，我要求你们不要再惊动你们的孩子了，他们都要平平静静地安息。我们都是黑人，都是社会主义者，难道我们是别的什么人吗？事情已经完了，很好……快点，快点，我的孩子们。我们千万别落在敌人手里……快，快……现在再也没有痛苦了。我说，再也没有痛苦了。我们不让他们来夺去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献出生命。

吉姆·琼斯坐在中央大帐篷的椅上举枪击中头部自杀。几分钟后，他的私人护士安妮·穆尔用同一把手枪在琼斯的屋子里照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只有他俩是用枪自杀，安妮·穆尔是琼斯敦最后一个自杀者。

魂断“桃源”，集体自杀的过程和悲惨结局

一个年轻母亲直接把药倒进了婴儿的喉咙。很多人奇形怪状地抽搐。最后一名自杀者，琼斯的私人护士开枪自杀。又找到两名幸存者。尸首都变成了黑色，除了琼斯。琼斯坐在他的椅子上，周围是他的妻子、情妇、儿子和保安人员。九一四人中绝大部分死于自杀。第二年的一名自杀者。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点刚过。死亡天使——两名护士，首先登上了讲坛。她俩将氰化剂“伐力安”与果汁水的混合物放到一和矮折叠桌上。鲁莉塔·保罗——一个年轻的、抱着婴儿坐在最前排的母亲——没等人叫自己就站起来走向桌子。这位第一个自杀者拿起一杯毒药直接就把它倒进了婴儿的喉咙里，剩下的她自己就喝了。药效还没有发作，她抱着孩子走到帐篷外面等待死神到来。

第二个自杀者，米歇尔·威尔逊，她抱着孩子来到桌前同样做了一遍。

人们争相涌向放着毒汁的桌子，护士用扩音器发号施令：“站在过道里的人排好队，大家都从桌子这边转过去再往回走，行不行？没什么着急的。大家都安静点。

别让孩子们哭了。大人领着小孩，哄哄他们。别让孩子们哭，又不痛，就只有一点苦。

他们不是痛得哭。”

教徒们开始排着队往前走，有秩序地“献出生命”。当母亲拿起一杯毒

药自己喝的时候，有一个护士就拿一个没上针头的注射器将毒汁射进婴儿的嘴里。

有的人在喊叫，有的人在拥抱告别，有的人到处跑，找他们的家人。琼斯的一个助手用扩音器对自杀者说，死，不过是“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很舒服。

什么也没有这么舒服。我告诉你们，你从来也没觉得这么舒服过。”

然后，氰化剂的毒效并非像所说的那么轻松。尽管混合了防止氰化物引起剧烈痉挛的“伐力安”，可是很多人临死挣扎时还是痉挛得非常厉害，奇形怪状地抽搐。

死的人越多，凄惨的哭叫声也越大。一个叫艾琳·爱德华兹的黑人老太婆见状接过话筒说道：我就想给大伙儿说说，我瞧着到处都在哭。没什么好哭的。没什么好哭的。这事儿我们该高兴。你们应该高兴点。人家说，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该哭，走的时候就要安安静静地走。我看这事儿我们该高兴才对。你们应该高兴。我要谢谢琼斯，他真是辛苦又辛苦了。我在这里住了一年零九个月了。我一辈子也没过得这么好。我说的不是在旧金山，我说的是叫做琼斯敦的这个地方。我不要这条命了。我这辈子过得还不错嘛。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哭的。我们应该高兴！

一个叫德里克·沃克的小男孩，大约只有八九岁。人们叫他喝下毒汁后，把他抱到大帐篷前面的空地上。孩子开始抽筋，抽得很厉害，以至人们都抱不住他。他的眼睛往后翻，只看见鲜红的眼球。嘴里往外冒着浅红色的沫，好像是他的肺从口里翻出来似的，很可怕。他像是想哭，又哭不出来。孩子一面发抖，一面喘气，直至死去。

一个哥哥看见温柔聪明的妹妹的尸首后，笔直朝大帐篷走去，自己拿了一杯又回到妹妹尸体旁边，将毒药喝了下去。

大帐篷前面长满了青草的空地躺着横七竖八的尸体。琼斯的妻子，“圣殿之母”玛希琳的眼睛有一种神气，好像是在说，这一切太可惜了。

五十五加仑的一大桶毒汁很快饮尽了，两个卫生人员又抬来一大桶。琼斯说道：“放在这里，把氰化剂和‘伐力安’都放在这里。成年人可以开始了。”琼斯的心腹们拿着枪和弓箭监视着，任何人都很难跑出警戒圈。

一群十多岁的孩子正走向帐篷，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鼓励着“到了‘那一边’以后一定要互相会面”。他们那样子完全不像是去死，更像是在搬家。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去的地方可怕，而是因为要互相分手了，所以觉得很伤心。

在大帐篷里，一个年轻女人开始在一架电风琴上奏起葬礼进行曲，奏得断断续续，好像是从坟墓那一边来的声音。

渐渐地，琼斯敦变得异常安静了。突然，响起一声枪声——那是最后一名自杀者，护士安妮·穆尔开枪自杀。

只有两个幸存者，奥德尔·罗兹和斯坦利·克莱顿不想死，趁着混乱拼死跑入丛林。当他们向圭亚那人报告时，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圭亚那人开着直升飞机去看了，才敢相信这一切。当直升飞机飞临琼斯敦上空时，大帐篷外的尸首看起来都不像是些尸首，倒像是地面上的一堆发亮的废纸。就像是马戏团离开以后表演场地上丢下的一堆东西。

第二天，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九日黄昏之前，圭亚那军队进入了琼斯敦，除了尸体之外又找到两名幸存者。七十四岁的格罗弗·戴维斯爬进一口

干井躲过了集体自杀，八十岁的半瘫痪老太婆海辛斯·色拉西躺在床上被人们完全遗忘，她认为自己错过了跟兄弟姐妹一块儿死的机会是多么遗憾。

集体自杀时，琼斯用无线电通知了在乔治敦拉马哈园的“圣殿”成员参加自杀。

负责公共关系的莎伦·艾莫斯马上把三个小孩带进浴室，把他们杀了，又割腕自杀。

圭亚那警方立即扣留了其余四十六人，其中有包括琼斯的大儿子斯蒂芬在内的琼斯敦篮球队，许多人认为这只篮球队是一个暗杀组，要跟斯托恩夫妇、“有关亲属”、叛离者和其他各种闻讯赶来乔治敦的人算帐。琼斯派去送巨款给苏联使馆的卡特兄弟、普鲁克斯三人也被扣留。

罗兹和卡特兄弟三人自愿随圭亚那军队进入琼斯敦辨认尸体，罗兹回忆说：就算这些人的脸你都熟悉，认出人来也不容易。

个个尸首都胀得很大，有几个一翻就爆开了。要是尸首是脸朝下躺着，脸就变得跟那一块地印出来一样。

这可不是桩容易事。那儿天气又热。那股气味，加上天热，简直可怕。而且你还知道这股气味是从哪里来的，那你就根本没办法受得了。我每一回大约只能干一个钟头就得躲开。查到放所有的孩子尸首的那块空地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想去。我跟他们说了，孩子的尸首都在底下。可是我想没人愿意去拉开尸首看，反正我是不愿意。

有点叫人惊讶。个个人，不只是黑人，而是个个人，尸首都完全变成了黑色，验尸官告诉我们这是那种毒药的缘故。但是琼斯却不一样，他变成了他最恨的那种颜色，是白色。我想这是因为他是开枪自杀的。他像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最白的东西。”

由于尸体是一个叠一个堆起来的，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无法统计，圭亚那军队初步估计死者数目不会超过六百。美国陆军殡葬队十天之后到达琼斯敦，开始移走尸体。孩子们的尸体终于统计出来。实际总数为九百一十四人。其中九百一十二人死于氰化物中毒，两人死于枪伤。

琼斯坐在大帐篷正面的椅子上，头部有一个弹孔。周围是他的妻子玛希琳和大部分保安人员，还有琼斯敦的行政参谋人员，包括琼斯的情妇卡罗琳·莱顿和玛丽姬·卡萨里斯，还有琼斯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卡罗琳·莱顿生的基摩，另一个就是约翰。

通过辨认是否有水泡（水泡是皮下注射过氰化物的证据，可以假定是非自愿死亡），事实证明，除了很少几个极衰弱的老年人，九百一十四人中绝大部分是死于自杀。

到一九七九年，琼斯、琼斯敦和“人民圣殿”教成了两个大行业的活动主题。

一个是新闻业，一个是法院诉讼。

全世界涌出的记者淹没了圭亚那首府乔治敦，旅馆等供不应求。记者们大掏腰包，将幸存者等只要和琼斯敦多少有一点关系的人整天泡在酒馆中。全世界的电视、报纸和杂志，课堂和鸡尾酒会，都热烈地讨论着自杀、迷狂、心理控制、道义责任感等等等等，沸沸扬扬。

律师和法院、家属和政府热热闹闹：关于“人民圣殿”教财产的诉讼，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受理的总数就有二十起；联邦政府要向幸存者催讨悲剧发生后的旅馆和飞机票费用；许多死者的亲属，包括国会议员瑞安亲属，向

法院起诉要求“圣殿”赔偿损失；另一些死者家属反过来控告瑞安，要求赔偿损失；联邦政府，几个州政府，死者家属，还有几家私营公墓，展开琼斯敦死难者的埋葬问题大讨论，好像谁也不知道该谁来付埋葬费，尤其是几百具未能辨认的尸体，许多墓地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招人议论的死难者。

混乱中，一些资本家找到了把灾难变成现金的方法：“圣殿”的律师马克·莱恩宣称“要把琼斯敦的事告诉全世界”，坐着飞机在全国作旅行演讲；一部故事片和一部电视片迅速开机；一群经营娱乐生意的人，计划把旧金山市区里的“圣殿”旧址变成一处摇摆舞夜总会。

“敌人”和“同志”还在斗争，马克·莱恩认为中央情报局可能与瑞安之死有关系，而瑞安的助手反过来认为琼斯本人可能就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

拉里·莱顿被控策划谋杀利奥·瑞安，查尔斯·拜克曼被控在集体自杀的当晚在乔治敦拉马哈园协助莎伦·艾莫斯谋杀她的孩子。

一九七九年三月，迈克·曾鲁克斯，就是送一箱钱到苏联使馆的三个人之一，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德斯托市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竭力为“人民圣殿”教辩护，然后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开枪击中头部自杀身亡。死前把一份声明分发给记者，声明中论证了琼斯敦集体自杀事件应该由想摧毁琼斯敦的那些人负责，他还声称他无法适应美国这个国家的生活，这种生活的价值与他格格不入。

一九八二年二月，旧金山时期的“人民圣殿”教叛离者米尔夫妇和他们十多岁的女儿一起在家里被人暗杀。新闻界广泛传播“有一个‘人民圣殿暗杀组’”的传言。但警方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活着的“人民圣殿”教成员和叛徒都走向了各自的生活。

I “迷狂”的灾难：本世纪的重大宗教惨剧

一九九一年世界信教人数已达四十一亿四千万人。

日本“真理之友”教七女自焚。遍及世界的杀人献祭的“撒旦崇拜”。美国“大卫”教八十六名信徒葬身火海。日本“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投毒惨案。人就是人，上帝就是上帝，人不能成为上帝。人类不应该遗忘悠远的文明和人文精神。

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全世界蔓延起一股强大的宗教热潮。

世界范围的灵思运动从一九八四年起波及近三亿人，其中包括数百万罗马天主教教徒。圣母玛利亚也在美国、乌干达、南斯拉夫和菲律宾等地不断“显灵”。

美国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现在拖儿带女，返回教堂参加追求超凡能力的“新纪元”运动。

俄罗斯的十六万所学校重新开设宗教课，一九九二年底决定向国外招募人数为一点二万的“基督教和平队”，专门向俄罗斯青年传播福音。

日本神道教复活，甚嚣尘上。一位号称“日本神人”的高僧，在日本、美国和巴西拥有五百万信徒，其中百分之八十不是日本人。伊斯兰教在日本近来也传播甚广。

越南也兴起宗教热，一九九一年圣诞节许多越南人像疯了一般涌入天主教堂做弥撒。

一九八七年，摩门教到达了其一百五十八年历史中的最高水平，新增教徒二十七点四万人。一九九一年，信徒总人数达六百二十万，遍及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在非洲的南非，一种将基督教和祖先崇拜混合而成的非洲独立教派已拥有五百万信徒，另一种宣扬“神授精神”的神授教派如今拥有百万信徒。

世纪之末，宣告“世界末日来临”的“救世主”纷纷登场，吸引大量迷狂信徒。

所谓“一九九九年人类大劫难预言”不胫而走，使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

据中国《世界宗教资料》杂志，一九九一年世界信教人数已达四十一亿零四千万人，主要为：基督教十七亿零五千万，伊斯兰教九亿零三千万，印度教七亿零五千万，佛教三亿零三千万，新兴宗教也有一亿零三千万。

宗教热也给人类带了灾难。不同宗教间的冲突剧烈，如阿以争端、黎巴嫩内战、波黑“内战”、印度的锡克教和印度教冲突等。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间的冲突也酿成持续时间很长的惨剧，如两伊战争、阿富汗内战等。还有信仰与世俗的冲突，如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惨案、对《撒旦诗篇》的喊杀风波。本世纪不断陷入宗教纷争迭出的刀光血影之中。

自从琼斯敦惨案以来，出现了很多像“人民圣殿”教这样的一些新兴迷狂宗教，酿出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惨剧：一九八六年日本“真理之友”教七女自焚。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清晨，人们在日本和歌山市郊区的沙滩上发现七具被烧焦的女尸。七人都是日本新兴宗教“真理之友”的信徒，为了去“天国”护侍在前一天去世的教祖和寻求通往天国的道路，相约聚集到海滨，然后以灯油烧身，集体自焚。七人除教祖的妻子和岳母外，其余五人均为二十五岁至三十七岁的年轻妇女，生前都有较为理想的职业。“真理之友”教祖宫本清治早先是日本国铁的一个小职员，辞职专门从事宗教活动，一九七七年六月正式创立“真理之友”教，该教奉“创造天地，造化万物之神耶和華”为主神，教导信徒要“清心寡欲，追求精神价值，走正确的人生之路”，“死后便可升入天堂”。教堂在教祖家中，有信徒一百二十多人，其中六十人有亲戚关系。自焚的五名女子都是“神的新娘”，几乎是很小就与教祖生活在一起。人们认为，这可以说是一起追随“父亲”之后而去的“家族”集体自杀。一九八七年韩国“五大洋天国”三十二人自尽，亦是迷狂的新兴宗教信仰所至。

一九八八年起遍及世界的杀人献祭的“撒旦崇拜”。“撒旦崇拜”的仪式是所谓“黑弥撒”，标式为倒悬的十字架和两个尖端垂直向下的星（表示指向地狱），点燃黑色蜡烛，用的“圣餐饼”是用腐尸、人类和女人的经血做成，念的祷文是按拉丁文本的祈祷文倒着念，仪式为十三人一组。一九八九年四月，墨西哥有十三人在“撒旦崇拜”的仪式中被当作活祭杀害，除一名遭枪击，一名被滚水煮熟而死外，其他则是活活被虐待而丧生。在德国，估计至少有一万名活跃的撒旦信徒，一九八八年万圣节前夕，一名十六岁的少年被他的好朋友用刀刺死，凶手称：“我觉得撒旦进入我的心中，命令我把自己的好朋友杀掉。”在澳大利亚，一九九一年十月，发生了“撒旦”教杀食儿童事件，仪式上居然有大学教授、警察、律师和医生参加，一位母亲说，她的女儿目睹一儿童被杀死后剁成几块在锅里煮，并被强迫吃人肉；一

位父亲说：“孩子们称他们被强行带进那座神秘的建筑，被强迫与另一些孩子淫荡。”一个“撒旦”教女信徒称，她曾将六个孩子中的五个用于献祭，她说：“死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来自死亡的全部力量。”

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美国“大卫”教八十六名信徒葬身火海。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美国警方因“大卫”教教主考雷什长期蹂躏少女、暴敛钱财、吸毒成瘾等罪行，突袭德克萨斯州韦科镇以东十六公里处的“大卫”教聚点卡尔梅山庄。因“大卫”教教徒用重机关枪等强大火器拼死顽抗和山庄内有不少妇女儿童，警方将之围困五十一天之久。五月一日，警方发起最后攻击：“大卫”教教徒点燃大火，以考雷什为首的八十六人葬身火海，其中包括十七名十岁以下儿童教组织，教主考雷什自称“大卫”、先知和战神，掌握着通向天国的奥秘，其人喜爱摇滚乐，经常边弹吉它边讲道，拥有多名情妇。不仅美国，还有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信徒投到其门下。近几年，考雷什称：“如果圣经所述是真，那么我就是基督。”不久前，他又称一年后即是世界末日，号召教徒们要进行一场战斗方可进入天国，并置办大批武器。他还不断让教徒观看他喜爱的《野战排》等几部越战影片。

惨案之后，克林顿总统称，是他批准警方的行动的，他认为考雷什是一个“危险、非理性、可能已经疯狂”的人。大火中幸存的九个教徒则否认上述说法。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日本“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投毒惨案。三月二十日八时二十分，东京发生历史上常见的地铁毒气事件，造成十人死亡，五千五百一十人中毒，其中垂危者十六人，严重中毒者三十七人。当时正逢东京地铁高峰时间，筑地、霞关、神谷丁等十七个车站相继出现异常气味，不断有人中毒倒地。人们纷纷逃出车站，东京顿时混乱，直升飞机、急救车、警车四下出动，市区交通堵塞，东京在恐怖中度过了一天。经调查证实，事件是“奥姆真理”教将含有“沙林”剧毒物质的液体置于车上引起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一九五五年生，一九八五年创立该教，利用罩上神秘色彩的“超能”发展组织，十年来，该教进行了包括绑架、监禁和放毒在内的大量罪恶活动。据报道此次投毒中竟有硕士生等高学位年轻人参加。村山首相要求国民继续保持警惕，并表示将依法取缔“奥姆真理”教。

五月十六日，麻原在他的一个秘密别墅被警方抓获，六月六日，日本检察当局以杀人、杀人未遂等和杀人预备罪对麻原等十六人正式提出起诉。

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人类被大气污染、温室效应、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爱滋病与吸毒等不祥之灾围困，开始怀疑工业革命和高科技所造就的“当今世界”，出现“信仰危机”。人们又重新极力寻找上帝。然而，“迷狂”又成为一种新的灾难。

人就是人，上帝就是上帝。人不能成为上帝，代替上帝。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信仰绝不是迷狂、仇恨和暴力。

人类在反思“当今世界”的同时，不应该遗忘悠远的文明和人文精神，唯其如此，人类才能走出各样现代困境。

在人类探索的道路上，应该有这样一只路标：“琼斯敦——灾难，不能前行”。

天才的危害

80年代至现在：计算机病毒蔓延全世界

概况：一九八三年，计算机病毒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短短十三年间，这个幽灵出没于世界各地，所到之处无不留下灾难般的痕迹。迄今为止，已发现的病毒计有八千五百余种，且仍以每天产生六千一百一十种新病毒的速度递增，令人们谈病毒而色变。人们将计算机病毒称之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隐患”，“不流血的致命武器”，它的出现完全有可能改变人类的未来，成为常规武器之外的又一种新式武器。

为了控制盛产石油的海湾，Y国军队正向沙特阿拉伯推进。

正当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准备发起一场沙漠风暴式的反击行动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计算机系统受到了来自浩渺网络空间的无形攻击。电话网和供电网被敌人通过互联网络放置的“逻辑炸弹”摧毁了，把银行和金融系统搞得乱七八糟，使飞机坠毁，火车相撞。当美国领导人试图寻找混乱根源时，历史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却陷入了瘫痪。

这幅末日场景是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和企业界领导人最近努力对付的、五角大楼举行的史无前例的演习的一部分。

灾难时间定在二 年。

这绝不是凭空幻想、杞人忧天的故作惊人之语，甚至也许不用等到二年，当人们还在为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发展的快捷、便利齐声叫好时，危险已经潜伏下来。

计算机和互联网络的巨大优势隐藏了致命的缺陷，对计算机的依赖越高，则危险越大。这项致命的缺陷就是——计算机病毒可趁虚而入。

计算机病毒犹如瘟疫一般，从问世之初便遭到专业人士的唾弃，但它的巨大破坏性和特殊性都极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有可能是商业上的窃取机密，有可能是制造一场社会骚乱，甚至有可能是一场战争。

但是，计算机病毒的危害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都未得到应有的、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和美国政府、企业界领导人近几年对此的忧心忡忡恰成对比。人们往往看不到近在咫尺的危险，要等到危险来叩门甚至登堂入室才会幡然猛醒。人们已经为他们的短视、粗心和自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且这一愚蠢的态度似乎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历史。

计算机病毒是以一次前所未有、引起举世震动、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并影响了历史进程的病毒案件唤醒人类麻木的神经的，科学家和有识之士的预言变成了现实，终于使人们意识到那小小的计算机屏幕在给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的同时也是一个看不见的杀手。

这次计算机病毒案被命名为“莫里斯蠕虫案”，是以其制作者，一个“天才”的二十三岁青年的名字命名的。

灾难的黑色星期三

短短几分钟之内，全美各地的计算机纷纷屈服在这病毒的威力之下。

入侵者启动一个小程序，从网络的另一端把病毒的全部人马引入电脑。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傍晚。

这是一个晴朗的初冬的黄昏，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学子在这段时间通常三三两两地在优雅迷人的校园中散步，柏克莱分校远近闻名的校园风景给了他们饭后的闲暇，以消减一天紧张学习后的疲惫。即使是在初冬，这儿的景色仍是风光宜人和赏心悦目的。只有一个人例外，工程系学生菲尔，他惦记着下午未完成的一项研究课题，打算趁这段实验室空闲的时间再核对几个数据。

他匆匆走过散漫悠闲的人们，心里想着自己的实验。他没有料到，自己将成为一次举世震惊的计算机病毒事件的第一个目击证人。他像往常一样进入学校电脑中心的一台升阳电脑工作站，可是这一次他突然感觉到有点蹊跷。

升阳工作站能同时运行十个程序，因而菲尔习惯每隔一段时间注意一下哪些程序正在运行。然而这一次，他却发现一个极不寻常的程序隐藏在众程序中，悄悄地动作，控制者是一个叫“戴蒙”的人，怪的是，“戴蒙”通常不是人名，而是一个躲在屏幕背后处理日常工作的公用程序。“也许又是什么人想进入柏克莱的电脑系统吧？”菲尔心想，对此他早已司空见惯。

这个程序不断地敲着柏克莱的电子之门，在菲尔消灭一份拷贝的同时，却有更多的拷贝蜂涌而入。事态开始失控。这个病毒消耗了越来越多的电脑计算时间，柏克莱的电脑相继减速、停顿、瘫痪。尽管工作站会在瘫痪之后自动恢复运行，但它们一开始运转又立即被侵犯。电脑病毒侵入了柏克莱校园。

事情远未到此结束，灾难性的打击接踵而至。就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全美各地的电脑纷纷屈服在这病毒的威力之下。下午六点三十分，位于圣塔莫尼卡的兰德公司（美国著名的国防政策研究所）的电脑管理员发现他们的电脑极不正常，有一个程序使机器速度减慢到几乎停顿。五十五分钟后，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慧实验室的电脑被袭。与此同时，病毒侵入了马黑兰州大学的电脑，然后是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墨西哥州著名的罗沙拉摩斯实验室。这些人面对一部部瘫痪的电脑一筹莫展。不久，他们又发现，这程序的“胃口”并不局限于此。他们在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艾姆烈研究中心的电脑上发现了它，他们在圣地亚哥分校的电脑上也找到了它，甚至劳伦斯·利物墨国家实验系统（全国最主要的武器实验室）的管理员也报告了灾情，不得不于第二天召开记者会，公开叙述事件的经过。这个病毒显然已经遍布了美国最大的计算机网络 Internet 网。

这个病毒程序一旦进入一台电脑，就像生物病毒一样又潜入其他机器。在有些机器上数百份拷贝同时运行，使电脑几乎停止。如果碰上一台电脑无法突破，它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试图进入的指令，严重影响了电脑运行，就算被消灭了，它也会在一瞬间再次出现。更神秘的是，一旦进入系统上，这程序就能找到其他电脑作为下一个破坏目标。那天晚上这个可怕的程序在全国网络内纵横出入，每到一次就兴风作浪。

管理这种供大学和科研机构使用的全国网络的专家并不是无能之辈，多年来他们已作了充分准备以对付各种突发事件，也在理论上阐述过病毒程序侵入网络的可能性，可是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的傍晚，没人知道如何

对付这规模空前的入侵。

据事后的新闻报道，由五个计算机中心、二十二个地区节点以及联接政府、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二十五万台计算机组成的 Internet 网络（其中包括三个主要网络：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军用网络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网络）同时遭到了病毒袭击，计算机系统受到重创，网络陷于瘫痪，部分机密的军用计算机系统不得不脱离网络。

军方在马里兰州的弹道研究实验室也被突破。工作人员怀疑入侵者来自另一个国家，担心军方的机密会经由网络被盗出，更担心这可能是一个特洛伊木马式的程序——貌似无害，却像一颗暗藏指令的定时炸弹，在特定时间执行某个毁灭性的任务。为了防范未然，弹道实验室的首席程序员穆斯，在三日早晨十点下令把电脑撤离互连网络。他决定让实验室的电脑脱离网络一星期。

事实上，不少其他机构早已撤出。

把电脑撤出网络当然能防止病毒的侵入或传染，可是对于习惯电子通讯的人来说却相当不便，因为那等于切断了联络通道，这些以电脑网络为唯一通讯方式的专家们，几乎忘了他仍还能用电话联络，可是就算想到了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极少交换电话号码。

经过初步查明，病毒程序攻击的是 UNIX 操作系统，主要目标都是升阳电脑公司和迪吉多公司的电脑，也就是全国互连网络上最常用的一种。

美国国防部紧急行动起来，当天就成立了一个应急中心，负责处理这起计算机病毒“袭击战”，协同全国数千名计算机专家进行网络的消毒工作，并对之展开调查。他们特地请来了开发 UNIX 操作系统的两位工程师：波斯蒂克和卡尔斯，他们是柏克莱大学的教授。波斯蒂克和卡尔斯把病毒看成是对自己名誉和尊严的挑战，没有国防部的邀请，他们也已开始着手对之的反击。

在以后的时间里，柏克莱大学成为此次反病毒事件的“大本营”。

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 UNIX 的诞生地正是柏克莱。波斯蒂克以前曾多次处理过外部入侵的事件，可是这一次却非比寻常。

这一次，他心中也没有底。

到此时，这个程序已侵入了至少三十个柏克莱的工作站，看起来它似乎是个很有眼光的怪兽，最爱攻击与大量电脑相连的电脑。它的入侵方式简单快速而有效，有两种电脑是它的重点目标，一台叫 CSGw，是接通柏克莱军校园网络和当地区域网络的通道，在几十份病毒拷贝侵入后就陷于瘫痪；另一台叫 UCB-VAX，是通向 Internet 网络的一个主要出入口。对病毒程序来说，UCBVAX 显然是个战略要地，占领了它就能同时进攻数十台电脑。因此，UCBVAX 持续不断地遭到进攻。可是，波斯蒂克不愿意把它撤出网络，那就意味着失败，同时也丧失了观察病毒并战胜它的机会。波斯蒂克和他的同事决心保持网络联系，同时设法消灭病毒。

要完成这个任务，一个办法就是设法趁程序快跑时拍下它瞬间闪动的指令，然后加以分析，从程序的原始码研究出病毒的特性。柏克莱的专家很快查出，它是利用网络上一个通讯程序的细微缺陷来实现破坏之功能。这个叫“Sendmail”的程序能通过网络在电脑之间传送信息和数据，可是它有两个貌似无害的特性结合在一起却相当可怕。一个功能是，它可允许使用者把程序隐含在电子信件的信息中，使电脑把信息误以为程序而加以运行。第二

个功能，是它可以让程序员在必须帮程序消除错误时检查网络各处的通信联络口，因此借由这个功能自然也能让人从远处的终端启动第一个功能，一旦第一个功能被启动，植入电子信件里的程序就能立即在另一台电脑上运动。这两个功能的结合鲜为人知，却是个致命的漏洞。此号病毒的设计者就是利用了这个漏洞把一个小程序送上网络。占据一台电脑后，这个过程就无止境地重复直至电脑瘫痪。不过这个程序看来并不想销毁数据。它检查电脑内信息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寻找进入其他机器的途径。但柏克莱的科学家们仍不敢掉以轻心，所有的程序员都集中到两个单位的机房里并肩作战，他们一直工作到星期四凌晨四时。

星期四，十一月三日一早，柏克莱的电话就响个不停。这些电话来自全国各地愤怒的电脑管理员，要求知道如何对付病毒。

这些人的语气都不怎么客气，而国防部的管理员更是又气又怕。

他们问波斯蒂克知不知道谁是罪魁祸首？有没有发现柏克莱 U-NIX 有漏洞？能否保证病毒里没有特洛伊木马的隐患？柏克莱是否计划将病毒分解研究？

早晨八点，继柏克莱向整个网络发出的第一份通告：“我们被病毒入侵。圣地亚哥分校、劳伦斯·利物墨、斯坦福以及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艾姆烈中心也同时被袭。”之后，波斯蒂克发出“病毒报告第二号”——修改“Sendmail”程序的第二方案。”

至于东岸，形势则和柏克莱一样艰难。麻省理工学院的程序员已经奋战通宵。

那天中午，他们向柏克莱通报了病毒进攻的又一种武器：“Finger”程序的漏洞。

病毒的先锋向“Finger”传送超出其容量的数据，从而逼使它瘫痪。一旦占领内存，入侵者就启动一个小程序，从网络另一端把病毒的全部人马引入电脑。

波斯蒂克对麻省的报告半信半疑——“Finger”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程序，一个才五十行长的程序不会招致如此恶果吧？但他错了。麻省理工学院寄来一个证明“Finger”漏洞的简单程序。于是波斯蒂克立刻在当天寄出了“病毒报告第三号”：“Finger”程序的修改方案。

即使如此，波斯蒂克和他的同事仍面临着巨大的难题和繁重的工作量：必须一行一行分解病毒程序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幸运的是，全世界的 UNIX 专家恰好在柏克莱召开年会。在一年前的 UNIX 年会上，股票市场经历了“黑色星期一”的大震荡，这次轮到 Internet 网络了。波斯蒂克请到了全国最杰出的 UNIX 专家特里克，来自犹它大学的编译器专家西里和甚至在读大学期间就被视为解译天才的比埃尔。波斯蒂克信心十足地开始了他对病毒的下一轮反击。

校园里的 UNIX 年会十分热闹，人人都在谈论前一天晚上侵入的病毒。有些原计划在星期四早晨赴会的专家不得不取消行程——他们必须坚守岗位与病毒战斗。即使是到会者也无心钻研“UNIX 加上 NPROC 等于三千”和“MACH 的内核化”之类的课题了。特里克和西里早已离会参加病毒的解译，一到休息时间其他人也涌进机房询问进展情况。他们看到程序员一边工作，一边以比萨饼充饥。

就这样，在美国东西两岸，柏克莱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程序员联手向病

毒展开攻击。除了团结合作外，这两所高等学府也在争强好胜——他们都想采用自己的方法首先获胜。与此同时，在全国互联网络上有数千的科学家或者电脑管理员等着他们的解毒报告，以便让处于瘫痪状态的电脑恢复正常。

又是一个紧张忙碌的日昼和一个不寐的夜晚，到了次日凌晨四时，程序主结构已经相当明朗——这个病毒显然并没有销毁电脑程序和破坏网络的恶意。星期五早晨，波斯蒂克向全国网络发出了第四份，也是最后一份病毒通报。全部程序解译完成后，柏克莱立即向国防部送了一份程序明码。但有一个问题立刻引起争论：是不是应该在网络上公开病毒程序的原始码。波斯蒂克和他在柏克莱的同事们坚决反对，他们可不愿让哪个学生抄下这程序找个网络来运行。也有人反对这种独裁态度，但波斯蒂克十分坚定。在他看来，在网络上公开程序原始码就像是在大街上分发机关枪。

不过波斯蒂克也表示，对有关程序功能和危害的细节，他们绝不保留。他的立场得到国防部的赞赏柏克莱大学终于又恢复了它自建校以来的老传统：平静和有秩序。

已是连续四十八个小时未合眼的波斯蒂克这才感觉到疲惫，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在与病毒搏斗的两天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谁，是这个病毒的制造者？他（她）对 UNIX 的熟悉程度以及天才般的计算机编程能力让波斯蒂克不止一次地发出惊叹。波斯蒂克回想起刚才与国防部那位老兄的通话，当他问起病毒作者其人时，这位国防部官员吞吞吐吐、语焉不详，而且匆匆放下了电话。波斯蒂克的好奇心大大被激发起来。不仅是他，整个社会都对此极为关注，这位神秘的作者是谁？

秘底很快就被揭穿了。

孤僻少年的“天才”创造

“电脑病毒作者是国家安全局数据保安专家之子。”

是无心的错误？还是国家安全局的秘密实验失控？

充当揭露秘底这一角色的并不是美国国防部，而是新闻界，这在美国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新闻记者灵敏的嗅觉和职业上的便利往往使得他们比墨守成规的政府官员抢先一步，这次也并不例外。只是，这一次的起因是一个匿名电话。

十一月三日下午，《纽约时报》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并不想揭露谁是此次网络病毒的制造者，只想让报社知道制造者是一个好心人，他只是在编写程序时犯了一个错误才酿成大祸。

接电话的是国内新闻编辑部的一名编辑，他马上敏感地意识到一个爆炸性新闻已主动找上门来。

“请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会请人给你回电。”编辑说。

编辑把情况告诉了报社的电脑记者马可夫。马可夫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此事——三日上午十点钟他接到了斯多的电话。斯多是柏克莱的天文学家，一年前曾协助当局破获西德的一个电脑犯罪集团，也就是在对此案件的采访中，马可夫与斯多建立了友谊。

无用讳言，马可夫从这段友谊中获益颇多，这一次计算机病毒入侵事件也不例外。斯多告诉马可夫他整夜都在和这病毒斗智，该病毒已经破坏了他所在的天文物理研究中心的五十台电脑。

放下斯多的电话，马可夫立即打电话给各大学和研究所了解情况，又打电话给国家安全局一位朋友，他是电脑保安方面的首席科学家，可是那人不在。

无论马可夫找的是大学、研究所还是军方，都没有人说得清病毒的来源。有人猜病毒的作者是个天才顽童，也有人咬定他是敌国间谍。马可夫对这个匿名电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拨通了那个波士顿地区的号码，发现自称保罗的接电话者对这病毒程序知道得不少。听起来很激动的年轻人说，他是那“伟大”作者的朋友。作者只想写个无害的病毒，只是因为一个小错误才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接连两天，保罗和马可夫又交谈了多次。保罗称病毒作者为“X先生”。他们开始讨论这“X先生”究竟会碰到多大的麻烦。

关于这程序的报道已经遍布报纸头版和晚间电视新闻，有的称它为病毒，也有的称其为“虫”。这是全国电脑网络第一次遭到大规模袭击，连军方电脑也受到影响。尽管病毒已被控制，可是造成的损失却无法估计。

但是这一次保罗犯了个大错。在谈到“x先生”时，他习惯成自然地称他的朋友为“rtm”，他的姓名缩写。马可夫直觉到，作者极有可能把“rtm”作为自己的电脑进入名。一放下电话，他就查询了一个网络“电话簿”，果然找到了线索，以“rtm”作为电脑进入名的是一个叫罗伯特·泰潘·莫里斯的康乃尔大学的研究生。

可是，他无法肯定这个大学生就是保罗所说的“rtm”。

突然，马可夫脑海里灵光一闪，他的那位国家安全局的朋友叫鲍勃·莫里斯。

两个莫里斯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呢？他又打了一个电话到国家安全局，这一次终于找到了这位电脑保安的首席科学家。他滔滔不绝地叙述了自己的发现，提到了罗伯特·泰潘·莫里斯的名字，也委婉地道出了自己的猜测。

电话另一端的沉默似乎有一个世纪那么长，马可夫听见自己的心脏在不规则地跳动。终于，鲍勃·莫里斯有了反应。

“这不是巧合，他是我的儿子。”

十一月五日，星期六，《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刊出：“电脑病毒作者是国家安全局数据保安专家之子。”报道详细叙述了马可夫的发现经过，马可夫一夜成名。

第二天的报纸上出现了父子两人的照片，鲍勃长发遮住了脸部看起来像电影里的科学怪人；而罗伯特穿着整洁的学生制服，站在父亲身边仍然显得拘谨和腼腆，怎么看都不像这起恶性计算机病毒入侵案件的主谋。

最初，全国新闻界集中报道病毒对军方电脑的破坏程度，（纽约时报）的石破天惊无疑是一个转折点，一个电脑安全专家的儿子设计出绝妙程序使全国电脑瘫痪于片刻之间，还有什么故事更能激动人心呢？尽管总统大选就在下星期二，新闻界仍然对病毒事件穷追不舍。说实话，新闻界对连续几个月报道总统大选也已经厌倦了，他们需要新的热点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再没有比这起电脑病毒案更好的题材了。

《纽约时报》把罗伯特·莫里斯塑造成了一个科学天才不小心铸成大错，但别的报社所持的观点不一，《芝加哥论坛报》的专栏记者甚至建议判罗伯特重罪入狱。

所有媒体记者纷纷使出浑身解数，采访电脑安全专家和电脑工业的主管作深入报道。

当罗伯特的名字出现在报端时，认识他的人并不惊讶。因为他在十四五岁时，已经能在电脑上伪装成超级用户利用自己发现的 UNIX 的缺陷进入他父亲以前工作的地方：贝尔实验室并修改那儿的档案，让他父亲的同事又惊又气。他们“感谢”罗伯特指出了电脑现存的安全漏洞，但也命令他就此住手。

很难说是家庭浓厚的科学氛围对他的熏陶，还是天生就具备的特殊天赋，罗伯特从小就与旁的小孩格格不入。旁的小孩感兴趣的事他往往不屑一顾，有一次他甚至向妈妈抱怨自己像个“怪人”。安妮和鲍勃明白那是因为罗伯特远比同龄人聪明，可是小罗伯特却不明白，甚至为此苦恼。但是他迷上电脑的入迷程度让鲍勃都吃惊。

只要鲍勃一离开家里的那台终端机，罗伯特就占据了座位。而一打开电脑，小罗伯特就完全进入了奇妙诡异的电脑空间，似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由于在电脑前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罗伯特变得更加孤僻和畏羞了，他只有唯一的一个好朋友，是他在网络上交的，一个实验室科学家的聪明女儿珍妮。两家相距并不远，但他俩仍然在电脑上“交往”了一年才见。这不能不说是典型的罗伯特风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上大学。

罗伯特进入了久负盛名的哈佛大学，他仍然不擅社交，但他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去被接受——爱肯计算实验室。爱肯实验室的管理员对 UNIX 系统所知甚少，而罗伯特却是 UNIX 的专家。

他常常坐下来拿本 UNIX 说明书读上几小时。UNIX 的说明文件有二千多页，每一页上有一系列关于操作系统的细节。绝大多数人只在需要时才查阅这些说明书，可是罗伯特却像读科幻小说似的看得津津有味，并且通读过所有的 UNIX 原始码。很快他就在爱肯出名了，被公认为校园里最精通 UNIX 的专家，只要他在机房，别人就懒得查 UNIX 说明书——直接询问罗伯特方便得多。除了电脑方面的不断深研之外，罗伯特在交往方面也有所进步，他结交了几个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包括前文提到的保罗。

保罗·格拉汉姆。

大学毕业之后，罗伯特认为自己应该在电脑方面有更多学习和实践的机会，他申请了康乃尔大学的研究生。康乃尔大学是著名的电脑理论中心，正好可以弥补罗伯特容易被机器细节吸引而忽略理论基础的缺陷。他很快获得了录取离开了哈佛的友人们，在康乃尔大学，罗伯特又陷入了孤独，对很多事漫不经心。

他在电脑上花了更多的时间，但没有认真学习课程，晚交的第一篇论文分数平平。如果一件事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就断然拒绝。在康乃尔，罗伯特很快就被认为是一个出色而又寡言的程序员，在课堂里远离其他人而坐，也婉言谢绝在周末晚上和教授、同学到酒吧谈天的邀请。但他充分利用了康乃尔的其他条件，参加了一门登山课，加入系里的曲棍球队，又在合唱团练唱。

电脑病毒的问世始于八十年代早期，首次出现在苹果二型的电脑上，但直到目前，都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罗伯特一接触到这个领域就被迷住了，这是个十分有趣而前景诱人的课题，因为它有一层神秘色彩，而且和生物学

常识非常相像。病毒程序能感染电脑，“疫苗”程序能抵御病毒。一般人都以为所有的病毒都是有害的，它们都能销毁数据。但内行人知道并非如此。事实上，人们可以写出丝毫无害却在电脑间反复穿行的程序。

这就是罗伯特的目标。他决定设计一个难以追踪的程序，在数千台电脑组成的电子宇宙中穿行，一声不响地渗透到每一个角落，而这个程序又能自我防御坚不可摧。他早就知道了柏克莱 UNIX 操作系统上“Sendmail”和“Finger”的漏洞，两年来他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一九八八年十月初，罗伯特已经在认真考虑这个程序了，程序的目标是渗透到尽可能多的电脑。十月十五日，他写下了程序纲要，列出了二十多个要求，包括：“目标：感染每一个以太网上的三台电脑。利用机器的空闲时间工作。避开速度慢的电脑。检查主机表，寻找通往其他网络的出入口，然后找出那个网络上的主机。偷到它的密码档案，破解它，然后再重新运行。”

在罗伯特看来，这是个完全无害的计划，可以测试网络的安全性。但罗伯特从没有想过，破坏分子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摧毁整个国际电脑网络。

在罗伯特的计划中，病毒将通过“Sendmail”和“Finger”漏洞进入电脑，然后在系统里寻找其他病毒拷贝。找到了，两个病毒将互相联络然后决定下一步行动。

理想的情况是一份拷贝会自动停止运行，以控制繁殖速度。为此，罗伯特根据随机性的原则设置了一个“电子硬币”以决定哪份拷贝将停止运行。

但是就是这个环节铸成了大错。后来的研究表明：已经占领电脑的病毒和新到的病毒之间的对话难以顺利展开，因为倾听程序运行时间太短，来不及听到新病毒到达后的宣告，使得每个病毒都以为自己是那台电脑上的唯一拷贝，罗伯特苦心设计的“电子硬币”根本用不上，计划中一半病毒的自我销毁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发生。

随后的几周，罗伯特一直在完善他的设计。十一月二日下午，他编写了病毒程序的最后一部分。他于东部时间十七点三十分完成了工作。一小时后罗伯特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慧实验室的电脑，从那里下达了释放病毒指令，随后便出去吃晚饭。

从罗伯特发出命令的那一瞬间，病毒程序就开始极速扩散，几分钟内它已经遍布网络，使无数电脑互相传染，传播得最快的是相连的 UAX 或升阳电脑。在罗伯特用餐时，数十份病毒拷贝正蜂涌而入一台电脑并霸占计算时间，造成电脑运算速度减慢，直至瘫痪。

吃完饭后，罗伯特原想回家的，可是他忍不住回到办公室观察程序的进展。他进入了系统，可是电脑毫无反应。糟糕！他的病毒已经完全失控了！

计算机病毒的入侵被控制住之后，在电脑学界，这个病毒触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大讨论，报纸上三天两头就有人发表有关病毒程序的分析文章，计算设备协会的技术刊物《计算设备通讯》还特别出了一份特刊分析这个程序。评论家们意见不一，有的说这个程序“程度平平”，也有的认为“非常出色”。经过事后的统计，入侵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接近一亿美元，但也有人反驳说，罗伯特此举恰好提醒电脑企业界注意电脑的安全问题。

至于病毒影响了多少电脑也无定论。麻省理工学院估计约有六千多台电脑被感染，占当年 Internet 网络上电脑总数的十分之一，但有的证据显示数目可能大得多。

专家们甚至争论起这个程序到底是病毒还是“虫”。尽管莫里斯和他的

朋友称程序为病毒，但多数的人认为程序更像个电脑“虫”。因为“虫”靠自己的力量爬行，而病毒却利用其他程序施威。在生物学界，病毒是个只能在客体内成长繁殖的传染源。严格地说，由于罗伯特的程序不需要依靠另一个客体程序繁殖，也不修改或销毁任何程序，因此它更像“虫”。但一些电脑科学家持反对意见。例如麻省理工学院两位曾与这程序搏斗的科学家，便撰文建议称它为病毒，因为程序功能与生物病毒的特性十分相似。但最后“虫”的说法仍然占了上风。

在“计算机蠕虫——一份给康乃尔文大学教务长的报告”中专门就此程序的性质作了探讨：“这个恶意程序既然复制了自己，而没有一定要将其附在宿主程序上来完成复制，因此，技术上它应被称为‘蠕虫’。严格地说，它不是一个网络蠕虫，而是一个主机蠕虫，只是通过网络传播罢了。这个网络本身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都一直在正常运行着。”这个性质的界定在目前看来是对罗伯特·莫里斯的程序最权威性、最公正客观的看法。我们的理解是“蠕虫”仍然是病毒的一种。

普度大学的斯伯佛德教授原是位软件工程师，他在全国各地周游讲演，谈论电脑病毒、电脑安全和他所观察的道德问题。他声称罗伯特的行为违反了学术界相互信任的传统，因而不可原谅。非法侵入就是非法侵入，无论是通过暴力还是程序。

关于电脑病毒的争论并不局限于学术界。对电脑一无所知的大众也开始担心新技术会不会被罪犯利用。几乎每个人都吃过电脑的亏，比如银行存款转错了帐户或者预订机票却订错了班次。

但很少有人想到出错的，并不是电脑，而是设计或使用电脑的人。有人辩论到，要是不从重处罚罗伯特·莫里斯，那么比罗伯特阴险的罪犯以后就能肆无忌惮地制造病毒软件欺骗银行，破坏空中交通控制，甚至引发战争。

至于罗伯特制造病毒的动机，也成了争论的热点。罗伯特拒绝接受采访，记者们就充分发挥了想象力。有人怀疑罗伯特的动机阴险，他们认为罗伯特一定是满怀仇恨才制造病毒破坏。还有人想得更远，一口咬定这是阴谋。既然罗伯特的父亲是全国著名的电脑安全专家，又为开展电子间谍战的国家安全局服务，这会不会是国家安全局的秘密实验失控，而推出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学生来承担罪责？但事实并非如此。罗伯特从没想过靠侵入电脑发财或者窃取国家机密，正如事后在法庭上他的辩护律师所说，“病毒程序没有砸坏一台机器，没有读任何人的私人文件，没有偷盗任何信息，更没为莫里斯先生赚一块钱。”确实如此，罗伯特只是继承了父亲传下来的学术传统。

但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一个对社会造成近一亿美元损失的灾难决不能因为当事人的出发点不是恶意而一笔勾销。罗伯特·莫里斯已经触犯了法律，这是当时的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他面临着被起诉并判重罪的危险。不过，罗伯特及其全家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勇敢地迎接了这一挑战。

一九八四年，为响应公众要求更多电脑保护的呼声，国会首次把非法入侵进入电脑系统定为犯罪。一九八六年又通过了修正案，所有非法修改销毁或者公开数据的行为也属犯罪。但直到一九八八年，这条法规还很少被使用，只有一起案例曾沿用此法作成判决。不少人批评这条法规过于笼统、含糊，没有准确定义“进入”和“非法”之类的概念。尽管如此，这也是美国国内关于电脑入侵案件的最权威、最专门的法律了。罗伯特聘请了律师古得玻尼，当他得知罗伯特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条法律时并不奇怪。古得玻尼很

喜欢罗伯特——这是一个聪明而不骄傲的年轻人，古得玻尼从未见过如此单纯的二十三岁的大孩子。他也喜欢这案子的性质——律师很少能用上从没有被解释过的法规。再说，这件案子会使他的知名度大增。他决心为罗伯特无罪辩护。

只是，古得玻尼对电脑专门知识近乎一无所知，这似乎有些不妙。不过，这是全国第一起电脑病毒案，要想找到一个既精通法律条文又熟悉电脑的律师是不可能的。

全国舆论界对此案的进展一律表示关注。但司法部对这一案件久久未表态，使得案子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僵滞的状态。这个嫌疑犯制造了八十年代最大的电脑案，而政府居然还没研究出对策！一九八九年春，案件转到华盛顿的高等检察院办理，仍是沉默。到了六月，距离病毒事件已七个月了，司法部才决定以一项重罪起诉。

如果罗伯特同意认罪，司法部将不必开庭并考虑从宽判处。一向沉默寡言的罗伯特此次表现得极为坚决，他认为自己有过失，却拒绝承认重罪，他宁愿上法庭一见分晓。

正式开庭是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十七万人的城市锡拉丘兹。整个审判期间，舆论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支持罗伯特或者反对罗伯特。双方天天在法庭外和报纸、电台、电视台上辩论，辩论的内容甚至远远超过了此案的范围。一位愤怒的电脑管理员说：“我希望他被送进监狱，不然的话任何人都能在网络上为所欲为。”相反，一个乡村俱乐部的妇女团体戴上特制的胸章，公开表示对这位年轻电脑学家的同情。

全国众多的计算机黑客——狂热的电脑迷们更是把罗伯特·莫里斯奉为自己的英雄。

在审讯期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长途电话通讯严重失常，公司网络上的长途电话、国际电话和商业免费电话有一半无法打通。虽然事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声明是自己的软件故障，但也有流言说是纽约地区的一个电脑黑客干的，意在声援罗伯特，抗议当局的“残暴”。但是，这件事却使整个局势朝着不利于罗伯特的方向发展。

决定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法官驳回了辩护方关于考虑被告动机的请求——罗伯特是蓄意侵入计算机系统，而不管是不是蓄意破坏。陪审团一致认为：罗伯特·泰潘·莫里斯违反了关于“非法侵入”的法律，应该判处有期徒刑。但是，却又作出了极少见的决定：不发表判处建议书。最后，主审法官宣布：被告的罪行不应该被判以徒刑，因此判他三年缓刑，一万美元罚金，四百小时的社会服务。几天后，律师古得玻尼宣布，将继续上诉。

罗伯特的判决在电脑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急欲把他送进监牢的人大为失望，而那些善良的人、关心罗伯特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很多人相信法官的决定是公正的——罗伯特确实不应该进监狱。他犯了大错，但已经尝到了苦果，也表示了忏悔——这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美国第二轮上诉法院驳回了罗伯特的申诉，宣布维持原判。

一九九一年秋，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审理此案。

“莫里斯蠕虫案”已经降下了帷幕。但今天我们看来，这个事件是计算机病毒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迫使美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国防部成立计算机应急中心，该事件发生后，美国报纸和电视台立即作了报道，

使计算机病毒第一次成为国际社会的新闻热点。它同时标志着计算机病毒已经走出实验室，开始入侵和危害社会，同时它也宣告了计算机系统已经创造出了自己的对立物。

“莫里斯病毒”既不是病毒事件的第一起，也不是最后一一起。

在它之前和之后，计算机世界经历了多次病毒入侵。今天，计算机病毒更让世人头痛不堪，甚至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它早已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制造出了令人发指的罪行，这是当年的罗伯特·莫里斯万万料想不及的。

形形色色的病毒

全球已有八千五百余种病毒，且还以每天产生六——十种新病毒的速度递增。

“向所有苹果计算机的用户宣布世界和平的消息。”

在对历年来出现的计算机病毒作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叙述之前，有必要明白什么叫做计算机病毒。

计算机病毒是计算机技术和以计算机信息处理为中心的社会信息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一种侵入计算机内部、可以自我繁殖、传播、具有破坏性的计算机程序。

迄今为止，出现在计算机领域中的计算机病毒都是人为编制的一段程序编码。

它被程序设计人员或操作人员有意无意地植入某个正常秩序或计算机操作系统中。

然后，该病毒就依照设计者给定的指令，不断地自我复制，进行繁殖。有的病毒又以磁盘、磁带和网络作为媒介进行传播和扩散，“感染”其他的程序或系统，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广泛地流行。计算机病毒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潜伏、寄生在计算机的系统或程序中，在一定的条件下，依照其程序指令，轻者干扰计算机的正常运行，挤占存贮空间，降低运行速度；重则破坏并导致整个计算机系统崩溃。

计算机病毒这一名词是由科幻小说首先提出来的。一九七五年美国的科幻小说家约翰·布鲁勒尔（John Brunner）出版了一本名为《电波骑士》的科幻小说，该书以计算机蠕虫为主，描述了在信息社会中代表正义和邪恶的两种势力之间利用计算机展开的一场斗争：一个集权政府利用无所不能的电脑网络操纵一切，直到一位勇敢的程序员设计了一个计算机蠕虫程序感染网络与政府作战。为了消灭蠕虫，政府不得不关闭网络，连同它的统治权也一起烟消云散。《电波骑士》幻想新奇，描写生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更是扣人心弦，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一代电脑迷。继之，在一九七七年，另一个美国科幻作家托马斯·杰·雷恩（Thomas J. Ryan）的著作《P—1 的青春》更是轰动一时，在该书中作者设想出现了一种神秘的、能够自我复制的计算机程序，并称之为“计算机病毒”。该病毒在计算机之间流传，一时感染了七千多台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科幻小说的出现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在那以前，许多人已发现了计算机程序可以自我复制和变异这一机理。首先，计算机的创始人冯·诺依曼（John VonNeumann）在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后仅仅四年，即一九四九年就发表了“复杂自动机器的理论和结构”的论文，指出计算机程序可

以在内存中进行复制即“程序复制机理”的理论，在此之后，许多计算机人员在自己的研究工作或游戏中发展和应用了程序或软件自我复制的理论。下面，我们将回顾计算机病毒发展历史。

“核心大战”

罗伯特·莫里斯对计算机病毒的兴趣，完全可以说是得自于遗传，是家学渊源。

他的父亲鲍勃·莫里斯早在五十年代就曾参与制造过一起名叫“核心大战”的计算机游戏。“核心大战”由于是首例对计算机程序的破坏而载入了计算机病毒的史册。

一九五九年美国 AT&T Bell 实验室的三个年轻人：鲍勃·莫里斯 (Bob Morris)，道格拉斯·麦克罗伊 (Douglas McIlroy)，维克特·维索特斯基 (Victor Vysotsky) 利用实验室机器中的核心存储器中的数据和程序来做游戏。先由每个参加的人各自编制一段计算机程序，先后输入到计算机中去运行。程序显示在屏幕上是你死我活的互相攻击，以一种直观的图象，将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思想予以生动的演示，相互之间想方设法使自己壮大起来并竭尽全力去破坏直到摧毁对方的程序，最终把异己力量困死或从屏幕中彻底驱赶出去。这个程序经过不断地改进，其威力逐渐增大，甚至发展到影响计算机 Xerox 五三机的正常运行。由于意识到这种能自我复制程序的潜在威胁，“核心大战”被终止了，并在有关人员的默契中保守了这个秘密。直到若干年后，凯·汤普逊 (Ken Thompson) 在给计算机协会做的一次演讲中才泄露出去。而后，又在“科学美国人”上详细地探讨了“核心大战”(Core War) 中可自我复制程序的原理。从此，美国学术界才开始了实质性的研究。

“计算机病毒”的正式出现。

一九八三年弗雷德·科恩 (Fred Cohen) 博士研制出一种在运行过程中可以复制自身的破坏性程序，在全美计算机安全会议上提出并在 VAX11/750 机上作了演示。

在一周后，他又获准进行了实验演示，共演示了五个实验，由此，证实了计算机病毒的实际存在。伦·艾德勒曼 (Len Adleman) 将它命名为“计算机病毒”。一九八四年，他又出席了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 IFIP 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计算机安全会议，使国际同行进一步了解了他的发现。因为这个会议是由 IFIP 发起的，世界各地的许多计算机安全专家都出席了这个会议。大家对科恩博士的报告很感兴趣，同时又都觉得很难以理解。许多人当时还认识不到科恩病毒研究的“实用价值”。

直到一九八七年秋，计算机病毒才开始引起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随后有关它的报道和书籍大量出现，计算机病毒的概念迅速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巴基斯坦 / Brain 病毒。

巴基斯坦病毒是实验室外第一个袭击美国的计算机病毒。它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被报告到美国特拉华大学计算中心，但在此前一两天，就已在校园内被发现了。该病毒也很快地传入我国。它之所以被命名“Brain”。是因为它在感染盘上写“Brain”作为磁盘卷标，但对染毒磁盘的初步分析发现，它有两个设计者：Basit 和 Amjad，巴锡特和阿姆加德，而设计者的地址是在巴基斯坦的拉哈尔 (Lehore)。这也正是该病毒被称为巴基

斯坦病毒的原因。

一九八六在巴基斯坦的拉哈尔，一家出售 IBMPC 机的商店，年轻的两兄弟阿姆加德和巴锡特对社会上软件互相拷贝和交换产生了好奇和兴趣，他们动手编制了一个计算机病毒程序，并在程序中注明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标注有编写者姓名和地址的病毒。他们把载有此病毒的软盘送给了一个朋友，从此造成了巴基斯坦病毒在全球的流行。阿姆加德和巴锡特的初衷倒并非如此，仅仅是为了阻止外人偷拷他们的软件，同时声明“看我能做什么”。病毒包含着作者的版权标志和信息，编码质量一般。只要具有八八微处理机基础知识的任何人，均能以他们的方式发现隐藏的病毒。后来，美国又陆续在不同的地区发现了巴基斯坦的许多变种。例如，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就有这么一个变种感染了豪斯顿大学商学院大约三百张磁盘。但相对来说，巴基斯坦病毒的许多变种都不及原病毒的影响大，涉及范围广。

“电脑蠕虫”病毒。

罗伯特·莫里斯的病毒程序即是一起典型的电脑蠕虫的病毒，但这并不是最早出现的，“蠕虫”的第一次出现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因此又叫做“圣诞节蠕虫”。

美国 IBM 公司的内部邮政网络和欧洲的 EARN 网络因为一份电子邮件传入了“圣诞节蠕虫”程序，每当用户显示内容时，病毒程序就以链式反应方式自我复制，最后导致网络拥挤。数千台计算机在“圣诞节蠕虫”大规模的突袭之下，几乎同时陷于瘫痪。这种“圣诞节蠕虫”不仅会迅速大量繁殖，而且还将系统锁死，以至于 IBM 公司这个世界头号计算机公司被迫关闭了它的三十五万台计算机终端达三天之久，才最终清除了这种蠕虫。

“蠕虫”程序是将一段插入程序天衣无缝地安排在原先的一套完整程序中，结果是，感染上电脑蠕虫的计算机开始反应迟钝，思维缓慢，而在网络中因为大量蠕虫程序的运行和传递，将使系统发生“梗阻”。在单机——一台计算机上，电脑蠕虫属于寄生型，它找不到外出的途径。然而，当多台计算机连成了网络，“蠕虫”则施展开了它的本领，在网络中窜来窜去，八方出击，光顾每台用户的计算机，甚至从美洲窜到欧洲，拜访国际网络中的每一个用户。同时，它还不断地繁殖，复制自身，使得网络中的“蠕虫”以几何级数增加。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日是新型苹果（APPLE）计算机的生日，有人借机制造恶作剧，全美国被感染的苹果计算机同时罢工，并在屏幕上显现“向所有苹果计算机的用户宣布世界和平的消息”，以此庆祝苹果机的生日。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名噪一时的 IBM“圣诞节蠕虫”再度出现。这天，连接二百多所大学的美国 Bitnet 网络接到了一种“新圣诞蠕虫”，它与老“圣诞蠕虫”几乎完全一样，新蠕虫也在被感染的计算机屏幕上画出一棵圣诞树，并显示几句圣诞节问候语，让用户啼笑皆非。

米开朗基罗病毒。

一九九二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全世界骤起一股“米氏”病毒的恐怖风潮，全球新闻界连续报道了米开朗基罗病毒即米氏病毒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米氏病毒因其发作时间定为三月六日，是意大利画家米开朗基罗的生日而得名。

尽管事先已在全球范围内频频敲响了警钟，可这几天的损失仍是巨大

的。就这几天里，美国数以万计的 PC 机因米氏病毒发作而丢失了数据和程序。加利福尼亚的市场研究公司“数据咨询公司”网络中的六十余万部计算机，约有百分之十五受到了病毒侵害。遭受米氏病毒侵袭危害最大的是南非、德国和荷兰，南非的五百家公司的一千多部计算机受到影响，而德国波恩鲁尔工业区受米氏病毒干扰，一家公司的七十五部计算机在几秒钟内数据全部丢失。在英国伦敦的一家服务公司的一百部计算机完全瘫痪。而意大利，仅三月六日一天，病毒就侵入了约一万台数据处理机，大量银行数据和软件资料毁于一旦。亚洲的台湾、日本、马来西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病毒侵袭，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公安部一位官员承认，中国许多计算机被病毒侵害，丢失数据的情况比较严重。越南也有报道说，米氏病毒三月六日袭击商业中心城市胡志明市，毁掉了几十家公司的硬盘。澳洲大陆也未能幸免这种病毒的袭击……在这些天中，人们一提到米氏病毒就谈虎色变，仿佛大难临头一般。

米氏病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

米氏病毒极其危险，它在发作之后可以把计算机存储数据全部消除，而且它具有选择能力，往往先破坏那些最重要的数据。

但它是一种依赖时间的定时炸弹，程序的制作人将它的爆发日期定为每年的三月六日，米氏病毒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在荷兰和瑞典首先被发现，但警方和专家们认为它来自台湾，并认定米氏病毒是“世纪”的变种，但是其危害性更大。由于事先已经得知此次的来访日期，当年三月四日以前的一段时间，世界反病毒软件商们的软件销售量比往年同期激增了三十倍，但损失仍然十分巨大。但是，后来专家们指出，病毒的避免也相当容易，只要计算机系统的时间避开这一天就行了。不过，在当时，惊惶的计算机用户谁又会想到这一点呢？

新生代病毒。

自从计算机病毒问世以来，全世界已有约八千五百种病毒，而且每天还有六到十种左右的新病毒产生、这些病毒花样越来越多，编程手段及技巧越来越高，能更好地隐蔽自己并对抗各类反病毒工具，使人防不胜防。这段时期的病毒被电脑学界称之为“新生代病毒”。

新生代电脑病毒具有变态性及多变性，其基本特征是通过不断变化自身代码和形态来对抗反病毒技术。它们主要有：隐型病毒(Stealth Virus)。隐型病毒是一九九一年从欧洲发现的新生代电脑病毒。它们的特点是专门躲避扫描式的查毒软件。这类病毒感染系统有时以特殊的手法将自身藏匿在内存中并随机地躲藏在存储器不同的地址，并把所有的 DOS 中断向量都拦截下来，使所有对 DOS 中断进程的请求都先转到病毒手中处理。隐型病毒一旦常驻内存中，它就会伪造一些系统数据，使被其感染的所有文件“假还原”成“看似原本干净”的文件。一旦从被病毒监视中断请求发现你要查看或搜索被其感染的所有文件或主引导记录，它就调出伪造的正常记录给你查看或搜索，使你觉得一切正常，从而达到瞒天过海的目的。

隐型病毒最厉害的地方是它会避开扫描器和监测器的扫描，又不能从长度和日期获知它的存在，就如隐形了一般，常见的这类病毒有：四九六、Flip、NewCentury (XqR)、Dark 和 Avenger 等。

多型性病毒 (Polymorphic Virus)。多型性病毒 (亦称千面人病毒) 是由隐型病毒衍生而出的新生代病毒。它的原理就是多型性病毒 (隐型病毒

技术)密码学。

多型性病毒运用了高度先进的密码学技术和程序码重编技巧,采用错乱编码的手法,使它每一次感染不同的程序时,都会替下一代换一个新面孔——病毒特征码有所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一个病毒。因此用病毒码对比方式来查毒的扫描程序根本无法找到这种病毒的病毒码,实在令人非常可怕。这类病毒目前越来越多,如:Whale、Mask、Doector等。

变体引擎病毒(Mutatim Engine)。一九九一年三月,保加利亚的“黑色复仇者”推出了一种可以转换四十亿种不同外貌比病毒更具危害性的“变体引擎”病毒。

所谓变体引擎病毒是一个程序模式库,内有许多为设计者设计病毒而设置的程序模组,只要运用所提供的模组,任何病毒作者都将很容易地创造出具有近四十亿种变体能力的病毒。变体引擎作为一套公开版本的病毒创作专用工具箱,是世界上第一个免费提供病毒技术的设计程序库,将带动电脑病毒创作的普及化。目前国内发现的“幽灵”病毒即属此技术产物。

网络病毒。网络病毒是一类针对攻击网络操作系统(NOS)——通常是Novell网——而设计的病毒,并通过网络进行传染。它主要利用拦截NOS系统的中断控制来修改程序,中断请求而实现传染和破坏的。

在网络中,病毒可分散在网络的不同角落,一旦条件满足,即结合成危害性极大的病毒程序,且以合法的形式存在和表现,具有欺骗性。国内称之为“超级三维病毒”。

“视窗”软件病毒。一种针对“视窗”word软件的新型电脑病毒自去年八月被发现以来,已演变成多种新形式,危害极大。

这种名叫“宏”(Macro)的病毒不是隐藏在通常的.EXE和.COM文件中,而是隐藏在用户可以随时调阅的.DOC文本文件中,因此通常的扫描软件无法扫描和清除这类病毒。尽管宏病毒仅感染Windows Word六点零以上版本的文本文件,但由于这种应用软件的应用面极广,对用户的商务及办公数据危害极大。目前,宏病毒有五种新的形式:色彩病毒、核病毒,DMV病毒、硬盘格式化病毒和Wiederottnen病毒,其中以硬盘格式化病毒危害最大。

针对WIN九五的新型病毒。随着Microsoft公司推出的操作系统Windows九五的发行,操作系统由十六位变为三十二位,原有的十六位电脑病毒的百分之八十五(约八千余种)仍可在WIN九五上存在并破坏。但新的三十二位具有感染长文件名的电脑病毒即将随之而现。

未来的电脑病毒将具有更强的代码变化能力,在功能上能不断接收新的信息,繁衍新的病毒并具有自我保护,自我复制,实现死而复生的能力,是一种智能化的变形病毒,抗病毒的任务也愈发艰巨。

计算机黑客及“未来之战”

“在极端情况下,恐怖分子或敌对分子可能掌握了对国防信息系统的控制,并严重削弱国家部署和支持军队的能力。”

“信息战没有前线后方之分,联网系统所及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是战场”

在计算机领域,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对技术性细节和更多

更新的知识追求而不能自拔。

电脑国际交互网络带来了一场信息革命，资源共享和信息的电子化处理使得传播速度加快，容量增大，同时风险性也提高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以通过交互网络秘密进入他人的计算机系统窃取情报或者毁坏数据，这样的人被称为“计算机黑客”。黑客是英文“Hacker”的译音。原意为热衷于电脑程序设计者，但这些人不同于普通电脑迷。他们掌握了高科技，但专门用来窥视别人在网络上的秘密，如政府和军队的核心机密，企业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等。黑客中有的窃取银行帐号，盗取巨额资金，有的盗用电话号码，使得电话公司和客户蒙受巨大损失。因此，这些人也被称为“骇客”，他们的危险性显而易见。据联邦调查局和设在旧金山的计算机安全协会公布的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表明：企图强行闯入计算机安全秩序的活动是非常普遍的。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计算机犯罪的危害将会越来越大，与这种特殊的高科技犯罪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英国“一九九六年信息安全博览会”的报告指出：英国一九九五年因计算机犯罪损失达十五亿美元，该年全球因计算机犯罪损失达一百五十亿美元，预计到二〇〇〇年这一损失将高达二千亿美元。

美国对此更是惶惶不安。由于这个国家的军事、金融、政府和企业部门在通信方面越来越休戚相关以及对迅速发展世界通信网络的依赖，他们更易遭到攻击。

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约翰·麦康奈尔海军中将说：“我们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容易受到袭击。”

一九九四年，美国军方一次特大丑闻被曝光：当时两名计算机黑客渗透到空军司令部和在纽约州罗马市的控制研究中心达一百五十余次。这两个黑客掌握了对实验室网络的控制，最后使全部三十三个分网脱机达几天之久。其中一名黑客是英国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他使用的代码是“数据流牛仔”，他被捉住了，而另外一个却从来没有识别出来。这件事让空军司令部的计算机专家们极为震惊。

据美国总审计署的报告，计算机黑客一年企图闯入五角大楼计算机去的次数达二十五万次，其中百分之六十五，即一十六点二五万次获得了成功。但是在一百五十次中只有一次被发现而且上报了，因此“造成灾难性破坏的可能性是巨大的”。

“最低限度来说，这些闯入对防务造成的麻烦要花费数百万美元才能消除。”

总审计署认为，“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恐怖分子或敌对分子可能掌握了对国防信息系统的控制，并严重削弱国家部署和支持军队的能力。”

为了打击黑客的犯罪活动，美国政府计划成立一个由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司法部和商务部联合组成的特别小组，来保护美国的重要电脑系统不受恐怖分子的攻击。人们普遍认为，阻挡黑客的最可靠有效的方法是开发出一种难以破译的软件，而政府又能对其加以控制。但是对投巨资开发这样的软件，美国政府明显得犹豫不决，担心收效不大，甚至适得其反。因此，西方电脑网络受计算机黑客困扰的状况短期内还难以结束。

如今，美国政府和企业界的认识已经趋于一致：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面临的最危险但又最不为人知的一种威胁并不是核武器或灵巧炸弹，而是来自计算机系统的攻击。他们越来越担心敌人、恐怖分子甚至周末闲得无

聊的黑客向这个国家错综复杂的计算机网络和电子数据网络发起进攻。美国政府一位官员说：“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脆弱之处。我们觉得现在也许到了制定一项重点明确的国家政策的时候了。”

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新的战争——信息战的年代正在到来。

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他的助手约翰·多伊奇领导的一个小组起草了一份名为《二十一世纪美军框架》的文件，提出在冷战结束后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的情况下，有限的军事预算不应该用于制造更多冷战时期使用的军事装备，而应着眼于研究和开发更先进的军事装备来武装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军队。佩里提出必须进行一场军事技术革命。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使用的武器在技术上已经过时了，未来先进武器的关键问题是信息技术，美国必须利用在信息处理和通讯联络方面的领先地位来打未来战争。在信息战这种未来战争形式里，计算机将成为主要的战争手段。

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计算机已经成为现代化军队的重要物质基矗有人曾指出，二十世纪的主要武器是坦克，二十一世纪的主要武器则是计算机。

军用计算机的装备数量和质量，已经成为衡量各国军事技术水平、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以及国防实力高低的重要标志。C4I（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系统更已成为未来高技术战争的制高点和维系战争机器的核心，因此，它必将成为未来战争敌我双方的作战重点。而计算机系统作为维系C4I系统运转的关键，也必将成为敌对双方倾注全力首先摧毁的“重中之重”。

因此，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针对计算机所采取的行动——计算机病毒战，将成为重要的作战样式。敌对双方都将会把计算机病毒作为一种新的电子攻击手段使用，同时大力防范对方的计算机病毒攻击，这将为未来的无硝烟的信息战争增添一种全新的景观。

计算机病毒战究竟会对战争产生什么影响呢？首先，计算机病毒可以瘫痪C4I系统。由于C4I系统是一个通过计算机连接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和武器系统的纵横交错的庞大网络，因此环节很多，只要实施计算机病毒战，将计算机病毒注入其中某一部位或某一个环节就是以破坏整个自动化指挥系统，使其无法正常工作，甚至瘫痪。

其次，计算机病毒可以袭击空间军事设施。在高技术战争中，空间军事设施是维系战争运行的关键领域，也是陆海空天电磁五维战场中的重要争夺点。现有的武器系统难以摧毁空间的军事设施，但空间军事设施的发射，定位和工作都离不开计算机系统，如果我们利用电脑病毒去摧毁空间设施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空间设施就会因中枢神经——电脑发病而不攻自破。目前，美国正在实验用高性能飞机在大气层顶部近距离发射计算机病毒攻击空间的军事设施。

再次，计算机病毒特别适于破坏电子设备，因此将成为未来电子斗争的焦点。

最后，计算机病毒可以攻击、甚至摧毁硬武器系统。现代化武器系统正日益电子化，如果用计算机病毒攻击和破坏武器系统内部的计算机系统，就足以使这些武器因“大脑”错乱无法正常工作而丧失战斗力。

其实，计算机病毒战早已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就已经对伊拉克实施过，并且初次领教了计算机病毒的威力。这对美国 and 伊

拉克都是一次印象极为深刻的经历。开战之前，美国情报机构获悉，伊拉克从法国购买了一套用于防空系统的新型电脑打印机，并将经约旦首都安曼运到巴格达。情报机构迅速行动起来，经过周密部署，特工们偷梁换柱，运到巴格达的已是被换装了固化有病毒的芯片的打印机了。

这种计算机芯片是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安全局的技术人员设计的，它除了完成正常的常规功能外，芯片电路中固化设计了一种使伊拉克军事指挥中心的主计算机失灵的病毒。美军在战略空袭发起前以遥控手段激活病毒，使病毒从打印机窜入主机。

造成伊防空指挥中心主计算机系统程序发生错乱，工作失灵，致使伊整个防空系统中的预警、指挥、通信和控制系统瘫痪，从而为美军空袭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时四十二天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损失惨重，伤亡人数达十万余人，相反，美国部队出兵七十万人，死亡仅一百二十六人。

这无疑和计算机病毒和电子战的实施为美国创造的战争优势有关，是它们使伊拉克成了一个“又聋、又哑、又盲、又瘫痪的巨人”，只能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现在，美军已把计算机病毒战作为首先采用的作战样式之一。去年，美国《时代周刊》载文称，美军不久将能够使用键盘、鼠标器和计算机病毒，对敌人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迅速、静寂、广泛和毁灭性的打击，不放一枪一炮，就能给予对手不流血的惩罚。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及陆海空三军的绝密情报机构一直在研究用计算机病毒来传染敌人计算机系统的办法，包括远距离投放计算机病毒。另一种病毒（逻辑炸弹）将在预先确定的时间内控制敌人的计算机系统，在这个时间内它将出现并开始吃掉数据。中央情报局还研制出一种秘密程序，可以把设有陷阱的计算机芯片插入武器系统，外国的武器制造商可能把这样的武器系统运到一个潜在敌对的国家去。这种秘密程序不易发觉，但在战时却可以突然发作，造成敌方武器计算机系统失灵。

一九九五年六月，受过特殊训练的十六名信息战军官成为华盛顿国防大学的首届毕业生，西方报刊称他们是第一代计算机网络战士。他们未来的作战任务是用键盘使敌人的通信系统瘫痪，操纵敌人的媒体，破坏敌人的财源。同年七月，在罗得岛纽波特的海军军事学院完成了一次全球战争军事演习，信息战专家在演习中策划了使敌人的计算机陷于瘫痪的办法。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举行的一次模拟战争演习中，一个配备信息处理装备和激光武器的二万人的步兵师“打败”了人数三倍于它的“北朝鲜陆军军团”。美国陆军希望在二一一年前部署这个步兵师在演习中所使用的武器和装备，从而使战嘲数字化”，用电子系统把每个士兵和武器系统连接起来。

美军设想，如果将来某个国家威胁美国及盟国，美国将不必再像海湾战争那样派遣大批军队劳师远征，而是首先利用计算机病毒对敌人实施攻击，使其陷入一场信息灾难：在敌军用计算机网络中删改有关数据，使敌指挥中枢和武器系统充斥错误数据，从而破坏其正常运行，向敌方电脑系统中注入假情报，诱使敌首脑机关分析判断发生错误，进而引起决策失误；通过计算机系统向敌指挥官和部队发布假命令，让其听命于己，随意操纵和摆布，致使敌军事行动陷入混乱；运用计算机网络摧毁敌国银行帐目，扰乱敌国经济秩序，引发社会动荡，从而迫使敌人因后方动乱而不攻自破。

但是，世界军事强国在研究计算机病毒武器的过程中，也深深地预感

到未来握在手中的计算机病毒武器将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不但可以攻击敌方，自己也难免遭敌方的攻击。更严重的是，由于计算机病毒战的攻击对象是计算机，因此，在高技术战争中受害最深的有可能将是信息化程度更高的军队。曾为美国核战略出谋划策的兰德公司在一份针对此的分析报告中得出结论：“信息战没有前线后方之分，联网系统所及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战场。简而言之，美国本土也许不再是躲避外来进攻的庇护所。”

“兵者，国之大事。”计算机病毒战还是信息战中的新生儿，其特点和战法还有待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计算机病毒战中真正的决定因素还是人的头脑——两军对垒智者胜。无论是技术强国，还是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只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必将能够通过竞争夺取巨大的优势而大有作为，从而在计算机病毒战这个无硝烟的战场上—显身手。

计算机病毒作为已经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的“隐形武器”，它的危害的历程将不会轻易中断。可以预见，在下一个世纪，随着信息程度地愈加提高，人们将更多地感受到来自病毒的威胁，这种威胁将深入人类社会的每一肌体，其破坏程度并不亚于核弹引爆和流行病的肆虐。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经指出，“电脑网络的建立与普及将彻底地改变人类生存及生活的模式，而控制与掌握网络的人就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技术的高速进步再一次将人类的自由推向了危险的边缘，高度组织化、电子化同时也为强权统治和专制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得不对疯狂追求技术进步的人们敲响警钟：切勿将人类自身引向毁灭。

病与毒

80年代至现在：吸毒与艾滋病肆虐全球

概况：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吸毒成风，艾滋病流行。目前全球大约有二亿人吸毒，每年毒品交易额五千亿美元，贩毒和吸毒已使数百万人丧生；自一九八一年发现首例艾滋病以来，全球已有二千万人染上艾滋病病毒，数百万人已经发病死亡，用于艾滋病的费用将达五千亿美元/年。吸毒和艾滋病的蔓延迫使人类重新思考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世界性瘟疫”：吸毒

毒品，这是一个几乎与人类历史同样悠长的尤物。

古代中国、波斯和印度等国的文献中都指出，从史前时期以来，大麻就有好几百种医药用途。同时这些文献还揭示了大麻的毒性，大麻对人体的危害。

据记载，史前时期的瑞士湖上房屋中，曾发现罂粟籽壳。

据记载，伦敦科学博物馆中藏有一批出土于塞浦路斯的公元前一千五

百年青铜时代的陶罐，外形酷似罂粟籽囊。考古学家经过科学的考证和严密的推理后认为，这些远古的陶罐是用来盛溶解之后的鸦片溶液远销中东诸国的。

据记载，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石棺上的大理石雕像，手中也拿着两枝罂粟籽囊，似乎是要用来解脱那在阴间里仍然痛苦的幽魂。

而在古希腊伟大的盲诗人荷马笔下，罂粟花则完全成了“解忧花”，他或许一边咀嚼着这种美丽的花儿一边击节唱道：“它能消除所有的痛苦和争吵，却不会带来一丝罪恶。”

或许这就是古人对它的认识吧。剂量很小的一点毒品使他们微醇薄醉，还不能体会那毒蛇猛兽般的厉害。

那时，罂粟以及从中提炼出的鸦片剂并无大功德于人间，但也无大罪大逆。它至多能担当的也就是宗教仪式中的镇静剂和催眠药。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公元前四世纪发现了鸦片的止痛作用，从这时起，鸦片开始正式成为一种药物。

十八世纪，德国化学家泽尔蒂纳从罂粟未成熟蒴果的干燥果浆中，分离出一种生物碱。这种白色或无色的结晶粉末对于各种病痛具有奇特的止痛镇静效果。这应该算是一项医学上的伟大发现。欣喜的泽尔蒂纳根据古希腊神话中睡神莫弗尤斯的名字将这个天使命名为“吗啡”。吗啡至今仍是医学上常见的一种有效的麻醉镇静药物，在帮助恶痛病人度过难关时积累过许多功德。

但鸦片作为一种毒品似乎登场更早。吸食鸦片的恶习在十七世纪即从南洋传入了中国。一七二九年清雍正帝曾下令禁止吸食鸦片，一七九六年嘉庆帝下令取缔鸦片进口与种植。而葡萄牙人在十八世纪初即发现从印度倒卖鸦片到中国可获厚利。

一七七三年和一七九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先后取得鸦片买卖和制造特权，此后便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以攫取暴利。美国也将印度和土耳其的鸦片输入中国。此后从一八一一年至一八四一年，走私到中国的鸦片从四千一百六十六箱/年，猛增到三万五千四百四十五箱/年。

中国人成了“东亚病夫”，一个民族几乎被毁掉。众所周知。

为此还进行了两次著名的“鸦片战争”，鸦片这时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灾难。

但作为毒品的鸦片还没有走到它的尽头……一八七四年，英国化学家赖特首次使用吗啡和乙醚加温后，提炼出一种新的有机化合物。

十多年后，德国科学家通过实验也得到了这个化合物，并且证实了它的镇痛镇静能力是普通吗啡的四——八倍。这就是海洛因——毒中之王。

它一投放市场，其“极易成瘾、且难戒断，应用过量可导致呼吸抑制而死亡”的罪恶本性也立即暴露出来。

人们开始警惕起来。

一九一二年，在海牙鸦片问题国际会议上，各国代表一致赞成管制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的生产、贩运和销售。

一九二四年，美国通过法令，严格禁止海洛因的生产与进口。

一九五三年，英国政府干脆将它从《英国药典》中驱逐出去。

但是这一切都已为时过晚。出了笼的恶魔是不会轻易回到它的囚身之地的。

当初西方人在向中国大量贩卖鸦片的时候大概预料不到，仅仅一个世纪以后，鸦片的新一代产品汇同其他由大麻、古柯等提炼而来的毒品，会作为只有核武器才堪与之媲美的杀人凶手，首先在西方世界里泛滥成灾。

“敌人已经登堂入室”

星条旗上的白粉
“欧洲君子”——“瘾君子”
毒品核弹袭击无核区
绿荫掩映下的罪恶

美国。最先将吗啡、海洛因运到中国的美国。原子弹和航天飞机的美国！

自六十年代由于受越战影响，美国的吸毒人数开始剧增，到八十年代已成了全世界毒品泛滥最严重的国家，一个“毒品之都”。

有人描述说，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繁忙的街上漫步，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周围的各色人等就会发现，每三名成年人或青年人中就有一个因吸了大麻烟而醉迷迷的；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可卡因痛正在高潮；二十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因用了LSD或其他迷幻药正在幻想联翩。如果你知道服用新药PCP的人会有极端暴力行为的话，你还要当心受攻击，以及避开吸毒者横冲直撞的汽车……二点三六亿人口的美国，有七千二百万人至少尝过一次毒品，占全美十二岁以上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

其中三千万人已染上毒瘾，百分之七十五为白人，百分之四十一为妇女。

全美高中生中四分之一的人吸过大麻，二十分之一的人吸过可卡因。大学生中十分之三的人吸过大麻，四分之一的人吸过可卡因。在某些执行“大麻法”的州里，学校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因吸大麻而被拘留。全美三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人中，就有一个染上吸毒的恶习，他们中有五分之一的人从十多岁起就开始吸食大麻，成年以后也很少戒掉。

而且在美国相当多的地区，吸毒已成为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活动了。这种“吸毒脖甚至也在美国军队中蔓延。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美国军人中吸毒人数剧增。一九八三年，美国海军中有五百七十人因吸毒而被革除军职，滥用麻醉药物而未受法律惩处的其他军种军人高达二万四千六十四人。

经过整顿军纪的几年，驻德美军中仍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人吸毒；驻英美军中吸毒人数超过百分之四十，驻英美军总部被报界戏称为“驻英美军毒品总部”。

一九八五年，美国各兵种中有一万六千五百名官兵因严重吸毒而被勒令退役，五万五千九百名官兵因轻微吸毒而被送进“军营康复中心”，接受强制戒毒治疗。

全世界生产的各种毒品中，有近三分之二被销往了美国。每年全美的毒品交易额（被称为“毒品美元”）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亿美元，总交易额已达二千亿美元以上！仅一九八六年，美国就吞掉十五万公斤可卡因，六万五千公斤大麻和一点二万公斤海洛因。

吸毒很快就会导致犯罪。全美收监的犯人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吸毒。吸

毒后的罪案又以抢劫、凶杀最多。

全美驾车者因吸毒而造成的车祸，每年至少损失二百七十亿美元；因吸毒而造成的劳动率下降，每年损失不下三百亿美元。

全美同毒品有关的各种问题造成的损失，每年达一千亿美元之巨！因吸毒直接导致死亡的人数每年超过一千人。

美国政府每年用于肃毒的拨款费用高达二十亿美元以上，然而仍收效甚微。

美国毒品管制局局长南格说：“在今天，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的最大威胁，不是别的，就是危及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毒贩。”

美国司法部部长米塞侗侃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位缉毒大员，那就是美国总统。”

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则悲哀地说：“毒品正在对美国的社会机构和人民利益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尤其对未来希望所在的青年人危害最大。”

美国，浸泡在毒液中。星条旗上的白色，似乎就是铺天盖地的“白粉”……英国。近一两个世纪的对华头号毒贩英国。“欧洲君子”的英国。

五十年代，毒品仅在首都伦敦索豪区等少数地区流行，并未酿成大祸，英国政府也乐得清闲。每当海关缉获大量毒品时，总被认为是假道英国转运美国或西欧的。

英国是“绅士之邦”，沉溺于毒品是有损绅士形象的。

五十年代中期，英国注册在案的吸毒人数仅为三百人。但到了六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英国的毒品流行区域逐渐扩大。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区的吸毒人数成倍增加，伦敦、利物浦、伯明翰、格拉斯哥、爱丁堡等大中城市毒品像瘟疫一样流行开来。到六十年代末，英国的注册吸毒人数已跃至三千，八十年代则跳至五万。而据英国一个提倡大麻合法化的组织——“大麻合法化运动”估计，目前英国至少有五百万人使用过毒品！

英国报界一片惊呼：“吸毒的风气已经遍及英国所有的社会阶层、阶级，就像在美国的情况一样！”

据伦敦凤凰大厦吸毒者治疗中心威尔·汉特说：“头等公立中学学生中每两人中就有一人使用海洛因。”

两名英国毒品专家勃莱克斯和詹姆士曾在一个少年犯罪者拘留所作过一项调查，发现二百九十名十四至十六岁的少年罪犯中，竟然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使用过两种以上的毒品，百分之十二的人使用过三种以上的毒品！

毒品，曾经为大英帝国换回了成船的中国丝绸、茶叶和金银，如今换来的，是抢劫、凶杀、卖淫、偷盗……等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所谓“以剑为生者死于剑”，是报应吗？

昔日欧洲“君子”，今成“瘾君子”矣！

德国。曾梦想用日耳曼精神征服全世界的德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使用非法毒品的人仅限于某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地下集团，人数很少。战后盟国占领期间，据说是先从美军兵营里散播出了毒品，而后逐步在德国流传，但主要是在前西德。

前西德官方和舆论曾长期不重视吸毒问题，一九六九年以前没有任何关于吸毒者的统计数据。一九七六年，西德警方缉获的可卡因还不到六克，这似乎也说明在这之前西德几乎是无毒的。

七十年代末，哥伦比亚麦德林卡特尔毒梟勒德尔率领他的哥伦比亚康采恩开始将雪白的上等可卡因奉献给西德人。由此开始到一九八一年，西德吸毒人数猛增了三四倍，全国已有十万人吸食大麻，八万人使用海洛因。一九七九年西柏林吸毒死亡人数达六百二十三人，死亡率竟高于“海洛因之都”——纽约。

德国人这才慌乱起来，但已经晚了。八十年代中期，警方的调查发现，西德的公民中有近四百万人曾使用过毒品，青少年在吸毒者中占百分之三十五，而且所有吸毒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几乎每一天都有青少年因吸毒，特别是吸海洛因而自杀身亡。西柏林成为全球吸毒死亡人数比率最高的城市，而法兰克福则取代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大的海洛因市常德国人叹息：“几乎一夜之间，西德突然成为欧洲的毒品之都，面临着比美国更严重的海洛因毒品问题。”

确实如此。西德的吸毒人数一年上一个新台阶，在欧洲占据首位。没能征服全世界的德国人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毒品征服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力主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远离了喧嚣的大陆的这两个岛国，仍然避免不了毒品的侵扰。早在一九七八年，就大约有四十五——五十万人起码每周吸食玛丽华娜（大麻制成）一次，全部十五至二十五岁的青少年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曾经使用玛丽华娜，其中四分之一是经常吸毒者。而在新西兰一所全日制学校调查发现，学生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抽玛丽华娜。

全澳一千四百余万人口中，有近五百万人使用变相毒品——精神剂。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全澳吸食海洛因的人口从七万跃至二十万人，同期因吸毒而死亡的人数也剧增。

报纸惊呼：“一天死去一名瘾君子。”

毒品核弹已经袭击了这块南太平洋上的洁净之洲。

瑞士。冰清玉洁的阿尔卑斯山下绿荫掩映中的瑞士。

苏黎世的普莱茨斯必茨公园，如今又被人们叫作“针筒公园”。从一九八五年起，这里成为全世界少见的毒品公开交易市常毒液从针筒中流向瑞士人。瘾君子的聚集，给公园留下了斑斑血迹和遍地皆是的废弃针筒。暴力事件、偷盗、抢劫、强奸等恶性案件每天发生，令人怵目惊心。

毒液从针筒中流向瑞士全境！绿荫掩映下的，不只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也有罪恶。

法国。大革命的法国，自由与浪漫的法国。

一九八六年法国境内被查获的各种麻醉剂和毒品共十三吨，而一九八五年仅二十一公斤。相比之下，入境毒品的增长速度之快简直令人目瞪口呆，而这种增长趋势在八十年代后期更加猛烈。

法国内政部说，官方公布每年约有二百五十人左右（主要是青少年）死于过量吸毒，而实际上这个数字要加倍或加两倍！

热爱自由的法国人，如今却受到了毒品的奴役。

东方呢？

六十年代中期曾是日本人迷恋海洛因的高峰期，在落入平缓之后很快又在八十年代大幅度回升。警方统计，日本每年有三十万人想靠吸毒来减肥。

巴基斯坦有四十五万人注射海洛因。仅有一百六十万人口的尼泊尔也有一点五万人离不开海洛因。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报》披露，伊朗吸毒成瘾者有二百万人！在东部霍拉桑省的一些村庄，每百户人中就有七十九户吸毒！

印度是世界大麻和鸦片的主要产地之一。有关资料表明，仅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四大城市就有六十万海洛因瘾客。

马来西亚一千五百七十万人之中，足有九点三万人靠海洛因为生，平均吸毒人数超过了美国。

韩国向来在吸毒问题上比较乐观，但八十年代后期吸毒人数也已达十三万人，据韩国官方估计，五年内有可能超一百万人。

拉丁美洲。

拉美国家是世界上毒品生产和贩运的主要地区之一。在生产和贩卖毒品不断增加的同时，拉美国家的吸毒客也不断增加。仅秘鲁就有八十余万吸毒者，其中又主要是青少年。在哥伦比亚的吸毒者中，百分之四十是十二至二十岁的学生。妇女吸毒人数也不断增多。

拉美国家的毒品泛滥是极其普遍和严重的，而且它还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地（主要是美国）输送毒品核弹。

中国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在短时间内就消除了烟毒的危害。随着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国际毒犯开始侵入中国，国内又出现了走私、贩卖、制造毒品，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和吸食毒品的情况，而且日趋严重。长期号称“无毒国”的中国，毒品再次蔓延、猖獗起来。

今日世界，毒品泛滥症不仅在西方存在，也遍布于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成为文明世界极为流行并难以治愈的“社会瘟疫”和“顽症”。这颗蓝色的地球上已找不到一块不受毒品的戕害、荼毒和侵扰的净土。

难怪人们把毒品泛滥称为“世界性瘟疫”。

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目前世界上有一点七六亿人吸食鸦片，四千八百万人使用可卡因。毒品贩子有七十五万人，八十年代全球吸毒致死者达十万之众。也是在这个八十年代里，全世界缉毒组织共缴获十五万到三十万吨可卡因，缴获鸦片三点五万吨，缴获海洛因四点四万吨，缴获大麻一百二十万吨至一百五十万吨！

假如把被缴获的如此之多的毒品，分配给地球村中每一个村民吸食，可以料想，人类必将在不久的将来从这颗星球上一个不剩地消失！

席卷两亿人的瘟疫！地球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可怕的灾难。

而全世界毒品市场每年的毒品销售额达五千亿美元，是目前全世界美元流通量的两倍，超过十二亿人口的中国年国民生产总值，也超过了世界上一个不发达中小国家的年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超过全世界钢铁工业的年产值，还超过全世界汽车工业的年产值！

据估计，在全球二亿人的吸毒大军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或正在成为堕落者、罪犯、僵尸，他们不但将自己和祖先创造的财富亲手毁掉，还将把这种“毒品瘟疫”以几何级数的膨胀方式传染给他人。

正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杂志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毒品对我们自身文明威胁之大，绝不亚于三十年代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我们在算毒品这笔帐时，必须再乘上今天毒品造成的家庭破裂、健康受损、生产力损失、公路及工作意外事故、家庭暴力、虐待配偶及子女、婴儿先天带有毒瘾或智力不足等问题所带来的损失。连较低价格也负担不起

的瘾君子，会使犯罪数目增加。凡此种种已经够可怕的了，我们还可以演出后果更难估计的危害。我们如果坐视无睹，就等于宣布人类道德已全面投降，我们等于是说，政府与法治已经不再能造就正常像样的社会，教育成了胡说八道……”这篇文章叫作“敌人已经登堂入室”。

毒品魔力揭秘

“你咬它一口就放开，但它的味道如此美妙，以至你老想回来再尝一口。”

“知识分子麻醉剂”

快乐和享受的守恒定律

当今的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充塞着各种各样的毒品，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大超过了任何一种瘟疫。而且这种“毒品瘟疫”还有一个特点是与其他的瘟疫绝然不同的：患上这种“吸毒脖”的人非但不想从中解脱出来，反而一往情深，变本加厉地追求更多的毒品，从而越陷越深。而贩毒的人更是乐此不疲，即使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鞠躬尽瘁地献身“事业”……那么毒品的魔力究竟何在呢？

从古代到近代，人们所认识到的毒品都是极为有限的，更谈不上对它们的利用了。西方在近代强行输入中国残害中国人的毒品也只有一种：鸦片剂。

但在今天，科技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不仅旧有的毒品得以保存，还翻新、创造出许多毒品的新花样。对这些毒品，法学家们根据法律条文把它们划分为合法毒品与非法毒品两大类。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则根据毒品作用人体后的不同效果，把毒品分为幻觉剂、兴奋剂和镇静剂三大类。此外，还有人根据对毒品使用方式的不同特点，而把毒品分为服用剂、吸入剂等。但归根结蒂，大部分毒品都来自三种最普遍化的毒品植物：大麻、罂粟和古柯。这三种毒品植物中，除了古柯是地区性植物外，其他两种几乎在任何国家都有。

由大麻提炼出的毒品主要有两种，即玛丽华娜和哈希什。生物化学家从大麻的树脂中提出和鉴别了四万种以上的化合物，其中有一种叫四氢大麻酚，被认为是对神经起显著作用的主要成分。大麻毒品中含四氢大麻酚的成分越多，这种毒品的劲头也就越大。

玛丽华娜是大麻（又称“火麻”）的花和叶晒干后制成的，中国俗称“大麻叶”。

而哈希什是大麻的浓缩物，毒性比大麻叶要大两三倍。

由于种植大麻和提取这种毒品比较容易，因而大麻成为毒品植物中最大众化、最世界性的一种，也是吸毒者最容易得到最广泛的廉价毒品，被称为“穷人毒品”。

许多城市里的瘾君子甚至在阳台或菜园里种植它。就连肃毒最厉害的美国也没能阻止大麻在其国土上被大量种植。

经过加工的玛丽华娜和哈希什是一种褐色的饼干一样的东西，挥发出一股刺鼻的橡胶、泥土和麝香的气味。贩毒者将它捣碎后混入一般的烟叶中做成烟卷卖给吸毒者，吸毒者只要吸上三五口，就会飘飘然。

大多数人在吸毒后几分钟之内，会产生安适、舒缓和宁静的感觉，迷

迷糊糊似在梦中。接着，他们觉得自己感受力增强了，视、听、嗅、触觉都更敏锐清晰。声音里混合着颜色，颜色里又荡漾着声音。他们自己甚至可以同各种物体“通灵”互换。有的人变得很友善，有的人变得内省而宁静，有的人则不停地为周围的事物所感动，并大笑或大哭。

但是这种精神兴奋的状态只能持续两个小时左右。随后出现的，是一种精神上和心理上都十分痛苦的感觉。尽管关于大麻对人体的生理影响仍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有许多人甚至持大麻无害论，但是大量的事实表明，吸大麻烟起码与吸普通烟草一样，对人体都是有着极大损伤的。短期吸食，会导致心律加快、表皮血液循环增强、眼球充血、喉头发痒、口舌焦渴、血压波动；长期吸食，则可使人患上支气管炎、气喘并低血糖等多种疾病。这种卑贱、廉价的东西，无疑是个杀手。

由罂粟提炼出的毒品有鸦片和海洛因，吗啡则是这种植物的一种自然衍化物。

二十世纪初，吗啡曾是一种使用极为广泛的镇痛剂。皮下注射器的发明和随之而来的吗啡在世界各国军队中的使用，使成千上万的士兵染上了毒瘾。吗啡因此被称为“军中疾病”。

一八九八年，海洛因从吗啡中合成，开始被用来作为治疗鸦片和吗啡毒瘾的药物。但它本身所具有的强烈成瘾性（相当于吗啡的两倍）不久就暴露出来。海洛因被称为“毒中之毒”，对人的伤害在毒品中首屈一指。

十九世纪初，英国天才作家托马斯·德·昆西在《一位英国吸鸦片者的忏悔》一书中，以他二十年吸食鸦片的经验，对鸦片在人体中的效应作了相当精彩的描述：人不仅仅能通过吸食鸦片进入幻游，鸦片还能解除人所有的焦虑感、罪恶感和自卑感，使吸鸦片者进入一种漫长而美妙的幻想之中。在这梦一样的境界里，他们有时会看到人类和物质世界的新面目，而这些都体现出智慧、慈善、甜蜜和美好；有时他们也会看到凄凉的情景：有送葬的场面，有对以往苦难的回忆。但这些情景都绝不会使人恐怖。

从长远来看，吸食鸦片的人能保持他的思维能力，但只限于一种诗人的和沉思的形式而不能进行任何创造性的实际工作，而且对任何这样的工作（包括精神上的！）都失去了兴趣。

而海洛因，当代西方专家把吸食这种“毒王”的直接效应分为两个阶段，即“冲劲”和“麻醉高潮”。吸海洛因者会感到瞬息之间的冲劲，那是毒品对人脑部产生的起始性冲击导致的。这种作用常常被人用性方面的销魂极乐时刻来形容，是遍及全身的巨大的快感高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感觉是畅快无比的，常常还伴以精力猛增、夸口吹牛、精神性运动行为增强等现象。

上了瘾的人还常常诉说皮肤有强烈的瘙痒感觉以及发红现象，特别是腹部，持续数分钟之久。随之而来的是“高潮”或欣快感，延续时间更长一些，但很难描述清楚。总之如梦如仙，很令人欢快，有一种深深加强了的安适感。

鸦片和海洛因等鸦片剂对人体的短期生理影响都是：使消化功能减低，发生恶心和呕吐；血管扩张、瘙痒、发汗；头脑和呼吸中枢受影响而产生呼吸衰退。剂量越大，衰退越深，严重时可直接导致人身死亡。

长期生理影响：导致便秘、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和暂时性阳痿或不育。最显著的则是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产生对这种毒品最强有力的毒瘾。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海洛因的毒瘾几乎是不能戒断的。最新研究资料表明，吸食海洛因能产生显著快感的时间只有二十八天！从那以后，吸毒者便会受尽地狱般的折磨，吸毒只是为了摆脱痛苦而吸，再不会有一丝快感！从染上海洛因瘾到死亡，人所需要的平均时间只有七八年！

这似乎是上帝在提醒人们：快乐也是守恒的。中国人叫它“乐极生悲”。

从古柯树叶子里提炼出来的毒品就是可卡因，又称古柯碱。

古柯这种植物只生长在南美，其主要生产和外运地集中在玻利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等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些国家，咀嚼古柯树叶是印第安人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

吸毒者通常使用可卡因的办法是把它吸进鼻孔内，在鼻孔的粘膜上把它吸收。

在美国，新式的可卡因结晶体被称为“自由碱”，其特点是不再用鼻子嗅而用吸烟的方式吸取，据说这样劲头更大，堪与海洛因媲美。

两个奥地利人对可卡因的发现作出了贡献。美籍奥地利裔眼科医生卡尔·科勒从古柯树叶中提取出可卡因用于外科局部麻醉手术，而一代精神分析大师西格蒙德·佛罗伊德则完全从另一个角度——即毒品的角度——使用它。

一八八四年，弗洛伊德作为一个著名的可卡因使用者在其（关于古柯树）一文中对于可卡因的效应作了如下描述：可卡因对神经的效应包括兴奋感和长久不衰的欣快感，这种欣快感和一个健康人所具有的欣快感毫无差别。使用了它的人感觉自我控制能力有所提高，有更好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这时如果做工作，并没有酒精、茶或咖啡带来的精力猛增的感觉。他仅仅感到很正常，很快活，难以相信自己竟是在药物的支配下。他能毫不疲倦地从事长久的、紧张的脑力或体力工作。平时到一定时候必然产生的吃饭和睡觉的要求，这时好像完全消失了……还有人把可卡因比作巧克力糖：“你咬它一口就放开，但是它的味道如此美妙，以至你老想回过头来再尝一口。”“它使你得到一种比别人强的优越感。它能提高你所有的感觉，减少饥饿。”

但是他们都没有描述这种毒品所带来的恶果。

不错，可卡因能刺激神经系统，产生欣快、自信、胜任一切重活和警觉、亢奋等感觉，但这种兴奋状态只延续三十分钟左右，以后就转入抑制状态，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

从短期心理影响来看，低剂量的可卡因可以使脑中枢（大脑皮层）兴奋起来，产生欣快、烦躁不安和激动等感觉。低剂量使用可卡因会导致心率变慢。随着剂量的增大，脑中枢也受到刺激，导致呼吸率和心跳率增高，出现呕吐、震颤和痉挛惊厥等现象。如果所用剂量高到足够的程度，处于抑制状态的人体，就会因呼吸过程衰竭而死亡。

可卡因的中毒情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循环性虚脱，其特点是面容苍白、昏眩、呕吐、脉搏衰弱、失去知觉。如果使用者对这种毒品特别敏感的话，即使使用较小的剂量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另一类更为严重，其特点是谵妄、反射增多、痉挛、暴烈的躁狂行为，最后是呼吸衰竭和死亡。

从长期生理影响来看，大量使用可卡因的人会导致体重减轻、失眠、并受到忧虑反应之苦。鼻粘膜由于可卡因的作用，使血管收缩导致部分组织坏死溃疡。在特别严重的病例中，由于不断嗅吸这种毒品而导致鼻中隔穿孔甚至坍塌。

除了大麻、罂粟、古柯这三种最普遍的植物里提取出来的毒品外，还有从麦角菌（一种自然谷物菌类）中提取出来的迷幻剂 LSD，从一种产于墨西哥东北部和美国西南部地区的仙人掌帕约他中提取出来的麦斯卡灵。

麦斯卡灵曾经特别吸引过英国小说家奥尔都斯·赫克斯利。

在《感性认识的途径》一书中，他对这种毒品的效应作了描述。

他说在服用了麦斯卡灵以后，曾经有一个超意识的四到八小时的幻游，甚至说他看到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裸露着身子的情景。赫克斯利的描述，使许多艺术家和小说家纷纷迷恋上麦斯卡灵，这种毒品也被冠以“知识分子麻醉品”的美称。

此外，还有像安非他明、普斯普剂等合法医用镇静剂甚至其他方面的挥发性溶剂、气雾剂包括氯仿、杀虫剂、汽油、煤油等都有人用来作为毒品使用……毒品的花样虽多，千变万化，但是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本质。从药物学的观点看，凡是能通过化学性改变生物结构与功能的物质，就叫做药品。神经活性药也是一种化学药品，不过它的效用是改变人的情绪、感觉和知觉的，人们把这类化学物质称为“毒品”。从法学观点看，被禁用的各种麻醉品叫危险麻醉剂，滥用者即吸毒者。

通俗的说，毒品是以各种方式吸进入体的并最终能给人带来危害的各种非食物的自然物品或化学合成物品。

而毒品的魔力即在于，尽管它最终有害于人体，却会在短期内给人以极度的快慰，并使人很快产生对它的依赖感，即成瘾。

成瘾性最高的是海洛因、可卡因和安非他明，染瘾者几乎无一不成为它们的奴隶。

而毒品对毒贩的吸引力则众所周之，他们是“为了百分之一的利润去铤而走险”。肃毒禁毒越凶，市场上毒品越少而价格也就越昂贵。在高利润驱使下，总会有那么一些亡命之徒会挺身试法。对于他们，各国政府也空前一致地开始了一场被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肃毒缉毒战争。

世界肃毒战

坤沙投降后不久，“金三角”又出新霸主。

“……如果我们能缴获阻截百分之十，也就谢天谢地了。”

麦德林集团的覆灭。

耗资七十九亿美元的肃毒战争计划。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毒品在全世界肆虐，无论在入欲横流的欧美，还是赤地千里的非洲，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毒品贩毒组织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成千上万的男女成了它的攫取目标，为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犯罪活动和恐怖活动注入疯狂的动力，而这种犯罪活动又使它变得更加猖獗和难以消除。国际社会公认非法毒品泛滥已经成为本世纪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近十多年来，各国缉毒机构所收缴的毒品数量成倍成倍递增，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毒品泛滥的程度。

联合国禁毒机构统计资料表明：一九七五年时，全世界一共没收了三吨可卡因，到十年后的一九八五年，没收量达五十六吨，一九八六年又达八

十四吨！海洛因的情况也一样，一九七五年则仅收缴二吨，一九八四年上升到十二吨，一九八五年则升至十四吨，而到一九八六年竟达二十八吨！

国际刑警组织的官员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一日在巴黎指出：被揭发的非法贩毒案件数量的增加，说明世界范围内毒品走私、吸毒情况日趋恶化。

联合国驻维也纳机构负责人拉莫斯·加里诺指出：过去数年里没收的毒品数量是爆炸性的，但仍没有缩小世界非法毒品市常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尽管人类有社会制度的差异，有意识形态领域的鸿沟，但是在共同的毒魔面前，世界各国携起手来，结成空前广泛的战线，展开了世界范围的旷日持久的扫毒战争。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七日，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了空前规模的反毒禁毒大会，有一百三十九个国家的部长级代表团和一百七十三个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举行如此规模的集会探讨国际性犯罪问题。

会议首先代表全人类向那些在反毒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人默哀一分钟。决定每年六月二十六日为“国际反毒品日”。

会议提出的肃毒案共分四章：毒品需求的预防和减少；毒品供应的控制和监督；取消非法毒品贸易；吸毒者的治疗和恢复正常工作。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就国际合作及本国处理有关毒品问题的具体措施交换了意见，许多国家举办了各种展览，展示了打击毒品活动中的新情况和新经验，联合国国际信息部门也发行了大量的背景材料，为开展国际扫毒战提供了情报。会议通过了一项政治声明，声明宣布世界各国在毒品问题上负有“集体责任”！

一年后，仅二十四个联合国成员国就销毁了鸦片二百八十三吨，古柯叶五千零四十六吨，大麻一千七百八十五吨。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联合国新闻部与麻醉品委员会共同筹办首次“国际反毒品纪念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向全世界发表文告，指出贩毒和吸毒已使数百万人丧生，还削弱了各国的经济，给人类造成很大的危害。文告告诫人们，吸毒有害身心健康，并使许多家庭破裂，由吸毒引起的犯罪案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文告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和持久的行动”，共同解决吸毒和贩毒的问题。

其实自联合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其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成立了“麻醉品委员会”，希望将毒品置于国际联盟的控制和监督之下。

一九六一年，世界性的《毒品单一公约》诞生，一九六四年该公约生效。目前全世界已有近一百三十个国家参加了这一公约。

一九七一年，联合国又通过了《精神调理物质公约》。同年，成立了“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品基金会”。

一九八四年，联合国又通过了《管制麻醉品贩运和麻醉品滥用的宣言》。宣言指出，毒品贩卖滥用是一种“国际犯罪活动”，“需要给予最迫切的注意和最优先的考虑”，毒品犯罪活动妨碍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威胁到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与发展。宣言认为，消灭毒品犯罪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

客观讲，在毒品问题上世界各国也是难得的异口同声，同仇敌忾。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联合国国际合作取缔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生产、供应、贩运和分销问题特别会议”。几乎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届联大主席约瑟夫·加尔巴在开幕词中指出：“全球性的毒品问题是

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大问题，必须强化反毒措施，采取全球行动！

出席联大的会议代表一致通过了《政治宣言》和大张旗鼓在全世界禁毒的《全球行动纲领》。

会议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一九九一年至二〇〇〇年为联合国禁毒十年！

世界上第一次各国人民都拥护的战争——世界肃毒战全面开始了。世界各国建立起一条无形的联合战线，作战的主攻方向首先选择在“金三角”、“金新月”和南美亚马逊河冲积平原这三大毒品发源地。

“金三角”是指地处缅甸、老挝、泰国三国交界处，包括缅甸的掸邦、泰国的清莱府和清迈府，以及老挝上寮西北部共约二十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缅、泰、老挝三国都管而三国又都管不了，统治这片土地的首领们称自己为掸国。五十年代，国民党李弥残部开始在“金三角”种植罂粟。国军撤走后，“金三角”崛起了两大贩毒集团，一个是罗星汉集团，一个是坤沙集团。

六十年代是罗星汉集团的黄金时期，每年鸦片毒品贩运倒卖量在二百吨以上，收入高达六七百万美元。

一九七三年二月，罗星汉集团在同坤沙集团的冲突中被击败。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缅、泰两国政府联合行动，在美国援助的二十四架直升飞机掩护下，攻陷了罗星汉集团总部。同年，罗星汉在泰国被捕，但越狱逃走。一九七四年他在马来西亚落入法网，引渡回缅甸后被判终身监禁。

坤沙逐步发展成为金三角的“毒品大王”，控制着“金山角”地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毒品生产和贩运。坤沙的海洛因加工厂能够提炼出纯度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四号海洛因，他生产提炼出的海洛因年产量可够全世界的吸毒者吸两年！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坤沙集团的鸦片年产量为六百吨，八十年代最高额为七百吨，但一九九二年猛增至一千五百吨。一九八五年销至美国的海洛因百分之十四来自“金三角”，一九九一年增至百分之五十六。这两个数字说明坤沙蒙泰武装集团的实力在增强，它在缅甸境内的海洛因提炼厂就有十几个。一九六九年十月，缅甸政府曾诱捕坤沙成功。五年后，坤沙重归山林。

八十年代，美国“毒品管制局”将坤沙列为世界一号大毒枭，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炳将军上台后的泰国政府曾出动二十多个连攻占了坤沙的大本营万欣德，但坤沙在给予泰军重创后撤至缅甸一边。

经过多年经营，坤沙的武装实力最高峰时达二万多人，并且装备精良。“金三角”的鸦片年产量也达到三千吨，对各国都危害巨大。八十年代后期，与“金三角”地区有关的国家对贩毒集团发动了大规模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总体战。泰国实行“收成灭绝”计划，捣毁罂粟田；推行“改植”计划，劝说“山地民族”改种农作物；修路架桥，打破山区的封闭状态；围剿贩毒部队，扫荡海洛因提炼厂。

缅甸从一九八七年末到一九八八年，展开了一场大规模扑灭毒品的运动，在二万公顷罂粟田里使用枯叶剂。美国为缅甸提供了几十架先进的军用直升机，专供肃毒使用。

开始，政府军集中对坤沙领导的泰武装发动了三次大攻势，先后占领了一些武装据点。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政府军又开始对坤沙武装开展

了新的军事行动。

而在这之前，国际禁毒合作得到加强，缅甸政府同联合国和邻国积极合作，国内国际环境变得对坤沙集团越来越不利，坤沙的蒙泰武装开始分裂。坎威领导的掸邦少数民族约一万人脱离了坤沙并准备与政府实现和解。

大分裂后，蒙泰武装力量大大削弱，坤沙也被迫辞去有关政治和军事职务。一九九六年年初，缅甸官方两次宣布，在位于缅泰边境的洪孟、瑞兰、孟托、孟塔等地，蒙泰武装分子有五千零二十六人从一月五日至十二日先后向政府军投降，缴械轻重武器三千四百八十三件，以及一座兵工厂和两座弹药库。据可靠消息，投降者中包括坤沙本人。

坤沙投降了，不等于毒品生产马上可以根除。在缅甸的国际扫毒机构说，坤沙的灭亡对“金三角”地区的毒品贸易有一定影响，但不会根除，因为就在坤沙投降后不久，就又冒出了一个堪称“金三角”海洛因霸主的人。

“金新月”地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三国边境，有三千多公里边境线，包括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伊朗锡斯坦和阿富汗沿边各剩因它的形状像一轮弯弯的新月，故称“金新月”。该地区战火连绵、治安混乱，以及落后的经济刺激了毒品种植与制造业的剧增，大有取代“金三角”在世界毒品市场的地位之势。

七十年代末，由于东南亚干旱严重，加之政府频频扑毒，“金三角”地区鸦片欠收，世界各地海洛因价格暴涨，“金新月”的毒品经营者们趁此良机，成倍成倍地扩大鸦片种植面积，竖眉横眼挤进了竞争激烈的世界毒品市场，并在西欧独领风骚。

一九八一年，“金新月”的鸦片产量达八百吨以上，是当年“金三角”和墨西哥鸦片产量之和的两倍。一九八七年，“金新月”的鸦片产量又骤然增至一千三百六十吨，一九八八年，又持续上升到一千四百吨！

开始，“金新月”只在伊朗及伊朗与土耳其的边境地区有简易的海洛因提炼作坊。后来，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继而又是两伊战争，加之土耳其迫于美国压力，对地下海洛因加工厂控制很严，打击严厉，海洛因提炼中心也随之南移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狭长地带，并在当地重金聘请了东南亚的化学师为他们传授海洛因提炼技术，再加上流浪世界各地的毒品技术人员自带设备，纷纷云集“金新月”出计献策，使阿、巴边境很快成了举世闻名的海洛因提炼中心。

“金新月”的崛起，为欧洲吸毒者提供了很好的吸食条件。

由于“金新月”所产的海洛因比“金三角”和墨西哥等地产的海洛因劲大，价格还相对便宜，加之供货渠道简捷通畅，很快成了欧洲市场的抢手货。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政治、宗教因素等原因，“金新月”的毒品一时难以根除，只有想法堵住其各条运输渠道。难怪美国缉毒局驻巴基斯坦首席长官杜温戈扼腕惊呼道：“这里的毒品问题远远超过我们以前所遇到的金三角或土耳其的毒品问题。在巴基斯坦这一地区，各部落间的海洛因提炼厂公开营业。

全无顾忌。从这里运往欧洲和美国的的海洛因，如果我们能缴获阻截百分之十，也就谢天谢地了。”

但是美国并不灰心，为堵住这股毒流，美国毒品管制局甚至成立了“西南亚海洛因特别行动处”，专门对付各条输送海洛因的通道，大批经过专家

门训练的缉毒人员开赴当地，与毒品走私者一见高低。

南美洲是继“金三角”、“金新月”之后兴起的第三大毒源。

八十年代后，其毒品产量和销量有后来居上之势。在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牙买加、秘鲁和墨西哥这五大毒品生产国中，哥伦比亚位居其首，毒品严重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以玻利维亚为例，该国第一产业就是古柯种植和加工。全国三分之二的耕地用于古柯种植，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古柯业。一九八六年，该国可卡因产量高达五百吨，非法收入近五十亿美元。

哥伦比亚是世界最大的可卡因贩运国，每年毒品成交额在六百亿美元到八百亿美元，当今世界百分之五十的可卡因来自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的麦德林贩毒集团，是世界有史以来最残暴凶狠也最有钱的贩毒集团。

一九八二年麦德林集团为了追杀绑架了贩毒大王奥乔亚胞妹的“四·一九”游击队，派出杀手先后杀害了一百多人。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清晨，他们杀害了哥伦比亚力主肃毒的司法部长罗里戈·拉腊，因为这位司法部长曾发动对贩毒集团的全面进攻并取得赫赫战绩。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他们又在匈牙利杀害了拉腊的继任者巴瑞何。

八十年代后期，拉美的主要毒品的种植国不断对毒品经营者进行打击。例如在哥伦比亚，一九八六年就销毁古柯六百六十万株，一九八七年又狠狠打击了麦德林集团，捕获了这个集团的第四号大头目卡洛斯·勒德尔并将他移交美国受审。在墨西哥，一九八七年共摧毁罂粟种植园和大麻种植园九千二百三十个。

贩毒集团也进行了凶残的报复。仅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六日——十八日，他们就杀害了审判过毒枭的大法官马吉斯特·卡洛斯·巴伦西亚，高级警官瓦尔德马·富兰克林·金特罗和自由党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等哥伦比亚政界、法界要员，然后又组织了近千人的“死亡小组”，分赴全国各地，一共杀害了哥伦比亚五十多名高级法官，一名内阁部长，二十二名新闻记者，杀害了哥伦比亚第二大报总编以及几百名警察与执法人员。

但是哥伦比亚各界人士并没有在这种恐怖中屈服。在巴伦西亚和加兰遇害后，哥伦比亚总统巴尔科在电视中代表政府作出最强硬反应，并向贩毒集团宣战。

巴尔科总统的电视讲话播出后，美国政府立即无偿地支持哥伦比亚二千万美元，并运去十五架武装直升飞机和大批现代化武器装备，以声援那里的肃毒战争。

一九八九年九月初，哥伦比亚警方首先逮捕了麦德林卡特尔集团中的“洗钱能手”罗梅罗。九月十四日，捕获贩毒集团头目佩莱斯和布埃诺。同时，美国国防部派出七个军事小组，乘专机赴哥伦比亚。

一个月内，警方共收审了一点一万名毒品嫌疑犯，捣毁了包括大毒枭埃斯科瓦尔的“圣那布利斯”大牧场第二号头子加查的别墅等毒巢，控制了六百多个大牧场，捣毁了二百六十八个毒品加工厂，收缴可卡因二十三吨，大麻叶八千吨，正式逮捕了产毒、制毒、贩毒分子二千七百多名。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麦德林集团第二号人物加查及其儿子、著名毒贩弗雷迪和十五名保镖全部被直升飞机及地面部队击毙。

一九九二年，麦德林集团第一号毒枭埃斯科瓦尔束手就擒。

美国是世界上受毒品危害最严重的国家。由于国力雄厚，它在世界范

围内的肃毒战中也是最卖力的一个国家。从八十年代开始，反毒工作就由副总统亲自抓。

从一九八二年起，联邦有关机构即雇佣了大批缉毒人员，派往巴黎、马赛、汉堡、罗马、伊斯坦布尔、贝鲁特、曼谷、香港、新加坡、汉城等世界各地的毒品中心，从事毒品调查侦辑。

一九八六年，美国针对玻利维亚和秘鲁的贩毒活动实施“爆炸火炉行动”，充当起扫毒运动的“国际十字军”。同年底，纽约联邦法院审判了八名黑手党毒贩的主要头目。一九八八年，美意两国警察采取了“圣迈克尔日闪电行动”，破获了由意大利黑手党、卡莫拉和恩德朗盖塔三大黑社会组织控制的国际毒品组织。

肃毒战所需经费在美国也大开绿灯。一九八一年联邦肃毒经费为八亿美元，一九八八年跃升至二十六亿美元。一九八九年美国国会压缩了星球大战计划费在内的财政预算，批准了布什总统提出的耗资七十九亿美元的肃毒战争计划。

世界其他国家也采用不同手段对贩毒活动予以沉重打击，从而在全球形成无比巨大的力量。但人类面前的禁毒道路还很漫长，它要求各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协同作战，彻底肃清这场席卷全球的瘟疫。

一场世界范围内规模空前的肃毒战争，正在紧张而激烈地进行。毫无疑问，这是事关人类前程的一次战争，人类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向瘟疫和灾难开战！

二、“世纪之疫”：艾滋病

同毒品相比，艾滋病的历史要短得多。但由于它和“吸毒病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全球性蔓延，又同样高比率地出现在一个高危险人群中，所以成了与“吸毒病相提并论的两个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世界瘟疫。

艾滋病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疾病，对之尚有许多未知的因素，其中包括它的起源。

目前，比较可信的推断是一种来自中非绿猴的变异性病毒。由于这种绿猴同人类很接近，很可能猴子咬伤人而将这种病毒越过人和兽的界线侵入人体。又据《华盛顿邮报》来自扎伊尔的消息说，那里的人屠宰和食用猴肉，因而通过接触猴血而感染病毒。

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科学家声称，第一例感染此病的同性恋者看来大约出现在七十年代中期。但由于艾滋病的传染性类似乙型肝炎，而不像麻疹、流感那样容易传染，也不像霍乱、鼠疫一些致死性流行病那样发作快，几小时或几天内就死亡，所以没有立刻引起重视。艾滋病的潜伏期长达二~五年，有时甚至十年以上。虽然此病比某些瘟疫扩散慢，但死亡率却最高。鼠疫和霍乱的死亡率为百分之五十，天花为百分之四十，而艾滋病则百分之百！

“人类历史上威胁最大的病种”

“二十世纪的鼠疫”已跨过大西洋太平洋……

“艾滋猛于虎！”

亚洲将占感染人数的最大比例

一九六九年，一个名叫罗伯特的美国人死于一种当时医学尚未认识的怪病。医院冷藏了他的部分组织。

一九八一年六月，美国同性恋者盖尔及他的两个同性恋伙伴先后被诊断患上了卡波西肉瘤（亦称皮肤多发出血性血管瘤），这种病通常只出现在地中海裔男性身上。

他们相继死去。

紧接着，一批年轻的美国男同性恋者相继死于这种怪病。医学专家们对此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这些男同性恋者身上并没有癌细胞。

进一步的调研表明，这种在男同性恋者中蔓延的怪病有一个特征，即人体免疫力严重缺损。于是他们把这一过去不曾出现的疾病命名为“男同性恋者免疫缺陷症”。

到一九八二年三月，专家们已发现分散在十七个国家的二百八十五位该病患者。

同年五月，美国已有九百名患者。专家们注意到，并非全部患者都是同性恋者，异性恋爱者、嗜毒者、血友病患者和儿童都有染上此病的。于是专家们重新将这一新病种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一种后来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威胁最大的脖由此正式在人类世界中登台亮相。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简称艾滋病（AIDS 的音译），AIDS 是英文四个字头的缩写：

A（获得性）——指此病并非遗传性疾病，也非药物引起。

I（免疫）——指与同体内免疫系统有关。

D（缺陷）——指免疫细胞缺少。

S（综合症）——指患者出现的症候群。

艾滋病的中文译法，还有“爱滋病”，“爱之病”，乃至“爱死病”等等，看上去似乎各有特色。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艾滋病并不是由“爱”而引起的。一九八三年六月，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家首先从 AIDS 病人的淋巴结中分离出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继而学者们发现，在 AIDS 病人和被感染上 HIV 但表面健康的人的血液内都存在 HIV 抗体，即 HIV 抗体呈阳性。

艾滋病的症状并不典型，最初的症状同伤风、流感类似，但发展下去将出现下列症状：耳后、颈部、腋窝和腹股沟等处淋巴结肿大，在身体其他部位出现紫色或深血色肿块，不仅不消失，而且越来越大，极易碰伤或出血，体重急剧减轻；疲劳乏力、没有胃口；发烧、出虚汗、干咳、气短、腹泻；身体虚弱，动作不协调；出现疱疹，疼痛发炎，口腔及咽部出现白斑。进而在患者免疫缺陷进一步加重的基础上，就会出现一系列机会性感染、卡氏肉瘤或其他恶性肿瘤的表现。

最近发现这种病毒还会侵入脑细胞和中枢神经系统。据估计有百分之三十的患者会出现精神和神经性症状：记忆力衰退、口齿不清、颤抖，以致痴呆。

艾滋病自一九八一年在美国被正式确诊以来，患者增长的势头很大。在我国，也发现了近千个病例，主要是通过性接触、吸毒而感染的。当前这种“二十世纪的鼠疫”已跨过大西洋和太平洋传播到世界各地。更可怕的是，艾滋病已打破仅限于迄今为止公认的几个高危人群——同性恋者、静脉麻醉药瘾者、海地移民、血友病患者的范围。

一九八一年，艾滋病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全球大约有一万名感染者。

一九八三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首次举行有关艾滋病的国际会议，制订了一项全球战略，以预防和控制这种流行极为迅速的传染病。一九八七年五月，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这项战略，并宣布设立一个由多个领域专家组成的卫生组织“艾滋病问题全球委员会”，以提供专家指导和咨询意见。到一九八七年九月止，约有一百二十七个国家报告了近六十五万个病例。但卫生组织认为，这一数字未能充分反映实际情况，它估计，当时已患艾滋病的人数约有十万到十五万，已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约有五百万到一千万。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认为，艾滋病是一嘲空前规模的全球性挑战，它侵袭和威胁所有国家，不论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富国和穷国，也不论其经济和政治方向如何。”他说，艾滋病提出了“难办的社会、人道和法律问题，有破坏我们社会必须赖以运转的结构的风险。”

一九八七年第四十二届联大首次审议和讨论了艾滋病问题。

十月二十日大会举行了防治艾滋病问题的特别全体会议。秘书长在致词中指出：“艾滋病问题，像核武器问题、全球发展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一样，是影响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未来的一个重大问题。防止艾滋病，在许多意义上说都是一场全球性战斗”。在全体会议上，由卫生组织总干事等人介绍了该组织防止艾滋病全球战略的工作，并指出如果国际社会不作出共同努力，艾滋病就可能蹂躏人类，使世界保健服务机构失去战斗力。大会通过了第一个专门关于艾滋病问题的第四二／八号决议，确认继续由卫生组织领导和协调全球防治艾滋病的紧急战斗，赞扬卫生组织对艾滋病进行全球性预防和控制所作的努力，决议还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系统和其他组织按照卫生组织的全球战略，协调一致地防止艾滋病的流行蔓延。

一九八八年，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局决定将原“艾滋病特别规划”更名为“艾滋病全球规划”。这项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减轻这种感染对个人和社会的有害影响；动员并促使各国和国际社会联合一致、共同努力与艾滋病作斗。

规划特别强调，预防是这一战略最重要的目标。随后，卫生组织在一份关于全球防治艾滋病进展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贫困迫使男人离家外出寻找工作，人们产生消极绝望情绪，转向吸毒以求解脱，贫困迫使妇女和儿童卖淫为生，从而使整个社会极易受到艾滋病的伤害。而艾滋病反过来使社会更加贫困，于是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

由于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而且是社会、经济和发展问题，联合国系统的许多机构都已把越来越多的力量投入到同艾滋病作斗争中。

一九八八年联合国决定每年十二月一日为世界防治艾滋病日，并在当年十二月一日纪念了第一个“世界防治艾滋病日”。

秘书长在讲话中说，这种疾病正以每分钟有一人被传染的速度在蔓延，“我们必须加紧努力，找到疫苗和其他手段来防止艾滋病的传染，并希望治愈已经受传染的人”。但三年后的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这一天，秘书长在纪念讲话中已经把希望变成警告来提醒世界：“艾滋病如果不加以控制，最终就可能成为对人的健康和发展的最大灾难，它将超出贫困的损害。”当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四十六届大会通过会议，促请各会员国将艾滋病的流行问题放在高度优先地位，应制订强有力的国家艾滋病方案来防止这种病毒的传播。决议还强调需要保护受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人的人权和尊严，应在提供服

务、就业和旅行方面避免对他们采取歧视性行动。

艾滋病蔓延的速度经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要快得多，致使卫生组织几次修正自己认为是高估的预测。卫生组织在八十年代末期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预计，九十年代，艾滋病毒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的妇女和儿童中间迅速传播，将有三百万育龄妇女患上艾滋病，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卫生组织的预测数字还显示，艾滋病将成为九十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儿童的头号杀手，小儿艾滋病将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性威胁，预测到二

年，全球将有一千万婴儿和儿童染上艾滋病病毒，其中大多数将死于艾滋病。同样令人震惊的预测是，届时还有一千万不满十岁的未被感染的儿童将因其父母死于艾滋病而成为孤儿。研究报告显示，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妇女越来越多。由于生理原因和社会原因，妇女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有高风险。儿童则成为最年轻的受害者。这份报告说，艾滋病很可能使八十年代在儿童生存方案取得的重大成绩化为乌有，可能会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城市人口平均寿命降低六岁。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博士说：“由于执行儿童生存方案的结果，儿童死亡率已大幅度下降。现在，由于艾滋病，我们担心这一进步将被葬送”。

到一九九二年初，艾滋病病毒已经感染了一千二百九十万人，其中七百一十万人是男性，四百七十万人是女性，而儿童竟有一百一十万人！在这些感染者中，已有二百六十万人发生了艾滋病，其中二百五十万人已死亡。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份资料显示：世界每天有五千多人感染 HIV，预计到二 年，世界将有一千二百万——一千八百万艾滋病病人与四千万 HIV 感染者，其中百分之八十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世界各国的 HIV 感染者中以非洲的乌干达为最多，一九九二年七月该国公布已有一百五十余万人感染了 HIV，占该国总人口百分之九，艾滋病病人达二十三万人以上。该国政府指出，在该国内战期间，每年战死者仅四百人，但现在每年死于艾滋病的军人就有二千人，真可谓艾滋猛于虎！美国也是艾滋病病人最多的国家之一，当时已有二十万艾滋病病人。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底，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最新数字：全世界迄今共有一千七百多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其中四百多万人患上了艾滋玻目前全世界每天大约有六千人感染上艾滋病毒。

流行特点：一、蔓延速度快；二、已从城镇蔓延到农村；三、发展中国家发病率高；四、亚洲地区，特别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呈高速上升趋势。卫生组织估计，到二 年，全世界的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将大约增加一倍。

而美国哈佛大学艾滋病国际中心的四十多位专家所得出的结论要比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更残酷。他们预测，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到二千年时会达到一亿两千万，而亚洲将占感染人数的最大比例。

而事实是，全球范围的艾滋病流行确已完失控了。它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在美国，一千名第一批艾滋病患者就消耗了十五亿美元。据统计，在一九八一年——一九九一年的十年中，全世界为艾滋病付出的直接费用高达二千四百亿美元。预计到二 年，每年的费用将达到五千亿美元。而近年来，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艾滋病蔓延造成的财力上的巨大付出已使其失去了持续发展的能力。艾滋病迫使很多国家劳动力短缺。在乌干达，由于艾滋病流行，大批劳动力死亡，致使咖啡丰收无人来

摘，土地荒芜无人耕种。

在亚洲，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趋明显，而由此引发的性产业也颇为兴旺。由于艾滋病主要由性交传播，在亚洲其扩散速度之快令人膛目结舌。仅一九九五年一年内就增加了八倍，艾滋病感染者首次超过非洲。

其中，扩散速度最快的国家是印度、缅甸和泰国。

印度艾滋病感染者现在已有一百七十五万，到本世纪末将会达到四百万。印度艾滋病患者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在孟买这座印度的金融中心，以及主要的国道旁。这些公路旁开设着众多的妓院，为过往的司机们提供服务，这些司机正是艾滋病的传播者。

在印度尼西亚，据官方估计艾滋病感染者到二〇〇〇年可能会达到二百万。在这个国家，艾滋病感染者多数是城市居民，来往于这个岛国的海员水手们也把病毒带到了其他偏远的海岛。

在菲律宾，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艾滋病感染者大约有一点八万人。这个数字虽低于泰国，但情况却不乐观，因为那里卖淫嫖娼现象十分严重。

艾滋病在亚洲蔓延的势头非常快。专家们估计，到二〇〇〇年时，亚洲各国艾滋病感染者将从现在的三百五十万上升到一千二百万，占全球的百分之二十五——三十。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就会付之一疫。这不由使我们想起公元前二〇〇〇年——三〇〇〇年盛极一时的古巴比伦王国。当时，人们因性的放纵和混乱而导致性病丛生，体质衰弱，死亡率迅猛上升，最后一代文明古国自我毁灭了。然而，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并未引起亚洲各国足够的重视。

正如联合国艾滋病预防计划负责人 Peter Piot 所说：“亚洲是世界上艾滋病流行最快的地区，但是那里的人民看起来对此没有什么认识。”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柬埔寨，甚至连医生和护士都对艾滋病缺少了解。最近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大多数医院中的护士都认为艾滋病是外国人所患的一种疾病，不会在柬埔寨人身上传播。

在菲律宾，宗教界人士反对任何形式的性教育。政府曾实施过一项全国性的艾滋病预防计划，但处处受阻。

一九八七年，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印度政府要提防艾滋病，但遭到了印度官员的嘲笑：“在西方发生的事决不会在印度发生。”泰国人也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泰国人是免疫的。”四年之后，印度卫生部公布，全国有艾滋病者一百万。据透露，最近泰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也有八十万，因艾滋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八十七亿美元。

在中国，艾滋病的流行处于初始阶段，但有关报告表明，它的流行速度较快。

据统计，目前已将近有十万人受到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比两年前增长了十倍，而且仍在加速扩散。感染面已从云南、东南沿海、北京、哈尔滨等向全国各地蔓延，且势头迅猛。沿边、沿海和大城市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发区，吸毒、卖淫、嫖娼、同性恋是感染的主渠道。除云南静脉吸毒感染外，其他地区大多通过性行为传播。感染者中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人员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对于高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应尽早敲响警钟。

如何面对“世纪之疫”

与艾滋病最密切相关的几种性行为。

艾滋病侵袭母亲和儿童。

各个时代的“世纪之疫”。

由于到目前为止，人类一直未能攻克治疗艾滋病这一难关，而预防艾滋病的疫苗也没能研制出来，就使得对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只能用教育来完成。

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本身所具有的感染性都是终生的。但人不能通过肉眼发现一个人是否患有艾滋病和已感染艾滋病病毒。只有通过验血才能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那么如何避免被传染上艾滋病呢？这就要从艾滋病的传染途径说起。

科学家从艾滋病病人的几乎所有体液中都发现了艾滋病病毒，这些体液包括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月经血、乳汁、尿液、粪便、唾液、眼泪、脑脊髓和肺泡液等，但其中在传播上有意义的主要是精液和血液，月经排出物和乳汁次之。由此可见，性接触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美国著名的金西性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与艾滋病的性传播最密切相关的性行为有以下五种：有多个性伴；肛交；与妓女性交；非常规性关系；

在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的城市与人发生性关系。也就是说，避免这五种性行为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艾滋玻但要注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艾滋病还有别的传播途径。

血传播。艾滋病的血传播是指通过输血或血制品、使用被血污染的针头、注射器或其他刺破皮肤的器械导致的传播。由于静脉吸毒者中间使用针头、注射器前往往不消毒，非常容易导致艾滋病毒的交叉感染。而这就是吸毒人群中艾滋病发病率高的原因，因为哪怕输入一个单位的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血就有百分之一百被感染的可能性。

艾滋病还可以在分娩前、分娩时或分娩后不久由母体传染给胎儿或婴儿。

对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调查的结果表明，各种传播途径导致的艾滋病感染其比例如下：性交，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母婴传播，百分之五——百分之十；共用针头吸毒，百分之五——百分之十；输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

没有证据表明艾滋病病毒可以经呼吸道、消化道或经人际生活接触而传播。也没有证据表明艾滋病病毒可以经昆虫、食物、水、厕所、游泳池、泪液、汗液、共用餐具、电话或旧衣服而传播。

但“医护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毒”这一说法已被推翻了。到一九九二年夏，美国卫生医务人员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六千余人。估计是因为医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被污染的器械和特殊接触引起的双向传染造成的。

艾滋病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全人类的传染病。由于艾滋病的流行，人类的性、生殖和血液等环境都恶化了，因此对人类社会的震动是巨大的。而艾滋病侵袭的又主要是二十——四十九岁的较年轻的人，所以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甚至政治的稳定构成了威胁。所以人们应该看到，艾滋病蔓延不仅是个疾病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

因此，人们应该重视家庭价值观，通过洁身自好的健康生活方式，防止艾滋病的传播。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世界卫生组织为在巴黎举行的控制

艾滋病政府首脑会议准备的材料中指出，艾滋病的迅速蔓延对人类社会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它不仅削弱人类生产能力、滞缓世界经济发展，而且已构成了贫困的新因素。由艾滋病引起的费用不论对穷国或富国的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都将造成摧毁性打击，把病人家庭推向贫困。

在工业化国家，每一个艾滋病病人的直接医疗费用估计在二万五千美元到十五万美元之间。而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对已经紧张的卫生资源又增加了巨大负担，尤其是在那些每年人均卫生预算仅为几元钱的国内。

艾滋病也侵袭母亲和儿童。在某些地区，因艾滋病病毒感染而致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已破坏了儿童保健方面取得的进步。因此可以说，艾滋病正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成就。

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有关的社会经济压力已成为重大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对艾滋病的恐惧威胁着人们，跨国的旅行和交流受到限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仍有歧视某些特殊群体、种族和民族的倾向。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威胁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任何解决问题的尝试都可能面临可怕的挑战。

但其实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人类的疾病史就会发现，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伴随着这个时代的令人恐怖的“世纪之疫”。例如十三、十四世纪的麻疯病，十五、十六世纪的梅毒，十七、十八世纪的黑死病（鼠疫），十八、十九世纪的霍乱、黄热并肺结核，二十世纪的癌症等等，都曾让人们束手无策，引颈待毙。

而且，艾滋病从迅速、凶猛的程度上讲远远还比不上黑死病和霍乱。但为什么艾滋病引起了全球空前的震动呢？

也许艾滋病的出现从根本来说是对工业文明以来物质主义的纵欲文化的一个重大打击，它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疾病的范畴，仿佛一个从天而降的报应之神，在伊甸园以外的人群中激起了恐怖、惊慌和反思……艾滋病出现后，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曾经具有过的道德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艾滋病与不道德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九十年代的精神特征是提倡宽容与对话，艾滋病病人也是人类的一员，他们自身也许并没有罪过，他们的行为也是在现行的法律范围之内，同大多数人一样。

德国柏林的一座自然博物馆里有一条碎石铺成的小路，每一块碎石上都刻着一个西方各国文化、艺术界的名人的名字，他们都死于艾滋玻这条被叫作“沉思路”的小路上已经留下了一千多个名字：作家让·保罗·阿隆，演员安东尼·霍金，导演西里尔·科拉……“是病魔夺走了他们的生命！”我们也许会如此悟出，疾病才是人类真正的敌人，它夺走了最优秀的人的生命。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确任重道远，与疾病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在一九九五年七、八月间，在扎伊尔的基奎特市发生了又一种罕见的传染玻这是自一九七六年该病在扎伊尔埃博拉地区首次发生以来第二次发作。该病同艾滋病一样，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染，但潜伏期更短，只有二——二十一天，主要特征是突发高热、便血、吐血及全身器官出血。患者在十天之内即死去，无药可医。

将来还会出现什么怪病呢？什么才是万病之根呢？这些问题都无从回答。活着的、健康的人所能牢记并努力去做的，只有理解、关怀和爱，当然还有洁身自好。

让我们重温自一九八八年以来的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全球共讨，征服有期；青年与艾滋病；共同迎接挑战；社区承诺；是行动的时候了；艾滋病与家庭；……显而易见，今后的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将很难像现在这样年年更换，它也许很快就会出现重复。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就希望世界艾滋病日出现这样的主题：“艾滋病与特效治疗”。

悲剧布鲁斯

1983—1985年：非洲大饥荒

概况：当今世界，大饥荒的灾难仍然高悬人类的头上。

一九八三年起，非洲发生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干旱和饥荒。非洲五十个国家和地区就有三十四个大旱，二十四个国家发生大饥荒，一点五~一点八五亿人受到饥饿威胁。一九八三年就有一千六百万人死于饥饿与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一九八四年死亡数字更高。联合国称这次大饥荒为“非洲近代史上最大的人类灾难”，全世界都在呼吁“救救非洲！”人类必须高度注意全世界的粮食安全，警惕大饥荒的再度降临。

中国《人民日报》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发布消息：非洲经历着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干旱和饥荒。

从非洲北部至南部有三十四个国家遭受大旱，二十四国发生了饥荒，一亿五千万至一亿八千五百万人受到饥饿的威胁。遭受灾害严重的地区河流干涸，田地龟裂，黄沙弥漫，牲畜倒毙，至少一千万人背井离乡，东奔西走寻觅食物。日内瓦红十字协会说，一九八三年非洲有一千六百万人死于饥饿或与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一九八四年的死亡数字肯定更高。联合国称这次大旱为“非洲近代史上最大的人类灾难”。

到一九八五年底，大饥荒使上百万人成为幽魂。在荒凉的非洲大地上，回荡着一曲古老、悲痛、幽咽的布鲁斯。

热带的厄运：“饥渴”的大地

非洲一半以上的地区终年炎热。从飞机上俯视非洲大地，一片单调的红褐色。泰戈尔说：我们生活在热带的淫威之下，每时每刻为了最起码的生存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沙漠、半沙漠挤去了非洲三分之一的大地。这是一个难以穿越的迷宫，正午气温可高达摄氏五千多度。

非洲，全称阿非利加洲，希腊语意为“阳光灼热”。面积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点二，次于亚洲，为世界第二大洲。人口六点六二亿，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三，次于亚、欧两洲。非洲的粮食作物种类繁多，有麦、稻、玉米、小米、高粱、马铃薯等。还有比较稀奇的特产土薯、大蕉、椰枣、薯芋、食用芭蕉等，也是裹腹之物。

非洲是世界上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地区，语言约有八百种，大多数居民属于黑色人种，许多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的至今还处于原始的部落阶段。

作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非洲最早驯化和饲养动物，广布于撒哈拉和南部非洲的一二千—三千年前的岩画上的牧放牛群，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早在六千多年前，埃及人就发展了灌溉农业。公元七—一四世纪，阿拉伯文化和基督教均在非洲传播，出现了穆斯林国家和基督教国家。中世纪时期，北非、东北非和西非的农牧业生产已达到较高水平。

然而，非洲是一块“饥渴”的大地，粮食问题一直异常严峻。饥魔几乎年年困扰着非洲。

从飞机上俯视，一片单调的红褐色，间或点缀着淡绿的刺槐、角豆和白胡椒树。

地面不时出现大片黑渍，那是灌木林在一场大火之后给干旱的草原留下的片片烧焦的黑毯。成群的牲口穿越其间，一行行的就像打在窗上的雨点。尖顶的茅屋构成一处处村落，周围散布着矮小的谷仓，就像母羊身边偎着羊羔。酷暑季节，地面上看不到一条河流，连一条小溪也没有。这，就是非洲。

从地面上看，眼前依然是单调的景色：干枯的灌木，红色的飞尘，砂石色的住房。女人头顶水罐，拖着疲惫的双腿前行。男人骑着自行车，在一条漫长土路上颠簸。旷野上有几株硕大的猴子面包树，树身宽阔，到处暴出肿块，枝杈细长，上面结着奇形怪状的果实，像是拴在绳子上的瓶子，一年当中只有三四个月有雨，然后就是漫长的旱季，猴子面包树粗大的树身里储藏水份，为了减少蒸发，树叶全部脱光。老鼠和白蚁还随时可能吃光谷仓里的粮食，蝗害威胁着地里的庄稼，在广达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的“萃萃蝇”生息区，人畜受到巨大危害。这，就是非洲。

非洲属于热带气候，其气候特点是高温、少雨、干燥，炎热的赤道横贯中央。

这块“热带大陆”的大部分处于南北回归线之间，全年平均气温在二十摄氏度以上的地带占全洲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五（除了极少数例外，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年平均气温超过二十摄氏度的地区），其中一半以上的地区终年炎热。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达洛尔年平均气温为三十四点五摄氏度，是世界年平均气温最高的地方之一。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这一天，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以南的阿齐济耶，气温竟高达五十九点八摄氏度，创下了有史以来气温最高的世界纪录！

除了刚果盆地和几内亚湾一带属热带雨林气候之外，黑非洲广大地区或为热带草原气候，或为热带沙漠气候，降水分布不平衡。年平均降水量在五百毫米以下的地区占了全洲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这已是发生干旱的界线。年平均降水量在二百毫米以下的地区占全洲面积的三分之一，有的地区终年几乎无雨，这些地方是旱魃年年肆虐之处。

这正是热带的厄运，同样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感叹到：我们生活在热带的淫威之下，每时每刻为了最起码的生存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非洲恶劣的生存空间还包括沙漠，撒哈拉沙漠、纳米布沙漠、卡拉哈迪沙漠和一些干旱草原、半沙漠地带挤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非洲大地。其中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东西长五千六百公里，南北宽一千六百公里。

里，面积七百七十七万平方公里，占去非洲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二。

这里植物贫乏、人烟稀少，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人。这是一个难以穿越的迷宫，烈日烘烤下的沙海升腾着股股热浪，狂风吹起的黄沙使沙丘在混茫中慢慢移动。这是一个舌噬活物的死海，正午时分酷热可高达五十多度，入夜，气温骤降，可至零下二十五摄氏度。炎热的、裹挟着漫天黄沙的“哈马丹风”从撒哈拉吹向周围的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培尼亚、尼日尔和乍得等，使人们苦不堪言。

热带气候和沙漠造成土地干裂、风沙侵蚀使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等恶劣的生存状况，使饥魔得以久久肆虐非洲大地。

造成饥荒的“秘密”：人口膨胀和生态危机

在正常的年景下，五个非洲人中，至少有一个吃不饱肚子。随处可见农民们在“刀耕火种”。照此速度，到二一年，非洲的森林将全部消失。在一年内撒哈拉沙漠竟向南推进了二百公里。在一万年以前，撒哈拉却是大草原。非洲一些国家照搬苏联模式。联合国的计划还没有实现，大饥荒已经来临。

非洲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平均居世界第一，一九八一年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三，远远超过位居其后的拉丁美洲和亚洲。失控的人口加剧粮食短缺的危机。大饥荒之前，非洲的人口以每年增加百分之三的速度增长时，农业的增长速度却只有百分之一点九，已经难以解决吃饭问题，在正常的年景下，五个非洲人中，至少有一个吃不饱肚子。

非洲广大人民的文化素质很低，一字不识的就有一点六五亿，成年人中的文盲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这部份人无疑使非洲的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同时，不从事粮食生产的城市人口增长过快。非洲进入八十年代后，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城市人口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九，三十年间城市人口增长三倍，赤道附近地区增长四倍，其速度不仅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也大大超过了亚洲和拉丁美洲。农村中的青壮年男子和妇女移入城市，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加重了小农业生产方式供养人口的负担。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随着人口增长日渐加剧。

非洲四处是分散、小型的农业村庄，随处可见农民们在“刀耕火种”：殖者先得刀劈斧砍，清出一块荒了六年到三十年的灌木丛或者森林，撂在那里晒一段时间，然后一把火烧掉，留下一地烧成木炭的断根残株和厚厚的草灰。非洲的农民长期并不用犁来耕种。这种地种过一、两次就让其进入休耕期，地面上重新长出灌木和幼树。只要休耕期足够长，在土地贫瘠的热带，这是一种合理的、不会破坏生态的耕作方法。使刀耕火种成为生态悲剧的是人口爆炸，稀疏的农业是无法解决稠密人口的粮食问题的。人口的激增使人们过度开垦、缩短休耕期。由于长期不施肥料，土壤肥力退化，单产大幅度下降，如马拉维的利隆圭玉米产量在一九六二年为每公顷产一千七百六十公斤，到一九八五年仅有一千一百公斤，减产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土地越来越贫瘠，越来越裸露于太阳光线的强烈照射以至干坼，整个生态系统陷入恶性循环。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他们的牲口是这一悲剧的另一主人公。

游牧民族的人口也在增长，养活一个人，要四至五头牛，人口的增长自然而然意味着牲畜数量的增长。非洲的过度放牧，往往使沙上草地在两三年内就变成一片片荒凉的沙丘。植被被不能承受的牧群破坏，土壤暴露在阳光下的程度更加严重，湿度下降，植物越加难于生长。牲口蹄子的践踏将土踩得时松时紧，不易保存水分。

于是下雨时大部分雨水都流走了，渗入地里的很少。作为最后一个环节，由于植物减少，土地反射的阳光增加，即反照率增加，地温上升得慢。由于雨水是温暖、潮湿的空气上升造成的，雨水甚至比以前更少了，直至发生旱灾。

人口的增长使得滥砍滥伐的现象更加严重。非洲的森林覆盖率为百分之二十一，而世界平均森林覆盖率约为百分之三十。非洲的森林面积减少急剧，平均每年减少三千七百万公顷，占非洲森林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其中仅西非就减少一千二百万公顷，相当于有些非洲国家全部的森林面积。照此速度，到下个世纪的二十一年，非洲的森林将全部消失。在本世纪初，象牙海岸共有一千五百万公顷森林，到八十年代只剩下五百万公顷以下的森林。一九四一年，埃塞俄比亚森林覆盖率还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四十年之后，其森林覆盖率只剩下不到百分之四。以前弄一担柴只需走一两个小时，现在却得花一整天。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雇工要把收入的四分之一用来买柴火。滥伐森林加快了水土流失的速度，冲下来的淤泥使下游的灌溉系统难以应付，使水库的库容水量减少，灌溉渠道效率降低。一位环境问题作家把滥伐森林称作“穷人的能源危机”。

人们肆无忌惮地垦殖，毫无节制地放牧和滥砍乱伐原始森林的结果，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是整个非洲的沙漠化。

非洲赤道以北，有百分之十一的土地受到水蚀影响，百分之二十二土地受风蚀影响，萨赫勒—苏丹地带，沙漠化的速度在加快，本世纪以来，沙漠已南移一百五十公里。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和利比亚每年也失去大约十万公顷的牧场和农田。

布基纳法索（原名上沃尔特）首都瓦加杜古周围五十公里的地方，往昔是郁郁葱葱的热带稀树草原，如今已是沙漠和半沙漠。往昔人们总以为撒哈拉沙漠向南推移的平均速度是每年十五公里，而通过对比研究一九八二年八月和一九八三年八月的卫星照片，专家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一年时间内，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竟向南扩张推进了二百公里！

沙漠的扩张并不像一支军队那样齐头并进，就像在布基纳法索那样，先是在人口聚居的地方或者水井周围出现一片沙丘，然后沙丘向外扩展，相互衔接，最后形成一整片沙漠。

沙漠的前卫就像有毒的菌种随风飘来，无声无息却又要致人于死境地滋生蔓延。

这种灾难性的过程在整个萨赫勒地区都在发生，从沙漠边缘的马里一直到苏丹，向南延伸到象牙海岸、尼日利亚和加纳北部人口稠密的耕作区。撒哈拉沙漠就像在沙地里挖出的一个大坑，流沙向四边扩展，使整块整块地区无法居住，把人群和牲口都赶向南方，加重那些地区的负担，使那些地区有朝一日也要面临同样的厄运。

撒哈拉沙漠，就像地球肌体上的一个癌变区，不断吞噬着地球健康的

肌体，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大。谁又想象得到，几千年前，这个“恶瘤”竟是一片辽阔的大草原和茂密的大森林。

在海拔一千米的恩阿杰尔大山脉的岩画上，刻着鸵鸟和水牛，他们都是绿色世界的动物，岩画上并未找到沙漠之舟——骆驼。在利比亚费然山的岩画上，刻绘着气势壮观的车马战争场面。一定有大草原供撒哈拉的先民养殖大量马群。

在尼日尔的艾尔山脉两侧、阿尔及利亚的恩阿杰尔以南现已干涸的提梅尔索伊河和塔法萨塞特河的宽阔河谷中，考古学家获得了惊人的发现。在这个不毛之地，他们发现了远古人类居住的大量遗址，仅恩阿杰尔山脉中新石器时代的石建村庄遗址就有一百多个。

这一切说明，在公元前八千年到公元前二千年的后寒武纪潮湿期，撒哈拉并不是如今满目黄沙，而是泉水叮咚、雨水充足、草木茂密的大草原和大森林。到公元前四千年，撒哈拉地区的人民已经开始大量牧放牲畜，他们创造了繁荣的撒哈拉文化，懂得了制造长矛和战车，进行过掠夺与保卫的战争。

正是人为的种种破坏及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化，使繁荣的撒哈拉文化彻底消失，使大草原竟然变成了今天地球上面积最大、危害最甚的沙漠！

世界银行的一位官员忧心忡忡地说：“非洲人口若是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该大陆更加无法解决它所面临的极端贫困、疾病肆行和环境恶化问题。”

非洲在六十年代有过经济短暂兴旺，七十年代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大为放慢，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一九八一年以前，增长率小于百分之一的有十个国家，负增长的十二国，增长百分之一~五的二十一国，大于百分之五的只有四国。一九八一年，非洲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七百五十二美元，在黑非洲，人均国民收入为二百六十美元（最低的莫桑比克仅有几十美元），在世界各洲均为最低，而且人均国民收入每年都在下降。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中，非洲占了二十八个，成为举世仅有的最贫困大陆，有人甚至说，非洲已陷入“第四世界”。

非洲是世界上债务最多的地区，沉重的债务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一九八五年非洲外债达一千七百四十亿美元，为一九七三年的十倍，超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还本付息额为二百零四亿美元，占出口收入的百分之四十。非洲外债正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速度递增，成为一个几乎不可能偿还的天文数字。

非洲的经济结构极端畸型，绝大多数国家依靠一二种初级产品出口维持生计，基本上没有制造业，而且交通、教育、卫生等设施异常缺乏。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卡住非洲国家的脖子，长期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信贷条件苛刻。

近年来，世界一、二级初级产品下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低水平，工业制成品价格成倍上涨，一九八四年仅非洲农产品出口收入就比一九八一年减少四十多亿美元。例如被誉为“黑非洲的楷模”的科特迪瓦，在七十年代以前，经济曾持续二十年高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七），但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其主要出口产品可可和咖啡价格的暴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七年，黑非洲出口额下降了百分之五十，损失了二千四百亿美元。大多数非洲国家外汇收入连年减少，而进口费用却成

倍增加。许多非洲国家指出：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由于盲目地追求现代化，非洲国家普遍不重视农牧业生产，忽视和减少了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粮食收购价过低，挫伤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这是很大的失策。非洲在五六十年代独立时，一些领导人受到原苏联的影响，把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模式搬到了非洲，结果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效率很低；一些领导人受到当时西方凯恩斯主义思潮的影响，照搬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模式，滋长了依赖性。

总体上说都是选择了计划经济或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又由于当时非洲国家缺乏现代化管理人才和可供遵循的法制措施，管理中漏洞较多，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丑陋现象也开始滋生并流毒至今。有的国家不顾国力，基建规模过大，背上沉重的包袱。许多企业管理混乱，效率极低。

非洲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战乱不断，使这些国家正常的经济生活难以继，并且军费负担沉重。南部非洲局势剧烈动荡，莫桑比克称其独立以来遭受南非侵扰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三十八亿美元；乍得、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国防费用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五十；安哥拉的石油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从以上三点分析可以看出，非洲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为破坏必将危及人类，给农业和粮食造成重大损害；非洲粮食自给率已从六十年代的百分之九十八下降到七九年的百分之八十三，就在这十来年期间，非洲已由一个粮食净出口地区变成了一个净进口地区。六十年代非洲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二点六，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粮食生产增长率下降为百分之一点三，远远小于人口增长率。人均粮食占有量不断下降，一九七 为一百七十二公斤，到一九七九年只有一百四十六公斤了，许多非洲国家的人民得不到起码的热量（每人每天一千六百卡，约每年一百五十公斤粮食），大批居民营养不良，甚至挨饿。

一九八 年，在联合国世界粮食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中列举了面临粮食奇缺的二十六个国家，就有十七个是非洲国家，其中有的实际上经常处于饥饿状态。

从一九三五—一九八三年，非洲粮食的平均年增长率再次下降，下降到了只有百分之一点一四，而同期间全世界谷物平均年增长率是百分之二点三七。可我们不要忘记，这期间非洲每年要净增人口一千七百—一千八百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粮食供应情况进一步恶化。

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际，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个农学家小组，对非洲的粮食状况作了评定，认为二十二个国家的危机看来即将来临。这些国家是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佛得角群岛、中非、乍得、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莱索托、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斯威士兰、坦桑尼亚、多哥、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专家小组断定需要供应四百万吨紧急用粮，以免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一点四五亿人民中将有人在饥荒中饿死。

当联合国许多计划还没有实现，许多报告还没有引起重视时，大饥荒已经来临！

大地的葬礼：大饥荒惨状

一九八二——一九八四持续三年的特大旱灾。卡那毛庄

族灾民只好吃同类以求生存。在坦桑尼亚每天饿死一千五百名儿童。以带壳的甲虫、令人恶心的虫子充饥。所有的骨骼关节和脉管神经暴露无遗，如同一具木乃伊干尸。孩子艰难地挪动着，一只黑色的秃鹫蹲在后面。

一九八四年非洲各国农业部长在津巴布韦的拉雷召开了非洲区域的粮食会议。

与会部长们一致认为，一九八一年有关粮食生产和粮食损失的“拉各斯行动计划”确定的目标没有实现。会议通过了《哈拉雷宣言》，表示要把农业置于各国发展的优先地位，以便解决粮食问题并监测农业发展的进展情况。出席会议的成员意识到各国政府赋予他们解决粮食问题的责任，并重申要担当发展农业的重任以提高本国自力更生能力的决心，会议通过对发展农业的有关政策，如价格政策给予了极大的注意。然而，哈拉雷会议以后人们的努力并没有能够扭转非洲在农业和粮食问题的颓势。

热带的厄运使非洲几乎年年干旱，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八四年，这块大陆更是年年发生较大的旱灾。一九七三年，西非的塞内加尔、尼日利亚等国家发生大旱，干旱夺走了三十万人的生命。一九七八年博茨瓦纳、安哥拉、南非大旱。同时，让人揪心的是，这期间很多国家还出现政治动乱，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乍得、乌干达等。天灾再加上人祸，非洲渐渐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

进入一九七七年，非洲每年都有多达二十—三十个国家发生粮荒，其中经常严重缺粮的国家有十五个，即莱索托、安哥拉、赞比亚、佛得角、博茨瓦拉、科摩罗、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乌干达和乍得，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差不多要占非洲总人口的二分之一。正是由于干旱、蝗等天灾，农业问题、人口膨胀、政治动乱、战争等人祸造成了灾难。

在连续遭灾的情况下，一九八二—一九八四持续三年的特大旱灾发生了。受灾范围从南部非洲一直到东非、撒哈拉沙漠附近地区，遍及三十四个国家，而其中二十四国面临严重的粮荒，受灾人口几乎占非洲总人口的半数。这二十四个国家是：乍得、安哥拉、佛得角、埃塞俄比亚、贝宁、博茨瓦纳、中非、几内亚、莱索托、冈比亚、加纳、马里、尼日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塞内加尔、斯威士兰、坦桑尼亚、津巴布韦、索马里、象牙海岸、多哥、赞比亚。这次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的受灾程度远远超过一九七三年的西非大旱。

其中一直风调雨顺了若干年的南部非洲遭遇了五千年来的最大旱灾。布基纳法索、中非、冈比亚粮食均减产百分之五十；毛里塔尼亚在一九八三的整整一年只收到一万五千吨粮食，国家的财政也告罄；加纳出现巨大的粮食缺口，达二十万吨；贝宁的粮食仓库空空如也，存粮告罄；多哥的国库存粮只剩下三千吨，只够全国人吃三天；斯威士兰、莱索托一九八三年降水量只有往年的一半，粮食产量减产四分之三；连被称为“黑非洲玉米粮食”的津巴布韦也粮食欠收，竟出现西南部约二百万居民缺粮的灾情。

西北沿海诸国，尼日利亚旱情异常严重，全国十九个州中九个州遭灾，受灾人口达一千五百万；喀麦隆的北部地区，人们在七个月的时间里没见到下一滴雨，不得不纷纷跑到干涸的河床上挖坑汲水。撒哈拉沙漠吹来的炽热的哈马丹风更是助纣为虐，象牙海岸、加纳、贝宁等国，灌木竟自己燃烧起来，树林中火灾四起，天火将人们苦心经营的许多大种植园焚为一片片焦土。

一九八三年，世界上第一大大可可生产国象牙海岸，由灌木野火引起的火灾使二十五公顷的可可树林化为乌有，可可年产量锐减八万六千吨。

非洲最西部的塞内加尔，塞内加尔河、冈比亚河等重要河流干枯，往昔壮阔的河水如今成了溪水般的细流，结果大西洋的海水倒灌入干枯的河床，沿河流域的大片良田被冲成贫瘠的盐碱地；塞内加尔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高粱、花生、粟等主要粮食作物减产近一半，其户北部和中部许多地区花生等全部枯萎，颗粒无收；塞内加尔的八个大区普遍遭灾，尤为严重的两个大区缺粮率竟高达百分之九十四。

只见烈日下的塞内加尔，大地生烟，白晃晃一片，地面反光强烈到刺人眼睛。

西非萨赫勒的八个国家，历来是非洲干旱最严重的地区，从一九七一年以来，这个地区已经遭受四次严重干旱。这一地区还一直是撒哈拉沙漠扩张肆虐的对象，饱受土地沙漠化之苦。如今，一场旱情最严重、受灾面积最大的干旱又降临在萨德勒地区的人民头上。

一九八三年，萨德勒地区雨季来得很晚，而且很快结束，降水量创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尼日尔河的洪水每年都将肥沃的淤泥冲入尼日尔河套地区，但一九八二年人们望眼欲穿地盼着的洪水不见一点踪影，结果特南古地区的稻谷只种上了九十公顷，这个可怜的数字还不到往年的四千六百公顷的百分之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香蕉园因干旱全部枯萎，水果、蔬菜均被烈日烧死；乍得因干旱造成的缺粮，一九八二年为十九万二千吨；一九八三年情况更加恶化，缺粮二十三万五千吨；马里的降水量跟往年相比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五十，土地干坼，粮食收成大减，干旱使马里缺粮约九万四千吨。

“饥渴”的非洲大地上，旱魃奔袭扫荡，所到之处，赤地千里。饥魔紧随其后，恐怖笼罩了非洲，数以亿计的非洲人民受到了饥魔的严重威胁。

在埃塞俄比亚，饥饿的人们涌向巴提难民营，一个只有足球场大的帐篷里挤着一万六千人，盼望着过往的车辆发放食物，每天大约有一百二十人在这种盼望中悲惨地死去。埃塞俄比亚全国人口不到四千六百万，而处于饥饿折磨和死亡威胁下的就有七百万人，其中百分之四十七是十四岁以下的儿童。

在乌干达，竟然出现同类相食的悲剧，绝望的卡那毛庄族灾民只好吃同类以求生存。乌干达共有十万灾民陷入饥馑。

在塞内加尔，仅牲畜就死了一百五十万头，村庄、道路两旁，饥民的尸体和倒毙的牲畜处处都是，惨不忍睹。

在津巴布韦，三十万头牛被饿得不能食用。

在毛里塔尼亚，牛羊中的百分之四十、骆驼中的百分之十五死亡。

在坦桑尼亚，每天饿死一千五百名儿童。

昔日较为翠的马萨伊地区而今沙尘满天，成为不毛之地。

曾经山青水秀的东非大裂谷地带，而今满目枯黄，动植物奄奄一息。

在莫桑比克，饥魔已经夺走了十万人的生命，并且还有上百万的人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

在尼日尔，一个小女孩在她写的向人们呼吁救援的信中说，两年了，她的村子始终没见到一滴雨。村民们已经连续二天以上没有吃东西，她的小弟弟已经受不住先饿死了。

在毛里塔尼亚，大旱使百分之八十的草地变成沙漠。饥饿的农牧民涌

入城市，沿路到处是他们的帐篷。城里的粮食被吃光后，饥民们四处觅寻小动物，挖地三尺，以带壳的甲虫充饥，甚至有人吃自己亲人的尸体。

在乍得，旱魃和撒哈拉沙漠交相进逼。肥沃的田地沙漠吞噬，赖以生存的牧场失去踪影，一座座牧民小村子不再有人。牧民们从北纬十六度被赶到北纬十四度，沿途吃尽了自己的牧群，然后又开始吃狗、猫、老鼠及其他令人恶心的虫子。在半沙漠地带，人们被饿得来掘食植物的根茎、捡食地上的树叶，许多人由于不能消化吃下去的根茎和树叶而死去。大地上一片龟裂，裂缝最宽处可以伸进人的腿，举目四望，不见一点绿色。

在苏丹，从苏丹港到喀土穆的公路上，尘沙飞扬，饥民们饿得只剩下骨头，有气无力地挪动着脚步。不时有人倒下不再起来，尸体被挪到路边。许多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互相倚靠，坐以待毙。一个摄影记者照下了瘫坐在路旁的濒死的母子三人的照片：母亲的目力已经呆滞，大约三十四、五岁，上身完全赤裸，颈子下面的锁骨明显地突出，酷似被一层皮肤所包着的两根弯曲的棒槌，两只乳房由于严重缺乏营养而干垂，耷拉在小腹上，由于饥饿两支手臂细长得惊人；一个不到二岁的幼儿含着母亲的奶头不放，好像要将母亲全身的血液都吸走；另一个孩子瘦得以至让人无法判断其性别与年龄，头显得特别大，眼睛闭着，连抬起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皮肤没有血色，没有水分，使后臂、腿脚上的所有骨骼关节和脉管神经暴露无遗，如同一具木乃伊干尸。

非洲一些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始设立救济站，成群结队的灾民拼命向救济站涌去，使得救济站成为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

一九八五年的大旱，使原有的五百万非洲难民人数迅速增加，仅苏丹一国难民总数就有一百二十万人，而且平均每天从邻国涌入了三千名难民。在非洲经褐色的大地上，只要一发现了水，成千上万的灾民立即蜂涌而至，搭起一片密密麻麻的窝棚。干裂的大地上到处都是饥民，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的食物。

爱尔兰籍著名摇滚歌星鲍勃·吉尔多夫在看了英国 BBC 广播公司播映的新闻纪录片《埃塞俄比亚饥荒》后感叹不止，他说：纪录片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墙的颜色，上万名难民中只有三百人得到救济品，而这救济品只是一盆牛油。没有领到救济品的人满面愁苦地往墙后站，这道墙就是一条生与死的界线。

许多受为国都陷于战争之中。战争使交通阻断，救援粮食无法送到受灾地点，使得混乱加重，饥荒更快地蔓延，人民挣扎在战争和饥饿的水深火热之中。

非洲大饥荒给非洲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一九八四年全洲农业大规模受损，粮食产量比一九八一年几乎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八。撒哈拉以南的南洲地区作物产品出口总值，一九八六比一九八一年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五，使主要靠初级产品出口维持经济的许多国家陷入财政困境。救灾投入的人力物力消耗了巨大的国力，一九八四年非洲粮食进口高达三千二百万吨，远远超过四百万吨的七十年代初的粮食进口量，给本来就贫穷的非洲国家带来巨大负担。

一个年轻的美国摄影师在非洲经历了揪心的一刻：在荒野上他突然看见一个孩子，趴在地上，艰难地挪动他大大的脑袋和小小的身子，向营地爬去，而他身后的几米处，蹲着一只黑色的秃鹫，它在等着孩子再也爬不动的

时候。

摄影师拍下的这张照片后来获得了美国普利策新闻奖。非洲，许多人从不关心，从不了解的大陆，它的惨状震惊了全人类。在这片古老、幽闭、神秘的大地上，这里的人民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惨重的灾难与毁灭！

“救救非洲！”：全球大救援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联合国紧急呼吁。中国决定再捐五万吨。国际社会共调入非洲灾区六百万吨粮食。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前往灾区。世界歌星为非洲歌唱，十五亿人收看。联合国纲领虽订出，但行动拖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对非洲忧心忡忡。

“救救非洲！”是联合国许多国家政府发出的紧急呼吁。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访问了埃塞俄比亚的灾区后说：看到这些饱受饥饿和苦难的面孔，人们必定会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类团结的必要。

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在大饥荒上。为保证联合国能够对受灾国的紧急需要作出及时和最有效的响应，一九八四年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决定临时成立非洲紧急行动处，以承担整个联合国系统、国际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协调及合作工作，掌握灾情和调拨紧急救灾物品等。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瑞士日内瓦万国宫里，来自一百四十八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关于非洲紧急形势会议”开幕，讨论向旱情严重的二十多个非洲国家提供紧急援助问题。德奎利亚尔在开幕词中说：“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估计非洲的形势和我们正在采取的措施的实际效果，动员必要的补充资源。会议共二天时间，主要讨论遭受严重旱灾的非洲国家的特殊需要和向二十个灾情最严重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的问题。希望整个国际社会做出大大超过以往的努力！”

开幕式上，萨德勒地区国家抗旱斗争常设委员会主席、尼日尔总统孔切和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先后发表讲话，呼吁在向非洲受为国家提供紧急援助的同时，能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以求根本消除非洲饥饿和贫困现象并使非洲获得持续的发展。

会议期间，各国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对黑非洲悲惨处境的同情，积极提供紧急援助。在三月十二日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李鹿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继去年捐赠十二万吨粮食后，今年上半年再捐五万吨，作为对非洲的紧急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怀着极大的同情密切关注着非洲国家所遭受的旱灾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局势。我们负责尽快使紧急援助物资运交受灾国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非洲人民的紧急援助将不遗余力！”

这次大会取得了成功，三月十二日大会闭幕。会议主席兼非洲紧急行动局长布雷德福·莫尔斯在闭幕词中说：“此次会议确认了国际社会在向受干旱和饥饿之害的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提供支持中所承担的义务。为了满足受灾国的紧急需求，我们必须立即筹集不少于十五亿美元的补充基金。我们最优先的任务是动员补充财源，以满足受害最严重的国家和紧迫需要。”

一九八五年，国际社会共调入非洲灾区六百万吨粮食；二十个受灾国

紧急需要约达三十三点八亿美元，到当年底约百分之八十五已到位；国际社会还提供了大批的车辆、药品、疫苗、衣被等急需物品。世界的四面八方都向非洲伸出了援助之手。

德奎利亚尔在灾区看到了许多救助人员忘我工作的动人情景时，赞扬说，他们的献身精神是为人类服务，人们应该关心全人类。

“救救非洲！”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呼声。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英国 BBC 广播公司播放了新闻纪录片《埃塞俄比亚饥荒》，虽然只有十四分钟长，但全世界的观众都为之震惊。深受感动的摇滚歌星鲍勃·吉尔多夫组织了一场空前的演唱会，演唱会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几十名世界歌星为非洲歌唱，十五亿观众收看了电视现场卫星直播。演唱会为非洲难民筹集了八千万捐款。

在比利时，瓦隆地区的农民发起“救救埃塞俄比亚”行动，募集了一百吨的奶粉。二月四日首批二十吨奶粉在两位比利时农民的护送下用飞机运抵埃塞俄比亚。

在前西德，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发性募捐活动。一些民间慈善和救济机构将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定为“非洲日”，这一天，许多人走上街头，为捐助奔走呼号，总统魏茨泽克为活动专门发表电视讲话，经济合作部长把“募捐罐”带进了内阁会议，请内阁成员当场捐款。汉堡的一位退休妇女把她的福利支票兑成现金捐款。“非洲日”这天全德国共捐款六千万马克。

美国洛杉矶的儿童献出积攒的零钱。一个美国失业者把她的衣物救济金捐寄给埃塞俄比亚。

在日本，人们开展“非洲日”捐助活动。民间发起“捐献一顿午餐”活动，人们省下自己的午餐费用捐献给苦难的非洲饥民，日本外务省也出面支持。

“救救非洲！”活动使世界上许多人第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非洲，开始了解、关心这片大陆，意识到广大非洲人民也是人类大家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八六年，根据第四十一届联大的要求，秘书长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救助非洲危急经济情势的报告。报告说，国际大家庭和非洲人民可以引为自豪的是，由于作出了全面及时的有效反应，因而避免了一场大悲剧，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减轻了数百万人的苦难。

但是，也应看到，“救救非洲！”并没有解决非洲大饥荒的根源。联合国后来的若干纲领也鲜有成效——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一日，经非统组织要求，四十届联大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通过决议决定召开的讨论非洲危急经济情况的第十三届特别联大的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强调非洲的发展危机是一个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危机，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会议一致通过了《一九八六—一九九〇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这项纲领优先处理的领域是农业、环境、基本设施、人力资源和外部资源。五年期间，全部执行纲领中的措施需要一千八百八十一亿美元，其中非洲国家承诺提供八百二十五亿美元，约占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其余四百六十亿美元（每年约九十亿美元），将由外部提供。

纲领虽订出，但行动拖后。一九八七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对进一步恶

化的非洲经济形势表示担心，呼吁紧急增加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一九八八年，秘书长向大会作的年度报告中说：“恶劣气候及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使非洲大多数国家难有喘息的机会”，他要求发达国家应该履行承诺。实际上，预期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没有实现。

一九九一年九月，联合国大会专为审查和评价“行动纲领”而特设的“全体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对“纲领”执行情况的评价报告。它认为“行动纲领”过于乐观，指出“纲领”规定的经济增长、粮食安全、人力投资和减轻债务等项指标已经全部落空，非洲很多国家以及非洲整体的经济状况都有下降。

为履行对非洲发展的承诺，一九九一年联合国通过了《一九九一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这一议程侧重于各项具体目标，其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达到每年百分之六的实际增长率。它还要求国际社会扩大参与，以帮助非洲实现经济多样化和减轻债务。

非洲的形势令国际担忧。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埃及人布特罗斯·加利在一九九二年联大年度报告中说，非洲的政治形势“很难经受得起沙漠化、饥荒和穷困不断的袭击”，他特别指出：非洲的经济状况特别令人担心。大多数非洲人今天比他们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建立独立国家时更穷。在世界上四十七个最不发达国家中，全非洲就有三十二个。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非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二年内穷人人数量会增加的低收入地区。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总债务等于或超过其经济产出的地区。

事情到一九九四年底仍无改变，此时全世界共有四十八个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就有三十三。非洲的发展面临着内部、外部的极其复杂的困境。唯有非洲本身真正奋力追赶，国际社会把大力支援非洲发展作为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非洲才会有希望。人类越来越认识到，一个经济停滞、长期落后、天灾人祸不断的非洲是不符合人类理想和共同利益的，应该把进一步发挥非洲丰富的自然和人力潜力作为促进人类经济和社会总进步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彻底避免大饥荒的人类悲剧。

“粮食安全”：警惕世界粮食危机

世界粮食大会《宣言》：每个男子、妇女和儿童都有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一个人每年至少需要一百二十五公斤粮食。本世纪前苏联、印度、中国、柬埔寨、孟加拉国和非洲的大饥荒。中国的援非工程。一九九一年，饥荒又临非洲。人类必须高度注意全世界的粮食安全，警惕大饥荒的再度发生。

当今世界，一方面严重的饥荒威胁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亿人口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另一方面粮食生产“过剩”的阴影又经常笼罩着某些发达国家，产品滞销，农场破产。产生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是世界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的结果。粮食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解决，是许多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以及遍布全球的科学研究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学者专家们至今仍在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所谓“粮食安全”，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保证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饭吃。供库存的谷物储备量、耕种休闲地所得谷物产量是世界公认的粮食安全指

标。粮食安全是全球性的问题，不难想象，如果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填不饱肚子，这个世界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因此，这是余粮国家和缺粮国家的共同问题，需要整个世界一起来解决。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罗马召开了世界粮食大会，通过了《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世界宣言》。该宣言声称：每个男子、妇女和儿童，都有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消灭饥饿是国际社会大家庭中每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有援助能力的其他国家的共同目标。

同时，粮农组织理事会也通过了《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该《约定》认为，保证世界粮食安全是一项国际性的责任，并要求有关国家“保证世界上随时供应足够的基本食品……以免严重的粮食短缺……保证稳步地扩大粮食生产以及减少产量和价格的波动”。《约定》首先要求各国政府采纳保证世界谷物库存量最低安全水平（即全年谷物消费量的百分之十八）的政策。

按粮农组织和国际卫生组织规定的食物摄入量“最低临界限度”计算，每人每天为一千六百大卡，每年约需要一百五十公斤粮食，这只能维持人们的最低体力消耗或稍高于一个人在休息状态时所消耗的能量。如果仅以维持生命而言，每年至少也需要一百二十五公斤粮食，约相当于每天一千三百多大卡。

一九三三年，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总干事爱得华·萨乌马提出粮食安全新概念。它包括三个具体目标：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们都能获得粮食。此议一出，得到了粮农组织理事会和大会的支持，这些组织号召尽可能广泛地实施这个新概念。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庆祝粮农组织成立四十周年的会议上，参会代表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世界粮食安全协约》。《协约》认为，各国政府负有确保本国人民粮食安全的基本责任，督促发展中国家促进国内粮食生产，作为避免饥荒的第一道防线。发展中国家应避免对进口粮食，特别是本国不能生产的基本粮食的依赖。《协约》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建议这些国家的政府为缺粮时维持粮食安全作准备，采取预报系统、应急粮食储备等措施。号召发展中国家促进乡村发展，尤其要着眼于穷人的需要，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协约》还要求发达国家在制定粮食生产、库存、进口和价格政策时考虑全世界的利益，向不幸的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帮助这些国家提高农业生产。

与“粮食安全”相反的就是“粮食不安全”，分为长期和暂时两种。长期的粮食不安全是长期没有能力生产或购买足够的粮食而引起的经常性的食品不足。暂时的粮食不安全是临时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饥荒就是暂时粮食不安全的最坏形式。

由于战争、政治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本世纪发生了多次饥荒，其中，比较大的饥荒为：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前苏联大饥荒。由于一九二二年前苏联部分地区雨水不足和一九二一年的旱灾，以及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战争和俄国革命引发的国家进一步解体使家事荒废，产粮区产不出粮食，结果是几乎一半的可耕地没有耕种。协约国的封锁和外国拒绝给前苏联商业信贷使饥荒更加恐怖。至一九二二年，前苏联有一百万平方英里和约三千万居民受饥荒的影响，据估计，有三百万人死于这场饥荒。

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孟加拉邦大饥荒。这场饥荒在一九四三年夺走一

百万人的生命，一九四四年又夺走五十万人的生命，死亡的绝大部分发生在农村。

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中国大饥荒。由于持续三年的旱、涝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等人为因素的破坏。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建国以来最大的灾难，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非洲尼日利亚（比夫拉）大饥荒。

有一百万人死于饥荒。

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一九七四年孟加拉国大饥荒。两次饥荒分别有四十三万和三十三万人死去。

一九七二年，印度大饥荒，死亡人数为八十三万。

一九七三年，撒哈拉沙漠国家大饥荒，死亡十万人。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死亡二十万人。

一九七九年，柬埔寨大饥荒，死亡四十五万。

今天，世界粮食安全仍然存在危机。世界人口在一九三 年为二十亿，今天，世界人口已经上升到五十三亿之多。人口增加最多的是发展中地区，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五，发达地区只增长百分之一。膨胀的人口导致对粮食需求的膨胀。就某种意义而言，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生活资料（首先是粮食）与人类自身这“两种生产”不断对立统一的历史。从世界范围来看，粮食是足够的，粮食总产量的增长仍高于人口的增长。然而从国家来看，如在发生非洲大饥荒的一九八四年，美国的人均产量为一千三百二十九公斤，加拿大一千七百一十七公斤，澳大利亚一千八百三十八公斤，他们的粮食出现“相对过剩”和“绝对过剩”。

而有些发展中国家则粮食严重不足，如巴基斯坦的人均产量为一百八十公斤，埃及一百八十四公斤，马里一百二十九公斤，尼日利亚九十六公斤，乍得只有九十一公斤，一九八四年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四十五个国家，平均人均产量为一百公斤。

世界粮食储存主要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四国，其中，北美可以说是世界粮仓，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异常严重的饥荒威胁着印度，正是靠着北美空前规模的援助，那场饥荒才勉强得以避免。然而，上述四个主要粮食出口国一而再，再而三地缩减粮食播种面积，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 年，上述四国的收获面积减产少了一千四百七十万公顷。

一九八一年八月，不结盟和发展中国家粮食和农业问题讨论会在朝鲜平壤召开，会议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总人口中，经常有十亿人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如果遇到全球性企业大面积歉收的年份，就会迅速增加到十一—十二亿人，甚至更多。

在营养不足的人中，有三分之二生活在南亚，五分之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要防止大饥荒的悲剧，发展中国家的紧迫任务是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地增加粮食生产，提高低收入者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发达国家也应改善国内分配不均的现象，同时更多地承担援助受害国家和地区的义务。

同时，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力图有效地控制人类自身的增长，将粮食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联系起来，形成良性循环。全世界各国都应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以免造成世世代代的祸患。

非洲自从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一届首脑会议通过《一九八六—一九九

年非洲经济复苏优先计划》以来，各国开始优先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增加农业投入，调查农业政策，发展农业科技，再加上转好的气候条件，各国农业大幅增产，马里、多哥、津巴布韦、赞比亚等国粮食连年丰收，达到自给有余，坦桑尼亚连续三年农业增产百分之四点七。不少学者甚至认为，非洲的潜力完全可以解决粮食自给问题。

非洲不少国家还积极开展“绿色革命”，大力兴建水利设施，改造、防治沙漠，开展集约经营——一九八九年马里政府邀请中国科学院治沙专家组进行防治沙漠化的全国综合规划——“马里绿色屏障工程”，计划建立二十六个治沙试验区；同时，马里的“尼日尔河开发办公室”，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已在马里境内的尼日尔河曲地段整治了五点五万公顷水浇地，其中四点五万公顷专门种植水稻。

中国援建的喀麦隆贝努埃河上游的“拉格多水利工程”使一万公顷土地获得灌溉，在中国农技专家指导下，一九八七年试种水稻，每公顷产量高达十三吨。

埃及实施的“新河谷计划”，将开发西部沙漠区约八十万公顷可垦荒地，为使游牧民定居，埃及北部新垦耕地六千五百公顷，并大力发展井灌，种植谷物和栽培果树，已初步取得了生态效应和社会效应。

利比亚先后完成的开发、改造荒漠的主要水利工程有：库夫赖绿洲灌溉工程、绿山山地灌溉工程、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市效污水灌溉工程，扩大灌溉面积、新垦耕地共二点三万公顷。

阿尔及利亚在撒哈拉沙漠区不断钻深井、发展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也取得明显的农业经济效益。目前正在进行规模较大的吉尔河水利工程（灌溉新垦区一点五万公顷土地）和“绿色屏障”工程（沿阿尔及利亚境内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营造一条东西长约一千五百公里、南北宽约二十公里，造林面积三百多万公顷的防护林带）。

沙漠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的尼日尔在兴建尼日尔河水利的基础上栽培大片双季稻，每公顷产量九—十吨（合每亩六百—七百三十三公斤），已远远高于非洲粮食的平均单产水平。

设在尼日利亚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的任务是为这个饥荒最严重的大陆解决粮食问题。研究所正取得一些突出的成就，其中包括通过释放昆虫利用生物手段抑制害虫，并且有选择地培育农作物，提高产量。该所已挽救了非洲最重要的一种粮食作物——木薯。

然而，由于自然条件和时间久远的人为因素影响，非洲的粮食问题仍然十分严峻。一九八七年，非洲又爆发了一场特大蝗灾，遮天蔽日的蝗群扫荡了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等几十个国家，尽管人们敲锣呐喊、燃火鸣枪，蝗群还是直扑农田、村庄和丛林，所到之处，农作物、树叶和草皮均被吃光，在蝗虫最密集的地方，每平方公里竟有蝗虫七千万只，一夜之间就吃光所有农作物。蝗灾肆虐四个月，使六百万顷的良田被席卷一空。

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旱情再起，一场新的饥荒又来了。

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十七国告急，大约在三千三百~三千五百万非洲饥民濒临饿死的悲惨境地，据联合国粮食组织估计，仅黑非洲就需要至少五百一十万吨的紧急粮食援助，否则，又将有上百万的非洲人饿死。尼日尔总统亲自向国际社会紧急呼吁，要求提供一百六十万吨粮食的援助。灾难终于在全世纪的又一次“救救非洲”的全面救援中沉重地拉上帷幕。

人类应该多关注一点多灾多难的非洲，多关注一点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非洲人民，多关注一点那些两眼无神、瘦骨嶙峋、衣不蔽体的非洲儿童。人类必须高度注意全世界的粮食安全，警惕大饥荒的再度发生！

挑战者的悲歌

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凌空爆炸

概况：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第十次发射升空后；因助推火箭发生事故凌空爆炸，舱内七名宇航员（包括一名女教师）全部遇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十二亿美元，航天飞机停飞近三年，成为人类航天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载人航天事故，使全世界对征服太空的艰巨性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

公元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十一时三十九分十二秒……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肯尼迪航空中心十英里上空，在“轰”的一声巨响之后，价值十二亿美元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凌空爆炸。

机舱内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这次空难的死亡人数之多，损失之大，是迄今最严重的一次载人航天事故。

蓝天霹雳

也许他们谁也没想到……走进机舱前的回头一瞥，也是最后一次望见这块人类栖居的大地。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美国的航天飞机中是佼佼者。在这次发射升空前，它已经成功地在地球和太空之间往返了九次。

“挑战者”号首航于一九八三年四月四日至四月九日，出色完成了两项任务：发射了一颗“跟踪和数据中继”卫星，宇航员走出“挑战者”号座舱，第一次进行了“太空行走”。在第二次飞行时，把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宇航员萨利·赖德送上了太空。

第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王赣骏博士参加了“挑战者”号的第七次飞行，并完成了失重状态下流体动力学的研究。

这次是“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第十次飞行。它的主要任务是观测时隔七十六年才回归地球一次的哈雷彗星，并进行一系列太空试验。

这次飞行也是美国航空和航天局计划在第一年进行的十五次航天飞行之一。按照这一计划，这一年的航天飞行次数将是历年来最多的。

“挑战者”号的这次飞行的原定日期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

但由于天气恶劣和其他一些原因，连续几天推迟了发射。

一月二十八日，总算等来了一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一夜凛冽的海风

吹散了卡纳维拉尔角上空的浮云，耸立在发射台上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深邃的蓝天映衬下，像一个翘首望天、积蓄着无穷力量的巨人。

这是人类对太空的又一次挑战。从一九八一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首航成功以来，在航天飞机的历史上，这是第二十五次太空探险。

由于航天飞机的前二十四飞行都安然无恙，全世界的人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次飞行也不过是今后的无数次成功飞行中的一次。

何况作为美国研制的第二架航天飞机，同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相比，它在结构、材料和设备方面都有一些改进：“哥伦比亚”号不装燃料时重量为七十五吨，“挑战者”号由于使用了改进的内部燃料箱，重量比“哥伦比亚号”号减轻四点五吨，因而能装载更多的货物；防热瓦也有所改进，采用了新型的加固硅片。

此外，宇航员的座椅、着陆系统、仪表盘都有所改进。

但一月二十八日这天天气虽然晴朗，气温却偏低。由于一夜的大风气温已骤然下降到零下四度，“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外壳上结了一层冰。

原定发射时间为上午九时三十分。但由于高空出现了强风等原因，又一连几次延迟发射。工作人员用了近两个小时来给“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化冰。

就在发射升空前二十分钟，在加利福尼亚坐在闭路电视前观看发射实况的转播的洛克韦尔国际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却另有发现。

他看见发射架和航天飞机下部挂着酒杯粗的冰柱！他不加思索就立刻打电话给美国航空航天局，要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推迟发射。

但专家们认为这无碍于“挑战者”号的第十次太空飞行。肯尼迪航天中心主任史密斯经过权衡后决定继续倒数计时。

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在航天飞机还有几秒钟就要升空时，计算机突然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故障，于是自动停止倒数计时。不过这次“挑战者”号似乎很幸运，计算机收集到的来自航天飞机上的二千多个传感器的数据都显示“一切正常”。起飞前二分二十秒，肯尼迪航天中心的电视实况转播解说员哈里斯向守候在电视机前的无数关心者宣布说一切尽如人意，航天飞机可以在十一时三十八分准时升空。

参加这次航天飞机的宇航员一共有七人。他们是：机长弗朗西斯·斯科比，四十六岁；驾驶员迈克尔·史密斯，四十岁；宇航员朱迪恩·雷斯尼克，三十六岁；罗纳德·麦克奈尔，三十五岁；埃利森，鬼冢，三十九岁；格里高利·杰维斯，四十一岁；女教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三十七岁。

机长弗朗西斯·斯科比曾是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后来成为一名高级飞行器的试验飞行员，一生与危险打交道。他幽默、开朗，成为全机组的核心与灵魂。

驾驶员迈克·史密斯，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担任过战斗机飞行员，多次获得奖章，其中包括海军特级飞行十字勋章和国家敢于战斗银星十字勋章。

宇航员朱迪恩·雷斯尼克，在余暇时喜欢弹钢琴，喜欢在音乐中寻找美的享受。

朱迪恩喜欢微笑，微笑中充满对事业和生活的信心。

宇航员罗纳德·麦克奈尔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在棉田的劳动中锤炼了他坚毅的性格。他梦想着到外层空间站去生活，在失重的太空中做试

验：吹奏萨克管。

格里高利·杰维斯满怀希望参加这次宇航旅行，他随身带着一面小旗子，这是他的母校巴法洛纽约州大学送给他的纪念品，他愿带着这面旗帜去开拓空间的探险。

埃利森·鬼冢生于夏威夷，他在孩提时代总爱光着脚板在咖啡地和麦卡达美亚墓地跑来跑去。他早就梦想着有一天去月球旅行。成为飞行员后，他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展鸿图。

克里斯塔·麦考利夫出生于美国波士顿，在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中学任教。她是一位有名的社会学女教师，已婚，并育有一儿一女。按计划她将在太空通过电视向美国和加拿大二百五十多万中小学生讲授两节太空课，还将在航天飞机上参加几项科学表演，录像后也要向学生播放，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太空教师”。

在七名宇航员中，女性有两位，即三十七岁的克里斯塔·麦考利夫和三十六岁的朱迪恩·雷斯尼克。而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七名宇航员中唯一来自民间的克里斯塔·麦考利夫。

美国航天局是在五十多次载人飞行后，才决定要载“平民”乘客登太空。里根总统提议，第一位平民宇航员应该是一位教师。

这无疑是教育工作者的巨大荣幸。消息传出，一年中有一万一千名教师报名。

经过反复挑选，从中挑出十名。最后选中的是克里斯塔·麦考利夫。她经过一百二十个小时严格艰苦的训练后，首次作为平民代表升入太空。对于她的航空旅行，所有教师都引以为荣。而她的父母、丈夫和儿女都来到现场为她送行。

在观礼台上观看这次“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射的还有其他几名宇航员的亲人和朋友，还有应邀从美国各地赶来的各届人士。

这一天清晨，七名宇航员在心情极佳的情况下谈笑风生地用过了早餐。然后他们穿上天蓝色的宇航服，结队走向航天飞机发射台。也许他们谁也没想到，临行前的这次早餐竟是他们最后的早餐，而他们走进机舱前的回头一瞥，也是最后一次望见这块人类栖居的大地。

谁也没想到……

倒计时顺利地进行了。航天飞机燃料箱中的液态氧开始注入，一切条件已经具备，“挑战者”号发出震动大地的隆隆巨吼声。

倒计时至一，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十一点三十八分，格林威治时间十六点三十九分。

点火器点燃了火箭推进器，震耳欲聋的轰鸣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场传向四面八方。伴随着浓烈的烟火，“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一把巨大的火炬托举下徐徐升空。

它神奇地腾空而起，拖着长长的红色火焰尾巴在蓝天上划出一道壮丽的孤线，场面十分壮观。

“挑战者”号发射的最初阶段，一切正常。

“发射顺利！”发射场控制室的工作人员激动地喊道。

“成功了！”在卡纳维拉尔角航空中心观看发射实况的万名观众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挑战者”号继续上升，肯尼迪航天中心的飞行人员与航空飞行的宇航

员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人们不停地赞叹欢呼，疲倦的观众则干脆席地而坐，抬头仰看，目送着航天飞机离去。

十一时三十八分七秒，“挑战者”号超越了发射架，拖着火焰和白烟。越来越快地向预定的东南方向爬升，一切正常。

十一时三十八分九秒，“挑战者”号根据常规程序，缓缓转了九十度。一切正常。

十一时三十八分三十五秒，根据常规程序，“挑战者”号轨道器的主发动机开始减速到它们全部推力的百分之六十五，这是为了减轻地心引力等对航天飞机在飞行最初阶段产生的紧张压力，一切正常。

十一时三十九分六秒，地面指挥中心对“挑战者”号发出指令：“挑战者，加速。”

十一时三十九分十二秒，“挑战者”号指令长回答：“明白，全速上升。”

这时，速度是每小时三千一百六十三公里，已经突破了音障，离地面的高度是十六公里。

这时航天飞机的速度超过音速三倍。

也就是在这时，“挑战者”号外燃料箱右下方突然闪出一个桔红色的小火球，紧接着在它的另一边靠近“挑战者”号轨道器的胸部又闪出另一个较大的火球。

这蔚为壮观的景象立即引起了观礼台上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有人甚至为自己能看到这一罕见场面而庆幸不已。

但两三秒钟不到，也即航天飞机升空后的七十五秒钟——十一时三十九分十五秒，“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离地五万英尺的高空燃起一片黄白相间的熊熊大火。

无线电联系猝然中断，地面控制中心电视屏幕的数据也陡然消失。

航天飞机爆炸了！

倾刻之间“挑战者”号变成了一团骇人的红色火雾，迅速扩展开来。两台固体燃料助推火箭像两柄利剑兀自朝蓝天刺去，尾部还拖着两缕扭曲的“Y”形烟柱。

随后无数燃烧着的航天飞机碎片从浓烟中钻出，像流星雨似地散落在广阔的海面上，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坠入了距发射地点二十英里以外的大西洋。

发射场训练有素的抢险队在数分钟后，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出事地点。九艘军舰和十架飞机也同时前往。由于爆炸碎片散落持续时间长，抢险队在三小时后才进入现场，在三千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洋面上展开搜索工作。机上七名宇航员全部罹难，这是美国宇航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事故，是美国进行五十六次载人宇宙飞行活动中，发生在空间的第一次大灾难。一九六七年发射“阿波罗”飞船时，曾经发生过在发射台上突然爆炸，造成三名宇航员丧生的悲剧。

“哀悼与纪念之日”

“英雄之所以称之为英雄，并不在于我们赞颂的言辞。而在于他们以始终如一地、锲而不舍地对神奇而美妙的宇宙进行探索的责任感去实践真正的生活以至贡献出生命……”

——美国总统里根

“挑战者”号发射后不久，蓝天上突然出现的那一团火球和“Y”形白烟，使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最初感到茫然，接着才意识到是发生了事故。惊愕使他们呆若木鸡，后来便陷入极端的悲痛之中。他们最初观看航天飞机升空的兴奋和热情顷刻间化为乌有，被痛苦的寒悚所代替。

而在观礼台上现场观看的人们更是被从天穹中传来的隆隆爆炸声惊得目瞪口呆。

他们已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宁愿这只是一个恶梦。

几秒钟以后，原先坐着的人已全部站起，看台上哀声四起。

谁都知道，在那样的地狱之火中煎熬，能够生还的希望完全等于零。

爆炸发生四十秒钟之后，内斯比特代表肯尼迪航天中心主任史密斯向人们悲痛地正式宣告：“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已经被炸毁。

航天中心发射基地笼罩在极度悲哀中，最初那些为“挑战者”号顺利升空欢呼的观礼台上的人们，其中有许多是宇航员的亲人。他们看到爆炸时从“不可能”的惊愕中醒悟过来后失声痛哭。宇航基地的工作人员们也悲痛欲绝地抱作一团，哭已经不能表达他们当时的心情。

观众席上最痛心的，要算是女教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的父母了。“天啊，这不是真的！”母亲格雷斯仰望蓝天，泪如泉涌。

父亲科里根首先觉察到意外的不幸事件，把手臂紧紧地搂在妻子肩膀上，老泪纵横。曾为女儿感到高兴和自豪的心情顿时被失去女儿的揪心痛苦所替代，巨大的悲痛像电流一样袭击着这对年迈的夫妇，他们在寒风中颤栗着、哭泣着。

在看台上的麦考利夫的丈夫和他九岁的儿子以及六岁的女儿，也都泪眼模糊，难以自持。刹那之间，他们就失去了妻子和母亲……这天麦考利夫所在的康科德中学的所有学生都守在电视机旁，等待着他们的老师……他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老师这次历史性的航行。当“挑战者”号发射时，学生们兴奋地欢呼起来，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的老师鼓掌……可是，不幸的事发生了。最初，他们几乎同时叫：“这决不是真的！”

曾和麦考利夫竞争宇航员的一万多名中小学教师和他们的学生也从电视中看到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太空课”没有了，师生们全都陷入了极度的难过悲痛之中。

在华盛顿的国会上，国会工作人员、参议员和众议员们聚集在电视机旁，默默地注视着这幕悲剧的发展。

政治家的冲动和悲痛相较之下是克制和有限的，因为他们再清楚不过地知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惨剧尽管是航天史上迄今最大的惨祸，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当“挑战者”号的碎片正纷纷扬扬撒向大西洋时，美国总统里根正同他的高级助手们共进工作午餐。副总统布什和国家安全顾问波因德克斯特急匆匆地冲进来，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众人。

里根总统的第一反应是：“是女教师乘坐的那架航天飞机吗？”

布什表情严肃地说：“是的。”

所有人都中止了午餐站起来，随里根总统来到离那儿最近的总统书房，打开电视观看这次事故的录像新闻。

起初，这位总统被残酷的现实“震惊得一言不发”，脸上充满了忧虑、

焦急不安和悲痛的表情。后来，里根对记者说：“我当时根本摆脱不掉遇难者家属的形象。”

而里根夫人南希则失声惊呼：“天哪！这不可能！”

在最初的惊愕过后，里根同国会领袖们商议了一下，决定把原定于当晚发表国情咨文讲话的时间推迟到下星期二，并派布什副总统马上乘飞机飞往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空中心，向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调查事故原因。正在开会的众议院中断了会议并宣布休会。华盛顿大教堂响起了为死难者哀悼的钟声。

华盛顿沉浸在异乎寻常的肃穆气氛中，没有了喧闹和叫嚷，仿佛进入了白夜。

洛杉矶纪念运动场上，重新点燃了奥林匹克火炬，以示哀悼。各地电台连续播放美国国歌。火车、轮船鸣响了汽笛，各大建筑上的星条旗也徐徐降为半旗……致哀电，慰问电，雪片似地飞向这里。白宫似乎在抽泣，里根总统步履沉重地走到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在电视摄像机前发表了讲话，他神情忧郁，语调沉重，他用极其悲哀的声音向全国作了电视讲话：“我原计划今晚对你们发表的讲话是就国情咨文做一报告。

但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件使我改变了主意。南希和我对‘挑战者’号发生的悲剧深感哀痛。我知道我国全体人民和我一样悲痛。”

他对七名宇航员的不幸罹难表示哀悼，并盛赞他们“大胆勇敢，他们具有那种特殊的风度，那种特殊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向我挑战，我也将高兴地去迎接。”

他还向美国全国的中小學生提到了他们尊敬的教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他知道这位献身的教师牵动着全国儿童的心，他说：“我知道这难以理解，不过，像这种痛苦的事情有时是会发生的。”

他向美国和世界沉痛宣告：

“今天是哀悼和纪念之日……”

美国全国上下早已陷入悲哀的浪潮之中。临近中午，知道消息的人们几乎中断了一切活动。繁杂的街头骤然间就比平时冷清了许多，人们匆匆赶路一言不发。许多人守在电视机旁，等待着有关这场灾难的详细报道。伴随着致哀的钟声，无数人流下了热泪。

入夜，从来灯火辉煌的纽约帝国大厦熄灭了全部的灯火，以示哀悼。这个“全美的灾难”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美国原定在一九八六年将有十五次航天飞机的发射，是“太空时代开始后的最重要一年”，现在全部分为泡影。建造“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花了美国纳税人十二亿美元，轰然一声巨响使这笔巨资化为乌有。

美国三大电视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在一月二十八日当天用了五个多小时连续不断地报道“挑战者”号爆炸事件，损失的广告费用估计近千万美元。

在这样的灾难中，金钱的损失似乎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七名遇难的宇航员代表着一个相同的梦，这是人类探寻未知世界的一个千古大梦。

应该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希望这个梦破碎。

所以这不只是一个美国梦，而是一个全人类的梦。

这也不只是一个美国的灾难，美国的悲哀，而是全世界的灾难，全人类的悲哀。

举世震惊。

一月二十日当天，联合国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或致电里根总统，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不幸失事表示同情和哀悼。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向里根总统发出言语切切的唁电：全世界都将为在开拓人类知识边疆中的这一悲剧的牺牲而万分悲痛。

联合国安理会获悉这一个消息时正在开会，会议似乎是理所当然地就中止了。

大会的全体成员默哀三分钟后，本届联大安理会主席李鹿野代表安理会发表讲话：“对美国航天努力中出现的这一机毁人亡事件感到十分悲痛。”

苏联莫斯科的居民大多是通过电视台首先得到这一噩耗的，惊愕使他们久久地沉默，一月的寒风席卷着冰天雪地的城市。苏联官方迅速发出慰问电，并迅速做出决定，把苏联人在空间探索中发现的金星上的火山口中的两个以美国“挑战者”号的殉难者、女教师麦考利夫和另一名女宇航员雷斯尼克的名字命名，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永恒的纪念。

细雨霏霏的英国伦敦，人们的心情晦暗得像恶劣的天气一样。撒切尔首相的致哀电发出后，广播电视都纷纷给予了报道。

舰队街空前忙碌，报馆的编辑室纷纷撤下原来的头条，换上最新消息。印刷厂机器飞转，《号外》、《快报》飞速地被印制出来。

中国北京，一月二十九日晚七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首次破例打乱编排次序，把“挑战者”号失事的消息放在了头条位置。国家主席李先念当即打电报给里根总统，对宇航员不幸遇难表示哀悼。

一月三十一日，休斯敦航天中心隆重举行了有一万五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同死难者家属坐在第一排。

乐队奏起了《美丽的阿美利加》乐曲，人们的心头像压着沉重的铅石……在麻省的弗雷明汉州立大学，升起了七个黑色气球。当年，克里斯塔·麦考利夫曾在这所大学取得学位。一千多教职员和学生为她举行了追悼会。弗雷明汉中学教员查尔斯·斯波萨托说：“麦考利夫将永垂不朽，因为她活在人们的心中。”

康科德中学的校园里，一株槭树上挂着一面崭新的美国国旗和七只圆球。一块黄色纸板上写着醒目的蓝色大字：“克里斯塔，我们爱你！”入夜，麦考利夫教过的六十多名十六岁左右的青少年，拿着六十多支点燃的蜡烛，一动不动站在雪地里，向敬爱的老师表示深切的哀悼。

美国教育部部长在追悼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希望学生们要为教师麦考利夫而自豪。里根总统也表示，今后的航天飞机将有“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平民，更多的教师。”

“挑战者”号的失事，是震撼世界的悲剧，全世界人民为人类航天壮举发生的这一重大挫折和不幸感到悲痛和惋惜。

美国总统里根在追悼会上说：“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沉痛地哀悼我们所失去的七位勇敢的公民，共同分担内心的悲痛，或许在相互间的安慰中能够得到承受痛苦的力量，并坚定我们追求理想的信念。”

“我们今天所说的远不能够表达我们内心的真实情感，语言在我们的不幸面前显得如此软弱无力……”“英雄之所以称之为英雄，并不在于我们赞颂的言辞，而在于他们以始终如一地、锲而不舍地对神奇而美妙的宇宙进行探索的责任感去实践真正的生活以至贡献出生命……”“愿上帝在这个艰难

的时刻保佑大家并给你们安慰。”

人类的壮举，人类在征服宇宙的伟大斗争中，从不畏惧艰难曲折，而总是在吸取经验教训后，勇往直前，惟其如此，人类的悲歌才有意义。

漫长的挑战与征服

“人类不断地争取生存的世界和空间。起初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气层，然后就是征服整个太阳系。”

——“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

人类对于太空的向往，从远古的洪荒时代直到今日，从未间断过。不过当我们衣不蔽体的祖先们站立在星空下仰望时，也许最初能够感觉到的只是恐惧与神秘。

当人类以其勇敢和智慧占据了整个地球以后，那种对太空世界来历久远而又难以遏止的感情就变成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征服太空。

于是最初的挑战开始了。究竟是人类的豪言壮语在挑战，还是太空的默默不语在挑战，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交战中成为名符其实的对手——重要的是人类能够确实投身于挑战。

人究竟能不能够进入太空呢？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人朱尔斯·维恩就在他的小说《飞向月球》中描写了他幻想中的太空情景。

“人们身感无重力，两腿脱离了地板。他们用力直线行走，却似醉汉般步履蹒跚。”

一九〇三年，俄国人齐奥尔科夫斯基提出了他那有关空间旅行的著名理论。

一九五七年八月，苏联成功发射了科洛列夫设计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同年十月四日，苏联用该火箭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地球伴星一”（重八十三点六公斤），揭开了空间时代的第一页。一个月后，“地球伴星二”带着一名叫莱卡的小狗上了天，经过几个月飞行，获得空间环境对生物影响的一些初步数据。一九六〇年八月，“地球伴星五”带着两只小狗从轨道上回收。同年九月，又有两只小狗乘“地球伴星六”绕地球飞行约二十四小时，回收时因轨道不正确，小狗与回收舱同归于荆在美国，一九四五年就有人提出人造卫星带着科学仪器飞向空间的设想。

一九五四年六月，海军海洋研究局召开会议，提出用“朱诺一一”（陆军“红石”弹道导弹的改进型）发射地球卫星。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政府极为震惊，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随即决定由布劳恩负责在九十天内发射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任务下达后八十五天，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布劳恩设计的“朱诺一一”火箭把一颗只有八点二公斤重的卫星“探险者一一”送入绕地椭圆轨道。卫星虽小，但衣阿华大学物理学家詹姆斯·范·艾伦博士研制的星载仪发现了绕地球的辐射带。

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美国的“朱诺一一”火箭接连发射了十一颗“先锋号”卫星，但仅有三次获得成功。

一九六一年（在齐奥尔科夫斯基提出他的著名空间旅行理论五十八年之后）四月十二日苏联空军少校加加林乘“东方一一”飞船绕地飞行十八分钟并安全返回地面。从此人类进入空间的幻想变为现实。同年八月六日，“东

方一二”飞船载着空军少校蒂托夫绕地球十七圈，飞行二十五小时十八分钟返回地面。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东方—四”宇航员波波维奇以特技飞行从宇航员尼古拉耶夫驾驶的“东方—三”飞船旁六点五公里处飞过，二人用照相机互拍了照片。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苏联发射载有三名宇航员的“上升—一”飞船。次年三月十八日，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走出“上升—二”飞船座舱，进行了人类第一次空间漫步。据后来西方观察家分析，苏联宇宙飞船的飞行均具有军事意义。宇航员采用焦距三点八米的卡塞林光学系统侦查照相机，可以拍摄地面汽车及人行道的照片，这是苏联用载人空间飞行进行照相侦察的开始。

继发射人造卫星之后，苏联在载人宇宙飞船方面再次领先，美国也不甘示弱，急起直追。一九六一年五月五日，美国人阿兰·彼·谢泼德乘“水星—三”进行亚轨道飞行，验证失重下手控飞船的能力。次年二月二十日海军陆战队中校约翰·格林乘“水星—六”飞船第一次进行绕地轨道飞行。在这之前，两只猴子和一只名叫哈姆的黑猩猩曾先后乘水星飞船进行同样的飞行。同年六月三日十七时，“双子星—四”上的宇航员怀特走出座舱，成为第一个进行空间漫步的美国人。美国利用双子星系列飞船实现了轨道会合、机动、对接和舱外活动。通过初期载人空间飞行，证明人在失重空间里能很快适应，并进行工作；拍摄了地球照片、云图以及在地面上难以勘查的宏观地质照片。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阿波罗—十一”载着三名宇航员：指令长尼尔·阿姆斯特朗、月球舱驾驶员埃德温·奥尔德林、指令舱驾驶员迈克尔·柯林斯在月球降落，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登上月球，第一次在那里留下人类的足迹，实现了人类祖辈和空间先驱们月球旅行的幻想。他们在月球上插上星条旗，安置激光反射器、地震仪、磁强计、捕捉太阳风粒子的铝箔，还拍摄了月岩和周围景色，收集了二十二公斤土壤和岩石样品，逗留二小时三十一分后离开。后“阿波罗—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各载两名宇航员登月，月面活动时间依次延长，取样逐渐增多。

他们在不同地点着陆，拍摄照片，观测地形，安放仪器等等。只有“阿波罗—十三”飞到月空后因服务舱内电源氧气容器爆炸而取消登月。美国为阿波罗登月计划付出二百四十亿美元，动员了一百万以上的科技工作者参加。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又是苏联从拜科努尔发射场用“质子”号运载火箭率先将世界上第一个试验性航天站“礼炮”一号送入近圆地点为二百公里和二百二十二公里的空间轨道。从此，载人航天活动又进入了一个新高潮。因为航天站意味着在宇宙空间可建立适合多人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基地，可以更为经济有效地开展载人航天活动。同年四月二十四日，“礼炮”一号还成功地与“联盟”十号宇宙飞船实现了对接飞行共五点五小时。

两年后的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美国也从肯尼迪航天中心用“土星”五号运载火箭将其试验性航天站“天空实验室”送入四百三十五公里高的近圆空间轨道。

随后，在这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七月二十八日和十一月一十六日，美国相继用“土星”1B 运载火箭送“阿波罗”载人飞船进入太空，与“天空实验室”对接成功，先后有三批共九名宇航员上站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八天、五十九天和八十四天，还出舱活动过四十多小时。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一日，

由于轨道空气阻力增加，“天空实验室”提前坠入大气层烧毁。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二日，又一项人类征服太空的最新成果首先在美国登台亮相。

这天凌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附近集聚了近百万人，盛况空前。当地时间上午七时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载着两名宇航员点火起航，进入高度约二百八十公里的近圆空间轨道，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首次试航。它在飞行五十四个小时，绕地球三十六圈后，四月十四日安全降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成为世界上第一架实现太空飞行的航天飞机，揭开了航天技术的新一页。

这种航天飞机集火箭、航天器和飞机技术特点于一身，既能像火箭那样垂直发射，又能像航天器那样远行于太空，也能像飞机那样再入大气层滑翔飞行和水平着陆并多次使用。由于它的这种特点，早期又被叫作火箭飞机，是一种新型的多功能航天飞行器。它的飞行高度在一百八十五—一千一百一十公里的范围内，可载三一七人，最多可载十人。

为美国政府设计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登月飞船的布劳恩，也是最先提出并着手实验火箭飞机（即后来的航天飞机）的人。他原是德国火箭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火箭生产中心佩内明德为德军生产 V-2 火箭。一九四五年，美军率先占领佩内明德，以布劳恩为首的一百一十八名专家向美军投降。这些专家和一百枚 V-2 火箭被迅速运往美国新建的白沙试验场，并在那儿为美国装配、检验和发射大型探空火箭，同时培养技术人员。苏联则将佩内明德余下的六千名科技人员及工人、家属运到莫斯科郊区及塞利格湖的戈罗冬里亚岛上，为苏联服务。

早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德国空间旅行学会”成立时，年轻的会员布劳恩就对空间旅行抱有满腔热情和强烈的好奇心，开始探索火箭飞机的可能性。他在陆军军械部研制弹道导弹火箭发动机时，曾用火箭发动机试验了两架火箭飞机。他设计的这种带翼飞行器基本上具备了早期航天飞机的雏形。

火箭助推滑翔越洋进入大气层的概念变化是一九四九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工学院工作的钱学森提出的，它成为美国空军动力滑翔飞行计划的开端。这种动力滑翔飞机是一架长十点七米的三角翼飞机，用火箭送入轨道，用减速火箭做机动力再入大气层并水平滑行降落。一九五八年，美国空军开始研究。火箭飞机 X-15 是从 B-52 轰炸机机翼下释放的第一个自由飞行体，它已具备航天飞机轨道器的特性。X 系列火箭飞机的飞行对航天飞机的设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十年代初，随着航天活动的日趋活跃，各种航天器的发射日见频繁。鉴于一次性使用的运载火箭和卫星费用昂贵，美国宇航局空间小组开始提出研制一种多次使用的载人航天飞行运输系统。

一九六九年四月，美国国家航天局设立了“航天飞机技术委员会”，正式开始了对航天飞机的论证和预研工作。

一九七二年一月，尼克松政府正式批准了航天飞机工程，最后确定了航天飞机方案——整个飞行器由可回收重复使用的固体火箭助推器、不回收的外贮箱和可多次使用的轨道器组成。从此，开始了航天飞机的全面工程研制阶段。共研制五架：“创业”号只做再进入大气和进场试验，其余四架——“哥伦比亚”、“挑战者”、“发现者”和“阿特兰蒂斯”编成一个多次使用

的宇宙飞船队，将使用一百次以上，发射费用可从一千美元/磅降到二十美元/磅。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专供地面附近实验用的“创业”号轨道器制成，并开始为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由波音七四七母机驮着进行滑行、载人与不载人系留飞行和载人自由飞行等试验。至八十年代初，历经十年艰辛，航天飞机才终于发育成熟。

航天飞机起飞推力达三千万牛顿，两分钟升高约五十公里，大部分推力来自两枚固体火箭助推器，燃烧后助推器分离，降落伞打开，溅落大西洋面予以回收，可再次使用。轨道器尾部的三台主发动机继续推着轨道器进入空间，由大型外燃料箱供燃。

八分钟后燃料箱弹出，再入大气层时烧毁（只有这一部分不回收）。最后推进轨道器的是两台小型独立的轨道机动发动机。在轨道上，货运舱的“蛤壳”门找开（舱内一次能装四颗卫星），宇航员遥控机械臂进行发射和回收卫星的工作。返回时，轨道器向后转向。轨道机动发动机工作两分半钟减慢飞速，开始再入大气层过程。

航天飞机的锥部有飞行甲板和宇航员住室，中间是货运舱，可装载荷。

美国航天飞机前四次飞行系试飞，验证设计水平，试用了加拿大造的遥控机械臂；做了昆虫、植物短期失重环境的生长试验，用雷达波探测到地下二十五米深处的矿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十六日的第五次飞行是航天飞机实用飞行的开始，成功地发射了一颗美国“商业卫星—C”和一颗加拿大通讯卫星“兄弟C—1”。

到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二日止，在近五年内共有约一百名航天员分批进行了二十四次航天飞机太空飞行，均获成功；共发射人造卫星三十颗、回收卫星三颗、空间修理卫星二颗，携带航天站一个；完成了数百项有关生物学、医学、天文学、空间材料加工和航天技术等试验。其中，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日，乘“挑战者”号升入空间轨道的两名航天员，进行了世界上首次不系安全绳的太空自由行走。

苏联也在试飞自己的航天飞机。并在一九八二年六月三日，以“宇宙—三七四”为代号第一次试飞，由苏联海军在印度洋上回收。

此外法国、英国、日本等国也从七十年代开始对航天飞机方案进行探索性研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宇航员的行列中也不乏女性。世界上第一名女宇航员是苏联的捷列什科娃。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十九日她（二十六岁）单独乘“上升—6”飞船绕地球飞行四十八圈，历时七十小时五十分钟。但由于条件不够完善，还不适宜女宇航员上天飞行，因而中止了近二十年。一九八二年八月，苏联恢复女宇航员空间飞行。萨维茨卡娅（三十九岁）与两名男宇航员一同乘“联盟 T—7”上天与“礼炮—7”轨道站对接飞行七天。美国一九七八年一月挑选六名女宇航员参加训练。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五日美国天体物理学家萨利·赖德（三十二岁）首次同四名男宇航员飞行。次年安娜·费什尔参加了航天飞机的飞行。

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努力，人类对宇宙太空的挑战与征服，总算初见成效。但这一事业也是充满了艰难与风险的。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每一次成功，无不包含着失败的教训；每一项成果，也都浸透着辛勤的

汗水，甚至鲜血。

全面打捞：梦想的沉与浮

“如果出了故障或问题的话，我希望它决不意味着太空计划的结束。”

——“挑战者”号机长弗朗西斯·斯科比

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残骸和七名宇航员的打捞从事故一发生就开始了。数分钟后，抢险队即以最快速度开赴出事地点。

十三架飞机在烟雾弥漫的空中盘旋，十三艘舰船在卡纳维拉尔附近的海面上来加游弋。它们无法驶进因坠落物掀起的巨大波涛之中。三小时后，水面才平静下来，飞机和舰船立即进入现场，投入紧张的搜索行动。二千一百平方公里的海面被严密封锁，任何船只未经许可都不得驶入。

一月二十八日，“挑战者”号失事后，美国政府立即组织打捞和进行调查。他们使用一切可能的先进手段，包括飞机、潜艇、水下机器人、“比人的视力强几百倍”的声纳扫描装置。

一个临时调查委员会负责研究各种碎片和资料。

这个调查委员会由美国前国务卿罗杰斯担任主任，第一个踏上月球的老资格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为副主任。

一月二十九日中午，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打捞到七百二十公斤漂浮在海面上已被烧焦的残骸，其中大部分是二点三米长的防热瓦碎片。

三十日晚上又捞到不少碎片，包括一大块机身残骸和另外两块大碎片，其中一块是九米长、十五米宽的电气设备。

二月三日，里根总统任命了一个总统委员会来监督调查工作，审议调查结果。

海上打捞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三月八日，美国宇航局宣布，打捞队的潜水员在离卡纳维拉尔角东海岸大约三十公里的三十米深海处，发现“挑战者”号驾驶舱残骸，打捞起了部分遇难宇航员的尸体。

八月二十八日，三艘打捞船返回港口，为时七个月的打捞工作宣告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这一工作的有六千人，出动了五十二架飞机，三十一艘船只，一艘七人核动力潜艇，两艘四人潜艇，五艘无人驾驶潜水器和五十一名潜水员。他们对卡纳维拉尔角东北六十四公里的九千二百平方公里的海域和四百二十九平方海里的海底进行了仔细搜索。

这次搜索和打捞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

七个月的战绩是：打捞出十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公斤重的残骸，其中有机组人员的尸体、座舱残骸以及可以证明“挑战者”号爆炸原因的助推火箭连接环等。这些打捞物占航天飞机、燃料箱、助推火箭和所携带货物、卫星总重量的百分之四十五。

那个伟大的梦呢？它也变成碎片了吗？它还剩下多少？

人类进入太空，闯进宇宙的大门已经二十六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两个主要空间大国美国和苏联，在发展航天事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经历了不少挫折，发生过不少事故。

下面只是能够勾起人们记忆的几起：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苏联“金星”号运载火箭发射时，发动机

没有按命令点火。为查明故障，几十名专家接近火箭。突然，火箭发动机喷火，继而爆炸，包括导弹部队司令涅杰林元帅等在内的近百名军人、科学家丧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肯尼迪航空中心的一艘阿波罗飞船在点火起飞时，舱内的一个小小电火花引起满舱大火。因舱内是纯氧，九十秒钟之内不能开启舱口，三名宇航员被活活烧死。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苏联宇航员科马列夫乘“联盟”号宇宙飞船飞行。

起初平安无事，但再入大气层时发生故障，降落伞系统失灵，科马列夫与“联盟”号回收舱同归于荆一九七一年六月，苏联的“联盟—一”飞船与“礼炮—一”空间站对接飞行二十四天后，在归途中因密封舱的一个气阀门失灵，发生了漏气，而宇航员又未穿宇宙服，结果三名宇航员静静地死在舱内。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美国用德尔塔火箭发射英国“天网二A”卫星，由于火箭电子装置中一块印刷电路板上的一个小焊点附近剥落了一小块绝缘层，引起短路，发射失败。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阿丽亚娜火箭第一次试飞时，一名工作人员不慎碰落一个部件的商标，堵塞了发动机燃烧室的喷嘴，造成发射失败。

一九八五年五月，美国发射“三叉戟”导弹，由于发动机燃烧室中剥落了一块黄豆大的绝缘层，结果高温火焰烧穿了那里的金属壁，燃气向外喷射，发动机爆炸。

其中仅载人航空的探索中，就有三名美国宇航员、四名苏联宇航员献出了生命。

人类不是第一次陷入灾难与挫折，也不是第一次从中苏醒过来。也许如美国宇航员格里索姆在参加“双子星—三”飞行安全返回地面后所说：“倘若我们死了，人们也不必悲痛，因为征服空间就得冒险……”的确如此。

但这次“挑战者”号失事造成机毁人亡，无论死亡人数之多，损失之大，是迄今为止的载人的航天事故中最严重的一次。

在美国的航天史上，到目前载人航天飞行共五十六次，其中包括自一九八一年起进行的航天飞机的飞行二十五次，从第一次试飞到一九八六年一月中旬的二十四次太空飞行中，航天机虽然也出过不少故障和毛病，如机载电脑失灵、传感器失效、防热瓦损坏、发动机提前熄火等，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发生机毁人亡的灾难性事故。

宇航员在飞行过程中死亡也是第一次。

“挑战者”号的爆炸惨剧使美国的航天计划和有关领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射卫星的商业任务全部流产。根据计划，航天飞机当年要为美国国内的一些大企业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发射一系列通信卫星。现在这批有利可图的交易绝大部分要被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的主要竞争对手欧空局的阿丽亚娜宇航公司毫不费力地唾手而得。

（二）太空工业陷于停顿。利用太空中的失重、真空等独特条件制造地面上不能生产的新型材料和药物，是航天飞机的独特功能。在航天飞机的五年飞行历史中，已取得了明显成就，而“挑战者”号的爆炸无疑将使这种方兴未艾的新型工业蒙受重大损失，如同打了美国航天工业一记闷棍，可能

使那些同航天飞机飞行计划有关的公司和依靠航天飞机部署卫星的公司遇到财政困难。航天飞机的主要制造和维修公司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和罗克韦尔国际公司的股票猛跌。如果美国航天局决定另外定购一架新的航天飞机，那么大约需要十七亿美元费用和五年的光阴才能制成。

（三）科学考察成为泡影。根据原计划，宇宙平常探测是当年航天飞机太空飞行的主要任务之一。“挑战者”号的事故对美国的这一太空计划的影响难以估量。

许多卫星和航天器的发射计划以及准备在太空中进行的研究项目将大大推迟，有的不得不取消。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三次重要的航天飞行：一次是原定三月十五日由“挑战者”为欧洲航空局发射的“尤利西斯”航天器，绕太阳的南北极飞行，首次对太阳南北极进行探测。另外两次是定于三月二十日和十月由“阿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分别将“伽利略”航天器和“哈勃”太空望远镜运入太空。“伽利略”航天器计划飞往木星进行近距离考查，而价值十二亿美元的“哈勃”望远镜则准备被送入地球轨道，观测宇宙“边缘”。由于航天器的发射需要等待行星之间合适的相对位置，错过了时机，只能重新等待机会。这种局面已不可避免。

（四）美国的军事计划受到严重影响。按原计划，一九八六—一九九五年，航天飞机总的飞行任务的三分之一将被占为军用，其中不少同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有关。因此美国五角大楼可能是“挑战者”号失事事件中受到打击最沉重的对象之一。有些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这次事故可能置“星球大战”计划于“险境”。五角大楼一直利用航天飞行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的基础实验。苏联十分关心这次事故能否阻止美国实施这一计划。塔斯社说，这场悲剧表明美国的宇航技术是不可靠的。

这一事件严重地震撼了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地位。

“挑战者”号事件，在美国还触发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辩论。

事发后一个多月。无论是报刊，还是广播、电视，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挑战者”号的报道，热点是关于美国航天计划发展方向和关于发展载人与不载人航天孰轻孰重问题。

但总的舆论倾向还是明显的。

人类绝不能屈服！而美国人是以崇尚英雄主义著称的。

在事件发生几小时后，里根总统即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一直十分信任和尊重我们的太空计划，今天的事情绝不会降低它的声誉。我们还要继续对太空进行探索。”

他宣布：

“今后还要有更多的航天飞行，要有更多的宇航员。是的，太空里要有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平民，更多的教师。”

在回答记者们关于航天飞机计划的前途问题时，斯皮克斯引用里根的话说：“这些人都献身于对太空的探索。我们纪念这些勇敢的人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继续执行这个计划。”

在一月三十一日在休斯敦举行的追悼大会上里根再次宣言：“机长弗朗西斯·斯科比曾在一次飞行时说过：‘如果出了故障或问题的话，我希望它决不意味着太空计划的结束。’我们决不会使他们失望的。……人类将继续向太空进军，不断确立新的目标，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这正是我们纪念‘挑战者’号上七位英雄最好方式。”

“更多的教师”中的一个很快站出来。麦考利夫等人遇难仅半个月，在爱达荷州担任中学二年级教师的巴巴拉·摩根说，她愿意接受美国航天局的建议，做下一个乘航天飞机的平民。她曾作为后备人选与克里斯塔·麦考利夫一起接受了宇航训练。

她在一项书面声明中宣布：我们有机会给整个一代人讲一堂很重要的课。她相信几百万中学生都会继续支持航天飞机计划。

她说，应当让这些学生明白，挑战的意思就是迎着困难克服困难。美国航天局代理局长威廉·格雷厄姆表示支持摩根夫人。虽然他也不知道航天飞机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飞行，但他将考虑给予摩根夫人接替麦考利夫的机会。他仍然坚信，一位教师将是下一个乘航天飞机的平民。

威斯康星州米尔沃基市斯托莱中学的校长斯伯塔说：“这个事件使人感到喉咙里好像堵了一块东西。

我们要记住这个悲剧，接受教训再继续前进。”

而怀俄明州和纽约州的学生提出倡议，号召全国中小学生每人捐出一美元，用来建造一架新的“挑战者”号。他们的倡议获得了佛罗里达州和缅因州幼儿园儿童的响应。

当美国总统任命的调查委员会还在调查“挑战者”号失事的原因时，挑选第一名进入大空的新闻记者的工作已经开始。在“挑战者”号爆炸前，设在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太空记者办事处已经收到了一千七百零三份申请书。由于“挑战者”号的失事使挑选工作推迟了三周，但没有任何人因为航天飞机爆炸而撤回申请。

恐怕也没有人认为航天飞机会从此停飞吧。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航天中心飞行控制室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明白，全速上升。”

此时离爆炸只有一秒钟了。

这句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话是“挑战者”号的驾驶员、美国海军中校、出类拔萃的飞行员、试飞员迈克·约翰·史密斯说的。

也许正是由于史密斯留下最后一句充满信心和进取精神的话语，他的离去便越发牵动了凡是在他生前与他有过交往的人的情思。

他的弟弟托尼·史密斯说，我们不能中途放弃而废，我要呼吁大家继续支持航天飞机计划，不要让迈克他们白白死去。

史密斯自己是决不后悔的。

活着的宇航员们也不会后悔自己选择了这个需要勇气和冒险精神的神圣行业。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为全人类探索未来。

他们身上维系着几千年的梦想，他们是寻梦人。

美国众多的宇航员中没有任何一个表示将要退出航天生涯，而是希望有在航天飞机恢复飞行后，参加第一次飞行！

曾经参加过宇宙飞行的参议员杰克·加恩说：“要探险就要难免会牺牲。如果需要，我愿意明天升空。”

由于“挑战者”号遇难的七名宇航员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既有男人也有女人，甚至还有一位日裔美国人，所以在客观上“挑战者”号的失事还起到了凝聚美国各民族的作用。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大约有三分之二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认为航天事业应该继续，他们愿为探测太空付出相应的代价。

美国哈佛大学史密森天体物理研究所所属的哈佛大学小行星研究所决定，将用七位“挑战者”号上遇难的宇航员的名字为一九八一年以来发现的在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绕太阳运行的七颗小行星命名。

“挑战者”号的爆炸原因，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航天飞机上没有记录事故详细情况的“黑匣子”，美国有关方面全力以赴地从各个方面寻求答案，成立了专门调查机构。

虽然里根强调：“我们还要继续对太空进行探索”，但是，在没有查清事故的真正原因前，暂时不会进行第二次航天飞行（实际上停飞了近三年）。

专家们认真研究了打捞上来的飞机残骸，反复观看了“挑战者”从起飞到爆炸的录像，发现问题出在右助推火箭上。

在航天飞机升空后第五十九点八秒时，右侧固体火箭助推器底部显出一小股火舌，随后，火舌越拖越长，几秒钟里，火舌包围了贮着液态氢的外挂推进贮箱；第七十一点三七秒时，氢气从贮箱底部爆出，液态氢又从顶部流下来；第七十二点九八秒时，贮箱猛烈爆炸，随即航天飞机凌空爆炸。失事的直接原因是航天飞机右侧的固体火箭助推器密封装置失效，导致燃气外泄，形成火舌，引起爆炸。

其实，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前，计算机已经观察并记录了发生故障的讯号，但由于操作上的疏忽，程序安排不当，计算机本身也未能及时处理数据交通告宇航员，致使惨剧发生。

六月九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故调查委员会在经历了四个月的紧张工作之后，向里根总统正式递交了一份由调查委员会全体成员共同签署的“最后报告”。

调查报告指出，确凿的事实证明，航天飞机右侧火箭助推器联接处环形密封圈在火箭点火后破裂是造成这次爆炸事故的导火线。同时，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以及助推火箭制造公司长期来对早已发现的密封问题采取含糊敷衍的态度和航天计划管理结构方面的问题也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尽快恢复美国航天计划，同时又是不再犯过去的错误，调查报告对航天飞机及其及管理提出一系列改进的建议，其要点有：重新设计助推火箭的联接处和密封圈，并且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加以监督，彻底改革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管理结构，研究向宇航员提供一个“逃生系统”等等。

有一位宇航员说：“技术上的进步，往往是进三步退一步。”

这次‘挑战者’号事件是退了很大一步，但这不是终结。”一位科学家说：“这次事件是很令人痛心的，但真理是：牺牲是发现的代价。”

美国总统里根表示，美国今后还要进行更多的航天飞行，尽管面临一系列难题，美国政府发展载人宇航飞行的决心，仍是坚定不移的。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已初步决定下一次重新开始发射的航天飞机。

事情至此，似乎已告一结局。人们钦佩英雄们的勇气，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征服太空的艰巨性与冒险性，坚定了走出地球的决心。但仍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悬持在心有不甘的人们心中，那就是：航天发射的成功率究竟是多少呢？

灾难，存在于小数点之后……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原因在于助推火箭上连接处的一个小小的橡皮圈失效。

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航天事故，原因也都发生在助推火箭上。

“挑战者”号的灾难也并不是最后一起。在那以后，航天发射可以说仍是事故频频。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八日，美国用“大力神”火箭发射间谍卫星，因助推器密封垫圈失效，起飞后五秒钟爆炸。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阿丽亚娜第十八次发射时，因第三级火箭没有及时点火，发射失败。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阿丽亚娜火箭第三十六次发射，一名工作人员不慎将一块擦拭布遗留在一级发动机的水循环系统中，堵塞了管道，引起火箭爆炸。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四日“大力神”火箭发射“国际通信卫星六号”时，因接错一根导线，第二级火箭没有分离，卫星没有达到预定的轨道高度。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国用“长征二号E”火箭发射澳星，由于拧动点火控制器时，从螺钉上旋下一点点金属屑，使电路短路，火箭发动机熄火，发射没有成功。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国“长征二号E”发射亚太二号卫星时，由于美方没有告之卫星的谐振频率，而凑巧卫星的谐振频率与火箭整流罩的谐振频率相同，由于高空切变风对火箭的作用，引起共振，造成星箭爆炸。

而在“挑战者”号爆炸后最严重的航天灾难当属一九九六年六月四日发生的“阿丽亚娜五型”过载火箭爆炸事故。

那天也是由于天气原因，火箭发射的时间被推迟了四十五分钟。格林威治时间十二时三十三分，火箭升空后三十七秒钟，地面控制人员发现不仅火箭推进器运转不正常，引导系统也有问题。第四十秒钟，火箭偏离预定轨道。控制中心担心火箭坠落地面会酿成大祸，便当机立断，决定在距离地面四千米的高空将其引爆。刹那间，火箭炸成一团火球，四散的残骸如漫天的火雨倾注而下，并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长长的烟柱。

“阿丽亚娜五型”火箭的发射地点是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就是这种耗资七十亿美元、上万人历经十一年研制出的最新型火箭的第一次发射，火箭上载有四颗总造价高达五亿美元的“太阳风”科学观测卫星也都化为灰烬。

火箭和卫星都属于欧洲航天局。而阿丽亚娜航天公司作为欧洲航天局的下属公司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上一直占据着极为有利的位置。自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首次成功升空以来，“阿丽亚娜”系列火箭总共进行了八十六次发射，这次爆炸是第七次失败。基其发射成功率在世界各商业卫星运载工具中名列前茅，也为欧洲赢得了世界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大约百分之六十的份额，功绩显赫。

爆炸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爆炸发生后，在外围观看的人员都迅速戴上了防毒面具并很快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但由于过分自信，这次发射的“阿丽亚娜五型”过载火箭及其携带的

四颗卫星都没有办理任何保险。据称，与“阿丽亚娜四型”相比，“阿丽亚娜五型”的可靠性已由百分之九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五，即平均每发射七十次可能出现一次失败。然而七十次发射中的那一次失败不幸落在第一次发射上，而对于这一次唯一的发射来说，其可靠性完全等于零。

这不由得再次使人们想到这个问题，即航天发射的成功率（或可靠性）究竟取决于什么？这种灾难究竟能不能避免？

现代科学可靠性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个系统的构造越精密、越复杂，其可靠性一般也越差。比如，火柴就远远没有打火机精密，但其可靠性一般说来就比打火机要高。

但构造简单的东西无法适应现代人类社会的需要，这是一个天然的矛盾。对于要上天航行的火箭来说，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复杂。

火箭发射后，不像汽车、火车，可以停下来加燃料、添设备，一切都要一次携带齐全；出了故障也不可能停下来检查，也不能像飞机那样返回地面进行修理。因此，对于航天发射来说，可靠性是第一位的，尤其是运送载人航天器的运载火箭，更必须安全可靠。同时，火箭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例如火箭发射时，发动机会产生高温、高压、强噪声和强震动；火箭在飞行的加速过程中，还会产生巨大的超重，进入轨道后，又会遇到失重、真空和辐射等。因此，制造火箭的材料、元器件和火箭上的设备，必须能经受这些恶劣环境的考验，需要加倍的可靠。还有，火箭燃料要么带腐蚀性，要么有毒，要么温度极低，对火箭材料和仪器设备带来许多复杂的影响；火箭上各种电子仪器设备在工作时，会相互产生电磁干扰，因此还要有防干扰的措施。此外，火箭和它运载的航天器之间，彼此的机械性能必须相互协调。这样，就好像一个人外出旅游，既要带上全部换洗的衣服，又要带上充足的食物，还要有遮阳、避雨、挡风的设施，也要有防盗、防劫的武器，更要有防病治病的药物，以及记时、定向的器具，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安排得井然有序，不相互影响和掺和……火箭构造的复杂性就可想而知了，而由于火箭的发射过程必须要克服地球引力，才能飞入太空，这就要求它自身的质量越小越好。火箭本身质量过大，就会降低自身的速度；为不降低速度，就要减少它运载物体的重量。对火箭来说，火箭重量增加一百千克，运载能力就减少一百千克，所以，火箭应该造得很轻巧。这与可靠性要求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从而造成火箭的另一个特点——娇嫩。

火箭使用液氢液氧这些低温燃料，从而提高火箭的性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但是，零下二百五十三摄氏度的液氢，甚至可以透过某些金属壁，非常容易泄漏。

泄漏的氢遇到空气中的氧，特别容易引起爆炸。尤其是火箭发动机中高速进入燃烧室的液氢，一遇到水珠和各种气体分子，会把它们冻结成比金属还硬的颗粒，并推动其高速前进。这样，它们就有可能像子弹那样击穿金属管道。有的金属材料遇到液氢，会变得像陶瓷那样脆，叫做“氢脆”。因此，用液氢作燃料的火箭，对用作制造液氢贮箱、输送管道、发动机等的材料，以及液氢的贮存、运输和加注的安全性，都提出很高的要求。

与火箭的零部件、元器件容不得半点疵瑕一样，火箭的工作状况也容不得些微偏差。同时，火箭发射时，也容不得工作人员有半点工作差错和疏忽。还有，火箭中更容不得半点多余物，因为那可能是造成火箭发射事故的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比火箭简单得多、成熟得多的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也常发生事故，甚至机床和自行车也常发生事故。那么，火箭事故是不是比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事故更多呢？

有人对汽车、机床、飞机和火箭事故做了一个统计，在一百辆汽车中，平均有二点五辆发生事故，事故率最高，为百分之二点五，其余机床为百分之二点四，飞机是百分之二点二一，而火箭是百分之零点九，即一百枚火箭中平均不到一枚会发生事故，事故率是最低的。这是由于人们对巨大、昂贵、复杂和娇嫩的火箭更加重视、更加谨慎的缘故。

同样的道理，火箭一旦发生事故，会造成比汽车、火车事故和空难、海难更大的影响。“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造成航天飞机停飞近三年，而其他死人更多的事故，则未必造成如此大的冲击。

如此说来，人的谨慎和努力虽然可以提高航天发射的可靠性，但要从根本上避免这一类灾难的发生，则几乎是不能的。正如人类的社会一样，它可以被无限地改良，却永远不能保证它的每个成员都幸福圆满。

其实从来就没有不付出巨大代价的伟大成功，人类的每一个梦想无不是用辛勤、汗水甚至鲜血去换取的。简而言之，对于征服太空这样一个伟大计划，需要人们具有无畏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当然更需要智慧。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向大自然的挑战是永无止境的，在每一次失败带来的灾难中，人类都再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人类是悲哀的。

但人类又是伟大的。

人类的智慧不仅能使他们意识到这种智慧的局限性，同时也会使他们向真理不断靠近并决不屈服于任何困难。因为，“要发现就要有牺牲”。

而一种没有止境的探索本身也是吸引人的。这正如“阿丽亚娜五型”发射失败后德国戴姆勒——奔驰航空航天公司负责航天系统的董事维尔纳·海因茨曼在一份声明中说：“该计划的失败显然非常失望。但是在着手处理‘阿丽亚娜五型’火箭涉及到的这类极为复杂的技术时，这类挫折肯定在预料之中。”

而另一位该计划的负责人，阿丽亚娜航天公司董事长夏尔·比戈在接受 LCI 电视台采访时说：“当然这次发射令人失望……但是我从事这项工作近四十年了，我知道每次失败后我们都必须无一例外地从失败中重新振作起来。”

危害一百年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爆炸

概况：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前苏联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大爆炸。前后已有近万人死于这起事故，数十万人受到辐射伤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数千亿美元。其后患将会影响人类一百年，是已知的世界最大核事故。这次事故在世界上造成的巨大影响，使各国重新考

虑核能的安全性并加强了这方面的国际合作。

一九八六年四月的最后一周，湛蓝而宁静的波罗的海在午后的阳光下尤如一块流光溢彩的宝石。对于生活在几乎是地球最靠北极的北欧的人们来说，现在是美好的时刻。长达八个月的冬天快要过去了，“北欧海盗”的子孙们又擦亮了桅杆拉满了帆，欣喜的眼里充溢着与和煦的东南季风相称的蓝色憧憬。

但这一年的东南季风却有些异样。纯朴和平的北欧人没有想到，和煦的东南季风中也夹杂着一股眼看不见、手摸不着的灾变之潮……最先发现这一异常情况的是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著名的中立国瑞典。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所位于波罗的海岸边，与前苏联隔海相望的瑞典军用雷达站突然发现周围环境的核辐射量正在急剧地上升。当自动监测仪器清晰地显示出，该地区核辐射水平已高出正常值六倍时，雷达站的气氛骤然间紧张起来。

该雷达站的值勤军官立即向其他九所军用雷达站发出了警报。

与此几乎同时，瑞典全国的放射性物质自动监测站也都记录了各地核辐射水平不同程度上升的异常情况。

四月二十七日这天晚上，像受到某种神秘感应似的，晴朗的天空罩上了一层浓云。瑞典全国天色阴沉：北部的山林中飘着抖颤的雪花，南部的城镇里神经质地落下阵雨。

当绝大部分人已坠入深沉的梦乡时，雷达站的军人仍然严阵以待。他们一边不断向上级报告情况，一边焦虑不安地守在监测仪旁，密切注视着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十分危险的“敌人”。

这是一个异常漫长的夜晚……整个晚上雷达站里所有的人都在想一个令人疲倦的问题：灾变究竟从何而来？

“飞”来横祸

前苏联应用原子能委员会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戈尔巴乔夫宣称“没有必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

“公告的措辞表明，这起事故非常严重，死亡人数很高”。

四月二十八日清晨，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以北一百六十公里处的福斯马克核电站突然响起了警报。

在核电站工作的人对警报当然是非常敏感的。值班的安全人员立即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是一名上早班的工人在经过站内一个要保障高度安全的区域时，引发了启动警报器。经过对这名工人进行严格检测，发现他穿的蓝色鞋套上有核辐射尘埃。

同时在刚来上班的其他工人身上也发现了类似情况，问题开始变得非同小可。警觉的安全人员已经开始怀疑是自己工厂的核反应堆出了问题，并立即动员了四十多名专业维修人员对核反应堆进行了彻底检测，但结果表明反应堆并没有异常情况发生。

只是在核电厂外部发现核辐射量高出正常水平的四点五倍，其原因却不得而知。

在瑞典这样一个废除死刑已上百年的福利国家里，人身保障永远是第一位的。

为了绝对保障人员安全，福斯马克核电站的厂方负责人还是决定将该

站的六百名非必要人员全部撤中，并逐一进行了身体检查，同时也把异常情况通报了国家安全部门、当地政府和电台、电视、报纸等公共媒介，以便于及时提醒人们做好应变准备。

特殊的处境和安全装置使福斯马克核电站较早感觉到了危险因素，从而引起了惊恐不安。他们还不知道，在瑞典以及整个北欧和波罗的海沿岸，这种惊恐不安并不是他们所仅具的。

此时瑞典国家核研究中心也在核反应堆外部发现了急剧增加的核放射物尘埃。

而瑞典的邻国芬兰、丹麦和挪威在这天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其中芬兰发现的核辐射水平增加值最高，在其北部和中部的核辐射读数比正常情况高五倍至十倍；在丹麦，官员们说，辐射程度比正常情况高四倍；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据称辐射程度比正常情况高百分之五十。根据这些发现，专家们排除了福斯马克核电站发生事故的可能，开始寻找外部的原因。最初被怀疑的对象有前苏联的地下核试验发生意外泄露，航行在波罗的海的核潜艇出了事故，在空间的核动力卫星损坏坠毁大气层。

到四月二十八日上午，瑞典国家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已精确地测定了收集到的放射性尘埃的化学成分。检测结果表明，放射性尘埃中含有氦、氙、碘、铯和钴等物质，其中铯一百三十四的含量要比铯一百三十七的含量少得多。科学家们由此断定，瑞典及北欧其他国家日益增加的核放射尘埃来自某个邻国发生了严重核泄露的核电站。

近日的风向、云图等气象资料表明，这个发生了重大核电站事故而至今秘而不宣的邻国很可能就是前苏联波罗的海沿岸的某个加盟共和国。

而且，这股从东南方向随风席卷而来的辐射浪潮已形成了一片放射性云层，并继续向东欧和西欧的上空飘去，危害的地区还将继续增多。

瑞典科学家的报告刚一完成，就立即被送到了瑞典外交部。

瑞典外交大臣即刻指示瑞典驻莫斯科大使馆同前苏联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交涉。

四月二十八日午餐时分，瑞典驻莫斯科大使馆科技专员在接到命令后，分秒必争地赶到前苏联应用原子能委员会向对方正式提出质询。但前苏联应用原子能委员会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四月二十八日晚间，瑞典驻莫斯科大使馆举行了招待会。在招待会上，瑞典大使再次严肃地向出席招待会的前苏联外交部官员提出询问。这回前苏联的官员对询问作了记录，但仍未作任何答复。

四月二十八日晚九点零二分，苏电视台发表了一条简单的答复，第一次承认，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一个原子核反应堆受到损坏。

事实上，这时距事故发生时间已过去了整整六十个小时。

稍后，前苏联官方喉舌塔斯社也发表了公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一座原子堆受到损坏。正在采取措施以消除事故的后果，并向受害者提供援助。已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着手处理这一事件。”与此同时，塔斯社用较大的篇幅报道了美国的核电站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多次发生的这类事件，并宣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是苏联第一次发生这类事故。”

果真如此吗？

起码十多年以前曾在前苏联南乌拉尔地区生活过的人不会这么看。一

九五七—一九五八那个冬季的一天，大型核工业聚集区乌拉尔就发生过一起惊天动地的爆炸。

强烈的气浪如同火山爆发把放射性尘埃和各种核物质喷洒到天空中。据说其威力相当于一九四五年美国投放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的一百倍。

狂风把放射性烟云刮到数百英里这外，结果造成南乌拉尔三千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核污染。区内草木不生，成千上万的人患了辐射玻由于当地许多医生不懂放射性核医学，不知道如何根据患者所受到的辐射剂量对症治疗，结果造成数百患者立即死亡。

一年之后，死亡人数上升到几千；三年之后共有几万人死于这场核事故。

事故原因是前苏联在南乌拉尔地区搞了一个军事核反应堆。

在核废料处理环节还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为了跟美国人竞赛，不顾科学家的反对下令提前开炉运转。为了节省核废料处理费用，苏联当局把核废料都堆积在乌拉尔的林区之中，从而形成大规模的放射性废物贮存场地。

核废物中心的钚是一种不易溶解的元素。乌拉尔地区核废物中的钚，大部分被土壤所吸收。当它与水作用后，触发了链式反应。水被迅速加热成水蒸汽，水蒸汽压力增大而产生的强烈爆炸，造成了这场骇人听闻的核灾难。

至于塔斯社提到的美国发生的各种核事故，当然也都是存在的，尤其是美国三里岛事件使人谈核色变。但由于美国的新闻相对而言控制得不太严格，消息走露得也较快。问题提出得早一些，酿成的灾害也较校后来的事实证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生的最严重，灾害面最宽的一起核事故。

对于塔斯社四月二十八日发表的公告，驻莫斯科的各外国通讯社都立即作出了反应。

路透社最先报道了这个消息。它说苏联承认其一座核电站发生了事故。并造成伤亡。并且说，塔斯社在一则简短消息中承认，发生的事故虽然是不同寻常的，却是苏联第一次发生这类事故。但路透社引用西方专家的观点说，五十年代末，乌拉尔地区的一个军事核设施也发生过重大事故，使其周围的大片地区变成荒地。合众国际社也报道说，塔斯社发表公告承认苏联发生了这类核事故，而这在过去是没有先例的。一位西方外交官在仔细研究了塔斯社公告中字里行间隐含的意义后推断道：“公告的措辞表明，这起事故非常严重”，“死亡人数很高。”

四月二十九日，塔斯社转发苏联报纸对事态较为详细的报道。报道说，位于基辅以北一百三十公里处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据初步消息，事故是在第四动力机组室内发生的，破坏了反应堆的一部分建筑物，反应堆受到损坏，流出一些放射物质。而其余的三个动力机组被保全下来，经过整修正处于备用状态。事故中死亡二人，已采取了紧急措施来消除事故的后果。

此时整个欧洲已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人心惶惶。瑞典、芬兰、丹麦以及欧洲共同体在四月二十九日向前苏联提出强烈抗议。瑞典国家研究中心放射学研究发言人说，这次事故后飘落到瑞典东部沿海地区的放射性物质的含量已超过正常标准的一百倍，使瑞典受到严重污染。瑞典能源大臣比尔吉塔·达尔进一步警告说：“我们两国之间今后的关系将取决于莫斯科是否很

乐意于及时回答问题和对提高安全标准的要求作出反应。”丹麦首相保罗·施吕特也抱怨：“苏联人丝毫也不透露风声，真令人遗憾。”

他强烈谴责苏联未立即就核电站发生的事故向其邻国发生警报。

他还说，丹麦将寻求与邻国特别是与苏联签订一项有关较快地通报核电站事故的协定。美国总统里根对这次核事故深表遗憾。英国、西德已开始对由苏联和东欧国家入境的人员进行放射性污染检查。日本首相中曾根表示对这一事件“非常关心”。

受到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应该是波兰。其首都华沙离出事地点只有四百英里，因此对这起核事故非常关切并积极采取了措施，防止核电站溢出的放射性尘埃危害波兰人的健康。波兰电视台在四月二十九日即宣布对牛奶销售实行限制，并说波兰东北地区的儿童有可能受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辐射污染。波兰总理梅斯内尔任命了由副总理沙瓦伊达牵头的委员会，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危害等问题。委员会公报说，中央辐射保护实验室、化学部队、大气和水利研究所以及卫生防疫站正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全国范围内的辐射水平进行测试。空气中放射性的碘落到植物上，有可能通过牛奶传播到人体中去，因此专家们指示目前不要食用喂青草饲料的奶牛所产的牛奶。

四月三十日，前苏联中央电视台播放苏联部长会议公告说，共有一百九十七人被送往医院，其中四十九人经检查后已经出院。公告还说，苏联政府已向事故现场调去装备有现代化技术装置的特种部队，由于采取各种积极的补救措施，没有发生核燃料分裂的连锁反应，反应堆目前已处于熄灭状态，核电站周围地区的环境正在好转，辐射水平有所下降……云云。

然而这时罗马尼亚有些地区的放射性物质的增长也已大大超过正常限度。总统齐奥塞斯库于五月一日召集会议讨论了核污染的问题，并成立了以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为首的专门机构，并向有关地区十八岁以下居民发放了碘化钾。南斯拉夫联邦保健委员会也向公众宣布说，南斯拉夫空气中的放射性尘埃明显增加，要求居民不要利用雨水，不要饮用放牧于野外的牛羊的奶，不要吃新鲜蔬菜。

而苏联则继续发表公告说：核电站周围地区的环境正在好转，对稍远地区的空中环境可“不必担忧”。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致函美国总统里根，在承认“有放射性物质散播到别处”的同时，仍然宣称“没有必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

五月六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较详细地报道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的经过。

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机房深夜发生事故时，“爆炸毁坏了反应堆机房的建筑，同时发生了火灾”。从仪器上发现有放射性物质这一现象来看，事故可能发生在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点二十三分。由于爆炸后机房屋顶起火，高温使消防人员的靴子陷入熔化了了的沥青中，浓烟使人呼吸困难。部分放射性物质外溢，然后在反应堆里起火。扑灭火非常复杂，因为不能使用水和化学物质。从四月二十六日早上开始疏散核电站所在地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居民。集中和疏散这些附近地区的居民总共用了四小时，离出事地点一百三十公里的基辅市出动了大批车辆参加疏散工作。前苏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罗比约夫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事故共有二人死亡，因辐射而受伤的共有二百零四人，其中十八人处于严重状态。

然而，西方通讯社援引核电站所在地基辅居民的话，报道的情况与塔

斯社却大相径庭。合众国际社说：基辅北面的大型核电站发生的事故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那么事故的真相和原因究竟是怎样的呢？

摄魂取魄的“核魔”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工作人员违章操作……

摄氏二千度的高温和高达一万伦琴/每小时的辐射吞噬了现场的一切……

“毁坏的核反应堆景象是令人震惊的……”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由于前苏联在当时除了说是人为的差错以外，对于这次核事故的原因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细节，所以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科学家的各种议论和猜测。

前西德官员和专家说，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是核电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核电站里因石墨燃烧造成的大火，显然是反应堆中产生的热量不能散发，导致原子堆芯熔化引起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用的是七十年代引进的“RBMK—1000”型核反应堆。

这种反应堆是将铀燃料棒放在一大堆石墨中，利用石墨来有效地控制核反应的速度，从而产生出推动涡轮机的蒸气。这种石墨反应堆缺陷是安全性不高，因而在许多年以前就被西方抛弃了。但是在前苏联所有原子能发电站中有一半左右是采用“RBMK—1000”型反应堆作动力的。

前西德研究苏联核动力的高级专家、不来梅大学的廷斯·舍尔对路透社记者说，如果这种反应堆的水冷却系统发生渗漏，同时又未能及时关机的话，那就会发生事故。小型爆炸必然会发生，这样就会使石墨燃烧起来，于是就会引起温度极高的大火。

这种火极难扑灭，因方任何水直接浇到火焰上，都会立即变成高度放射性的蒸汽。

另外一位核专家比克霍费尔则说，由于苏联的核发电厂的建设情况，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故可能比哈里斯堡的美国三里岛核发电厂七年前发生的事故要严重得多。

在西方，核反应堆通常有一个钢外壳。如果发生事故，它能够遏止最严重的辐射。

而前苏联的核电厂通常没有这种外部防护装置。他还说，一旦燃料棒过热，反应堆的所有水都将汽化，与空气混合起来。如果堆芯熔化，放射性微粒便喷射到空中，形成辐射云层。于利希的核研究所的伯尔施表示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如果反应堆缺少一个钢罩将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如果从堆芯溢出什么东西来，它将通过空隙喷射出来。

美国情报专家则断定是一次化学爆炸引起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堆芯的熔化，而放射性物质由于没有钢罩阻拦喷射到电站周围十英里之内的地方。

在美国核工业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核工程教授富兰克林根据新闻报道推测，切尔诺贝利事故原因是热石墨与空气接触后起火。核反应堆中石墨的冷却剂通常用的是二氧化碳。

前西德原子能机构的技术主任彼得·豪格说，发生事故显然是因为流

向堆芯的冷却水中断了，从而使反应堆的热量变得过高。

各国专家们言之凿凿，都有一定根据和道理，但只是由新闻报道和自己的经验分析得出的。而当事国前苏联当时一直保持沉默，至到一九九一年以后各种报刊才陆续披露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真实原因、详情和可怕的灾难性后果。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前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府基辅市北郊一百三十公里的地方，是一个著名的大型民用能源工业工厂。该电站只是前苏联众多原子能发电厂中的一个，共有四个核反应堆发电机组，另外还有两个发电机组正在修建之中。

发生爆炸的建筑物是这个巨大的建筑群中四个建好的建筑物之一。如果从俯摄的照片上看，这个建筑群由南至北成一条直线。每个建筑物里都有一个发电用的核反应堆，而发生爆炸的是最南端的一个建筑物。

已建成的四个机组分别于一九七七、一九七九、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间被相继投入运行使用，每个机组都具有一百万千瓦的巨大功率。一九八三年当第四号机组正式投入使用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发电量占乌克兰总发电量的一半，同时也成为大多数东欧国家的重要电力供应者。

前苏联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核能发电，也是第一个建原子能发电站的国家。然而，从技术，尤其是从安全防护技术的更新步伐上看，苏联显得十分守旧不前。它的大站分核电站中的原子能反应堆，都属于第二代压力管式沸水堆，又称石墨堆。这种原子能反应堆，不像西方国家的核反应堆那样，都被外罩上一层“安全壳”，即全封闭的由钢筋混凝土构筑而成的坚牢厚实的防护层。

所以从技术上说，这种反应堆很不安全，几乎没有什么有效防御能力。而且这种反应堆，一旦控制人员技术失误或违章操作，很容易发生爆炸事件。而一旦发生爆炸，即使是轻微的爆炸都有可能使石墨燃烧，而将堆芯熔化，从而摧毁厂房，造成有害放射性物质的大量泄露。无疑，这将会使许许多多无辜的生命被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所采用的 RBMK—1000 型水冷式反应堆系前苏联七十年代引进的，正是所谓石墨水反应堆；而这次爆炸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正是由于工作人员违章操作！

核反应堆中的核心是对人危害性极大的放射性物质钚和铀构成的。这些物质犹如阿拉伯神话里渔夫从海里捞起的那个魔瓶中的魔鬼一样，一旦被放出了牢笼，就会危害于人。

面对隐患仅仅祈祷是无济于事的。一个可以人为抑制、消释的隐患，当人们任其发展的时候，也会像无法控制的火山、地震一样被酝酿成熟，而且当时机到来时会更肆无忌惮。猖獗横行，造成无穷的后患。

果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中的“核魔”一现身，就为非作歹，演出了极为残酷与恐怖的一幕。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仍像往常一样，灯火通明，各部门正常运转。凌晨一点整，根据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站长 B·布留哈诺夫的指示，工作人员开始准备在第四号发电机组上进行切断 RBMK—1000 型反应堆保护装置的试验。由于工作人员违章操作而使电源突然中断，主要冷却系统因此而停止了工作，反应堆失控了！堆芯温度迅速增高，进而被熔化。凌晨一时二十三分四秒，反应堆工艺管道内的载热体沸腾起来，水

被强辐射立即分解成了氢和氧，浓度过高的氢和氧随即发生了大爆炸。中子流引起燃料核分裂，在 RBMK 型铀——石墨反应堆没有厚实安全壳保护的情况下，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反应堆燃起熊熊大火。

当时火焰从炸飞了的建筑物顶部窜出，高达三十余米，黑夜被照得如同白昼。四号机组中的“核魔”挣出了核反应堆这一“魔瓶”的“瓶口”，核燃料碎块，高放射性石墨块被抛出，散落在堆体四周，而堆体和厂房已被完全毁坏。摄氏二千度的高温和高达一万伦琴/每小时的放射剂量吞噬了现场的一切，翻滚的浓烟从反应堆中涌出，扶摇直上，笼罩了整个电站，又向四面八方蔓延。更要命的是，它和蒸发的核燃料迅速渗入到大气层中，在周围地区造成了强烈的核辐射，继而被风刮到更远的地方。

现场周围到处充溢着一股非常强烈的臭氧气味，工作人员的眼皮、喉咙都有一种剧烈的刺痛感，呼吸不畅、胸部滞塞，表现出强烈的放射反应。许多人就这样被大火和强辐射立即夺走了性命……警报尖利刺耳，厂区一片混乱惶恐。放眼望天，放射性烟云遮天盖地！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四号机组陷入了一片烟与火的海洋之中。正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瑞典人汉斯·布利克斯所说：“毁坏的反应堆的景象是令人震惊的……这个景象叫人悲伤。”

大爆炸之后，火势迅猛地发展起来。虽然爆炸起火的只有第四号机组，然而各个机组之间的距离仅有一百五十米，而且都修建在同一个机房内。如果第四号机组的局势得不到有效控制，蔓延殃及其他机组，引起紧邻的三个原子核反应堆的连锁爆炸，那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确定火势蔓延的最危险地区，即机房屋顶。它可能成为第四号机组和其他机组，特别是第三号机组的“联系环节”。

此时，正在电站值班的专家和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常电站消防队的普拉维克中尉和军队防化分队的基别诺克中尉都很快带领消防队员到达了现常在大量放射性物质仍在不断释放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冒着极大的危险关闭了有关阀门，消防队员冒着扑面而来的热浪攀上屋顶去压制几十米高的火焰。他们用手套排除爆炸碎片，靴子浸在融化了的沥青中。如果太靠近出事的反应堆，就可能立即死去，而危险的高辐射则会毁掉他们的后半生……但在这个关键时刻，是谁也不能退却的！

由于现场情况复杂，燃烧物质特殊，核能和化学能同时释放，着火区域放射性较强，给灭火带来极大的困难。因为扑救核反应堆引起的大火，绝对不能使用任何水和化学品。水和化学品一旦被射向反应堆，将会立即化为强烈放射性的蒸汽进入天空。

唯一可行的措施全用砂子、粘土、硼、铅、白云石等物质，将反应堆严严实实地覆盖起来，以在释放放射性物质的堆芯上形成隔离层，阻绝空气，封固源顶。于是政府征调了大批空军直升飞机。

切尔诺贝利市郊外有一大块空地，是露天仓库兼机常现在成群的直升飞机停在那里，满载着一袋袋沙子、硼、白云石和沉重的铅条，然后飞到四号机组上空对它进行“轰炸”，因为从地面是无法完成这些工作的。但是在切尔诺贝利飞行，飞行员不仅要注意速度和高度的仪表盘，还要注意放射性的剂量仪，因为在空中也是会遭到辐射的。有时飞机飞临的区域其放射性都不是以每小时毫伦琴计，而是以每小时几十伦琴计，这时就必须设法躲避高辐射。为了躲避高辐射，飞行员在空中往往要折腾几十分钟才能将“炸弹”

投到目标上去。这样经过半个月的奋战，直到五月十一日，五千多吨的沙石才将“魔瓶”那破损的“瓶塞”堵祝经过前苏联方面的一番努力，反应堆引起大火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五天基本被控制。五月十四日，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讲话中说，已经防止了事故的最严重后果，但在核电站及其毗邻地区，辐射水平仍然危害人们的健康。而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这是迄今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核事故。

事故发生后，一个以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为首的领导小组成立，同时组成了一个包括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官员在内的政府调查委员会，在竭力组织扑救、控制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轻危害程度。

四月二十六日傍晚，已有医护人员赶到了事故现场女医生安·康·古希科娃透露，第一个昼夜她就检查了上千人的病情。她说：“我觉得，现在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单凭自己的经验来处理这样重大的事故。在和平时期，没有人应该遭到如此可怕、在科学上又鲜为人知的问题。”

事发当天，基辅市以及整个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犹如进入了战争时期的紧急状态。

前苏联政府将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为中心的方圆三十公里的所有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必须撤离，牲畜也带走。鸡、鸭、鹅等家禽可以留下，狗或带走或打死，否则比较危险。第二天凌晨，对隔离区中的居民开始紧张疏散，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汽车运输部门调集了大型公共汽车一千二百一十六辆，各种型号的卡车三百辆，组成的汽车车队达十五公里之长。警察和地方官员在隔离区中来回奔走，挨家挨户地催促人们立即上车，撤离家园。距核电站最近的三万多居民最先被疏散了出去，随后，又疏散了周围的十万多居民。整个基辅一带，各个中、小学校一律停课放假，学生们被全部远距离送往千里之外的黑海海滨。看来似乎只有这些孩子从这次事故中得到了一次绝好的游玩机会——但实际上他们中的一部分已受到了致命的辐射伤害，其可怕的症状将在不久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各医疗救护队一千三百多名医护人员对撤离的居民作了严格的检查治疗，二百多名重伤员被直接北运莫斯科。”

美国著名核医学专家盖尔博士乘坐飞机赶到莫斯科，和苏联医护人员一起投入了与死神争夺二百九十九名遭受严重辐射损伤的人的生命的战斗。虽然他所领导的抢救小组和苏联专家们在一个星期内就做了十九例骨髓移植手术，成为“同时进行多例这种手术的前所未有的创举”，但是十九位受术者中还是有十三人相继死去。

盖尔博士说：“许多受害者因为体内白血球被放射性杀伤而剧烈下降，因而这些患者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多系统感染。”他还指出，由于遭受超量的辐射伤害，受害者本身又成了辐射源，因而，他们还直接危及救护人员。

另一位美国医生华荣博士在对受害者的作了长达一个月的访问、调查后下结论道：“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到目前为止，才只是一个开端！因为事故中间核反应堆溢出的大量碘一百三十一，铯一百三十七等放射性物质，使事故现场周围的放射性剂量超出了人体允许剂量的二十倍。附近的居民受到了六百拉德以上的辐射，而且必须提醒注意的是，四百五十拉德的辐射量就会使受到辐射的健康人死亡殆半。所以并非耸人听闻——由于这场事故而受到核辐射的人，其死亡数将达到一万——三万五千人，还有五万人可能因此而患上癌症和其他疾病”

惨重的代价

小城里空无一人……一片凄凉的景象。

五十年内……不得耕作和放牧。

损失全部加起来……可能达数千亿美元！

核科学家和核技术专家云集在切尔诺贝利。

这样大的核电站事故在世界上还没有发生过。反应堆的保护区被破坏了，它的冷却也停止了，形成了一个烧红的“结晶体”。

如何使电冷却？这个被破坏了的反应堆将如何“行动”？事故的范围会不会扩大？怎样制止泄漏的放射性物质进一步感染空气和周围地区？……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专家们的前面。

人们所甚为忧虑的一个问题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处普里皮亚特河畔，该河流与面积为九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基辅水库相勾通。而基辅水库又正是基辅市民的主要饮水来源，如果放射性物质渗入普里皮亚特河，再污染基辅水库，这必然殃及子孙后代。

为了不留后患，苏联政府决定在反应堆底座之下，再浇铸一层混凝土厚垫，以使反应堆底座与地下土层隔离，为此，政府当局从各地抽调大批矿井工人，挖掘一条直径一点八米，长一百三十六米的斜井隧道，直达反应堆底部。由于矿工们是在污染严重的条件下作业，所以他们每天分作八班，每班工作三个小时。每个施工队只作业十五天就轮换下来。完成这项艰难而特殊的工程，前后花去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在电站区内射线固然危险，而放射性尘埃更为可怕。如果道路可以冲洗，那么河岸、水库、电站的屋顶，院子和堆满木材、部件、建筑材料的基地怎么办？化学家们找到了一条出路，他们研制一种专门的溶液，把它涂在任何表面上就会变成一层薄膜，把尘埃、砂料和其他东西都粘在上面。喷涂这种溶液的任务有时也由直升飞机来完成，六辆液罐车把那种化学溶液灌进米——二六直升飞机。飞机起飞时非常非常沉重。要知道机身里装了差不多二十吨溶液。经过二十分钟的飞行，飞机到达四号机组的上空。这次飞得很低，仿佛一伸手便可以触及反应堆。高度只有六十米。但目标不是四号机组，而是三号机组的屋顶、基地和河岸。

机长亲自驾驶，在目标的上空盘旋。

“领航员，打开泵！”机长命令。

从直升机的肚子里像线似地流出了褐色的液体。六十米，这比机组的屋顶还低，机组的高度是七十米。飞机下面是电线和电线杆……这时，任务能否完成以及全体乘员的生命都系于机长的飞行技术。

“机长，任务完成了。”领航员报告说。

“好，离开电站区！”机长喘了一口气，并将飞机交给助手驾驶。

直升飞机改变了航向。两分钟后，飞到了一个明亮、舒适、规划得很好的小城上空。但是在这个小城里却空无一人，没有车辆，一片凄凉的景象，因为那里所有的人都撤走了。

这个小城就是因普里皮亚特河而得名的普里皮亚特市，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只有二公里，受核污染最严重。曾有五万居民的城市现在变成了一座“死城”。林立的楼房之间只有可怕的寂静、寂静。

为了防止核辐射的进一步扩散，从前苏联乌克兰首府基辅到核电站所在的小城设立了许多核辐射量监测站，车辆过往都要经过辐射测量器的检查。轮子是最薄弱的环节。车辆污染不超过半毫伦琴始得放行。在三十公里电站区边界上的好几个村庄里盖起了巨大的仓库，那里堆放着抢运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去的材料、商品和机器等。经批准进入三十公里电站区的人都必须戴上特别的防尘口罩，戴上帽子。

但切尔诺贝利电站核污染的危害程度仍是严重的。为了防止污染的扩散和消除污染，前苏联决定：在污染范围之内的农作物一律禁止收割，必须全部翻耕深埋；电站周围必须挖地三尺，把受核污染的表土翻埋地下。对于污染地区的河流，水系，则修堤截流将其排放到特定地区。前苏联空军还专门派出气象飞机前往事故地区消除雨云，避免降雨造成污染扩散。对受污染较小的建筑物、生活设施则用净水清洗。

前苏联方面宣布，截至五月十六日，直接死于这场灾祸的有十三人，有三百多人因辐射致伤而在治疗中。

过了一段时间，前苏联方面又再次宣布了这次灾难的一些后果的数据：切尔诺贝利事故使前苏联损失了八十亿卢布，善后工作花了四十亿卢布，农业和电力生产损失也是四十亿。人们健康遭到的损失就很难说得精确了。

据说已确凿知道患严重放射病的共一百四十五人，他们是核电站的值班人员和参加事故善后工作的人员。已死亡三十人，其余的已得到专门治疗，目前只有十六人尚能工作。普里皮亚特市及电站方圆三十公里地区内没有一个居民患放射病，因为这里的放射污染程度比可能受到的要低得多。

使人特别担心的是在事故期间有孕和事故后不久受孕的妇女。她们总共有二千多人，每个孕妇都受到医生的特殊监护，因此所有婴儿都正常出生。

但是西方的专家们认为，辐射的后果在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出来。特别是前苏联方面只是在事故后三十六小时，也就是在辐射量已达到危险程度时才下达疏散令的，因此在绝大多数疏散的居民中实际上“播下了致命的祸种”。由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基辅供应水库附近的两条河流的汇合处，因此一些西方专家担心该地区的水源有可能受到辐射污染。一些科学家甚至预言，在今后十年内，现居住在切尔诺贝利周围地区的数百万居民的癌症发病率将会很高，三年或五年后就可能会出现第一批白血病患者。在随后的几年里将会有更多的患者。

从经济方面来说，西方估计，除核电站本身的损失外，光清除污染一项就得花费几十亿美元。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苏联为了安全起见，关闭了十六座同类核电站，从而增加了国内对石油的需求量。美国专家估计，这些核电站的总装机容量相当于每天要用四十万桶石油。这样，苏联对欧洲的石油出口就可能减少。

这次事故对环境的影响也是令人痛心的。乌克兰，人称天然粮仓，“面包篮子”，是前苏联农副产品的的主要产地，其粮食产量占了苏联的百分之十五。据西方科学家估算，核电站事故将使苏联的粮食产量减少二千万吨。苏联将不得不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禁止在事故现场十公里范围内耕作和放牧，在十年之内禁止在现场一百公里范围内生产牛奶。这就是说，半个世纪的漫长时期内，核电站周围的千万顷沃土肥田将是一片奇特的荒野大漠。

这样，苏联不得不增加粮食和副产品的进口。同时，由于电站中四个机组全部关闭，苏联的电力损失将近百分之十，整个基辅地区的工业生产将

会出现严重危机。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不仅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直接后果，而且也产生了间接影响。

首先，这次事故对当时苏联雄心勃勃的核能计划是一个打击。苏联为了弥补石油生产的不足，计划到一九九一年将核电力产量提高一倍以上。这次事故无疑将给该计划的实现投下阴影。

前苏联的核能设备在国外本来有一定的市场，这次事故已使芬兰、巴基斯坦等国重新考虑引进当时苏联的核能技术问题。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前东德的核电力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苏联技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东欧处于一片恐慌之中。捷克有一座同切尔诺贝利相似的核电站距维也纳只有三十公里左右，这使奥地利人非常不满。芬兰已购买了两座前苏联制造的反应堆，因它没有安全外壳而使芬兰人惶惶不可终日。

这次事故对前苏联的旅游和外贸也产生暂时的影响。西德、瑞典、丹麦等国已禁止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食品。西方国家在苏联西部的留学生、工作人员和游客开始撤回国内。一百多个英国人要求尽快离开基辅和明斯克返回英国。芬兰准备派专机从基辅将一百多名芬兰游客接回国。由于这次事故，欧洲的许多旅游机构取消了组织去苏联旅游的计划。

据西方专家估计，如果把前苏联的旅游方面，外贸方面和农业方面所遭受的损失全部加起来的话，可能达数千亿美元之巨，不可不谓之“惨重”。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这起核事故可能污染苏联最肥沃地区的农田，挫败戈尔巴乔夫振兴经济的计划并影响核建设计划速度。然而，西方国家驻苏使馆的经济专家们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事故将对苏能源计划和食品供应产生不利影响，但对整个经济影响不大。

苏联核事故在苏联本土之外所造成的污染程度如何呢？

事故发生后，西欧一些国家分别监测到苏联核电站事故溢出的放射性物质。瑞典、西德等国对苏联的东欧国家入境人员逐一进行放射性污染检查，而且严禁从苏联和东欧进口蔬菜、水果、食油、酒、粮食、肉类等新鲜食品。一些国家的露天游泳池和儿童游乐场纷纷关闭。每个人的心头都对核污染缭绕着一片恐慌的阴云。一位英国核专家说，这次事故的放射尘埃可能要危害几十年。但许多专家却指出，迄今飘到西欧地区的放射性物质的含量不足以给人体健康带来危害。瑞典学者欧勒姆四月三十日说，在法国上空发现的铯和碘的微粒量足以留下痕迹，但构不成危害。

法国防离子辐射中央局总局长皮埃里·佩勒兰认为，迄今在苏联领土以外侦察到的放射性物质的量，距危险界限还远。西德内政部有关专家指出，在西欧地区上空，放射性物质要增加到高于平时一百倍时才会危及人的健康。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声明说：“目前不必对苏联边界以外的影响惊慌不安。”奥地利的专家们认为，奥地利境内放射性物质虽有增加，但并未达到危及人体健康的程度。

但奥地利卫生部宣布一项紧急措施，禁止在市场上出售在露天生长的新鲜蔬菜。

无论怎么说，这次事故已在国际社会里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各种新闻媒介和社会舆论的焦点。许多问题被这起事故以最尖锐的形式再次摆在了公众面前，诸如国际合作，全球一体化，环境保护等等。而在核电事

业已有三十年历史，世界核反应堆的平均负荷率已达百分之七十，核发电量占世界总发电量六分之一的技术成就面前，人们最禁不住要重新提出的问题是：核能安全吗？

IV 危害一百年！

“一九四七年，当爱因斯坦把发现原子核反应比作火的发明时，他没能料到，人类社会为了学会控制这一具有毁灭性威力的‘火’将需要多少时间……”

——N·所罗门《我们是自杀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后，人们从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中得到启发，在开始研制原子武器的同时也开始了和平利用原子能为人类谋福。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迫使世界各国为发展经济，制定了能源多样化政策。由于核能干净，运输方便，富有经济性，各国竞相兴建核电站。截至八十年代后半期，全世界约有三百七十个核动力反应堆在运转，预计二

年核电将占世界发电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和平利用原子能已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原子能进入人类生活后，从费米的第一座原子能装置开始运转到库尔哈托夫的第一座工业原子能发电站正式运行，类似广岛和长崎式的悲剧，犹如幽灵在人们身旁游荡。

为了解决核安全问题，尤其是核废料的处理问题，西方国家采取了种种办法。

但结果是提高了核电的成本。早期那种以为核电成本将会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看法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难以实现了，核电站对西方资本家的吸引力也开始变校实际上到八十年代初期，西方各国的核电站计划都在收缩。尤其是美国，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美国撤销的核电站数目超过了新建核电站的数目。

在少数几个没有压缩其核电站计划的国家中，前苏联是突出的一个。因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核发电计划与西方国家的计划有根本不同之处：它们都不是以经济价值作为唯一取舍标准的。

从一九四五年建造出第一个轻水反应堆核发电站，到七十年代初前苏联核电站计划达到高潮。而核发电能力从一九七一年的六百兆瓦上升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千二百兆瓦和一九八三年的一万七千兆瓦（有二十九座核电站）。前苏联的核电站完全由党和政府控制与管理，而党和政府在传统上一直支持电气化，把电气化作为现代经济的基矗核电站由国营公司进行设计和建造，并由政府官员们在制定五年计划时决定应该投资建立多少个反应堆。

在一九八三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机组已建成投入使用时，前苏联的电力供应中，已有百分之六来自核电站，民主德国为百分之十二，保加利亚为百分之十八。官方的计划要求到一九九一年东欧地区有三分之一的电力要靠核发电站提供，这就要求把现有的核发电能力至少提高二倍。

前苏联于是把核发电计划的重点放在建造“原子机器”核电站方面，其计划是每年生产八个这种标准化核反应堆。从理论上说，这一史无前例的标准化工作可以有助于缩短反应堆的建造时间，降低成本。这种独特设计的反应堆可以作为一个国际计划，各种零部件分别由许多东欧国家分工生产，

互相在各自的核电站中通用。

据说这种策略较之每个国家自搞一套另起炉灶要有效得多。

同前苏联的其他经济建设项目一样，这个核发电计划是由政府严密控制的，公开的资料只谈成绩不谈问题。然而，许多情况表明，苏联已经出现了不少技术和组织工作上的困难，而安全上的问题更加引人注目。一九八三年间由于一个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这一计划已被推迟。

这时前苏联已经承认，全国各核电站的建造成本超支很多，但是对于他们究竟要采取何种措施来节约核电的成本却始终避而不谈。其实，严峻的考验已在眼前，安全问题同他们面临的财政和技术的风险纠缠在一起，使情况日益严重。前苏联那种高度集中化而又无反对派的做法，那种由政府津贴使核电站得以平安无事地建成的做法，是否行之有效呢？八三年的那次事故已经敲响了警钟，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则更把一切问题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面对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执行主任海尔·加斯泰戈夫人的回答是：“诸如核电站在安全条件下运转，核废料处理等问题，都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不应使人怀疑核电的安全。”

但人们面对曾在美国、前苏联、英国、德国发生过的一百五十多起核电站泄出放射性物质的事故，却不可能完全放下心来。

尤其是这些事故的受害者有许多还处在他们病害的潜伏期，他们的遭遇将会不断提醒人们对于核安全的关注。

专家们认为，要过三十一五十年才能知道全部事故后果。现在只能对它们进行推测。最易受到放射影响的肿瘤和遗传方面的情况怎样呢？

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格尔教授说：“吸烟者患肺癌的可能性要比经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人大得多。”前苏联医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博奇科夫认为，事故后果不会显著影响到遗传方面。

但即使前景值得乐观，医生仍将长期注视着无论在何种程度上同切尔诺贝利有过接触的人的健康。甚至要注视着他们的子孙的健康，为此于一九八六年十月在基辅设立了全苏放射医学中心。

这个中心联合了三个研究所，即流行病和预防放射创伤研究所、临床放射学研究所（五百四十个床位）、放射疗法实验研究所。

该中心有一千多医生、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程序编制师、化学家及其他行业专家进行放射医学基础理论和实践研究。其中有些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列宁格勒、托姆斯克和哈尔科夫来到了基辅。

而对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给相关地区所带来的未来影响，据科学家们测算，四号反应堆泄露出来的强放射性物质有八吨之多，核电站周围一千平方公里的地区都受到了放射性污染。

苏联的一份官方报告承认，在今后七十年内，可能有六千七百五十人死于这次核污染。然而，西方科学家们的估计还要严重得多。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公布的英国防止辐射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说，这次核事故将使在今后的七十年里，仅仅死于癌症的人数就会增加大约一千人。另一位西方专家估计，苏联境内将有大约二万五千人因为这次事故而死于癌症。而国际核能安全咨询组织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由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到大气中的铯—一百三十七，要一百年才能衰变，因此，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内，它都会给

人类带来癌症和各种遗传病症的威胁。

然而这一切却不可能使前苏联放弃它的核电站计划。苏联的工业大部分集中在西部，但是该地区缺少石油、煤炭等能源资源，靠从西伯利亚运来煤炭发电很不经济。据有关专家计算，在苏联西部用核电站发电的成本要比用西伯利亚煤发电的成本低百分之三十。同时，苏联正在加速发展经济，计划到本世纪末使工业产值翻一番。为了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和同西方国家在核工业方面竞争，苏联仍然要坚持发展核电站。那么，这次事故发生后，它在核电站的设计、制造、施工、管理等方面会有什么改进呢？

苏联现有的核反应堆主要是三种，即石墨减速堆、压水堆和快中子增殖堆。总的说来，压水堆和快中子增殖堆更可靠些。这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石墨反应堆出事后，苏联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压水堆和快中子增殖堆上来。这要求核工业的组织管理机构、设计工作和生产核电站设备的工厂也相应作出调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核专家们认为，苏联采取的补救措施也应该包括建造核电站的安全外壳装置。

假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装有安全壳的话，放射性污染就可能不会蔓延到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直至希腊甚至美国加利福尼亚。

过去苏联在发展核工业和保障核电站安全方面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合作较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苏联表示将为“安全发展和平原子能”加强国际协作。一九八六年七月，在事故发生后三个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召开首届特别大会，有八十多个国家（包括前苏联）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核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这两项公约是在加强核安全领域里的国际合作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对人类和平利用核能有重要作用。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主持下，又召开了核损害责任的国际会议，通过了关于核事故责任的《巴黎公约》和《维也纳公约》的联合议定书。该议定书向上述两公约的成员国以及所有主权国家开放签字。

签字归签字。人们不会意识不到，这些“条约”和“议定书”说到底关心的只是善后与补救。善后与补救！

而就在签字的手在挥动时，受到核污染的人们仍在病床上呻吟，大自然也在呻吟！而一颗颗生态炸弹仍隐伏待爆。

这一切并且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的范围内。

人类千百年来养成的习惯就是不断向大自然索龋到了二十世纪，自从人类开始对自然界产生威胁性影响以来，地球上延时生态炸弹的定时器便开始嘀嗒作响。随着人类漫无节制地利用基本的自然资源——水、空气、土壤、动物与植物界，自然环境开始被逐渐污染。当原子弹终于爆炸时，“生态炸弹”已经不只是一个概而论之的比喻了，它开始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地球上的生命。

为了全面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制约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必须看到，生态系统决非只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只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生态系统是植物与动物以及由它们构成的群落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对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也会产生影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人类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只有这种揭示出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依赖的矛盾观点，才能使人认识到已经到来和正在临近的变化的深度与广度。

德国生态学家孔茨认为，面对类似生态问题这样一些全球性的问题，所有其他问题都退居到次要位置。他说：“在人类生存这一真正问题的衬托下，其他一些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和现象都是从属和暂时的。”

从人类发展的前景看，人类可能面临的是环境发生灾难性的变化的无法逆转的进程。而类似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样的核事故所产生的后果则正是这一类的。

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美苏核竞赛期间试验的大量核武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相比，还简直不值一提。

仅在一九四五——一九七七年期间，美国就进行了六百次原子和核装置的爆炸，其中二百三十六次在空中，五次在海下，其余的在地下。即使按五角大楼的估计，在大气层进行的核武器试验中，就有二十五—五十万军人和文职专家受到了辐射。

而这些核实验对地球环境的污染则更是灾难性的，许多地方的生态平衡遭到了彻底破坏。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进行的一次地下核爆后，美国内华达州的莱涅——梅萨的人们发现，大地正在从人们脚下塌陷下去……而前苏联在这方面所进行的试验也同样多，后果同样严重。

一九四七年，当爱因斯坦把发现原子核反应比作火的发明时，他没能料到，人类社会为了学会控制这一具有毁灭性威力的“火”将需要多少时间，以及为此人类在心理上将需要经历多少变化。

但也许已经没有时间等了。事故已经发生，毒害已经扩散，“善”后几乎不可能。相比自然生态几十万年，上百万年的进化，几十年是不成比例的瞬间。但就在这么一瞬间，灾难性的事故却层出不穷。如果以这种速度退化，人类在茫茫太空中唯一借以存身的这颗地球，不会再给人类以太久的庇护。

现在环境保护的呼声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共鸣。但往往是臭氧层出现了空洞，才开始讨论是否停止用氟；核电站爆炸了，方开始寻求改进……如此环保，最多只是推迟大限的到来，而改变不了人类处境恶化的总趋势。

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内的第一、二、三、五和六号反应堆又相继恢复或建成开始运转。与此同时，爆炸后被关闭的四号反应堆里仍存有一百二十余吨核燃料。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在反应堆外建起了一座混凝土外罩，以阻止核辐射外泄。但据说一场里氏五级的地震就足以摧毁这个呈阶梯形的外罩，而这种强度的地震每二十七年就可能在当地发生一次。想想这种景象，让人不寒而栗。

而有关环境保护的许多所谓补救或改进都如同这个障人眼目的“外罩”一般，是治标不治本的。

这就是涉及到在绿色思想中被形象地称为“浅绿”和“深绿”的分野。仅仅停留在环境的保护和补救的层面，只能称为“浅绿”。而“深绿”认为解决人的处境的危机的根本出路不是环境保护，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但是谈何容易。人类自工业文明以来的生活方式主要立足于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衡量社会进步之标准的物质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在有限资源中追求无限增长，在“人定胜天”的狂妄中奴役和毁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但人同这个“天”——大自然的对话如今已进行到了这个地步：人类呼

天天有可能不应！各种各样的核灾难有可能已是大自然的最后一次警告。

竖起耳朵来听一听吧，人们！听一听那些受害者不断发出的哀声和呻吟吧……

并非结束的尾声

“他们清楚这场事故造成的后果有多大，却故意想给人们制造一种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假象……”

这种免疫系统受损被称为“切尔诺贝利艾滋病”。

谁也不愿负担，而且也负担不起这笔巨额费用。

从那次事故以后，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中，前苏联解体了。

一九九一年以后，一些报刊陆续披露了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种种危害和遗患。

苏联明斯克肿瘤医院院长阿列吉尼科娃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说：在白俄罗斯一千三百五十万人中，有一百五十万人生活在受放射性物质影响的地区，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这些儿童中有十分之一患有各种放射病。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乌克兰一位调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专家弗拉基米尔·绍夫科希尼说：已有七千人死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放出的核辐射。他指责道：“前苏联政府总是把这场事故造成的后果缩小到最低限度。他们清楚这场事故造成的后果有多大，却故意想给人们制造一种什么事也没发生的假象。”

一九九二年六月基辅再次公布数字，承认已有八千名乌克兰人死于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该事故还严重污染着前苏联境内最肥沃的地区。

据苏联报刊透露，有十五万人的甲状腺受到大剂量放射性碘的严重侵害，患甲状腺癌的比率大大升高。在乌克兰地区，儿童患白血病的比率高出正常标准二至四倍。因放射性后遗症畸型的儿童大量涌现：有缺胳膊少腿的，有连体畸型的，有头大豁唇的，有四肢发育不全的。他们大都因父母染色体变异，损坏了遗传基因所致。

众所周知：放射性对人体的长期作用将导致遗传因子受到破坏，增加遗传的突变，而这些突变会世代相传。

奥夫鲁奇位于切尔诺贝利以西大约五十英里，居住着八万人口，是一个田地平展的地区。松树和白桦树成林，农民在那里放牧奶牛，种植小麦和其他作物。但是核事故给这个田园诗般的画面带来了一场无尽无休的灾难：儿童生病死亡率不断上升、动物令人吃惊地畸型，笼罩在无把握、恐惧的气氛中，事故的遗患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据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奥夫鲁奇的代表伊万·奥克里姆丘克在一九九二年所说，“从我上午一开始工作，我所作的每一件事都同切尔诺贝利有关。”奥夫鲁奇市政府咨询委员会成员和一家民间的辐射作用监督组织的积极分子阿纳托·波尔希科夫也抱怨道：“当局使我们居住在有毒的领土上。”

在该市第一幼儿园的有屋檐滴水的建筑物底部地面上，用伽玛射线探测器发现了比儿童安全标准高三倍的辐射作用热点。尽管幼儿园早就由士兵洗刷过，但为了二百多名小孩的安全，必须把表土掘起并搬走。甚至有人断言：“从纯粹医学的观点看，所有儿童都必须从奥夫鲁奇地区撤走。”据调查，一九八六—一九九一年该地区贫血病人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四，肠胃不适

的人增加了三点五倍，尤其是儿童的健康遭到极大的伤害，在某些年龄组的小孩中有多达百分之四十的人肺部免疫能力减弱，儿童得喉炎，支气管炎和其他肺部和呼吸道疾病的增加了四倍；青少年被列为“身体很不好”的人数增加了五倍，每年能拿到身体完全健康证书的儿童人数在持续下降。这种免疫系统受损被称为“切尔诺贝利艾滋脖”。这并非危言耸听，自一九八九年以来，该地区的农庄牲畜畸型怪胎已增加了一倍。因为当地牧草和水面已受到铯、锶及其他同位素的污染，向人们提供干净的食品和水已变为官员们的首要任务，他们为每月需要大约六节火车车厢的进口牛奶及其他食品和饮用水而奔忙。但是，乌克兰因汽油短缺，无法定期向奥夫鲁奇一百五十三个村子供应食品。

当地原有二百八十二名医生，因辐射危险只剩下一百四十二名，而且医学学校毕业生已不再愿意来此工作。苏联解体更造成抗生素，止痛药，麻醉剂的长期短缺。奥夫鲁奇人民处在极端的困境之中，但哪里也不愿接受这些“生态难民”。

尽管切尔诺贝利周围地区的居民在核事故发生后甲状腺癌发病率成倍上升，然而据有关专家调查分析，这只是开始。因为受核辐射后甲状腺癌的发病潜伏期长达十五至二十年，也就是说这次事故的严重后遗症要在二一年至二六年才显现。

国际原子能机构一九九四年在巴黎召开的研讨会上，发表过这样一份调查报告：在当年参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救援行动的一点五万名工作人员中，有六千人的后代出现了核辐射造成的病理现象，同样的现象也见诸于从事故现场疏散来的数千人中。

他们中许多人正遭受疾病的折磨。专家们说，要控制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并消除那次核事故造成的核污染至少需要一百年。

灾难，仍未结束。

直到十年后的今天，切尔诺贝利的第四号反应堆仍在释放核辐射。辐射剂量属高度机密，一般人不得而知。但有一件事可想像其严重程度：所有去切尔诺贝利现场采访的记者，在距核电站十公里处主人就要求他换上防护服；而在距现场五公里处，还要穿上连裤的套服。

目前，一家法国集团正在筹备加固第四号机组的混凝土罩，准备再给它包上一米厚的混凝土“外衣”，最后再将反应堆内的核燃料运出来处理。可是这项计划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它需要人进入内部操作，而不仅仅依靠机器。但是，即使是在有防护服的情况下，人在里面呆的时间也不能超过几分钟，否则就会遭受过量的核辐射。

在人们踌躇之际，水不断地渗入报废的反应堆内，被放射性物质污染后渗入地下，更加剧了该地区的核污染。

近年来，西欧国家一直在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控制核污染扩散。一九九四年七月，西方七国集团领导人那不勒斯峰会上讨论了乌克兰的核问题，并作出要求乌克兰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决定，同时还把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与核问题挂钩。当时，乌克兰虽然与俄罗斯、美国共同签署了销毁乌克兰境内核武器的声明，但却没有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乌克兰的核武器、核电站安全仍然是西方各国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但是乌克兰坚持既然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要求是西方七国提出的，那就不能让乌克兰来负担关闭费用的大头，况且经济困难的乌克兰也没有这样一笔

钱——据估算，关闭该核电站的计划至少需要四十亿美元！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乌克兰与西方七国签署了就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进行合作的备忘录，西方七国表示准备向乌克兰提供二十六亿美元贷款，五亿多美元无偿援助，用于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及其相关项目。

但一九九六年四月初，双方在基辅刚刚结束的新一轮谈判中，就向乌提供上述贷款和援助的具体方式仍未能达成协议。西方七国的专家建议，应成立一个共同的机构，拟定停止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电的计划，最终来确定关闭核电站的全部费用和西方在其中所占的份额。西方七国的态度显而易见：谁也不愿意负担，而且也负担不起这笔巨额费用。但在事故过去十年后，切尔诺贝利的阴影仍在困扰着世界各国的人们，仅此一点，人们即可看出这次事故的危害和影响。

而另一些设想也因这次事故而被各国所重新意识并强调了。

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以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进程面临新的重大历史机遇，从根本上说，要确保全球环境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在全球化相互依存的进程中，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核心问题，正在于更公正地进行国际再分配。从这个角度上说，西方对乌克兰关闭核电站的援助应该尽早开创一个国际合作互助的范例。

但人们更希望的是，永远不要再出现第二、第三个切尔诺贝利，永远不要再使人类遭受这种类似“核战争”的浩劫。在核时代，人们必须比从前更加爱和平与自然界。

绿色王国的浩劫

1987年：中国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

概况：火灾灾难始终伴随着人类，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失。

一九八七年五月六日，中国大兴安岭地区燃起特大森林大火，持续二十七个昼夜，烧毁七十万公顷森林，三座城镇变成废墟，一百九十三人丧生，六万多人无家可归，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员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特大灾难。灾难起因发人深省，根本原因是管理混乱和严重的官僚主义。

它警告人类，毁灭森林等于一场毁灭人类本身的浩劫。

一九八七年五月六日，中国国家气象局的卫星云图上蓦然多出三个鳄鱼眼般的红圈。在中国林业部直属的大兴安岭森工地区，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

大火造成的灾难及损失都是空前的。在这场持续二十七昼夜的大火中，一百零一万公顷（其中有林面积七十万公顷）地面惨遭火劫，八十五万立方米木场存材被烧，六万多人无家可归，他们的房屋被夷为平地，从塔河到古莲的几百公里铁路沿线被大火洗劫一空，二千四百八十八台各种设备，总长一千三百四十米的六十七座桥梁，四百八十三公里的通讯线路，二百八十四公里长的输电变电路，三百二十五万公斤粮食，六十一万四千平方米房屋，

一百九十三人的生命，在一场大火中灰飞烟灭。受灾群众一万零八百零七户，五万六千零九十二人，受伤二百二十六人。

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十九分之一从地球上永远消失。这场大火改变了大兴安岭森林面积居中国之首的历史地位，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特大灾难。

大兴安岭一下子变得蓬头垢面、衰朽老迈，那飘浮空中叙说大火威慑的黑灰蝶般的灰烬；那苍苍焦土上枯立的根根焦木；那惊恐呆立束手无策死里逃生的五万灾民；那埋在火灾废墟下蒙难者的焦黑尸体；那超出生理极限满脸灰尘伤痕累累的三万五千扑火士兵；那被火光照亮、暴露的形形色色的人形，以及属于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内心，荒唐怪诞的令人费解的种种现象……大兴安岭，要告诉人类什么呢？

一切从人的脚下开始：火灾的起因和肆虐

肇事者正是缺乏起码的防火知识和严格管理的“盲流”人员。扑火队没有认真清理余火。关键时刻，长途电话一直未接上。一场名符其实的大崩逃展开了。

轮胎上溅满孕妇的鲜血和胎儿的脑浆。一具女尸被烧得只有二尺乡长，全身麻雀色，有如出土的古尸。烧剩的一半颅骨上散乱地披着一缕长发，可以看出死者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两妹妹被活活煮死。再看女童，已经在燃烧，趴在地上朝母亲缓缓蠕动。这个隧道口奔来的女人死于被大火烧毁的爱情。

大兴安岭是聚宝盆，大兴安岭人是富裕的，中国版图上最北端的漠河县西林老镇，四千多户人家，家家都达到万元户的生活水平。主要的收入来自林业。

大兴安岭大部分地区取消了边境居民证，所有人均可自由进入。大兴安岭的珍禽异兽、中药材、金矿和丰富的林业资源，早已为无孔不入的中国“盲流”所瞄准。

截止一九八七年五月初，大兴安岭地区共有四十七万人口，其中林业人口三十一万。

涌入的中国“盲流”有一万九千人之多，其中许多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被林场雇用为季节工、临时工，然而他们并没有受过专门的职业培训，更缺乏严格管理和防火教育。

而一九八七年五月初大兴安岭森林的生态气候已经非常严峻。自一九八五年底以来，漠河地区仅下过一场透雨，整个地层含水量已至极限，严重的干旱造成一系列奇特现象：黑龙江沿岸的地下井几乎全部干涸，放下的水桶打出来尽是泥水；常年不断的山泉也断流了，老百姓认为是“龙王爷搬家了”；漠河最北的村庄，目击者看见天空忽然狂风大作，满地黄沙，竟下起了遮天蔽日的“沙雨”，当地人认为“风神爷发火了”；在大兴安岭北部的露石顶山，有人听到石头里发出哭泣般的呻吟声，他们以为是“山神爷受罪了”。这是由于石头裂缝中的空气被高温晒成暖气，到夜间暖气急速冲出，石头中的云母膜被剧烈震动，发出呻吟般的声音。

进入五月，大兴安岭气候更加异常。往年“五一”节前夕应时而来的大雪始终未下。往年五月初的白日最高气温都在二十摄氏度以下，而此刻最

高气温已超过了二十六摄氏度。少雪高温，树林、灌木丛、杂草地含水量太低，干燥异常。一遇火星，燃势将难以控制。

一切从人的脚下的开始，肇事者正是缺乏起码的防火知识和严格管理的“盲流”人员：一九八七年五月六日上午十时，西村吉镇北的河场，在公路四支线十六公里处做清林作业的三十八林班号人员，二个中国山东省来的“盲流”：王宝敬、傅邦蓝，无视林区中“不许带火上山，不许在山上、林场用火”的禁令，在休息时用火柴点燃香烟，吸完后将烟头扔在树根间枯叶所累叠而成的松软植被上，用脚踩了一下。但烟头并未熄灭，午后一时三十分，二位“盲流”离去，未灭的烟头引燃枯叶、杂草和灌木，火焰进而向林梢顺风窜去。

同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古莲林场五干线十一公里处做割草作业的十四林班四小号，从中国河北省来的十九岁的“盲流”人员汪玉峰，成为又一位播火者。他是通过几次送礼之后，被古莲林场营林段清林大队队长李某冒名插进清林承包组当临时工，上岗才十来天。当时他正使用手提式割灌机做割草作业。这种割灌机是中国江南某厂生产的不合格产品，起动时常常要火星飞进。汪玉峰并不知道三月十五日以后是大兴安岭林区的防火期，四月一日以后是防火戒严期。也没有人通知他大兴安岭地区林业局已经严令在这段时间内禁止使用割灌作业。

他开始给割灌机加汽油，由于灌得太满，汽油向外溢出，洒至机身、草地。汪玉峰发动打火时割灌机溅出火星，立即在机身上成了一个火团，洒滴了汽油的草木也立即腾起火焰。此时应该用大衣捂火，但由于缺乏起码的消防教育，汪玉峰用衣服扇火。

火越扇越大，他只好拖着割灌机跑，结果一路上的枯草、灌木均被引燃。慌乱之中，他跑到四百米远的营业段叫人扑火、打电话求援。此时火焰窜上树冠，难以控制。

立即被拘扣的汪玉峰（文盲）还不知道自己已闯下惊天动地的大祸，竟问别人能否得到当月的工资。

同日火灾嫌疑人还有：西林林场的郭某割灌作业时机器跑火，兴安林场的李某清林作业时抽烟后未掐灭烟头。塔河林业局内的一处山火，火因待查。

就从人的脚下开始，大兴安岭的五个地方：古莲林场、河湾林场、依西林尝兴安林场和盘古林场几乎同时起火。森林、城镇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五月六日的中国国家气象局的彩色卫星云图上可以看见五个主要火点位置、规模、演变及肆虐动向：火灾总方位在北纬五十三度左右，东经一百二十度到一百二十五度之间，即漠河至塔河的铁路线两边。

十四时十分：出现两个火点。A点，方位北纬五十三度十分，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二十二分，约四个象元（一个象元约当一千五百亩）；B点为六个象元，方位北纬五十二度四十分，东经一百二十三度四十分。

十五时四十二分：出现火点C，主位北纬五十三度零五分，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二十五分，约四个象元，此时上述A点约六个象元，B点约七个象元。

五月七日国家气象局的卫星云图：

九时：前述A火点扩展为八个象元，B点扩展为八个象元，C点消失，

但又增加了火点 D，约为二个象元，方位北纬五十二度五十分，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二十分。

十五时三十二分：A 火点扩张迅速，增为十一个象元，达一万六千五百亩，B 火点更迅猛，增为十二个象元，达一万八千亩，扩张已难以控制。由于云层较厚，D 火点情况不明。

古莲林场的火发展最快、危害最烈。起火之初漠河县派出几百人的扑火队伍奋力扑打，五月六日午夜，火势退缩。然而扑火队没有认真清理余火，七日白昼后，死灰复燃。五月七日傍晚，一阵西北风突然刮起，余火猛然窜上十多米高的树梢，火风相借，古莲林场变成火海、火浪、火云。风力还在急剧增加，直至历史最高纪录、空前的九点八级。烈焰翻腾，甚至跳跃向前。火头经过之处几十公里地段的空中烟火笼罩，大地被炙得滚烫，无数参天大树被烈焰围住，倾刻间变成一个个巨大的火炬。

百余米高的大火，在九级大风中向漠河县城奔扑而至。而就在此时，即将遭难的漠河县二万多人还听到县广播站通知古莲林场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而最早的报警者之一，距漠河县城八公里，我国最北的气象站漠河气象站站站长周儒铨，下午三点发现大火袭来后立即要长途电话试图与县城联系，然而气象站虽然每天九次与北京国家气象总局电台传真，每次来去绝不超过十五分钟，然而和八公里外的县城联络却十分不易。果然，关键时刻，长途电话一直未接上。

大火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向漠河县县城合围而至，首先击中的是位于县城的西林吉贮木场，贮木场的木材垛子立即烧得发白，由于极强的高温的烤，火还没有掠过，木料堆就全部起火。几万方木材倾刻间尽数化为乌有。

十八时三十分，县城里的高音喇叭紧急呼喊：所有在家的人员除老、幼、残外，一律自带弯把锯、大斧，立即去西山清出防火道，不听命令者，一律严惩！

男人上山了。女人、老人甚至孩子立即拎起扑火工具，跌跌撞撞地奔出来，在西山脚下聚齐了上千名群众。然而，令人遗憾，当时没有一个领导干部在场指挥。

目击者称：正在西山脚下等着，就见上山扑火的人们撤退下来，火追着人，人到火到。风卷着狂沙，噼哩啪拉直打脸，嘴一张开热气就往里灌。情形是只好各自逃生了。

漠河城里的广播、电视突然中止，线路中断前居民们没有接到任何疏散通知。

直到亲眼看着大火铺天盖地地烧进县城，才开始四处奔突。

一场名符其实的大崩逃展开了：几乎全漠河城所有的人，所有的车，在同一时间涌上道路，其中包括应该镇定些的首脑机关。于是，出现了无法无天，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某些人掌握着卡车、轿车、吉普车，此时横冲直撞抢条生路。马车、自行车争先恐后，挤在其中。汽车燃烧了，马车掉了，被压扁的自行车铺了一层，汽车堵住了汽车，男人、女人、老人、儿童乱成一团，狂呼乱叫。一位横穿马路的孕妇被疯狂的车轮拦腰压断，轮胎上溅满孕妇的鲜血和胎儿的脑浆；一位老妇来不及躲避，卡车就从她身上开过，老妇顿时血肉模糊，无法辨认。一个壮年男子被马车撞翻在地，侥幸漏过驰过的车轮。倾刻间又被另一辆发狂的卡车碾死。

回首漠河，浓烟像先导，已经遮盖了一切，方圆四公里，四千多户、

二万多人的县城，变成了一个黑暗、压抑、令人窒息的空间。

一位目击者称：“五月七日下午六时，我看到漠河县城好像升起一个巨大的火柱，足足有几十米高。上边漆黑，中间深红，下边浅黄。四处昏天黑地，对面都不能见人，灯的强光，也只能射到二三米远。很快，全镇一片火海：贮木场着了，木院墙着了，房子全着了，一堆一堆木头样子着了。我的家在县城里，家里的一切？”

另一位目击者称：“大火到漠河城时，我在西山上扑火，听到县城被烧，撒腿就往回跑。沿路看见汽车、拖拉机停在那里呼呼燃烧，有的只剩下铁壳子了。电线杆子都被烧酥了，我家旁边的那一根，水泥一块块开裂，掉下来，里面的钢筋熔化，弯弯曲曲如一条红色的蚯蚓。一座接一座的房屋变成堆堆黑灰。”

烈焰的跳动发出不断轰鸣声，使人心惊肉跳。地面被烧成粉屑，石头、砖瓦、钢筋扭曲变形。

漠河县城三千六百多户人家被烧毁，近一点五万人无家可归，五十一人死难，六十八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在一亿元以上。

烈火在漠河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又乘着八级以上大风，以每小时五十四公里的速度，向图强、阿尔木等林业局所在地席卷而去。从图强开出的救援漠河的两辆消防车行至半路，迎头撞上大火。消防车急忙掉转车头，慌乱中一辆消防车翻倒在地，被大火吞没，车上两人罹难。另一辆消防车和一辆吉普车被大火穷追不舍，苦苦奔逃也在劫难逃，被火舌舔上化为一堆废铁。二十点二十分，育英林场被火龙横扫，二十一点零五分图强镇被横扫。阿木尔镇已在劫难逃。

从漠河被焚起长达四个多小时时间里，这些地区均未得到及时的警报。尤为悲惨的是阿木尔人，人们刚刚关掉电视机上床睡觉，大火就已到达。

二十三点三十分，阿木尔遭劫。这个林业局所属森林百分之八十被烧掉，二千零五十六户的住宅被毁，九人丧生。

烈火在阿木尔横行肆虐了将近一个小时，又分火三路从正东、东北、东南云向直冲塔河而来。同时，大兴安岭东侧的火点也烧成了线，形成了东西两面大面积火区。大兴安岭面临被烈火荡平的危险。国家气象局卫星云图上此时的大兴安岭一带，一条条红色的细带蜿蜒爬行，颇有连通汇合态势。这之前仅仅五个小时，大火就吞噬了漠河、图强、阿木尔三个城镇和这三个林业局的绝大部分山林。

残存的几幢楼房在市镇矗立，举目望去是一片废墟。楼房上的玻璃已经溶化，窗户变得空洞虚无。白铁瓦被拧成麻花形，失去了光泽。仓库遗址堆满了进碎的罐头，酒瓶被烧成扭曲的一堆。电视机只剩下一个窄窄的框架，荧光屏如今只是丝丝缕缕的纤维。瓷器被卷倒打碎，洗衣机如破桶一般。新华书店的书被烧成白灰，风吹散了大字典的亡灵。昔时繁华的市镇遍地碎砖破瓦，断壁残垣，地面浮土一尺多厚。烧死的牲畜皮烧焦，肚子烧爆。

壕沟里有一撮白色的骨灰，从残存的一小块腿骨和地上焦黑的影子，能够判断出是过火的人的形状。一具男尸萎缩的四脚似乎还在惊悸、抽搐。一具女尸被烧成了二尺多长，面部模糊不清，全身麻雀色，有如出土的古尸。一具无人认领的尸骸被人们盖上白色塑料薄膜，烧剩的一半颅骨上散乱地披着一缕长发，可以看出死者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她留下的只是未足一斤的骸骨。

赶赴现场的“灾地记者”们实录了一些惨死情状：一位男人遭到严重烧伤。灾后被送到县城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总安静不下，好像他满身是火，置身于火海中东奔西突，除了烈火，还是烈火。他不停地喊叫，害怕听到声音，尤其怕听到吵嚷和高音喇叭的聒噪，如同被杀死了睡眠的麦克白。直到第四天直升飞机来转运伤员，在被送至飞机舱门的时候，他才回首惊呼：“地窖！有九个人躲火！”人们立即奔向那里，然而地窖中的九个男女已全部死亡，这是大火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处。大火中地面和地窖中氧气升流助燃，地窖中氧气渐渐稀薄，一氧化碳却不断灌进来，造成窒息。许多人不懂得这点，火灾时跳入地窖中避火，致使很多人罹难。那个被烧伤的男人是奋力爬出地窖的幸存者。

图强镇两姊妹正在看电视，有人惊呼：“火来了！火来了！”

毫无准备的两姊妹四处躲藏，走投无路，有人看见她俩跳进贮水铁槽里，水齐腰深，她俩只把脑袋露在外面。第二天人们发现铁槽里的水被火烧剩了一半，而两个年轻姑娘已被煮死。

一位母亲一手抱着半岁的儿子，一手拉着五岁的女儿，和避难的人们一同逃上一个大坝。不幸的是，风向变幻，烈焰嚣张，似乎大坝的空气和水都在燃烧。百米石坎，红光闪闪，火与热浪两面夹击，犹如炉火中的一段锻铁。母亲抱紧男婴，默默祷告，自己的胸膛再冷些再冷些吧。火烧到了她的头发、衣服，她全然不知。怀中的孩子还是被活活烤死。再看女童，已经在燃烧，趴在地上，似乎已挣扎了很久很久，她的头向着母亲缓缓蠕动。女儿也死了，双腿已经烧烂的母亲疯了。她是漠河县城烧伤最严重的一个。

一个二十岁出头酷爱玩狗的男人，在十万火急中只抱出了自己养的一条狼狗，他牵着狗拼命奔跑。过后，人们找到了爱犬者和他的狗，一个蜷曲着、残破不全的尸体的焦糊残臂上，系着一条爆皮、红锈斑斑的锁链，而狼狗烧掉了四脚、尾巴，只剩下流着黄油的半截尸体。

一个男人根据一个奶瓶、一片未能烧尽的布片及一些钱币，分别“找到”了他的妻子和小儿：一具蜷曲的尸骨和那背后的小炭团；人们根据在树林残烬中发现的八个钉鞋的铁拐子，知晓了消失在这片树林中的一群浙江掌鞋姑娘的“下落”。

一个火车司机当火车通过图强隧道时，发现隧道口奔来一个穿着红上衣的女人。

司机拉响了汽笛，临近她时，她突然卧轨。

察看尸体，发现一张纸条——“我心中只有你一个人：x x”。

这个隧道口奔来的女人死于被大火烧毁的爱情。

同样遭受火灾，镇静和丰富的避火经验往往能自救、救人。

马林和盘中两林场相距不远，地理、自然情况基本相同。五月七日晚，大火先到盘中，后到马林。由于盘中事先有所准备，派出了观察哨，居民们也组织起来。

大火一到，广播一遍又一遍地招呼所有群众都集中到空旷的学校操场上。烈火袭来，青壮年被组织在人群外围抵挡，统一号令，操场上的人一齐卧倒，脸埋在事先挖出的土坑里呼吸，躲过了席卷而过的火头。盘中一千多老小，无一人伤亡。约四十分钟后，大火烧到马林林场，结果却有十一人葬身火海，二十六人烧成重伤。

漠河县林业局工人黄有年动员了几户邻居留下，勇敢，聪明地保卫家

园。他们抡起斧子砍掉屋前燃烧的木栅，用衣服扑打、用水桶浇灭落于屋顶的团团火球。对低飞的小火，则用身体滚压。路边有堆二米多高的柴垛着火，黄有年与另一位邻居把水桶放成一排，靠着墙，监视着烈火。直到柴垛烧透，才小心翼翼地把余烬铲到路边沟里。一夜对峙，东方欲晓，被送去避难的家属们忐忑不安地回来时，发现人和家园完好如初。黄有年认为，如果漠河能组织起来，全城毁不了那么多。

大火一来，漠河人争相走避。谢保荣、周喜等退休老工人不愿离开，他们组织了二十多个同样倔强的退休老工人，一直在火车站打防火情，终于把一个完整的车站（除氧气瓶仓库爆炸外）完整的铁路家属区保护下来。

同样，由于准备及时和打防火情顽强，漠河第二木材加工厂厂长胡守本和职工们保住了厂子。而不远之处，全县第一大企业——漠河大修厂，到货不久的四十台新“东风”汽车，全部烧毁，成为一堆废铁。

人与火灾的搏杀：决定生死的二十五个昼夜

这场大规模的灭火救灾由中国最高政府直接领导和指挥。

人被烟呛得受不了，就趴在地下吸口潮湿的空气，又起来打火。两亲火龙同归于荆塔河县。县长放了三枪鸣警，大喊：“撤！太危险！”连着二十多天几乎没有休息的官兵们极度疲倦。七八台风力灭火力机整整顶了二个小时。整个林区响起一阵阵欢呼声。

十六次成功的人工降雨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五月八日一时十分，驻漠河边防某团向分区发出了第一份报告漠河火情的电报。

十六时，又代为转发了受灾严重的图强林业局的灾情报告。很快，离大兴安岭较近的部队受命驰援，率先赶到火灾。

五月九日上午八时三十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紧急会议，国家副总理李鹏作出六条指示：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国家林业部、气象局、物资局、铁道部等单位要定期召开碰头会议协调扑火事宜，这次扑火主要由扑火前线指挥部和黑龙江省指挥；二．铁路必须为抢险救灾服务，为扑火让路，保证把部队运上去，把灾民转移出来；三．要死保塔河，在呼码河北岸搞一条隔离带；四．要上一些部队，主要打隔离带；五．气象局要密切配合，作好人工降雨准备；六．为了及时搞清情况，要建立及时汇报制度。

五月十日国务院成立了有总参谋部、林业部、铁道部、国家气象局、国家物资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扑火救灾指挥小组。

五月十二日国家副总理李鹏至灾区现场考察。这场大规模的灭火救灾由中国最高政府直接领导和指挥。五月十三日，在火场废墟上、在呛人的空气中召开国务院现场办公会，李鹏副总理当即决定再增派二万部队上山打火救灾。

沈阳军区先后有三个集团军投入火常这样，有五万多军民云集在长二百公里、宽七十多公里的火场，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立体扑火。

五月八日，驻齐齐哈尔某师抵达塔河。当时大火离塔河只有三十多公里了。塔河的最后一道屏障是绣峰镇，全镇的房屋和道路都是木头的，镇南贮木场有七万多立方米木料，镇东有八个油库，贮油几百吨，镇内人口五千

多。沈阳军区参谋长命令师长吴长富一定要死保塔河，把烈火控制在呼玛河以北。吴师长命令一定要在六一六地域把大火顶住，扼守保卫塔河的防线——三支线。

部队冲入火海，扑打烈火。锹把、树枝、橡皮条把相继打断、散架。士兵纷纷脱下衣服浇湿后用衣服扑打。人被烟呛得受不了，就趴在地下吸口潮湿的空气，又爬起来打火。很多士兵身上被燎起泡，脚被树桩扎穿。有一个团好几百人被两面包抄的烈火包围，火圈逐渐缩小，团参谋长带着两个人在浓烟烈火中终于找到一处缺口，士兵们簇拥着一名在场的记者飞快突围。

此时烈火已突破三支线，扑向塔河最后一道防线二支线。几经争执，上级终于同意吴长富以火攻火。官兵们在三支线每间隔三米站一个人，排了十多公里长。一声令下，十多公里全部点燃冲天大火，两火相撞，轰响如雷，翻卷滚腾，不一会儿，两条火龙同归于荆五月十日晚，受阻的烈火改道从西北方向向绣峰扑过来。两个团的官兵迎上去。一个团拦截火头，一个团挡住火线。官兵们与迎风火死死相拼，惊险万分。塔河县长荆家良放了三枪鸣警，大喊：“撤！太危险！”这团官兵却拼死不撤，一直抵挡烈火四天四夜，保住了绣峰和塔河。

灭火者主要以山川河流为线，打成隔离带，然后分割围歼，或以铁路、公路为界，针锋相对，与大火生死搏斗。打树冠火，扑地面火，铲地面火，让火无处存身。

灭火飞机、风力灭头机、扒土机、装甲车和灭火爆破弹一同轰响，山摇地动。

在塔河保卫战中，部队转战四处，常常强行军几百里。扑火、打隔离、清火场，保证三百米之内无烟、无火，挖二米宽的防暗火隔离沟……常常是每个士兵耳边响起的命令。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一支部队六天六夜没有睡过觉，行军时有士兵走着走着碰到一棵树，抱着树就睡着了，被晃醒后接着再走。由于长途行军，战线长，供给困难，一支部队三天没有一点儿吃的东西。

救灾部队还遭受到寒冷和雨淋的袭击。

为了统一指挥，吴长富师长被任命为东线总指挥。他下令全线数万军、警、民分兵把守，尽可能消灭火线火头，封闭火区，进而全歼大火。依命令各路人马一齐出发。一个团进入三支线以北林区中扑战四天四夜，另一个团四进四出北山，还有一个团到八里湾，扑灭了四个火常五月二十日，东线千里合围扑火成功，塔河、绣峰的危险基本解除。胡子长出一公分多的吴总指挥对记者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大火不灭，胡子不刮。”时人遂呼之为“大胡子师长”。

六月一日，该师全部出动，合围一股猛然烧起的残余大火，耗时三天三夜。士兵们喝沟塘中的冰水，吃野果子和饼干，冻得全身哆嗦，从头凉到底。连着二十多天几乎没有休息的官兵们极度疲倦，倒在泥水中就睡着了。六月三日，官兵们一身、一脸、双手均成漆黑，胜利地走出山林。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发命令给该步兵师，全体官兵集体一等功，“大胡子师长”吴长富记一等功。

由大兴安岭的灭火专家单成玉在贝尔直升机上提出的“以火攻火”，打出隔离带的技术方案，在灭火中普遍采用。

在东线八里湾三千名林场职工和二千名士兵五月十八日上午七时随着

一声号令，同时迎着三个方向的火头点燃了手中的火种，这一大股人工火头呼啸着向前飞腾几公里，与大火相遇。两股火头嘶咬着扑向对方，在燃尽了所有可燃之物后，两股火头一同奄奄一息，无力地倒下了。这种“以火攻火”，打出隔离带的技术方案，形成了从绣峰到二十三站保护塔河的百余公里防火隔离带，保住了一百五十万公顷的森林。

在这场生死搏杀中，身穿桔红色浸药防火衣，头戴白盔，手提十三点五公斤重的风力灭火机的森林警官，立下首功。

火场最重要处是火线，火线最关键处是火头，而森警就搏斗在火头上。在盘古，森警操纵着风力灭火机掐住山火，风力灭火机燃耗的是汽油，喷出的是十二级火风，用“火吹蜡烛”的原理扑火灭火。灭火机发出阵阵怪叫，森警不顾燎人的烈焰奋力向烈火压去。火太大、烟呛人，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趴在地上往上面灭火，硬顶着火头不让它冲过。七八台风力灭火机一齐开动，硬是把大火头顶住，整整顶了二个小时，为后面的清打隔离带的人抢出了时间，保住了有全国第二大贮木场的盘古林常兴安林场告急，大火铺天盖地地扑向居民区。两架直升飞机及时赶来，里面跳下几十个森警，看准火头，迎面冲上去。十多台风力灭火机一字排开，对准火头咆哮猛攻。很快，他们从中间打开一个缺口，接着将大火一分为二，各个扑灭。

扑灭樟松岭的大火时，森警后面跟着一千多人的灭火队伍，突然风向突变，大火迎面向人冲来，指挥人员立即喊话，让林场职工和部队马上撤到公路，森警部队留下顶住。有的老百姓失声痛哭，以为七十多个勇士全完了。然而二十多台风力灭火机突然响起来，大火果然被顶祝森警部队要求有很高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机动性，他们的临战装备为：一台卡车头朝路口，车厢插一面红旗，车厢后部依次放成几行的风力灭火机、塑料汽油桶、喷水式灭火器和草绿色背囊。一旦得到命令，两分钟之内卡车出发。

森警主要来自武警部队，这些士兵每人背负二十一三十公斤，迎在火头上。风力灭火机震后二个小时后，人的耳朵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他们敢冲、敢搏，用十几台风力灭火机可以把十多米高的火头撕开缺口，十分钟内就把火头掐住与大火相距一米，面对面地搏杀，头盔不一会儿就被烤化，手指一捅一个窟窿。最前面的人用风力灭火机打火，由于离火太近，会被烤得皮焦肉化，因此需要有人不断地往打火者身上喷水，现场雾气腾腾。一天过去士兵的裤子变成了裙子，二天过去裙子变成了裤头。

为了抵挡、扑灭大火，当时军人普遍以一种超过生理极限的拼命精神面对大火。

历经二十五昼夜，大火终于倒下熄灭。

这场生死搏杀的主要时间表如下：

五月八日，东部火场驻齐齐哈尔某师驶入塔河，大火前距三十多公里。全师死保绣峰、塔河。

五月十日到十四日，两个团的部队死守绣峰西北方向。

五月十三日，西部火场，大中明火线十四条，总长三十一公里；东部火场，大中明火线十五条，总长六十公里。总指挥部的灭火方案为：“稳西打东”。

五月十九日，东部火场的明火被扑灭。并打通了三百公里长的隔离带，几百万公顷森林可以放心得存。

五月二十日起集中力量扑打西部火场

五月二十六日，西部火场全部扑灭。并打通了二百多公里长的隔离带。

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三日，所有部队扑打塔河附近一次较大余火。

六月四日，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最后一处火点被扑灭。经国务院领导人批复，塔河防火总指挥部宣布，持续燃烧二十七天的森林大火全部扑灭。整个林区响起一阵阵欢呼声。

在前述时间中，中国政府向灾区输送了大量款物，中国政府还接受了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团体和个人，以及七个国际组织的各种援助。其中，写着“来自日本的礼物”字样的日本红十字会药品在漠河各救护医院分发，来自英国的白色帐篷在图强分发……由黑龙江和内蒙古气象局实施的人工降雨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飞机在灾区上空收捕云朵，一旦发现后钻入云层中倾洒干冰降温，播撒的催化剂形成千千万万个核，在云中滚大、下落，化成雨滴，倾洒至火区。在扑火中共作业十八次，十六次降雨成功。

“烈士和小丑”：大火照亮的高尚与卑劣

漠河县公安局消防科副科长秦宝山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县长的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废墟上。捷足先登的几乎全是青壮年，妇女老幼被挤在车下。甚至连医院的痰盂和污物桶都要拿走。凡是值钱的东西被抢得精光。小灾小捞，大灾大捞。一些人置灾情于不顾，在小餐厅胡吃海喝。为了救护一只小羊羔，他被快了一步的烈火吞没。“卑劣”使形势更混乱、更复杂，甚至酿成灾中之灾。

人影在大火中晃动，大火把人影缩小，也把人影放大，大火照亮了人的高尚与卑劣，使平常遮盖着一切暴露无遗。

漠河县公安局消防科副科长秦宝山在烈火危及粮库、油库时，却把几辆消防车和两辆推土机定位于自己家周围。灾后漠河县一片废墟，而他的家安然无恙。一年后，秦宝山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县长高保兴在山上打火时，漠河县消防科一些人指挥推土机推倒了县长家周围的小军校和民房，用救火车不断地浇易燃的草垛，水流四溢，直到第二天早上，地面还湿漉漉的，县长的家当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废墟上。

漠河县委书记王召英在大火来时正在指挥疏散，他爱人单位的一些人将他家的家产安全转移。

一个居民在出逃时只顾抢夺衣物，却将年迈的老人弃之火海。一个司机开车挤入逃难人流，吆喝着带电视机的人上车，可一等电视机放上车，他就开车扬长而去。

而此刻正在洪河附近修路的某团官兵却放弃生路，开着六辆卡车逆逃难洪流而上，冲进县城救人。惊慌失措的人们见到汽车，就拼命往上。士兵们一遍遍吆喊着“老人孩子和妇女先上”。

然而捷足先登的几乎全是青壮年，妇女老幼被挤在车下。妇女们急了，只好把孩子交给素不相认的士兵举上车带走。

漠河民警娄德伟向跪在面前抱住他的腿求他别走的妻子大声喊道：“我是警察！”

警察不能跑，警官这个时候得去救人！”高风亮节。

大火进入图强。某单位四个科级干部互相推托，竟然不按命令上山扑

火，被给予降职处分。一位科级干部在分发救灾物资时，各选一件先披在自己身上，造成恶劣影响，被当场撤职。

图强职工医院在五月八日清晨涌入一帮灾民，哄抢所有可以进食的东西，有人抢不到东西就吞下一把维生素药片。他们还泄忿打碎医院的玻璃，割开氧气袋，甚至连医院的痰盂和污物桶都要拿走。

沿着河边随时可见有人狼吞虎咽并非自己财产的牲畜尸体，甚至生吞活剥，完全丧失理智。

而此时，颈涛段轨道车司机纪文祥三次冲越图强站的火海，救出了四百多被烈火周围的灾民。而他却眼看着自己的家化为灰烬。他本人也在抢救中烧焦了头发，满脸都是燎泡。

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华茂昆当时正在甘河车站检查工作，五月七日二十一时他断然命令自己乘坐的公务列车向灾区进发。列车冒险前行，右侧几十米高的火龙翻滚，随时可能断掉列车退路。

五月八日下午四点，列车抵达凌云站。华茂昆得知前方长缨站附近林场油库已被烈火围困，并且风劲火猛难以通行。华茂昆果断下令继续前行。傍晚冲过长缨车站，铁路两面山火肆虐，枕木直冒黑烟。列车继续冲过劲涛车站，将二节油罐车挂上。劲涛再向前二公里处，有五十多根油枕木起火燃烧。而机车油箱外层被钢轨刮破，夹层的防寒泡沫被暴露在外，若有一粒火星飞上，后果不堪设想。华茂昆镇定指挥随行干部跳下扑灭枕木燃火，列车及时冲出危险地段，扑火人员飞奔抓车而上。

这趟勇敢的列车终于将粮食、饮水和食品运往灾区。

国防绿，象征着生命和庇护。当生命危险的时候，许多灾民同时涌入边防某团。

官员全力以赴，保护、转移了五千多名群众。火势稍退，部队又安置了一千五百多名无家无归者。军需仓库里的棉衣、被子和军衣被分发给最困难的灾民。无需上级命令，部队还派出访灾问苦小组和巡逻医疗队走访灾区，救难救病而很多干部自己的家被烧得光光的。

在火灾中组织人员扑火、抢救重要国家财产的图强林业局党委书记迟仁太，自己的家被烧毁，东西烧光。

五月八日，火的劫掠已过，阿尔木被另一种“火”蔓延。幸免于大火、完好无损的商店大楼突然燃起了余火，而只要有人救完全可以扑灭。人们却在一边默默观看。派出所的人也在忙于看守本单位的東西。有人开始从火中抢掠商品。

有人用小车推着一车白糖而去，有人扛了一百多斤毛线走，一个女人抱着一台双缸洗衣机走了，一个带肩章的人拿走几双女式皮鞋，一个警察换上一双新皮鞋扬长而去，一家开小店的开着车来抢东西。毛料一匹匹被扛走，毛毯、手表、录音机等凡是值钱的东西被抢得精光。

阿木尔百货商店放在法院的一车物品也不能幸免，被拿得所剩无几。没被烧的沿江商店也被人抢。

一位记者还记录了阿木尔的一些现象：

大凡见到的阿木尔人，个个满肚子牢骚，有的忍不住了就破口大骂。

“烧！全他妈的烧！有人巴不得把帐底子全烧了！”

“哼，罐头一箱一箱往家里扛，衣服刚来的时候，连影儿都没见到就被抢光了！”

“咳，无灾不捞，小灾小捞，大灾大捞哇！”

一个相当谨慎的干部也承认，在阿木尔“救灾物资是没整明白的”。

又谈起了救灾物资。一位工人把我扯到了另一个房间，拎起一床足有二十多个补丁的被子说：“你瞧，给我们工人的就是这个！按说，万贯家财都烧了，一床被子值几个钱，但办事要公平。”

“有人成箱成箱往家搬桔子罐头。”一个姑娘插嘴说。

“一看他们分东西就来气，有的人家里新被子七八套，铝锅三四十个。机关干部把新东西、好东西都弄去了！”

“哼，这回才知道什么叫机关！”又是那个姑娘插嘴。

有人告诉我，五月二十八日给山上打火的人领食物，单子上签的是二百公斤面包，只给三十斤；三箱酒只给一箱；连咸菜也克扣，还逼着人按原件数签字。在漠河的一位年轻记者，见到一些人置灾情于不顾在小餐厅里胡吃海喝，当即拍照。这些人竟冲出来对记者大打出手。

阿木尔也有大写的人。全城拼命逃跑之际，阿木尔小商站七十岁的更夫老包头从容地提着枪领着狗在商站四周巡视。那一夜附近十几米远的房屋都被烧了，小商站却被保存下来。

阿木尔镇牧羊人辛海青用斧头劈开羊圈，放跑了所有的羊，但是为了救护一只小羊羔，他被快了一步的烈火吞没。他的头部炭化了，两臂成了灰棒，一只手向前伸着，另一只手深深地抠在泥土之中。

在灾难中高尚和卑劣都是会出现的。“高尚”能减轻灾害，使他人的生命得救。

“卑劣”使形势更混乱、更复杂，甚至酿成灾中之灾。高尚者要做出自我牺牲，要勇敢，胆怯和自私则导致卑劣之举。在灾难中这个天平总是不断摇晃。从天平上走下来的将是烈士，或小丑。

黑色灵薄狱：世界一百年来的大火灾

几十名船员眼看着十几英尺高的大火慢慢烧到他们身上，他们无路可逃，都死得很惨。剧院大火使六百零二名观众被烧死，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人们躲进客房的洗澡间里，有的躺进浴缸，有的站在淋浴蓬头下。大火之后，英国地铁系统全面禁止吸烟。馆藏各种珍贵报纸被烧毁四分之一，其中有珍贵的二千零六十四万册报纸合订本。如果摩天大楼的钢架继续被烧，上面的五十层将要全部塌下来。罐内一万六千吨原油燃烧，火焰冲天而起。科威特油田大火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火灾。

火灾是肆虐人类最频繁的灾难之一。翻开本世纪的历史，烈火呼啸的声音扑面而来。它烧毁森林和大自然，逡巡于剧院、商楼等人类建筑，吞噬地铁、码头、工厂、油田，给世界造成巨大的恐慌和损失。今天，人们已经认为，灾难（包括火灾）也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回首本世纪的特大火灾，一个黑色灵薄狱就此出现。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美国霍博肯码头大火。这一天是星期六，下午三时五十五分，堆积在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木制码头上的棉花起火，引燃了附近的一百桶威士忌酒。大火接着烧着了该公司停泊在码头的四艘主要客轮。这四艘客轮是：由布洛姆和沃斯公司建造于一八八九年的六千三百九

十八吨级“梅恩”号，建造于一八九六年的一万吨级“布来梅”号，一八八六年建造于格拉哥的五千二百六十七吨级“萨勒”号和二万吨级豪华客轮“恺撒·韦尔黑姆·格罗斯”号。四艘船中只有“恺撒”号及时扑灭大火幸存下来。“梅恩”号最为惨烈，起火后拖船无法将其拖离船坞，几十名司炉、司机和船员眼看着十几英尺高的大火慢慢烧到他们头上和身上，他们无路可逃，都死得很惨。大火还烧着了十八艘驶船、运河船和游船。共有三百二十六人被烧死，大部分是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的雇员和码头工人，另有二百五十人受伤。损失达一千余万美元。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国埃罗戈伊斯剧院大火。“绝对防火”几个大字于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将二百一十五名观众迎进了新建成的埃罗戈伊斯剧院，上演的节目是流行歌舞喜剧家伊戴·弗伊主演的音乐喜剧《蓝胡子先生》。整个剧院都挂着厚厚的华丽的窗帘。剧院的一切都是易燃的，演员演出的笨重布景道具和布帘，铺在地上的地毯，盖着座位的麻纤维。剧院内缺乏灭火器材和消防措施。

火从舞台的布景悬吊区燃起，演员继续演出，一时观众以为火是剧情的一部分。敞开的舞台后门形成的通风口使卸了一半的幕布像气球一样向外鼓起燃烧。火舌伸进礼堂，又一阵旋风似的冲到剧院后部唯一完工的通风口上方挤满人群的楼座。整个剧院一片惨景。挤着几百儿童的楼座哭喊震天，妇女们设法一次把四五个孩子拖出来，但很快被奋力挤出的人群挤倒、踩死。有六十人从楼厅沿着没有标记的过道跑到女休息室和被锁住的出口，无法逃脱，后来发现他们一堆堆地被烧死或闷死。清理出来的死者都被烧焦，有个妇女的脸上被踩上了靴子印，一对夫妇在火中互相抓得很紧，火把他们焊在一起。剧院大火使六百零二名观众被烧死，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一九四六年六月四日，芝加哥拉萨利饭店大火。拉萨利饭店高二十六层，客房和走廊铺着名贵地毯，墙壁镶有红木和胡柳木。正在宴会大厅用餐的一位客人的座垫突然燃起，并烧着他的衣服，惊慌失措的他跑出宴会大厅，一路引燃了很多地方。

火势蔓延得很快。第二十二层楼上被困八百多人。人们躲进客房的洗澡间里，把水管打开，有的躺进浴缸，有的站在淋浴喷头下，还有不少人把床单、被子打湿后堵住门窗，坐等消防人员救援。火灾发生后十五分钟，消防队赶到现场，救出了一些被困者。一个女话务员推开拉她走的人，不停地打电话给各个客房，告诉人们安全通道怎么走，后来她被熏昏，死在自己的岗位上。大火使六十一人失去生命，二百余人受伤，财产损失一百万美元。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伦敦地铁大火。大火是从一自动扶梯的底部开始烧起来的，火势蔓延得很快，浓烟滚滚，充满了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乘客混乱奔突，乱作一团。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人，有的人已经烧得面目全非。大火燃烧了四个多小时才被扑灭，一名消防队员丧生。火灾共造成三十二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这场大火以后，英国地铁系统全面禁止吸烟。地铁防火问题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地铁场地窄，大型消防车难以开进，地下排烟不便，一旦失火浓烟呛人。伦敦地铁大火中消防队员，因没有获得地铁通道分布图而一度受阻。世界各国地铁迅速反应，加强消防工作解决上述问题。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四日，前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大火灾。这个创建于一七一四年的图书馆有着自一七二八年本国出版的几乎全部自然科学著作，抄本部有一万多件古代俄罗斯的写本。火灾起因是报纸典藏部电线短路，而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失灵，人们在烈火燃烧二个小时后才听见报警。烈火一共肆虐了十九个小时，二十五台消防车不停地工作了十九个小时，使图书又惨遭水和潮气的破坏。据统计：馆藏一千二百万册图书中，有四十万册被烧毁，馆藏各种珍贵报纸被烧掉四分之一，计二千零六十四万册合订本，其中很多报纸是世界上仅存的孤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在图书修复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波兰专家前往列宁格勒，并为修复工作提供了设备。前苏联新闻记者和科学院工作人员纷纷撰文痛陈玩忽职守和对消防工作的麻痹思想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

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洛杉矶六十二层第一洲际银行大楼失火。摩天大楼上的消防装置纷纷失灵，消防队员只好带着消防工具爬上去。大火从第十二层楼窜向第十三层、第十四层、第十五层，如果摩天大楼的钢架继续被烧，上面的五十层将要全部塌下来。消防队员终于在第十六层击退大火，避免了一次更大的灾难。火灾死亡一人，伤十人。火灾后洛杉矶的市政府制定了一条新的规定，强迫该市一九七四年以前建造的三百多幢大楼的所有权拥有者对自己的大楼进行消防全面检查并安装新的消防设备。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二日，中国黄岛油港大火。黄岛油港是中国的重要的原油出口港，胜利油田的原油通过输油管道输送到黄岛贮存，然后外运。这一天上午十时，港区油库五号贮油罐因雷击（这是距地面很近的“地滚雷”，使避雷针失效）引起爆炸起火，罐内一万六千吨原油燃烧，火焰冲天而起，库区另外四个贮油罐相继发生爆炸、起火。石块和杂物被爆炸的气流抛出几百米远，三公里范围内的房屋窗玻璃被震碎，八万多吨原油燃起的大火笼罩整个港区。五千多军民、一百三十多辆消防车投入扑火，激烈拼搏五天大火被扑灭。有十六名消防队员在灭火中失去生命。

国务院总理李鹏来到火灾现场，离火场最近处仅二十公尺。

一九九一年二月，科威特油田大火。美国发动的历时四十二天的“沙漠风暴”打败了伊拉克，伊军撤退时在高级工程师阿尔发的指挥下，炸毁了科威特全部油井，七百多口油井喷射着冲天的烈焰。科威特油大火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火灾。

这七百多口油井每天烧掉六百万桶原油，向大气层排出四万吨氧化硫，三千多吨氧化氮，十万吨一氧化碳，二百多万吨二氧化碳，还有大量的硫化氢气体。黑烟中还含有致癌物质苯并芘，含有苯并芘的烟尘经“黑雨”落入土壤，会使草木污染。

牛羊吃了被污染的草，体内就有这种致癌物，最终将传递给人体内。

大量烟尘遮蔽了阳光，汽车在大白天也得打开大灯才能行驶。地面的温度只有摄氏十度至摄氏十五度，形成了局部的“核冬天”现象。

到八月份才开始扑灭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火。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个国家的二十八支灭火队，用了整整八十五天，终于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六日扑灭了全部起火的油井。科威特石油公司付出的灭火费共为一千二百余万美元，但和烧掉的原油价值相比，这个数目还不到十分之一。

大火形成的烟尘一方面对科威特当地造成污染，另一方面，高空的烟尘随西风带气流渐渐东移，经过阿联酋、印度、中国、日本上空，最终造成整个北半球气候异常。有的专家认为北半球，最近频繁的火山爆发就与它有关。有的专家认为还将出现一些难以预测的气候异常现象。

持续十个月的科威特油田大火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了空前的危害。人类

真正的灾难也许就是这种纯粹人为的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突发性破坏。

人与森林：大兴安岭火灾反思录

人类呼吸的三分之二氧气来自这不知疲劳的绿肺。

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在世界上排在第一百二十位，仅仅比非洲撒哈拉的几个沙漠国家略前一点。田纪云副总理说，火灾根本原因是企业管理混乱，纪律松弛和严重的官僚主义。防火费用平均到每亩林地仅八分钱。

援华加拿大专家感叹：“一切再早一些就好了。”某些指挥者素质太差、指挥混乱。大兴安岭变得丑陋、难堪、骇人，也更真实。

自古以来森林就不断给人类提供木材，而且可以说，森林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保护者。

首先，森林直接有益于人类的肌体，有益于人们的生活福利和健康。森林给人类提供了十分之九的生物量和超过湖泊八倍的贮水量。一亩森林一天能吸进十公斤的二氧化碳，呼出四十九公斤的氧气，人类呼吸的三分之二氧气来自这不知疲劳的绿肺。

其次，森林对其周围环境的环护、保持作用，间接地有益于人类健康和生活安全。森林有调节气温的作用，可以促使最高气温降低，使最低气温提高。森林经常通过蒸腾作用消耗大量汽化热，不断把水分输送到大气中去，森林内部的温度比外部平均高百分之五。森林可以挡住风沙、风雪，保护着城市和道路。森林能净化大气和土壤，吸附污染物质，例如对付二氧化碳的树种有：栲树、龙柏、梧桐、银杏、夹竹桃等，对付臭氧的树种有：黑松、银杏、夹竹桃等。森林还能防止土壤侵蚀和崩塌，防止噪音等。

再次，森林直接对人类的精神空间具有重要意义。森林有助于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情操，是休息、观赏风景的诗意之地。历来为人类自然科学、文艺、建筑所采用，是人类友伴。

中国，仅有百分之十二森林覆盖率，在世界上排在第一百二十位，仅仅比非洲撒哈拉的几个沙漠国家略前一点，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六点二的大兴安岭无疑是国宝。世界森林面积有二十八亿公顷，大兴安岭有五百二十万公顷，对中国而言，大兴安岭何等重要。然而，这场大火改变了大兴安岭森林面积居中国之首的历史地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损失最惨重的火灾。

一位中国生物学家对大兴安岭火灾的后果作了这样的描述：森林是大自然的“总调度室”。根据科学论证，如果一个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达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且分布均匀，就可以基本上做到风调雨顺，天与人和，很少有大的自然灾害。可惜啊，可惜！我们国家的森林资源极为可怜，可烧了这么多。大自然这块平衡板陡然倾斜了，天灾将接踵而至——首先，森林防风沙作用被破坏。据测定，由林边向林内深入三十至五十米远，风速可减少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如深入二百米，则完全平静无风。其次，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我亲眼看见一只被烧得焦头烂额的小鹿，奄奄一息倒在焦土上，那些幸免的动物逃走了，逃得远远的，也许这辈子也不会再回到这片光秃秃的土地上。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重要讲话中说：这场火灾是解放以来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必须充分认识这场火灾的严重性，

现在已经查明，造成这场特大森林火灾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天灾，也不是坏人破坏，五个火源都是林业职工违反操作规程造成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管理混乱，纪律松弛和严重的官僚主义所致。对这些重大事故，一定要作出严肃处理。

对基层单位的问题也要调查清楚作出严肃处理。这么大的事情，绝不能不了了之，不然是无法向全国人民交待的。

反思之一，火灾前防火工作的问题。防火资金滞留、不足，防火管理，不严格、不科学，缺乏现代化的防火设施、队伍和通信，部份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

大兴安岭的防火设施、队伍建设和资金严重不足。防火费用平均到每亩林地仅八分钱。林区道路是衡量防火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世界上一般为每公顷几十米至百米以上，而大兴安岭只有十七点三米。方圆五百二十万公顷仅有三十一座了望塔，而且功效较差，每座了望塔只能监视方圆二十公里。

大兴安岭防火中心副主任金可参多次向有关部门呼吁加强大兴安岭防火工作，火灾前一个月还向有关领导作了两小时四十分钟的长篇报告，认为火灾防治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然而反应平一九八二年，加拿大无偿提供五百七十万加元和三名防火专家，为大兴安岭建设防火中心。防火中心将完成以下项目：建立森林防火通信网；建立森林防火气象网；建立雷达探测网；提供先进的扑火工具、机具；派专家培训中国的防火技术人员。然而四年过去了，这个现代化的防火系统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还未完成。防火中心加方经理麦纳叹息到：“一切再早一些就好了。”

漠河县原本有一支七十多人、装备齐全的森警中队。火灾前一个多月，据说因为“关系不顺”、“资金问题”等原因，这支专业化极强、机动力极快、扑火作用巨大的队伍被解散了。漠河林场起火起，全县竟无一个森警，也没有一台风力灭火器。

早在火灾之前，由于使用割灌机引起明火已有先例。地区防火指挥部通报全区，严禁在防火期间使用割灌机做清林作业。地区防火办指挥科副科长在传达通知时，却遗漏了漠河、图强、阿木尔三个林业局。

漠河在火灾前十七天从沈阳消防车厂接来的一台消防车，刚刚出动去灭火，就出现多处质量问题，没办法使用。

县里家家户户，门前屋后，道路两旁，都堆着木材样子。

黑龙江省三令五申下达文件要求清理林区样子，各级检查组也屡次下到林区？

五月六日古莲、河湾最先的火源明火被扑后只留下一小部人守火场，这些每天拿一、二十元工资的扑火队员却在那里喝酒、打扑克、吹牛。第二天一早，烈火复燃。

大火吞噬漠河城前，有四个报警者，但他们只能向大兴安岭地区首府加格达奇报警，却无法与近处的漠河城取得联系。同样，由于通信缺乏的原因，育英、图强、阿木尔也没有收到任何告警。

反思之二，扑火救灾中的问题。部分灭火人员惊慌失措、技术缺乏，某些指挥者素质太差、指挥混乱，有的酿成灾中之灾。

五月六日，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调度室给漠河县打来电话，要调一个机降灭火队扑灭古莲、河湾林场的火。漠河县的答复竟是：“我们自己有能力解决。”

塔河机场森警分指挥部向塔河县城的前沿指挥部通报：“我们发现了新的火点，方位东经××度××分××秒，北纬××度××分。”对方缺乏地理常识，根本不知道“经纬”是何物，“愤然”断下电话。

在大兴安岭扑火救灾中，出现太多的扑火指挥部，计有总指挥部、前沿指挥部、分指挥部、专门指挥部、各兵种军种指挥部、各有关部委部门指挥部，还有东线、西线火场指挥部。各局、厂也纷纷设立指挥部，各种汽车纷纷安上各种指挥部的标志，令人眼花缭乱。这种人人唯恐落后的举措有时造成指挥混乱、迟缓，指令交叉，浪费人力物力。

某指挥部向坦克三师下令：“盘古以西八十公里处有大的火点，命令你们立即赶赴扑灭。”近二千士兵急行军八十公里，却毫无火情。再推进五公里搜索，才发现火已经烧过三天了。

有的地方救灾物资一时堆积成山，各地各部门送来的救灾物品缺乏统一筹划，部分需同、重复、多余，紧张的救灾单位不得不抽过多的精力和时间予以安置。

大火，揭去了大兴安岭的兴安落叶松、黄鳞松、樟子松、白桦、黑桦、山杨及柞，椴等三百多种的森林家族，大兴安岭变得丑陋、难堪、骇人，也更真实，更袒露地揭开了隐藏千百年的症结与病根，使之暴露于世界。

森林，是整个人类的森林，保护森林，是整个人类的职责。

提高到这个高度，大兴安岭开发区做饭、取暖每年被烧掉的木材就占年采伐量的三分之一，无异于一场更为特大的“火灾”。

目前，整个地球的森林覆被面积小于整个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一个生态学家曾说：“人类在自然界中做什么？就好像大象在摆瓷器的小房子里漫步，任何时候都可能将精致的玩意打成碎片。

警告人类，不要再打碎大自然如此精巧而又脆弱的平衡。

警告人类，不要再毁坏自己的友伴——绿色的森林。

血沃西亚

1980—1988年：两伊战争灾难

概况：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间，全世界共发生了大大小小三百多次战争灾难。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长达八年的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共造成五十三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九千亿美元。这场战争使用了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现代化武器，而且运用了极原始极残酷的人海战术，是一场名符其实的拼国力、拼人命的拉锯消耗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罕见。人在战争灾难中的孱弱再次给人类敲响了沉闷的警钟。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九月九日，伊拉克大批军队开始向伊朗边境集结；伊拉克谍报人员自八月起在伊朗境内的活动更加频繁。另据可靠情报：伊拉克外交部在同其他海湾国家频繁地往来，并达成了

一项旨在针对伊朗的秘密协议。这个时刻关注着自己在海湾地区利益的超级大国已于这些迹象中嗅到了浓烈的火药味。

几乎同一时刻，苏联的谍报部门克格勃也将这些情报上报了国防部，并断言：一切迹象表明，两伊间以往小范围的边境冲突将于最近升级为全面战争。

早在八月，海湾国家首脑就已清楚地知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将很快在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点燃，那份新近达成的《海湾国家反伊朗秘密协议》已将这一情况通告了他们，并且这场秘密的交易使他们成了伊拉克的盟友。打垮这个波斯人聚结的国家成了海湾各阿拉伯国家共同的愿望。

“伊朗在大革命后，清洗了原帝国军队中大部分高中级将领，使其军队的元气大受挫伤”，“八月份在伊朗发生了一次反对霍梅尼统治的政变，高级司令部和军官团遭到清洗，国内民心不稳”，“伊朗国内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动乱，其军队已完全涣散，几乎丧失了战斗力”。这一条条来自军情处的绝密情报给萨达姆·侯赛因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一切已不允许他再等了。九月十七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发表声明：“一九七五年阿尔及尔条约完全无效，阿拉伯河应由阿拉伯国家管辖。”九月二十日，伊朗做出了迅速的反响，伊朗军队总司令巴尼萨德尔总统下令征召十二万预备役军人。九月二十二日，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宣布：“给伊朗以决定性打击，将边境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全线进攻伊朗，收回被伊朗占领的全部领土。”

战争的帷幕拉开了，两国人民的鲜血将随同浓烈而令人窒息的战火燃烧起来，灾难和着弥漫的大雾笼罩着两伊。谁曾预想到，九月二十二日这恶梦般的一天使两伊人民陷入持续八年的苦难中。

开动绞肉机：战争起因和第一阶段

还有一件让霍梅尼终生难以忘怀的，来自伊拉克现任统治者给予他的奇耻大辱。萨达姆这个名字的原意“坚定不移的战士”似乎注定了他狂人的命运。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圣战”战士将一枚手榴弹掷向了伊拉克副总理。伊朗的天空烧得通红，似乎地狱之火在的烧着大地。一到夜晚几乎整个巴格达都成了一座空城。毛拉和少年冲在最前沿，不顾死活地扑向雷区。令人胆寒的人海战术使伊拉克的防缓和斗志崩溃了。伊拉克呼吁国际社会调解，举行谈判。

伊拉克和伊朗虽然共同信奉伊斯兰教，膜拜同一个神——真主安拉，但是在他们中间却掺杂着民族矛盾、领土纠纷、教派分歧乃至领导个人政见不同等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两国间的旧怨夙恨使得两国的狂傲的领导人坚持认为，只有诉诸武力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伊拉克”这个阿拉伯语中有“血管”之称的国家，人口总数为一千九百五十八点一万，阿拉伯人就占其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九，而伊朗在其五千七百七十二点七万人中，波斯人占有二千多万人。在这两个毗邻的国家中各自生存着近百万的库尔德人，两国政府长期支持着对方国内的库尔德族进行反政府的活动。加之两国陆地边界全长约一千一百公里，南部有长约一百公里的界河——阿拉伯河，如此长的接壤线使得这两个古国长期以来就不断地为领土问题发生着大小的争端。特别是围绕阿拉伯河界的争端尤为突出，阿拉

伯河是伊拉克通向海湾的唯一水路，而伊拉克的经济又几乎全靠出口石油为其支柱，只有通过波斯湾石油才可源源不断地对外出口，因此，伊拉克长期称整个航道都是它的领土，界河以伊朗一侧浅水线为界，而伊朗也毫不示弱地坚持界河以河流中央的塔尔维格线为两国正式的边界线。一九七五年三月在阿尔及利亚的调解下，两伊达成了《阿尔及尔协议》。伊拉克同意将阿拉伯河南端一百零二公里中心线定为两国水界；伊朗同意停止支持伊拉克库尔德反政府力量，并答应将陆界境内三百平方公里土地划给伊拉克，但伊朗领土转让事后并未兑现。时值伊拉克国内革命胜利没有多久，一切尚处在努力稳定已动荡多年的政局的紧要时期，就在十分“丢面子”的情况下签署了协议。

一九七九年对两伊来说这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在国外流亡一四年的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在他的黑色革命成功时回到德黑兰，并宣布废除帝制，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位伊斯兰教传统的坚强卫士在实现自己梦想后开始了他以伊斯兰教义治国和对外的行动。首先，伊朗国内宗教领袖成为最高统治者，立法以《古兰经》为准则，建立起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坚信伊斯兰的宗教复兴的火种将在伊朗这个被波斯语称为“光明”的国家中熊熊燃烧起来，并燃遍整个伊斯兰国家，他开始大肆输出“伊斯兰革命”，号召各国穆斯林起来推翻政府，建立“伊斯兰革命政府”，并大力支持一些国家的反政府势力。环视整个中东及海湾地区，他将“伊斯兰革命”输出的第一个目标指向了西邻的伊拉克。伊拉克的领土上居住着百分之五十五的什叶派穆斯林，而他们却又忍受着只占百分之三十五的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霍梅尼自认他的思想一定能获得伊拉克穆斯林的积极响应。

还有一件让霍梅尼终生难以忘怀的来自伊拉克现任统治者给予他的奇耻大辱，那就是六十年代初遭伊朗国王迫害时，他流亡到伊拉克并得到什叶派穆斯林庇护，然而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却在一九七八年强行将霍梅尼驱逐出境；加之伊拉克自复兴社会党统治以来国力一天天的壮大，并且建立起了一支被称作阿拉伯国家中最强大的军队；霍梅尼深谙萨达姆·侯赛因这位被埃及总统纳赛尔称赞为“阿拉伯世界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的野心，他不能任其日渐强大，这不仅会给他的伊朗带来威胁，还会威胁到他的“伊斯兰革命”，将会是他想成为阿拉伯世界共同的宗教领袖的一大障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抑制伊拉克的日渐壮大。”

“进行伊斯兰革命，起来吧！我的兄弟们，推翻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统治，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以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伊斯兰化，由穆斯林创建的伊斯兰共和国只承认真主的统治。”霍梅尼向伊拉克半数人口的什叶派教徒发出了“黑色革命”的号召。

再翻开伊拉克的一九七九年，被土耳其总统誉称为“天才政治家”的萨达姆·侯赛因于七月十七日就任为伊拉克共和国总统和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萨达姆这个各字的原意“坚定不移的战斗者”似乎注定了他狂人的命运。萨达姆一直主张阿拉伯世界必须统一，阿拉伯财富由阿拉伯人共享。在青年时代他就立志要使其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阿拉伯二十二个国家执政。萨达姆这个俾斯麦的笃信者以他自认为最强有力的铁与血向着他的追求奋进，他一心一意要重铸巴比伦帝国的风采，借以向犹太人、向阿拉伯世界展示：阿拉伯世界五千年的历史与文明，来自两河流域，来自现今的伊拉克国土。他将

自己装扮成巴比伦王朝的尼布甲尼撒大帝，坚信他能向尼布甲尼撒大帝那样以伊拉克为中心建立一个东至波斯湾、西至地中海的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他在重建的巴比伦古城的王宫墙上刻下这样的字句：这些围墙是在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执政时重建的，巴比伦城不会湮没无闻的，千秋万代均可作证。

在二十多年政治斗争中，萨达姆深深的体味到军队对其理想的意义，他给伊拉克的军队赋予两方面的作用，在国内，军队是人民自豪感的体现，绝不是用来压迫人民的工具；在阿拉伯范围内。伊拉克军队是阿拉伯民族的军队，它随时都会对阿拉伯世界面临的危险作出反应，他们是阿拉伯世界的保护神。这一切明显地流露了萨达姆·侯赛因谋求阿拉伯世界霸权的心迹。他决不允许有谁同他争夺霸权，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正在伊拉克的国土上发芽，作为成就未来霸业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取代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并彻底粉碎伊朗什叶派革命组织利用伊拉克什叶派团体颠覆伊拉克的阴谋活动。萨达姆还记起了那份丢尽了面子的一九七五年签署的《阿尔及尔协议》，以及伊朗至今未兑现的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执政一年来的励精图治使萨达姆感到必须在伊朗还未从国内革命的疲惫喘过气来时给它粉碎性的打击。

一个打着为“伊斯兰”而战的旗号，一个自称为整个阿拉伯民族谋福，狭隘的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膨胀和在同一地区两个国家均想成为主宰这一地区的霸主时，战争就很难避免了。

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一名伊朗籍的“伊斯兰革命圣战”战士将一枚手榴弹掷向了在巴格达集会中的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加速了两伊战争的爆发。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拂晓，大雾弥漫着长达一千一百公里的边境线，昔日疏密不绝的枪声沉寂了，浓密的雾气好似战斗停止的浓烟，这不正常的沉寂似乎预示着一场大的浩劫即将来临。萨达姆下达了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毁灭性的打击”的命令，他决定仿效当年希特勒对苏联作战的“巴巴罗萨”计划式的闪电行动，以最具优势的空中力量在第一天就将伊朗的空军基本打垮，中午，伊拉克八十多架以米格—二三轰炸机为主的作战飞机群向伊朗境内扑去，对伊朗的十五个城市和七个空军基地及雷达站实施突然空袭，战争就在飞机的轰鸣和炸弹的爆炸声中全线拉开了。遭到空袭的主要机场和空军基地有：德黑兰郊外的梅拉巴德国际机场的空军基地、布什尔空军基地、设拉子空军基地和大不里士、迪兹富勒、恰赫洛希、沙鲁希、哈密德、哈迪米、阿瓦士、驻克尔曼沙赫部队司令部的各个机场以及炼油中心阿巴丹等地的石油设施。

然而，这次空袭却未达到萨达姆预期的效果，在梅拉巴德空军基地依然整齐地排列着伊朗空军的“鬼怪”式飞机。空军司令部的无能加之飞行员缺乏实战经验，伊拉克未采取反复空袭来将战略效果扩大。各国军事家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拥有四万空军，各种飞机一千零四十八架，轰炸机中队两个，攻击中队二十二个，截击机中队十七个的伊拉克为达到最有效的攻击却仅出动了不足百架飞机。萨达姆没有能在第一天把对方的空军基地毁掉。

相反的是，当天下午伊朗陆海空三军一齐出动进行反击，“鬼怪”式战斗轰炸机袭击了伊拉克两个空军基地，击落伊拉克飞机六架，击沉导弹炮艇四艘。

九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左右，在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第三号通报

下，地面部队六个师兵分四路强行渡过卡伦河攻入伊朗境内。由伊拉克的精锐之师共和国卫队的一个机械化师从北路沿克尔曼沙赫——哈马丹公路一线挺进，攻击通往德黑兰的边境要塞——席林堡。共和国卫队的另五个装备精良的装甲师和机械化师担负着主攻任务，从两个方向攻击重镇胡泽斯坦，一路从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越过阿拉伯河大桥，向霍拉姆沙赫尔进击；另一路袭取处于阿瓦士公路上的阿胡，以将作战区域内的公路要线控制在手中。另外，还有一个师沿阿马拉公路突击胡泽斯坦的军事基地苏桑吉尔德和阿瓦士，另一个支援该师行动的师将目标放在随时会在扎罗斯山口出现的从克尔曼沙赫和德黑兰调来的伊朗援军。第六师驻守在巴士拉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经霍拉姆沙赫尔向阿巴丹推进。经萨达姆亲自精心策划的战术果然取得了出奇不意的效果，步兵在重型装甲车的开路和炮火的支援下快速地实施进攻，密集的炮火飞向伊朗的油库、储油罐和输油管，浓烟滚滚，将伊朗的天空烧得通红，似乎地狱之火在烧着这块伊斯兰的土地。

伊朗在仓促之下应战，一方面全线拼死抵抗，一方面空军首先出动二十架 F - 14 和 F - 5 战斗机，对伊拉克后方首都巴格达、工业重镇巴士拉以及基尔库克油田地区实施轰炸；紧接着伊朗空军又出动一百四十架飞机，重临巴格达、巴士拉等城市及十五个军事基地和一些石油设施的上空。伊拉克军队如潮的攻势，使得一些政治家、军事分析家、记者认为伊拉克将会在几星期内摧毁伊朗赢得战争。伊拉克军队进攻的势头在库林堡方向进展顺利，却在阿巴丹和霍拉姆沙赫尔遭到了伊朗军队的顽强的抵抗。

伊拉克此次进攻的主要目的是夺取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将胡泽斯坦省的西南角划入自己的领土。卡伦河将阿巴丹和霍拉姆沙赫尔一分为二，伊拉克夺取了该地便控制了整个阿拉伯河，以保障巴士拉油港通往波斯湾的唯一出口安全。为达到目的，九月二十五日，伊拉克军队向霍拉姆沙赫尔发起突袭。原以为不堪一击的伊朗革命卫队却布下了重重陷阱等待着他们，伊拉克的装甲师陷入塞满障碍物的狭窄街道和道路网中，伊拉克军队受到了意想不到的重创。在一个特种旅的急驰增援下，浴血了十五天的伊拉克军队终于攻下了霍拉姆沙赫尔，惨重的伤亡使得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不得不放弃进一步攻占阿巴丹的计划，只决定包围该城。

随着雨季的到来，战争的进程缓慢下来，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三个多月来的拼杀伊拉克占领了霍拉姆沙赫尔以及其他九个阿拉伯人聚居的城镇，围困了军事要塞索格德和石油城市阿巴丹，将伊朗二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控制在自己手上。然而，真正的预计战果却完全没有达到，萨达姆低估了伊朗的民族情绪和战争潜力，战争不仅未如他所料的那样使霍梅尼下台、伊朗境内爆发少数民族起义，反而提高了霍梅尼的威望，加强了国内的团结，原有的动乱因战争而平息。伊拉克军队开始丧失了战场主动权，战争沉寂了下来。

九月二十三日的伊朗对伊拉克的空袭使其损失了六十七架飞机。而九月二十五日在霍拉姆沙赫尔攻城战中，伊拉克军队死亡达到一千五百多人，伤四千多人；伊朗付出了更惨烈的代价：死亡三千多人，伤五千多人。无怪乎伊拉克将霍拉姆沙赫尔更名为胡尼恩沙赫尔——即血城，这儿的每寸土地上都滴撒着那些可怜的士兵的鲜血。

自伊朗空袭巴格达后，巴格达开始实行灯火管制，三百二十万人的巴格达城的夜漆黑一片，人心惶惶地不敢大声说话，似乎时刻担心会因声音而

招致一枚炸弹在头上开花。九月三十日那天，伊朗飞机击中了市区西南方的一个发电厂，油罐中弹，惨红的大火席卷着浓烟将巴格达烧烤了整整一天一夜。城内的每一声巨响，都把居民屋顶上的鸽子惊得四处乱飞，大街小巷不时可见一只只被炮火烧得散发着阵阵刺鼻焦臭、肢体全非的鸽子。一到夜晚几乎整个巴格达都成了一座空城，居民们惊恐的奔向郊外。

那些不得不因空袭而停工的工地，残缺的立在市区，使巴格达城显得更加惨淡。

在伊朗的德黑兰，一个个巨大的弹坑布列在市区。许多人四下奔寻着自己的亲友，一声声凄惨的呼声从四周汇集在德黑兰的夜空中。一位年轻的头罩面纱的妇女呆滞地坐在地上，她的侄儿、哥哥和十五岁的儿子全战死在霍拉姆沙赫的战斗中，莫大的悲怆使她无法流出眼泪。在阿巴丹，各个医院的病房和过道上摆满了病床，整个医院沉浸在一片痛苦的呻吟声中，医护人员四处奔忙着。

这就是战争，用人们的鲜血和痛苦做为代价的战争。

人们喘息未定，沉寂了一个月又打响的战争把他们推向了更悲惨的深渊。

一九八一年一月五日上午十时，伊朗军队这支多数未经正规训练的部队，在总统巴尼萨德尔亲临战线最前端的鼓舞下，开始了它蓄积一个月的反击。遮天蔽日的炮弹似乎怀着对人的切齿之恨从天降落在伊拉克的士兵群中。反击在巴尼萨德尔总统的亲自策划指挥下同时从西线和南线实施。由一个正规师、一百辆坦克携同边防部队和革命卫队共一万六千多人从西线佯攻；真正的主攻方向在南线，装备有三百五十辆“酋长”式坦克的一个坦克师、二个步兵师和革命卫队的精锐部队在一个炮兵师的支援下全线反击。撕裂长空的炮弹呼啸着，坦克和步兵战斗车“嘎嘎”地轰鸣着，双方的血肉之搏正在拉近。一月五日~七日，双方的厮杀在西吉兰和阿瓦士、苏桑吉尔德激烈地全面展开，血肉横飞，惨呼四起，伊拉克军队节节败退。双方的伤亡人数仓促间难以统计，只有伊拉克军人被俘了二千余人的报道。

七月十日，一场自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在苏桑吉尔德的沼泽地带展开，四百多辆坦克你来我往的拼杀着，由于后勤保障的跟不上致使伊朗的一百多辆坦克被伊拉克没收，双方共有二百多辆坦克没能再从沼泽地中爬出来。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伊朗又经过周密准备打响了一场蚕食战，向伊拉克的薄弱地段猛攻。使得伊拉克军队被迫撤退数公里，有效地牵制了伊拉克的援军。

九月二十六日凌晨，早已集结在阿巴丹对岸的巴哈姆沙尔河的五個步兵团和大量的装甲部队以及炮兵部队强渡巴哈姆沙尔河，对围困阿巴丹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突然袭击。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伊拉克军队措手不及，经过三天的激烈对攻，伊朗取得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将伊拉克军队赶过了卡仑河，退入霍拉姆沙赫尔，阿巴丹的围困解除了，通往阿瓦士、马萨赫、达赫文的交通要道打开了，并且还歼灭了伊拉克的一个师。

伊朗开始对这场战争有了更大的信心了。

宗教的大肆渲染，战果的轮番报导，伊朗全国上下的士气逐步膨胀起来。“迅速行动起来吧！我的兄弟们，为真主而战，为伊斯兰而战，为伊朗而战。踊跃的加入战斗的行列，我们将组建一支两千万的大军把伊拉克侵略

者彻底击败”，穆萨维·霍梅尼在阿巴丹的胜利下兴奋地发布了号召，一丝曙光在他面前出现，胜利使他更坚信伊朗的“光明”将照亮“黑暗”的伊拉克大地。然而，他竟没有想想这一胜利是他多少同胞用鲜血换来的。他正以宗教为美丽借口将同胞们引入血与火的深渊。

半年多费尽心思策划的伊朗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发动了决定性的反攻。一支打着为“圣战”而献身的旗帜的由正规军、民兵、革命卫队、毛拉和少年人组成的奇特的十万伊朗部队，在迪兹富勒舒什地区发起了总攻。毛拉和少年人冲在最前沿，狂热的宗教意识使他们似乎忘却了自己也是血肉之躯、也是有思维有生命的人，不顾死活地扑向雷区。让人胆寒的人海战术使伊拉克的防线和斗志崩溃了。同样的人海战术在整个战线上滚动开来，两个月下来，在五月二十四日，伊朗收复了失陷一年多的霍拉姆沙赫尔，基本上将伊拉克赶出了西南部的产油省，只余下有争议的边界城镇卡西林、吉兰、梅赫兰等地尚在伊拉克手中，胜利由四万多人的血肉铺就。

萨达姆难以置信眼前的事实，这支巴列维国王倒台后肢离破碎的军队竟给他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带来空前的沉重打击。三月二十八日伊拉克军队的第一装甲师、第十一特种旅、第九十六步兵旅、第六装甲旅，全军覆没。五月二十四日，二千多名士兵尸遗战场，一万三千人被俘。这些噩耗使萨达姆的心沉重异常，“也许该停下来喘口气了”，否则这将会成为自己永远无法醒来的恶梦。六月十六日，伊拉克军队全部撤离伊朗，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并呼吁国际社会调解，举行谈判。然而，一切怎能由萨达姆一个说了算呢！打得正兴起的霍梅尼岂能就此放弃“光明普照”伊拉克的良机呢！他断然拒绝了停火和谈的要求，还要伊拉克赔偿一千五百亿美元的损失。

一股股浓黑的烟柱俯冲向伊朗的提斯孚尔的天空，呛人的火药味随风窜入人的鼻孔，在森达尔地区，五十多辆伊拉克的坦克疲惫不堪地躺在沼泽里；公路两旁或堆积着或散落着大批的弹药，丢弃的衣服、床具、食品零乱地扔在地上。一个看上去还是小孩的伊朗士兵木讷的端坐在地上，他的四个哥哥的血流淌在这片土地上，家中只剩下孤独而可怜的妈妈和已成寡妇的几个嫂嫂。他的眼神中饱含着停止战争的渴求。

拉锯肉搏：空前惨烈的战争第二阶段

伊朗当局在战前准备了二万五千多口棺材，下了“灭之朝食”的决心。朝鲜战争以来世界最激烈的步兵战。两伊共有二万七千多人在此次“斋月行动”中丧生，近六万人受伤。伊朗以单纯的人海战术又发动了攻势。黄沙被人的鲜血浸成湿漉漉的。萨达姆决定同时袭击外国油轮，让美苏两个大国也卷入这场消耗战。沙特将一架伊朗战斗机击落。一个玉石俱焚的抉择纳入了萨达姆的计划。数万名平民在“袭城战”中被炸死。伊拉克的精锐部队——共和国警备师一万五千人全军覆没。毒气还夺去了伊朗成千上万儿童生命。

伊拉克停战谈判的希冀破灭了。伊朗和伊拉克各自又在加紧的筹备，一场更大规模的相互屠杀又将爆发。

巴士拉是伊拉克最大的港口，位于阿拉伯河右岸，距波斯湾一百二十公里。市北七十四公里处的库尔纳传说中是亚当与夏娃的伊甸园所在地，并

有“东方威尼斯”之美称，工业以石油化工为主，也是伊拉克椰枣的重要产区。伊朗决定在穆斯林圣月发动“斋月行动”，将主攻目标定在巴士拉，从而在经济上给伊拉克致命的打击，进而乘胜突向巴格达。

霍梅尼无法掩饰心中的激情：打垮“异教徒”侯赛因，尔后“进军耶路撒冷”。

伊朗的第四装甲师、第九十二装甲师、第七十七步兵师等精锐部队共十二万大军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向伊拉克发起“圣战”，伊朗当局在战前准备了二万五千多口棺材，下了“灭之朝食”的决心。

为防备伊朗的进攻，萨达姆·侯赛因于六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召开了紧急复兴社会党大会，对军队和内阁作了人事调整。

他让自己当选为总统、总理、三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随即，第九装甲师、第十装甲师、第三步兵师和第十一步兵师等十万大军被部署在巴士拉，并在巴士拉以北地区筑起二十公里长的坚固防线，一条二十米宽的水障、地雷、铁丝网、坦克、火炮将这一带设置成稠密的火制地带。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凌晨，由伊朗发动的自朝鲜战争以来世界最激烈的以十二万人对十万人的步兵战——“斋月行动”打响了。头裹印有“为伊斯兰而战”的红色花巾的伊朗革命卫队的毛拉们在夜幕下，越过多石的边境，潮水般冲入伊拉克的防线。

革命卫队的第七师在“真主安拉”的呼喊声中滚过地雷区、越过堑壕、撕开铁丝网向巴士拉猛扑。第七十七步兵师在预备队的支援下，从霍拉姆沙赫尔沿一条六公里宽的狭道紧随革命卫队挺进。密集的人海在坦克的掩护下涌向巴士拉的防线。

对屠杀、对人海战术已麻木的伊拉克军队瞪着血红的双眼完全无视“生灵”的意义，近二千辆装甲车和三百门火炮狂笑着，成千上万的炮弹泻在伊朗的军队中，惨号声、粗沉的喘息声、凄厉的惊呼声响成一片，一队队的伊朗士兵倒下了。同时，波斯湾哈尔克岛的油泵设施在伊拉克喷气式飞机的轰炸下化作一堆堆废铁。

七月十六日，两个师的攻击被伊拉克部队击退。

七月二十一日，终于突入伊拉克境内五英里，然而，缺少装甲兵、空军和后援又得而复失。

七月二十三日夜十点，伊朗又一次惨烈的失败。

七月二十八日夜九点，骤然响起的尖厉刺耳的炮声撕破了五天的死寂。伊朗全线冲击，“斋月行动”的最后一役在伊朗的孤注一掷下打响，革命卫队的少年队也拖着枪冲入了战场，最小的才九岁啊！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孩一手捂着被地雷炸飞的右腿，凄厉地哭号着呼叫着：“妈啊！妈妈……”向故乡的方向爬去。伊拉克的防线未被突破，巴士拉丝毫未损。

“斋月行动”中，时值气温高达五十摄氏度以上，交错往来的炮火炸得巴士拉附近的浮土厚达一英尺多，毁坏了的铁丝网上横挂着伊朗士兵的尸体，零乱的军用电话线旁，横七竖八杂陈的全是伊朗士兵的尸体，有的脸面血肉模糊，有的头颅成了焦土，更惨的是，东一条大腿，西一只手臂，不知是谁的。这就是战争，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

据当时报道，两伊共有二万七千多人在此次“斋月行动”中丧生，近六万人受伤。伊拉克在此役中共发射了约九千枚炮弹、防空火炮弹一千多枚，

损失了二十辆主战坦克、十二辆装甲步兵车、五架轰炸机、两架攻击机。伊朗革命卫队就死亡了一万二千多人，损失三十多辆坦克、一百多门大炮。在惨重的损失下，双方再次陷入僵持阶段。

九月三十日，休整了两个月后的伊朗完全以单纯的人海战术共一万多人在巴格达正面的曼达利发动了攻势，以人同现代军事装备和技术相抗衡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十月十日又一场一味采用人海战术的无谓的攻势行动被伊拉克击退了。这次战斗伊朗付出四千人丧生的代价，伊拉克亦有三百人丧命。

在一场场的现代武器与人的撕杀后，血腥的咸味随沙漠的季风向人袭来。已经战红了眼的霍梅尼又在策划了，十月二日夜间，为减少伊拉克军和炮兵的杀伤，他决定乘夜向伊拉克的迈桑挺进。在 M60 和“酋长”式坦克的支援下，步兵向扎格罗斯山脉的丘陵地带进攻。双方约五万多人又在这儿展开了撕杀。

很快一切就平静下来了，一具具变形的尸体停放在硝烟的熏烤中。伊朗重新夺回了巴亚特的一个油田，还有德赫洛兰周围的伊朗领土二百四十平方公里，并攻占了伊拉克的蒂比小镇。这一仗似乎伊朗胜利了，然而正是这场用二千多颗灵魂的消散换来的“胜利”将霍梅尼和他的伊朗沉迷在“这仅是胜利的开端”的狂想中。又一场更大规模的消耗生命和消耗国力的行动已在霍梅尼心中酝酿。

两年半似乎过得太快也太漫长，到一九八三年一月，双方的处境似乎与战前的处境相同，伊拉克防御守势，将大量的坦克当作碉堡用，伊拉克的兵源远不如伊朗，萨达姆以他先进的现代化战争武器来与伊朗的有生力量相对抗，以达到消耗伊朗兵源的目的，他要与伊朗比耐心，等耗到他的兵力足以与伊朗的兵力抗衡时，便是他的反攻之日，他坚信胜利最终将属于伊拉克。然而，伊朗在连续进攻作战都遭到挫折后，仍然信心百倍，狂热的宗教情绪不断加强着战争机器的运转。截至此时，战争已使双方的人民和国家疲惫不堪，伤痕累累。仅伤亡人数，双方共有八万多人丧生，二十万人负伤，四万五千多人被俘。

一九八三年二月六日，就在伊朗人迎接一年一度的国庆日前夕，议长拉夫桑贾尼向全国传达了霍梅尼的再次进攻伊拉克的命令，代号为“曙光”的攻势开始了。

为了发动这场攻势，伊朗做了两个多月的准备，集结了十五万军队。伊拉克为对付伊朗的攻势，也集中了约十万人的大军，将所有的精锐部队和各式先进武器聚集在边境附近，并修筑了四条防线，战争的方案是采取引诱伊朗坦克深入，然后以直升飞机袭击，增加新型坦克，加强反攻力量，大规模的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

二月六日，伊朗孤注一掷地将最后一批预备队的大部分兵力都投入作战，以六个师的兵力在巴格达东南阿马拉沙漠地带四十公里的战线上发起了进攻。这次进攻伊朗一改单纯的人海战术，而采用了空军、坦克和炮兵掩护，步兵层层推进的立体空间作战。霍梅尼似乎对这一战充满了信心，然而等待他的是一场凄惨的悲剧。伊拉克一方面依托数道防线在地面上进行顽强的抵抗，另一方面每天出动超过二百架次的飞机，并密集使用直升机群对伊朗的进攻梯队实施狂轰滥炸。一场持续十一天之久的死亡游戏在干涸的沙漠中展开，黄沙被人的鲜血浸成湿漉漉的。

沙漠中一具具被炸弹炸的七零八落的残尸胡乱地扔在那里，冒着浓烟的飞机的残骸，还在“剥剥”地燃烧。不少的尸体胸前累累弹洞历历在目。而有的尸体却完整得很，让人觉得他们没有死而是静静地睡着了，一张张被痛苦扭曲变形的脸才让人知道他们的确死去了。在一片开阔地边上的一条很深的战壕里，从头至尾断断续续成卧、成俯、成蜷曲一团的全是尸体，有些尸体被坍塌的壕沟半掩着。“曙光”在这副惨境中暂时拉下了帷幕。

战后，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宣称：“此战已达到预期目标，共打死三千三百名伊拉克士兵，收复了三百一十二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占领了约四百平方公里的伊拉克土地。”相对应的是，伊拉克军方称，打退伊朗多次进攻，打死敌军一万五千人，俘虏一千人。双方自称的战报至战后都未有准确的数据。无论孰是孰非，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战役依然是双方边界上的“拉锯战”，仍然是双方消耗生命，消耗国力，消耗意志，消耗人类美好品质的野性膨胀的消耗战。

战争持续进行着，伊朗在攻势连连受挫下，士气不仅未被击破，反而却更加惊人地“勇敢和团结”，频频向伊拉克发起冲击，为此萨达姆·侯赛因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看来要想停战只有另谋计划了。论国力伊朗有四千多万人，而伊拉克只有二千多万人，伊朗兵源广泛，战争潜力雄厚，论军力伊拉克竭尽全力也只能保持五十~六十万人，而伊朗却发展到近百万部队。伊拉克唯一较伊朗的优势是空军，作战飞机为八—。萨达姆感受到他不能再这样耗下去，其结果将会使他成为败者，必须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他的空中优势。他决定袭击伊朗的油轮，控制它的经济命脉；同时袭击外国油轮，将其他国家，包括美苏两个大国也卷入这场消耗战，让其他国家向伊朗施压，以达到和谈目的。一场无奈之战的升级——“袭船战”开始了。

一九八三年十月，萨达姆宣称要用从法国购得的五架装备有“飞鱼”导弹的“超级军旗”式飞机袭击油轮。霍梅尼针对萨达姆的这一招也毫不示弱地宣称，一旦伊朗的油轮或海上石油设施遭到“超级军旗”的袭击，他们将立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来，一向纵容和偏袒伊拉克的海湾六国和整个西方都不敢再旁观而坐收渔翁之利了，一旦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运不出去，西方将陷入瘫痪的状态，而海湾国家的财路也就断了。海湾合作委员会一面劝说萨达姆总统不要用“超级军旗”式飞机破坏伊朗的石油设施，一面又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建立快速干预部队以保护海峡的畅通；美国为维护本国的石油供应，增派了战舰，在海湾地区执行巡逻和护航任务，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了“毒刺”式防空导弹，还声称要以军事行动作出“迅速而坚决的反应”，以确保航道的畅通。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伊拉克首次用“超级军旗”袭击了一艘巴拿马油船。

第二天，伊朗袭击了靠近巴林的一艘科威特油轮作为报复。波斯湾的油轮冒着浓浓的黑烟和大火，把海水照成了血色，亮黑的浮油飘浮在海面上。仅五周内，就有十一艘船只受到两伊双方轮番袭击，其中十艘是油轮。

六月五日，五架沙特阿拉伯的战斗机在美国空军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的指挥下击落了一架伊朗战斗机。六月十日，一艘行进在卡塔尔附近的科威特油船被伊朗导弹击中。外部干预使形势逐步升级。这样你来我往的“袭船战”使伊朗的石油出口由每天的一百八十万桶锐减到七十万桶，伊朗的财政地位被严重削弱，只得放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到一九八五年二月，共有一

百零八艘船只遭到两伊飞机导弹的袭击，其中伊拉克袭击了八十四艘，伊朗袭击了二十四艘，“袭船战”并未能使战争停下来，也未导致战争无限扩大。

地面上双方依然处于“拉锯”式的消耗战。在巴格达北部的小城曼德利，曾经是一个风景幽美恬静、情调别具的小城。可如今一片凄凉、颓败的景象，机关门户紧闭，商店前垒着高高的沙袋，空地上一个个弹避坑，打坏了的路灯挂在大树上，校舍里书本狼藉……一位当地官员说，最多时全城一天要落下伊朗的炸弹三百多枚，城内的居民早已撤离，只剩下荷枪的士兵和民兵，他们显得疲惫不堪，眼中流露出痛苦、忧伤，更流露出他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伊朗似乎已看出萨达姆想停止战争的焦虑，把一味大规模的攻势改作小规模出击，力图以消耗战争来拖垮伊拉克。伊拉克也意识到袭船战只能达到减弱伊朗经济地位的目的，不能使其全面崩溃，他认为只将其战争的支柱——石油生产源彻底摧毁，才能达到使伊朗在和谈书上签字的目的。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伊朗预定的石油收入为二百三十五亿美元，哈尔克岛就担负了二百亿美元。“摧毁哈尔克岛”，伊拉克将轰炸红圈画在了哈尔克岛上，一个玉石俱焚的抉择纳入了萨达姆的战略计划。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伊拉克出动九架喷气式战斗轰炸机，避开哈尔克岛上的雷达和防空火系统，贴着水面低空飞至伊朗出口原油百分之九十的哈尔克岛上空，三十多吨炸药被泻在这个面积只有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港内装油的十艘油轮燃起熊熊大火，超级油轮码头和输油设备几乎全部陷入瘫痪，岛上的输油能力下降至不及原来的一半，国外的油船不敢再冒险去哈尔克岛装油。

“加强对伊拉克城镇的空袭，截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检查其是否载有向伊拉克运输的战争物资；进行局部动员；准备采取另一次大规模的地面进攻，选择伊拉克的石油目标实施攻击。”新就任的伊朗总统哈梅内伊毫不示弱地订出了他的报复计划。

九月六日，伊朗飞机深入伊拉克领土二百五十公里，摧毁了伊拉克的一个石油设施，并炸掉了一个雷达站。同时，加强哈尔克岛的防空能力，抢修被破坏的设施，以防备伊拉克再次袭击哈尔克岛。此后的三个月中，尽管伊拉克的飞机对哈尔克岛又实施了打击，彻底摧毁哈尔克岛的计划却流产了。

袭船战升级到袭击油田似乎并未起到任何效果，战争在僵持中进一步恶化升级。

相互袭击对方城市、残杀平民的已泯灭人性的战争恶性膨胀首先从伊拉克开始。萨达姆要袭击对方的城市，消耗对方的战争潜力，在后方的平民中引起厌战的恐慌，进而冲击决策者的战争意图，以扼制伊朗组织再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这一毫无人道的“以炸促谈”的非常招式成了萨达姆的杀手锏。

一九八五年三月初，伊拉克上百架战斗轰炸机先后对伊朗的三十多个城市发起大规模的袭击，其中包括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布歇赫尔等。炸弹疯狂、漫无目标地从空中泻落在平民区、市政大楼、学校、工厂、医院等，炸弹随时都会在伊朗城市中的每个角落爆炸。

这次袭城的初期，伊朗出人意料地沉默着，并未采用同样的方式袭击在其炮火射击的射程中的巴士拉，据有关人士分析，其主要是因为巴士拉中百分之九十八居民是什叶派穆斯林，伊朗怕袭击它会给国内的占绝大多数的

什叶派穆斯林带来反感，以影响其日益高昂的士气，再加之空中力量远远不如伊拉克，当炸弹在伊朗的阿瓦士钢厂和布什尔核电厂工地炸响时，伊朗再也无法掩饰其沉默的假面，霍梅尼在星期五的集会中终于痛下决心，“以牙还牙，决不示弱”。三月四日，伊朗出动数十架轰炸机扑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时间，巴格达城被硝烟笼罩着，居民们纷纷逃离家园。

双方的轮番轰炸其结果是战火将伊朗国内的战争热情再度升温，而伊拉克的首都却产生反战情绪，人们怨声载道。三月十五日，哈梅内伊总统在祈祷会上语态强硬地称“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对伊拉克的任何一个挑衅行动进行报复”。议长拉夫桑贾尼也宣称，“只要伊拉克今后对我们任何一个城市进行袭击，我们将以轰炸巴格达作为报复”。在伊朗的战争叫嚣声的急剧高涨下，袭城战暂时冷了下来。

这场为时半月的袭城战，使双方数万名无辜平民伤亡，十多万人无家可归。

在袭城战的同时，双方并未停止地面部队的相互屠杀。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伊拉克南部的胡维扎沼泽死一样的沉寂，灰暗的天空中一架架战斗轰炸机呼啸而过。无数伊朗士兵的尸体倒在沼泽地的边缘，有的浸浮在浅滩的水中，水色微微地泛起红色，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鬢发斑白的已佝偻的死者怀中紧搂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殉难者。生命在这片土地上异常的廉价。在伊拉克首都通往巴士拉的六号公路上，一辆灵车向北方急驶而去。庄严的清真寺广场前，每五六个人高举着一具具盖着红、白、黑三色国旗的棺木，一直到无法看清的尽头。巴格达市区内的街头巷尾散布着许多临时搭就的办丧事的拱门，随处都可见黑纱横幅。

这些惨景都是记者三月十一日伊朗在伊拉克在胡维扎沼泽地带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后看到的景况。三月十八日，伊拉克宣称赶走了伊朗的八个师，并打死伊朗士兵二万多人，伊朗方面则宣布打死打伤伊拉克军一千多人，俘虏三千人。

一九八六年二月九日，为了迎接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七周年，伊朗发动了一场预谋已久的代号为“曙光八号”的大规模攻击。

伊朗出动了五个正规师和青年卫队、青年旅约十万多人的兵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伊拉克突袭。北线将矛头指向巴士拉，将伊拉克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拖在这条战线上，使得伊朗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攻占了伊拉克东南端的法奥半岛。二月十三日，伊朗军队继续在南线推进，直逼与科威特毗邻的乌卡斯尔。获取一小场胜利后的伊朗部队在南北两线上又遇到伊拉克的顽强阻击。“曙光”的结果是使双方三万七千多人失去生命：伊朗损失了二万五千士兵，伊拉克的精锐部队——共和国警备师一万五千人全军覆没。

紧接着从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伊朗又在北线发动了“曙光九号”的进攻，将攻势的目标定在苏莱曼尼亚的东北部，距伊拉克的石油生产中心基尔库只有六十公里。伊朗军队占领了约五十个库尔德村庄、约二百平方英里的伊拉克领土。

面对伊朗来势汹汹的攻势和层层推进速度，萨达姆完全丧失了人性。他下令将大量的芥子气弹、光气炮弹、沙林榴弹等杀伤力极大的化学毒剂倾向伊朗士兵，无数的士兵一层层一排排地在毒气中倒下。八千五百名伊朗士兵死于毒气，据由西班牙、澳大利亚、瑞士和瑞典组成的联合国特别医疗小组报告说，由他们救助的受伤士兵中，至少有七百多名伊朗士兵死于毒气。

其惨状使人不忍目视，有人双手将喉管抓破，有的脸色乌黑，有的皮肤溃烂流着浓黑的血，有的牙关紧锁渗流着白沫……这次毒气攻势还无情的夺去成千上万名儿童的生命。

伊朗士兵的猛烈攻势和前所未有的推进，以及伊拉克明目张胆地违背国际法动用大量的化学武器（二战以后在战争中首次运用化学武器），这一切都震动了整个海湾地区和阿拉伯世界。

伊拉克军队竭尽全力，终于将伊朗军队阻止在乌姆卡斯尔，却无力将其从法奥半岛赶走。面对这一颓势，萨达姆更急于获得胜利，以维持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声誉和稳住伊拉克部队的士气。于是，伊拉克在五月中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攻取了伊朗的梅赫兰。萨达姆欲以梅赫兰换取法奥半岛。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伊朗在七月初发动了“卡巴拉一号”进攻，又夺回了梅赫兰，萨达姆交换的梦破灭了。

“必须要尽快给伊拉克政权以最后的彻底的打击。”伊朗政府高级发言人得意洋洋地宣称。

伊朗又开始策划下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为阻止或推迟这一时刻，伊拉克从七月中旬起，发动了一次对伊朗战略目标大范围实施空袭的战斗。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出动了上千架次飞机，对德黑兰、克尔曼沙赫和哈尔克岛的油船轮番轰炸。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二日，伊拉克出动了“幻影”式远程轰炸机群，飞越一千多公里，对伊朗的石油中转站锡里岛、拉腊岛及紧邻前苏联的中东最大的发电厂——纳卡进行了一番狂轰乱炸。

伊朗也多次派飞机对伊拉克的经济设施和边界城镇实施空袭，远程大炮每天将数吨的炮弹倾泻在伊拉克的边境重镇中。同时，在九月一日，又在北线发起了“卡巴拉二号”的进攻；九月三日在法奥半岛又发起“卡巴拉三号”攻势，这一系列行动似乎在向伊拉克证明它的空袭并不能动摇伊朗领导人的决心。你来我往的袭击使战争并未有任何显著有利于一方的进展，无数的平民与士兵颓然在倒下，双方的领导都忘却了生命的意义，一幢幢建筑物倒塌了、残缺了，一座座城市瞬间化成了废墟，街道上一个个弹坑中蓄积着被血浸得微红的污水，许多城市都成了空城，人们疲惫不堪地奔走于郊外与市区内，数以百万的人流离失所。

从一九八六年底伊朗开始了大规模的部队集结，精锐部队悄然地向南部战线集结，一百万部队屯兵于边界地区。伊拉克也倾几乎全部兵力约八十余万人推进到边界。似乎双方都决心进行最后一搏。

· 血色帷幕降下：战争的最后阶段和停火

两伊战争以来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攻势在伊朗的首先发难下展开了。战火直逼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死尸重重叠叠地铺满了整个战常这次空袭战双方都不惜一切地欲置对方于死地。成千上万的平民被炸死炸伤。伊朗邀请了四十二名外国记者采访南部前线。欲大发战争横财的各国争相与科威特达成协议。

美、苏、英、法争先恐后地向霍尔木兹海峡增派军舰。美国首次护航就遭到失败。美国直升机将伊朗布雷艇炸沉。伊拉克又发动“斋月行动”。俘虏中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十来岁的小孩。霍梅尼发表文告：无条件地接受联合国五百九十八号决议。

一九八七年伊始，两伊双方就在战场的南部和中部展开了厮杀，空中报复也交替升级，一场已耗战了七年的战争还激烈地持续着，人们无法去揣测这场战争还将打多久，这场二战后战争史上罕见的巨大的灾难还要将两伊人民推向什么样的深渊，全世界的人们忧虑着。

一九八七年一月九日，两伊战争以来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攻势在伊朗的首先发难下展开了。二十多万部队蜂涌般地从两伊边境地带沙勒谢赫一带发起总攻。经过四天多的厮杀，在无数血肉之躯的鲜血中，十三日伊朗军队突破了伊拉克的防线，直逼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在中部战线，伊朗在付出惨重的伤亡之代价后，收复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先后攻占了阿拉伯河的布瓦里安岛、博瓦林岛等四个岛屿，强渡贾西姆河，抢占了巴士拉城以东九公里的杜艾吉地区，还控制了沙勒谢赫——巴士拉公路的主要地段。

伊朗已占领了法奥半岛，如今又对巴士拉形成包围，若丢失了巴士拉，伊拉克就失去了通往海湾的出口，成了内陆国，并且将威胁到伊拉克最大的石油基地，那儿又是什叶派穆斯林聚集的地带，如果伊朗扶持一个伊拉克什叶派政权与复兴社会党抗衡，萨达姆的一切梦想就将彻底破灭。巴士拉能否守住与萨达姆及复兴社会党的生死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萨达姆亲临前线，并在巴士拉东、南、北三面筑起一条导弹、飞机、坦克相配合的立体防线，他要使他的士兵深信能抵御伊朗大军的攻击。

巴士拉城有近十万的伊拉克军队防守，把伊朗军队阻挡在阿斯玛人工养鱼湖与阿拉伯河航道之间的狭长的土地上。巴士拉城几乎每分钟都有炮弹落下来，一百万市民成了惊弓之鸟，纷纷逃离巴士拉。半个多月的激战，巴士拉经伊拉克军的顽强作战死守了下来。巴士拉的城郊，死尸重重叠叠地铺满着整个战场，土被染成了殷红色。

伊拉克在这场防守战中共有五万多人被打死打伤，损失战斗机五十多架次，尚有数名旅级军官被俘；同样，伊朗用了近十万人的生命也未能攻占梦寐以求的巴士拉。

二月二十六日，伊朗结束了长达六周的“卡巴拉五号”攻势。

二月二十八日深夜，伊朗又在巴士拉东部地区打响了“卡巴拉七号”的突袭，双方在渔湖西南和西北部展开殊死搏杀，依然无功而退。

紧接着四月七日至十二日，伊朗再次对巴士拉发动“卡巴拉八号”行动。四月下旬，伊朗在伊拉克西北部边境先后发动“卡巴拉九~十号”攻势，前后五次攻击的目标只有一个，即攻占巴士拉，历时三个月的残酷的两伊攻防战在巴士拉城郊结束了，双方又打了个平手。

在巴士拉攻防战的同时，双方还进行着激烈的空袭战，以往，空袭的目标主要针对军事目标、油田、油田设施等，对双方的首都和主要城市仅实施象征性空袭。

而这次双方都不惜一切地欲置对方于死地。从一月九日~二十三日，伊拉克就出动了四千多架次战斗轰炸机，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圣城”库姆、阿瓦士等十多个城实施狂轰滥炸，并集中对霍梅尼和他的助手在德黑兰的办公楼、霍梅尼在库姆的住宅进行重点攻击，伊拉克的导弹把库姆、比索通等一些城市炸得七零八落。伊朗立即采取了针对性报复，属于革命卫队的导弹部队将目标直指巴格达的伊拉克阿拉伯复兴党总部。驻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军舰趁夜用导弹袭击伊拉克的城市，交替升级的空袭战使大批建筑物化做废墟，成千上万的平民被炸死炸伤，尚未完工的建设项目被迫下马，商店

缩短营业，流离失所的市民为寻找一块安全的栖身之地整日奔波。

伊朗停止攻势后，为吹嘘自己已取得的胜利，伊朗邀请了四十二名外国记者采访南部前线。记者亲眼见到并拍下了战火后的阿瓦土城，曾经商品丰富、市场喧哗的一个南部繁荣城市，如今城市中人稀街静，树凋草枯，一派寥落景象，曾经果实累累的椰枣林，如今一棵棵被炮弹拦腰击断，或被战火烧得只剩一节焦木，满目尽是断壁残垣。郊外已不见七零八落、血肉模糊的尸体。但一片片新冢却密密匝匝地立在这片浸透着鲜血的土地上。

自一九八五年伊拉克首先开始袭船后，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七月，共有一百多艘非两伊国家的船只被击沉，一百多名非两伊的无辜海员丧生，国际间正常的贸易活动和航行受到严重影响。

一九八七年三月，科威特为保证自己的石油安全出口，同美、苏、英、法等国洽谈。为扩大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影响，欲大发战争横财的各国迫不及待地想与科威特达成协议。

苏联表示愿意向科威特出租悬挂苏联合国旗的油轮。

美国允许科威特十一艘油轮悬挂美国国旗，并派遣美国军舰护航。

随后，美、苏、英、法等国争先恐后地向霍尔木兹海峡内外增派军舰，本来就紧张且敏感的海湾地区形势更加紧张。

七月二十二日，美国的三艘军舰小心翼翼地护送着“布里奇顿”号和“加斯王子”号这两艘悬挂着美国国旗的科威特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缓缓行进着。整个世界静静地注视着这次直接影响海湾局势的发展的护航行动。“安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报告使白宫人士长长地吐了口气，一根绷得已快断的弦似乎松了一下。就在船队距科威特港口只剩下五小时行程时，即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七时，“轰”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惊得自以为已成功的美军无所适从，一枚小小的水雷把四十万吨的超级油轮“布里奇顿”号炸了个大洞。

首次护航就遭到失败。没有确实的证据，美国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它无法公开表明报复伊朗。

七月二十七日，霍梅尼无所顾忌地宣称：“把美国的牙齿敲掉。”拉夫桑贾尼宣布：科威特让超级大国卷入海湾，干预了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事务，伊朗将袭击任何胆敢支持伊拉克的国家的工业和其他沿海目标作为回敬，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哪怕只开一枪，伊朗人民将决不允许一个美国人在整个海峡地区活动。这一番声明使伊朗的反美情绪空前高涨。

美国在油轮战中的掺合使伊拉克长长地松了口气。萨达姆深深地明白油轮被炸的事件美国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同时，伊拉克在八月份对伊朗油轮发动了十多次袭击；伊朗毫不客气地袭击了伊拉克、科威特、日本、西班牙、希腊的油轮，并且加紧在海湾布设大量水雷。油轮大战进一步加剧了。

九月二十一日，美国的直升机袭击了伊朗的布雷艇，将其炸沉，并警告伊朗：如果美国的护航舰队遭到伊朗的袭击，就将出动巡航导弹实施报复。然而，自恃伊朗不敢轻举妄动的美国又一次失算了。

十月八日，在海湾中部偏北处，伊朗的三艘快艇向美国一架直升机开火。美国直升机迅即还击，击沉了一艘快艇，俘获了另外两艘快艇。十月十九日，美国又袭击了伊朗的石油钻井台。自此，伊朗的“领袖”总算冷静了，不再轻举妄动。

两国的油轮大战仅一九八七年一年内，就有一百五十多艘船只遭到袭

击。

七年，这场艰苦的拉锯战、漫长的消耗战，已使两国几乎完全陷入困境。孤立而疲惫不堪的伊朗最终放弃了它对伊拉克的“最后攻势”。

由于超级大国的插入和明显的偏袒，以及伊朗的退却，伊拉克终于等到了它所期待已久的良机。一九八八年四月中旬起，在三个月的时间中，伊拉克集中全部精锐兵力陆续向境内的伊朗军队发起猛攻，先后夺回了法奥半岛、沙拉姆杰地区、马季农岛、祖培达特地区以及北部的部分山区，将伊朗军队逼回伊朗境内，使其基本回复到一九八一年战争爆发前期的情况，四月十七日，伊拉克军队改变了以往被动防御的战略，出其不意地向两年前被伊朗军队攻占的法奥半岛发动了代号为“斋月行动”的闪电式攻击，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激战，法奥终于被夺回来了。在法奥的公路两旁，一辆辆残损的伊朗坦克、装甲车、炮车和辎重车被遗弃在那儿。无边无际、寸草不长的盐碱地上，战壕坍塌、弹坑累累。整个法奥半岛满目疮痍、一片废墟。

法奥市上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一座巨型储油罐在燃烧，厚钢板被烧得通红。

周围还有以前战火中被炸或烧塌的近百个巨型圆柱储油罐，一个个东倒西歪，满是锈迹。昔日向海湾输油的管道和运油船已变成了一堆废铁。

“斋月行动”结束后伊拉克歼灭了伊朗三个师，打死打伤数千人。

五月二十五日，伊拉克又出动第三军团的两个师和共和国卫队的三个师向萨达姆杰地区进攻，消灭伊朗守军五个旅共九千五百多人。

六月十四日，伊拉克出动了三个多师的兵力，向位于苏莱曼利亚省的哈勒卜加镇及其周围战略高地发动了代号“真主使者穆罕默德”的攻势。一场激战后，伊拉克夺回全部失地并攻占了部分伊朗领土。

在伊朗部队的防御工事里，一具具尸体成仰、成卧地倒在那里，仓促退却时丢下的武器弹药和生活用品以及一些笔记本和未发出的家信遍地都是，被炮弹炸起来的浮土半掩着的尸体在烈日下散发出一股股令人窒息的恶臭。在临时俘虏营中，伊朗俘虏一个个垂头丧气，他们中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十来岁的小孩。有一个十多岁战俘还掏出他家的电话号码，哀求采访的记者转告他家，他还活着。另一个十多岁的小战俘捧着断臂蹲在墙脚发着呆。

至此，两伊都沉默下来，一切军事行动都停止了。两伊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既不战也不和。

国际社会敏感地抓住了这一时机，频繁的外交活动围绕着两伊展开了。终于，在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日，联合国通过的要求两伊实现停火的五百九十八号决议发布一周年之际，霍梅尼发表文告：无条件地接受五百九十八号决议。

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结束了，没有胜者，一场演绎了八年的灾难结束了。

黑色枢衣：战争的悲惨结局和灾难性影响

伤亡总数相当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四次中东战争伤亡人数的十二倍。直接经济损失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经济损失的五倍。仅伊朗首都德黑兰就有二十万妇女失去丈夫。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化学武器等几乎各式现代化武器。一向缺少劳

动力的伊拉克竟出现失业现象。有些地方鲜有完整的家庭。无数伊朗士兵中毒后失明、聋哑。伊拉克战前外汇储备有三百多亿美元，战后外债高达一千亿美元。大量被炸油轮的原油流入海湾造成严重污染。

据统计，激战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双方死亡约六十多万人，伤九十五万人，伤亡总数相当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四次中东战争伤亡人数的十二倍。

双方共损失飞机四百余架，坦克三千五百辆，火炮二千七百门，舰艇三十一艘。

双方被袭击的船只近五百艘。

由战争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九千亿美元，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经济损失的五倍。

这一系列数字性的罗列也许还很难使人触及到两伊战争给两伊人民乃至世界带来的灾难。

两伊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持久和最残忍的地区冲突。遭受轰炸地区的灾民多达三百多万。仅伊朗首都德黑兰就有二十万妇女失去丈夫。在这次战争中，使用了除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以外的几乎各式现代化武器，其中包括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和化学武器。

八年的两伊战争使伊拉克元气大伤，产油设备遭到破坏，海上油路中断，石油产量锐减，石油收入竟不及战争前的百分之一。战争使得伊拉克债台高筑，据西方观察家估计外债约八百—一千亿美元之间，资金的缺乏使国家财政和国民生活均处于艰难状态。一向缺少劳动力的伊拉克开始出现失业，通货膨胀率达每年百分之四十。

在巴格达的艾卜·努瓦斯大街上有一处买烤鱼的店铺，战争前这儿生意异常兴隆，整条大街也是一片繁荣的景象，战争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烤鱼的价格直线上升，大的五十第纳尔一条（一第纳尔合人民币六元），小的也要三十第纳尔，门前顾客寥寥，生意冷落，一切已失去往昔的景象。

伊拉克的食品也出现短缺，食品全部由国家统一实行凭票供应制。每天在食品店门口人们为买面包和饼干需要排很长的队。

战争结束后，伊拉克有些地方鲜有完整的家庭，一家失去几个亲人的屡见不鲜。

政府向殉难家属实施了一种抚恤办法：战死一名官兵，发给其家属一辆小汽车。街上穿着丧服而面无表情的妇女驾着用自己的丈夫或儿子的生命换来的车，这种车不时会出现好几辆。

在伊朗，仅首都德黑兰在八年战争中，全市遭受导弹一百三十三枚，死一千七百人，伤八千五百人。伊朗一军方人士告诉前去采访的记者：一个导弹，一个“化弹”（化学武器），成了战争后伊朗的致命伤。导弹动摇了民意，化弹涣散了军心。

一九八八年初夏，伊拉克为迫使伊朗接受停火，在战场上大量使用化学武器，到处施放“化弹”，毒烟弥漫，天空都变了颜色，无数士兵中毒后失明、聋哑，就连死状也让人惨不忍睹。火焰喷发器将人燃成了一团蜷曲的焦灰。

伊朗在八年战争中死亡达四十万人。失去亲人的家庭比比皆是，大街小巷挂着许许多多在前线阵亡的官兵的照片。

往昔，每到夏末，伊朗的海滨聚集着无数来自各个国家的游客。而现在所有沿海公路上，见不到一辆旅游车。国家管理的旅游胜地杂草丛生，据当地人说：这儿一个村有近千户人家，七成以上的青年上了前线，战死，或伤，或俘虏，有的下落不明，留下一群孤儿寡母或年迈父母，能劳动的人一个都没有了。

由于战争耗资巨大，伊朗国家货币里亚尔越来越不值钱，它同美元的自由比值由原来的一百七十五比十一落到一千五百比一。

石油生产是伊拉克和伊朗两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占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石油出口占国家外汇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粮食则有一半靠进口。由于双方不停的袭油战、袭城战，石油的出口减少了近百分之七十，石油设施遭到极大程度的破坏，一切都有待重建，许多工厂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由于战事，可耕作的土地大量荒芜，加之债台高筑，各种生活用品奇缺。

战争期间，双方不断扩充军备，八年的消耗战使得两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仅伊拉克战前外汇储备有三百多亿美元，战后外债高达一千亿美元。

再看看两伊战争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灾难，据美国《时代》周刊提供的数字表明：日本从海湾地区进口石油占其国内石油消费量的百分之六十四，法国百分之三十五，美国百分之二十一，意大利百分之三十二，英国百分之十四，德国百分之十五。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发展与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和油价波动紧密相关。

自战争开始后，世界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特别是双方展开袭油战后。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美国中质原油每桶上涨近三美元；在欧洲现货市场，原油每桶上涨近五美元。涨幅最高时，一周每桶油价就上涨了三至五美元。

石油的涨价使许多国家的炼油厂开工不足，不得不解雇工人。特别是那些经济上严重依赖石油的国家，会因此而放慢经济的增长速度，并带来大量的工人失业。

美国一些报刊曾发表评论说，如果袭油战再继续下去，战争再拖下去，纽约夜晚的灯火将不会那么明亮，“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会变得暗淡无光。

另外，大量被炸油轮的油流入海湾造成严重污染，对海湾水域中丰富的“原料工厂”，即浮游植物的生产带来打击。浮游植物是细微的漂浮植物，他们构成了整个海洋生物链的基础。由于大片浮油覆盖水面，阳光不能穿透水层，浮游植物就无法生存下去，从而威胁着海洋生物链。这将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并影响海湾沿岸国家居民的饮水。

两伊战争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广泛而严重的。毫无疑问，这场地区性冲突给两国自身和世界带来的灾难在有形的之后尚隐着许多无形的、无法估计的灾难。

“玫瑰与亲吻”：要和平不要战争灾难

短短一百年间，世界各地就发生了大大小小三百多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于战场的有一千多万人，战祸波及的人口在十三亿以上。广岛惨剧造成十余万人死亡，几十万人受伤。历时十二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世界能源危机。英阿马岛之战短短两个多月，损失骇人听闻。波黑“内战”一年伤亡十几万人，难民人数达二百万。生命在战争中萎缩了。

丢弃战争、暴力这种已陈旧、腐朽而狭隘的人类垃圾。人类向往回到和平与爱的本性。

二十世纪这短短的一百年间，世界各地就发生了大大小小三百多次战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范围内每天都有枪炮声。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德国对俄宣战，拉开了战火蔓延了大半个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帷幕。四年间，同盟国集团（德、奥—匈）同协约国集团（法、英、俄）之间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拼得你死我活。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运用了坦克、飞机、化学武器等先进而且极度残忍的武器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国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交战双方直接参战人员达二千九百多万人，死于战场的有一千多万人，战祸波及的人口在十三亿以上，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达二千七百亿美元。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凌晨四时十五分，德国对波兰大举进攻，又将人类推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祸中。这场战争中，仅广岛的一颗原子弹，当时就造成七万余人死亡，几十万人受伤，几秒钟的爆炸危害广岛五十多年。这次人类史上第一次核武器的运用，将人类推入了核恐慌中。许多国家在此后展开以核武器为主的军备竞赛。

一九六一年，在美国的强权干预下，爆发了本世纪最持久的越南战争，整个战争历时十二年之久，仅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就有五十万军队参战，花费了五千亿美元军费，各式各样的先进武器除核武器等极度杀伤力的武器之外全派上了战场。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突然攻击。拉开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幕布，虽然为时不足一个月，却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打击。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以逐渐削减石油产量百分之五来威逼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撤军，并提高原油价格百分之七十，致使原油减产和油价上涨，而引发了当时的世界能源危机。

一九八二年阿根廷和英国爆发了为争夺马尔维纳斯岛（即福克兰群岛）而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海空战争。这场战争历时七十四天，英国出动了海军实力的二分之一、飞机一百四十架，总兵力二万七千多人；阿根廷投入了近二百架飞机，十几艘主要舰艇，守岛兵力一万余人。短短两个多月，双方物质损失骇人听闻，英国有十九架飞机被击落，七艘战舰被击沉，十艘战舰被击伤；阿根廷损失了一百零四架飞机、九艘战舰。英国为这次远征付出了二十亿美元的费用。

一九九一年六月，信奉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人宣布从南斯拉夫中独立，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坚决反对，内战随之而起。一九九二年一月，穆斯林占绝对多数的波黑共和国又宣告独立，三月，内战转入波黑境内。到年底伤亡人数已达十万，难民人数二百万。

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一次接一次的灾难，人类拿着自己发明的枪炮屠杀自己，一部分人野性的勃发，将无数无辜的人们推入战火的凄楚之中，生命在战争中萎缩了。

人类的天性是向往美好的，进入新世纪之际，人类应该回顾一下二十世纪这个灾难重重的时代，丢弃战争、暴力这种已陈旧、腐朽而狭隘的人类垃圾，共同创建和平，步入一个充满博爱、宽容的大同世界。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捷克诗人塞弗尔特有一句诗：假如让女人来操纵大炮，落到大地上的将是玫瑰与亲吻。

人类不要战争灾难！人类向往回到和平与爱的本性。

